為毛主席而戰

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

何蜀——著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為毛主席而戰

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

何蜀——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責任編輯　楊　帆
書籍設計　吳冠曼

叢 書 名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書　　名　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
著　　者　何　蜀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香港九龍塘聯福道 34 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深圳市恆特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民治橫嶺村恆特美印刷工業園
版　　次　2010 年 8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 開（168 × 230 mm）39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995-8
© 2010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出版説明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是香港三聯書店和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合作出版的第一個重要項目。

由2009年9月開始，這個項目正式起動，我們將聯合出版有關研究中國當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環境等方面的專著、合著、論文集等。這套叢書，設計初期每年出版約十種。除了有選擇地收入浸會大學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外，我們將熱誠歡迎本港及海內外學術界提供資料豐富、有分析、有新見，同時又簡明可讀的有關當代中國包括內地、台灣、港澳及中外關係的研究著作。

期望本叢書可以見證當代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各領域的全面發展及其發展路程中艱難跋涉的印跡。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重慶市老城中心的解放碑舊貌。文革中是群衆集會的重要地點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967年初重慶造反派召開的一次批鬥走資派大會（周致仁提供）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966年12月17日的首都工人體育場全國造反派集會。羅廣斌在這次會上代表重慶造反派「一二·四」慘案控訴團作了發言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967年武鬥停息後，在剛建成的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死難同學「烈士墓」碑下，幾個中學生手持衝鋒槍留影，表示「揮淚繼承烈士志，誓將遺願化宏圖」（廣韓提供）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967年武鬥停息後，一些同學在剛建成的重慶大學「烈士陵園」大門前留影（黃順義提供）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武鬥中的西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一群女生。照片上題有她們的誓言「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原載《西南師大附中老三屆校友聚會紀念冊》）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967年4月7日，要求砸爛革聯會的井岡山紅衛兵遊行隊伍經過解放碑旁（黃開全提供）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本书由 http://www.dztsg.com 提供

重慶八一五派創作演出的《八一五風暴》大歌舞（周孜仁提供）

目　錄

序：是文化的革命還是武鬥？（徐友漁）

序（啟之）

引子

第一章　北京吹來動亂風

任白戈被《紅旗》雜誌點名　4

鄭思群之死　10

八一五事件　15

各級黨委號召「炮打」自己　21

「八二八，扯頭髮」　25

重大八一五上京告狀　31

動手打人為何成風　36

官辦保守派組織率先打、砸、搶　39

中學生紅衛兵「逼上梁山」　44

造反派代表上了天安門　48

第二章　造反之火燃向全社會

官辦的工人糾察隊及「保皇四軍」　54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平反　57
工礦企業造反派的崛起　60
機關幹部紛紛造反　67
小說《紅巖》作者造反了　69
少年兒童也有兩派組織　74
保守派組織的分化　79

第三章　首開大規模武鬥先例

兩軍對壘　86
萬人大武鬥血濺體育場　89
「親愛的戰友你在哪裡」　94
「烈士」真相　100
全國造反派集會為「烈士」默哀　104

第四章　兩大派分道揚鑣

造反派自行「大亂」　110
「一四」大會使矛盾公開　112
從「調查團」到「聯絡站」　113
保守派組織退出歷史舞台　115
革聯會成立名單背後　118
重慶駐軍空前的武裝大遊行　122
「黑電文」　125
羅廣斌之死　127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五章　都是「復辟逆流」

臨時最高權力機構　134

「救世主」　136

「鎮壓反革命」　140

「三大右派組織」　145

「鎮反」抓了多少人　148

炮轟革聯會　152

迅速壯大的砸派　157

「紅五條」引發更大衝突　160

針鋒相對的兩派大遊行　166

第六章　武鬥在制止中升級

從動拳頭到拚鋼釬　170

毛澤東稱讚五十四軍　174

中學生紅衛兵交出《遺書》　176

兩派大武鬥拉開序幕　178

熊代富被俘　183

警司公函與軍工井岡山覆函　185

第七章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全面內戰」

「七七」槍聲　190

兩派都要打「人民戰爭」　191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從「七二五」走向「全面內戰」 194
反到底派打開軍火庫 201
血戰楊家坪 203
喋血楊柳街 204
「八八海戰」 207
解放碑旁的激戰：攻打「完蛋就完蛋」廣播站 213
炮火中的「八一五」週年紀念 219
惡戰潘家坪 224
重大八一五遭受重創 228
「八二二」寬銀幕電影院事件 231

第八章 從停火交槍到解散組織

邊談邊打的「重慶談判」 238
出人意外的林園血案 243
武鬥間歇中的「文鬥」高潮 247
「三一五」指示引發新一輪武鬥 252
「全面內戰」為何再掀高潮 256
周恩來說：「重慶不能再亂了」 259
革命委員會成立與最後的惡戰 262
文革群眾組織的終結 267

第九章 重慶大武鬥面面觀

武鬥中的軍隊 274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武鬥中的專業武鬥隊　278
武鬥中的「烈士」　289
武鬥中的虐俘與殺俘　297
武鬥中的「第三條道路」　304
武鬥中的報紙、廣播　307
武鬥中的文藝　312
武鬥時期的市容　326
武鬥時期的市民生活　330
毛澤東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347

尾聲　無言的墓群

後記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序：是文化的革命還是武鬥？

徐友漁

不論是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專門研究者，還是一般想瞭解那一段歷史的人，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都是值得一讀的好書。作者以歷史研究者的素養和功力，客觀、冷靜地敘述了以派性武鬥為主要內容的重慶文革歷程，提供了一幅生動、全面、可信的畫卷。作者對於文革有親身經歷，能夠輕易區分什麼是宣傳，什麼是實質，能夠在文革中喧囂的官方宣傳和派別組織宣傳中把握運動進程、轉折的真實意圖和原因。作者雖然身處中國西南，但與許多孤獨思考、單兵作戰的文革寫作者不同，他與國內、海外的同行有密切接觸、交流，對於海內外有關文革研究的概況和動向瞭解甚多，因此避免了一些人難免的閉塞與偏狹，視野開闊、論述中肯。

書名《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準確地揭示了文革的實質，發人深省。文革一開始以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塑造一代共產主義新人相標榜，這不但贏得青年學生和全國人民的狂熱支持，而且使得全世界天真的理想主義者浮想聯翩，似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實現社會公正、平等，把人性改造為絕對純潔無私的嘗試。本書揭示，文革根本與文化無關，武鬥是文革邏輯的必然產物；本書還披露，武鬥其實完全在文革發動者的預料之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本書以翔實的材料說明，大規模武鬥是在文革發動者的縱容和煽動下釀成和擴大的。

不少人——特別是回憶文革迫害官員和知識分子的人——把文革中的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武鬥理解和描述為拳腳相向的毆打，對於身受其害的人來說，這是自然的，但這只是文革中武鬥的一個方面。大規模的、成建制的、使用槍炮的武鬥則是延續時間更長、席捲人數更多、引起傷亡更嚴重、破壞更大的武鬥，這種武鬥使廠房、商店、圖書館、實驗室夷為平地，使成千上萬的人流離失所，使衝鋒在戰場的青年像被收割的稻禾般成片倒地。本書對前一種武鬥有所描述，更着力說明和分析的則是後一種武鬥。

作者認為，投入血腥武鬥的兩派誓不兩立，但從根本上說並無是非與善惡之分。他們都是以「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己任，都能從「毛主席的偉大教導」中、從文革的綱領中得到啟示和根據，都能從當權的「中央首長」的指示和講話中獲得鼓舞士氣的表態，都能從「無產階級司令部」信任的某支軍隊、某個官員那裡得到明確的支持。那麼，他們到底為誰而戰，傷者為誰流血，死者為誰而亡？所有的組織都宣稱自己是為毛主席而戰，都把本派死者加封為「英勇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犧牲的烈士」，儘管會有偶然和例外，儘管參與武鬥的動因並不單一，儘管人們事後不一定堅持當時的信念，但從根本上說，他們確實是在為毛澤東而戰，這就揭示了悲劇的根源。

文革中，全國各地武鬥急劇升級，派性鬥爭惡性發展，久久不能平息，最重要的原因是軍隊的介入。軍隊是群眾組織的靠山，他們利用自己的力量和權威支持一派、壓制打擊一派，在背後出謀劃策和指揮，甚至以變相手法發槍給自己的一派。這一切，都是出於毛澤東「軍隊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甚至「武裝左派」、「發槍給左派」都是出自毛澤東之口。這聽起來匪夷所思，但其中自有政治考慮和利害計算。讀了這部著作，人們才會理解那些原來不可理喻、不可想像的事情，當然，儘管其中的理路和計算是清楚的，但其動機和做法仍然是瘋狂的。

軍隊在文革中的作用極其巨大，但在武鬥中所起的實際作用因為往往發生在幕後而不易為人所知。重慶的文革歷程讓我們得到難得的瞭解、研究這方面情況的機會，因為重慶駐軍是「王牌軍」之一，他們有恃無恐，行事較少隱晦，他們與一派組織的戰友關係在全國是最明顯和最典型的。作者充分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利用了自己身在重慶的有利條件，本書在這方面的說明與分析，將對下一步深入研究文革起到示範作用。

何蜀專心致志、鍥而不捨，在打撈歷史記憶、還原文革真實方面作出了可觀的成績，我祝願他不斷有新著問世，為他自己，為我們大家，也為下一代。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序

啟之

這本書有三個關鍵詞：毛澤東、武鬥、造反派。[1] 它們組成了一個歷史紐帶，紐帶的兩端是人——發動文革的偉大領袖和追隨他的億萬激進群眾；中間是事——大大小小的武力衝突，以及由此帶來的傷殘、屍骨和墳墓。通過對這些人物、事件的詳實敘述與精闢分析，作者為文革的主體階段（1966—1969）梳理出了一個不可動搖的邏輯鏈條。

這個邏輯鏈條為我們揭示了毛澤東、武鬥和造反派三者間的關係——毛澤東既是造反派的後台，又是造反派的殺手；既是武鬥的支持者，又是武鬥的終結者。武鬥是中共操控的群眾運動所達到的最高形式，對於毛澤東來說，武鬥是他完成「天下大亂」的工具——1967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接見阿中友協代表團時對此做了坦率的說明：「要打就打，我主張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厲害的地方，解決問題比較容易。北京不疼不癢，太文明了。」

利用這個工具，毛澤東達到了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支持革命左派，重新建黨建政的目的。時至今日，很多當年的親歷者仍無法理解，1968年春，在中央發佈了禁止武鬥的「九五命令」，號

1　造反派至少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穩健派，另一類是激進派。前者反對武鬥，後者主張武鬥。本文所說的造反派指的是後者。參見周倫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書屋2006年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召大聯合，且大力「圍剿派性」的情況下，為什麼全國上下會再次掀起「全面內戰」的高潮。本書作者通過嚴密的考證，為我們揭開了謎底：早在1968年4月，毛澤東就制定了對付武鬥的「四不方針」——「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一未曾公開的「戰略部署」使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和北京衛戍區停止了對清華大學武鬥的干預。「在武鬥愈演愈烈，死人的事已經不斷發生之後，處於劣勢的四一四總部組織人馬到北京市中心去展開『文攻』。但是，無論他們採取什麼手段：奔走呼號、遊行示威、靜坐抗議，甚至抬屍遊行，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採取措施制止清華武鬥，實行軍管，中央和北京市就是不聞不問。」作者引用了清華大學四一四「理論家」周泉纓的話：「中央的這種政策的存在，實際上是在支持蒯大富，讓他放開手腳，堅決果斷地用武力解決四一四派的問題，從而一統清華大學的天下……」作者隨後指出：「在毛澤東還指望他所欣賞的『左派』能夠以武力強行征服對立派的時候，『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不可能為制止武鬥採取真正有效的措施的。而各地的造反派，特別是被當地駐軍認定為『左派』的一派群眾組織，正是受到了這種秘而不宣的『戰略部署』的縱容和鼓勵，才得以把『全面內戰』的野火燃得更為熾烈。」

對於造反派來說，武鬥具有多種功能——它是擴大勢力的途徑，是壓倒對方的砝碼，是革命意志的試金石，是報仇雪恨的英雄榜，是人民戰爭思想的實驗場，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浪漫曲……而這些功能大多是以「自衛」為號召、為藉口的——為悼念兩位「死難烈士」，1967年8月2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主辦的《八一五戰報》（第34期）以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了《踏着烈士的血跡前進》的編輯部文章：「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敵人是不會放下屠刀，也不會立地成佛的！當敵人舉起大刀、長矛、槍支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不能祈禱，不能哀求，恰恰相反，我們必須武裝起來，照樣辦理，拿起大刀！拿起長矛！拿起槍支！拿起一切可以拿起的武器，自衛！自衛！！自衛！！！」

然而，直到文革結束，人們才發現武鬥的另一個功能——它是「造反派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歷史上最黑暗最荒唐的篇章」。[1] 它在為毛澤東取締群眾組織提供了充足理由的同時，也給造反派的履歷上塗上了不可磨滅的反人道污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徐友漁認為，「手執長矛、衝鋒槍，殺紅了眼的造反派」與「德國法西斯的青年納粹運動十分相似」。[2] 作者無限感慨地告訴我們，在「徹底否定文革」的口號下，「當年在重慶的許多學校、工廠，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園或花圃（如市體育館、朝天門碼頭、上清寺轉盤、楊家坪轉盤、嘉陵江大橋頭等地），都曾修建有武鬥『烈士墓』。但是後來都被平毀了……那些年輕的『烈士』或曰『冤士』，曾經滿懷豪情地『為毛主席而戰』，最終卻死無葬身之地。」

在文革研究中，造反派與毛澤東的關係是最複雜也最有爭議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作者似乎傾向於「利用說」，即毛澤東利用了造反派。大陸文革學者周倫佐不同意這一觀點。在其富有創見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書中，周氏頗有信服力地提出了「契合說」，即造反派與毛澤東具有某些「利益契合點」。周氏認為，一方面，毛澤東具有鮮明的「非制度化」個性，「喜歡支配人而非遵令行事，喜歡建立團體而非隸屬其下，喜歡制定行為規則而非受其束縛。」[3] 另一方面，毛澤東懷抱着以「興無滅資」為表象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社會理想。[4] 造反派身上有兩個東西，「一是年輕人青春期特有的非制度化傾向，二是下層民眾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級歧視的衝動。這正是文革中民間造反行動與毛澤東政治行為之間的兩大契合點」。[5] 文革之

---

1 周倫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書屋2006年版95頁。

2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139—140頁。

3 周倫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書屋2006年版176頁。

4 這一「社會理想結構的正向所堅持和追求的，其實是蒙上『無產階級』言詞假象的封建專制主義；其反向所防止和反對的，恰好是隱藏在『資本主義』言詞假象之下的民主社會主義，以及由此進一步轉向現代民主社會的歷史可能性」。周倫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書屋2006年版186頁。

5 周倫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書屋2006年版194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初，是造反派與毛澤東的「蜜月期」，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政治目的，與造反派反等級、反迫害的心理相契合，從而上演了一齣毛澤東批判資反路線，造反派驅逐工作組，搶奪「黑材料」，抗擊保守派的「活報劇」。毛澤東要摧毀各級修正主義，重新建黨建政，與造反派的反官僚、反權威的心理相契合，群眾組織遂風起雲湧。然而，這個「蜜月」是短暫的，其原因和過程，本書作者為我們做了生動的描述和令人信服的剖析。

與許多有識之士一樣，作者對造成武鬥的思想源頭做了深入的思考：「組成武鬥隊的多是熱血青年（也有少數是少年），他們都是在『文革』前17年接受的『無產階級政治』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從小崇拜的是『革命英雄』，他們的許多行為方式，其實都是在模仿小說中或電影裡的紅軍、八路軍、解放軍。」17年教育的核心是階級鬥爭，它製造的是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社會等級觀念，培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心理，淬煉的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錢理群語）的「革命英雄主義」情操。這種觀念、心理和感情如浸油之薪，只待星星之火。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猶如一把烈火，投向了紅旗下長大的一代，浸油之薪轟然而燃，大火熊熊，迅成燎原之勢。武鬥就是這燎原大火釋放出的最大能量——既然這場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那麼，武鬥就有了強大的理論支持。作者精闢地指出：「在這裡，當年的造反派已經把自己比作昔日與執政的國民黨作鬥爭的共產黨了。與之相應，對立派顯然就被視為當年的『國民黨反動派』了。當時兩派都是這樣認識問題的。這也是武鬥得以打起來並且越打越大的思想基礎。」作者提醒世人，正是17年的洗腦，將這些熱血青年推向了互相殘殺的荒謬境地。

在研究文革的中外著作中，此書是第一部研究武鬥的專著。武鬥是群眾組織的行為，群眾組織是群眾運動的產物，此書的可貴之處在於，它為大眾心理學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我曾這樣設想，如果作者轉換一下角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度，以其豐厚的史實積累、獨到的問題意識和執着的鑽研精神，對這些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做一番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那麼，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有另一個第一部——第一部研究文革群眾心理的專著——擺在我們面前，它將為文革研究開闢新天地；它將與國際接軌，提升、深化文革研究。

法國大革命，德國法西斯，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無一不是群眾運動的產物。經過歐美學者的不懈探索，社會心理學家發現了這些運動的共同點：在群體中，越是激進的口號，越容易被接受；越是簡單化絕對化的思維方式，越受歡迎。一個膽小、善良、理性且守法的個體，一旦成為群眾運動中的一員，就完全可能變成另一個人，一個目無法紀、殺人放火、狂熱偏狹的暴民。還有，一個製造冤獄的群眾運動，同時也會成為淨化道德的教堂，那些在廣場連向反對派行兇的惡徒，在自己的隊伍裡則是一位道德高尚之士……[1]

這些可以稱為定理的心理症候，在文革中隨處可見。我們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那些含糊的、混亂的、沒有分析和限定的隻言片語，會成為群眾運動的指南；為什麼重大八一五中的穩健派呼籲放棄武鬥的理性之聲，群眾置之不理，反之，激進造反派毫無理性地兩次衝擊保守派改過自新的會場，卻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和擁戴；為什麼在重慶大武鬥中，雙方的專業武鬥隊都清廉自律，除了享受「供給制」的待遇外，沒有任何「物質刺激」，他們看不起參加武鬥多記工分的農民，對睡在身邊的女性秋毫無犯……

在2006年以前，我沒見過本書作者何蜀先生，只是從網上，從海外出版物，從王年一、徐友漁、印紅標、唐少傑等研究文革的朋友中，看到、聽到他的名字。2006年3月，國內的文革研究者在北京召開國際研討會，紀念文革發動四十週年。在這個會上，我才見到何蜀——一個皮膚白皙、舉止穩重、言談頗有條理的中年學者。他的學養和為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此決定請他為我的《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做序。這是一個無名無利，可能還會賈禍的苦差，而他慨然應允。

前不久，一位朋友聽說我要給此書寫序，馬上報之以「你們這是文人相親，

1　詳見（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德）埃利亞斯·卡內提《群眾與權力》，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美）埃里克·霍弗《狂熱分子：碼頭工人哲學家的沉思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互相吹捧」的譏嘲。當時的我，似乎覺得自己做錯了事，面紅耳赤，不知如何答對。事後，我想，出此語者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十年浩劫結束之日，就是文革研究禁止之時。在迄今的32年中，歷史真相的探求始終飽受政治、經濟、文化的多重壓迫——史料嚴密封鎖，會議嚴禁召開，文章無處發表，書刊無法出版，有單位者常受領導打壓，無單位者頗煩國安「關照」。商家用「紅色經典」謀利，學府卻奉文革為禁區。電視以百家之名，行一家之實，逃避至古代文史之中。有司以名利為餌，驅學者入彀，歌吟於紫台魏闕之側。掩蓋真相，歪曲歷史，鼓吹遺忘已成為學界的「潛規則」。

正是此種語境造成了這樣的奇觀：經歷文革者，滔滔者天下皆是；直面浩劫者，寥寥然舉世罕有；而矢志研究者，則鳳毛麟角。這些「毛角」之人，在世人眼裡是怪物、畸零人、不識時務者。在官方那裡，則被視為搗亂分子、不安定因素、心懷叵測之徒。就是在這樣的氛圍裡，何蜀在供職餬口之餘，以搜集文革史料，研究文革歷史為職志。數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成果纍纍。其著述文章，縱不容於時，但必將久傳於世。我們的「文人相親」，是同道之間的鼓勵和寬慰，是學術之中的探討與爭鳴。至於我是否「吹捧」了這本書，大家開卷之後自有公斷，何蜀是否「吹捧」了我的書，俟拙著問世後亦會大白。

北京 枯柳樹

2008年6月26日初稿

2008年7月6日修改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大众图书馆 http://dzisg.info

引　子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　　——重慶八一五派的誓言

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　　——重慶反到底派的誓言

武鬥，即以武力（暴力）手段進行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革命辭典中的專有詞彙，它伴隨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運動而出現。從20世紀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到40—50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及此後的「三反」、「五反」、「整風整社」，直到「四清」、文化大革命……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中幾乎都會出現武鬥，只是手段不同，程度不同，規模不同，後果不同而已。

「武鬥」一詞，在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正式出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8月8日，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其中，特別規定：

「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這樣的說法，起初讓許多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感到意外——既然是一場「文化」大革命，怎麼可能出現「武鬥」？

然而，這正說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對此早已成竹在胸，他們根據歷來領導群眾運動（或曰「運動群眾」）的經驗，早已預計到會出現武鬥，而且武鬥的手段及規模、後果都將大大超過以往那些政治運動。因此，他們才會特別在指導運動的「綱領性文件」中破天荒地、史無前例地作出了這樣明確的文字規定。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中國的廣大老百姓，這時才第一次聽說了「武鬥」這個新名詞。

誰也想不到，武鬥竟會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成為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

在這場「全面內戰」中，重慶的武鬥，無論規模或影響，都成為全國之冠。

毛澤東1967年9月19日在武漢接見湖北省新任領導人曾思玉、劉豐時，陪同的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談到：「聽說重慶打了一萬多發炮彈，開始也不大相信，以後聽梁興初同志講為什麼打，怎麼打的，都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好，這是個訓練，戰備演習，拿了槍炮，不打不過癮。」[1]

江青在1968年3月15日與周恩來等一起接見四川軍政領導人時的講話中說：「特別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2]

周恩來1968年為北京南苑大武鬥批評七機部造反派「九一六」負責人葉正光（抗日戰爭中著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之子）時，說：「你們打得還不夠格，你們向重慶學習嘛，也去燒房子，也去開坦克。」[3]

……

總之，重慶的武鬥，已經成為吸引最高領導人目光的一大焦點。

重慶武鬥為什麼會打得這麼厲害？它是怎樣發展起來的？要瞭解這一點，就必須瞭解重慶是怎樣陷入文革大動亂的，重慶的民眾是為什麼和怎麼樣分裂成為不同派別的……

---

1 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1967》，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220頁。

2 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中央首長接見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和五十軍、五十四軍領導時的講話》，1968年3月19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政工組、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部隊政治部翻印，1966年3月20日。

3 任捷《火箭在發射——任新民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144頁。該書將「南苑大武鬥」時間誤記為1967年，應為1968年。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一章

北京吹來動亂風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任白戈被《紅旗》雜誌點名

文化大革命爆發時，重慶市雖然只是四川省轄市，[1] 但卻是當時習稱的全國「八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瀋陽、西安、武漢、廣州、重慶）之一，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工業城市和經濟中心，而且是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三線建設」[2] 中最大的中心城市。當時重慶市包括市中區（今渝中區）、江北區、南岸區、沙坪壩區、九龍坡區、大渡口區、北碚區、南桐礦區（今萬盛區）這八個區和巴縣（今巴南區）、綦江縣（今綦江區）、長壽縣（今長壽區）這三個縣。總人口400餘萬，[3] 因此在文革的許多文章、講話中都可以看到「四百萬山城兒女」這個說法。

重慶的文化大革命，是跟全國其他地區一樣，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開展起來的。

後來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指責「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於這場偉大的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其實，中共重慶市委和重慶市人民委員會（即市人民政府）雖然同其他地區的絕大多數黨委和政府一樣，對這場文化大革命確實「很不理解」，但卻並非「十六條」所指責的「很不認真」、「很不得

---

1 195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和合併若干省、市建制。重慶市與四川省合併，由中央直轄市改為四川省轄市。

2 三線建設：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擔心「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為防備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那樣到戰爭降臨時才將重要工廠倉促西遷造成較大損失，決定事先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建設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因當時把沿海地區視為最容易遭到戰爭打擊的一線，內地一些大城市為二線，西南、西北「縱深地區」就被視為三線，因此這一建設計劃稱三線建設。

3 1959年重慶總人口421.9萬人，1969年重慶總人口462.2萬人。見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775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力」，而是像領導以往歷次政治運動一樣，認真領會，積極行動，絕沒有絲毫懈怠。

1966年5月底，中共重慶市委收到中共中央西南局《關於貫徹執行中央5月16日〈通知〉，堅決開展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文件要求「四川、雲南、貴州、西藏和重慶市要在報上點名批判一、二個影響較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每個大學也要公開批判兩三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對本省（區）、市報紙、廣播、刊物、書籍、大中學校的講義和歷史語文課本、文藝作品、戲劇、曲藝、電影美術、音樂、舞蹈等，認真進行清理，發現毒草，徹底批判」。[1]

按照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四川省委的要求，重慶市也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仿效北京批判「三家村」[2]的做法，掀起了揪本地的「三家村」、打「黑幫」的高潮。中共重慶市委首先發動批判了原《重慶日報》副刊《巴山漫話》雜文專欄，「揪出」了《重慶日報》以副刊部成員為主的「三家村」，並將

1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重慶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93頁。按照西南局的統一部署，四川批判了前中共中央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綿陽地委文教書記張黎群及其於1962年主持的《重慶日報．巴山漫話》和《成都晚報．夜談》專欄；雲南批判了《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為首（加上副總編周鍾德、夏雨）的「三家村」及其所寫《滇雲漫譚》；貴州批判了中共貴州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汪小川及其所著《衝出絕境》一書。

2　三家村：1961年，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開始為《北京晚報》寫雜文，特設專欄名為《燕山夜話》；同年，鄧拓兼任主編的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開闢了雜文專欄《三家村札記》，由鄧拓與吳晗（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廖沫沙（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分別撰稿，共享筆名吳南星。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為整垮被他視為「獨立王國」的中共北京市委，繼發起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又將《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組織了大批判。5月17日晚，鄧拓留下聲明自己的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的遺書後自殺。吳晗、廖沫沙被批鬥後關進監牢，吳晗被迫害致死。1966年夏，全國各地按中央部署紛紛大揪各種各樣的「三家村」、「四家店」，各地報刊的副刊特別是雜文專欄幾乎無一例外被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遭到批判。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963年已受到批判處理的所謂「蕭、李、廖[1]反黨集團」定為《重慶日報》「三家村」的「黑後台」、「反黨黑幫」，加以公開批判。

在《人民日報》6月2日公開點名批判北京大學「陸平黑幫」[2]、6月16日公開點名批判南京大學「匡亞明黑幫」[3]之後，重慶市委也報經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批准，於6月21日將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4]定性為「黑

---

1 蕭、李、廖：指蕭澤寬（原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李止舟（原市委候補委員、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廖伯康（原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1962年2月底，中共重慶市委召開貫徹中央「七千人大會」精神的第十八次全委擴大會議，會上，許多幹部對四川的「反右傾」、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李井泉的工作作風等提了大量意見，這些意見連同四川在三年大饑荒中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反映到中央後，中央書記處曾派人赴川調查。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強調抓「階級鬥爭」後，向中央反映的意見被認定為反革命的「黑暗風」、「翻案風」。據此，1963年重慶市委召開第二十次全委擴大會議，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清查敢於向中央真實反映社情民意的幹部，重點整了蕭、李、廖及于克書（共青團市委副書記）、王竹（共青團市委副書記）等一批幹部，鑄成一大冤案。

2 陸平黑幫：陸平，1914—2002年，時任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書記兼校長，正在領導北大的「運動」，號召師生站到鬥爭第一線。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寫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稱宋碩（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彭佩雲（北大黨委副書記）等「壓制群眾革命」，「破壞文化革命」，「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毛澤東6月1日批示將此大字報由新華社全文播發，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全國各報刊發表。《人民日報》配發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稱「為陸平、彭佩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

3 匡亞明黑幫：匡亞明，1906—1996年，時任中共南京大學委員會第一書記兼校長。1966年6月2日，南京大學溧陽分校的一些學生聽到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受其鼓舞，寫出了《十問匡校長》等大字報。匡亞明認定這是右派反黨的行為，組織師生反擊。但其做法背離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中共江蘇省委按照康生批示將其停職並組織群眾批判。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放手發動群眾　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宣稱「南京大學革命學生、職工和教師，揪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匡亞明」。

4 鄭思群：1912—1966年，廣東海豐人，1926年參加共青團，1927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八路軍總部敵工科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女子大學副校長兼政委、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西南人民革命大學總校教育長等，1952年起任重慶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幫」，責令其「停職檢查」，並在22日《重慶日報》上公開點名批判，市委還派出由副市長余躍澤為組長，五十四軍副政委鍾池為政委，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崔成禮為副組長的300人的龐大工作組進駐重慶大學，領導「抓鄭思群黑幫」，讓校、系兩級領導幹部90%以上「靠邊站」，[1]發動師生員工揭發批判。

不料，當重慶市正在按部就班開展運動時，市委、市人委領導班子卻遭到了意外的一擊：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不經過通常的組織程序，採用在文章的註釋裡點名的詭異手法，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重慶市市長任白戈[2]。

在這期《紅旗》雜誌上，以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3]（不久穆欣本人

1　重慶大學校史編委會編，伍子玉主編《重慶大學校史》下冊，重慶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127頁。

2　任白戈：1906—1986年，20世紀20—30年代初曾任「左聯」秘書長，文革爆發時為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重慶市市長。1966年7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紅旗》第九期穆欣文章《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在註釋中點了任白戈的名。任白戈隨即以「請假檢查」名義停止工作。8月2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在中共重慶市委召開的大專院校革命師生代表會議上講話時，宣佈將任白戈罷官。196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稱「重慶市各革命組織應當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中央同意公開宣佈撤銷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和重慶市委第一書記職務，撤銷任白戈兼任的重慶軍分區第一政委職務」。1968年6月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七千萬四川人民在前進——熱烈歡呼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將任白戈與其他幾位被打倒的領導幹部一起並稱「中國赫魯曉夫……在西南及四川地區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黃新廷之流」。1977年後曾任中共四川省委顧問、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

3　穆欣：文革爆發時為《光明日報》黨組書記兼副總編輯（主持全面工作）。1966年4月任文化革命起草小組成員，參加起草《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隨即列席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28日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6月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紅旗》雜誌副總編輯。8月列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10月列席中央工作會議，任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副主任。1967年初因文學評論家李希凡在《光明日報》社貼出大字報《穆欣是反革命兩面派》，被江青要求回報社接受批判。9月7日下午在《光明日報》社被批鬥後關進北京衛戍區監獄。12月3日被北京衛戍區正式宣佈「監護」。1968年1月被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5月14日獲釋。文革結束後平反。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也遭到打擊迫害）署名的文章《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中，批判「周揚[1]的一些追隨者」「圍剿魯迅」，說到「周揚的另一個追隨者竟然攻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是『罪惡』」時，在註釋中點明，這個「周揚的追隨者」是任白戈。

在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撤銷職務的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中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隨後，彭真遭到不點名的公開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任白戈是繼彭真之後第二個被批判的大城市的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不同之處在於，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銷職務並且其所在地區黨組織及上級領導均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遭到公開點名批判的，而這時彭真雖已遭到批判並已被罷免職務，卻尚未在報刊上公開點名。[2]

雖然這次點名批判任白戈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並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註釋裡出現的，但是當時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有嚴格的政策規定和組織程序，絕非文章作者或報刊編者可以任意而為，同時，作為中央輿論喉舌的傳媒，當

---

1 周揚：1908—1989年，文革爆發時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1966年6月4日，全國文聯黨組向中宣部、文化部和文藝界各協會傳達關於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問題的報告，點名批判周揚等人的「罪行」。6月12日，新任中宣部長陶鑄電話通知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央決定點名批判周揚。7月1日《紅旗》第九期重新發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針》的編者按中，稱此講話「針對以周揚為代表的30年代資產階級文藝路線作了系統的批判」，並稱周揚自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開始公開點名批判周揚。因做過左肺切除一葉手術正在天津休養的周揚於年底被轉移回京，由北京衛戍區關押，接受批鬥。1975年7月2日，毛澤東對前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所謂「周揚黑幫」成員）6月24日檢討「緊跟周揚的錯誤」，希望能繼續留在黨內的信批示：「中央：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請討論酌處。」7月12日周揚與「同案犯」夏衍、陽翰笙一起獲釋（周揚因自願留在獄中給毛澤東寫表忠信而推遲出獄）。

2 同一期《紅旗》雜誌發表的社論《徹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就沒有點彭真的名。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時都被視為傳達的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因此，《紅旗》雜誌此舉必然被視為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響和震動是顯而易見的。當那篇文章在各地黨報轉載（《重慶日報》於7月6日轉載）、廣播電台反覆廣播後，重慶立即引起震動，許多幹部紛紛打電話詢問市委：被中央點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慶的黨政領導人任白戈？

重慶市委無法回答。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1]，後來在一次向群眾所作的公開檢查中回憶了當時西南局和四川省領導人面對這一意外時的一些情況：

在穆欣同志的文章點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2]、志高[3]商量如何處理的問題，先用電話問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同志，他當時答覆是罷官。同時又用電話請示中央辦公廳，中央辦公廳答覆，下午中央書記處要開會，等中央書記處會議後再覆。我們當時商量下決心一步走，（即罷官），由志高到重慶瞭解情況，等中央書記處會議答覆後再宣佈處理。晚上接陶鑄電話說，鄧小平意見，任

1　李井泉：1909—1989年，文革爆發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政委、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67年2月19日，重慶造反派在駐軍支持下奪權後建立的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召開數十萬人大會批鬥李井泉。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稱：「以李井泉為首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李井泉等人堅持執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職務，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撤銷李井泉的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在四川批鬥後交北京衛戍區關押「監護」。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被中共中央定為「中國赫魯曉夫」（即劉少奇）在西南及四川地區的頭號代理人。1973年中共十大上被安排為中央委員。1975年被安排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2　大章：李大章，1900—1976年，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四川省省長。

3　志高：廖志高，1913—2000年，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白戈過去是周揚的追隨者，這十幾年在重慶市工作還不錯，要不要罷官還要看一看，你們寫個報告來，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這樣）。我當晚即按原電話轉告了廖志高照辦，不久就寫了報告到中央，以後中央正式批覆也是這樣批的。[1]

7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專程趕到重慶，召開市委會議，傳達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的意見：任白戈的錯誤是30年代的問題，60年代的工作還是好的。

隨即，任白戈被迫以「請假檢查」名義停止工作。

鄭思群之死

在重慶這樣一個當時西南地區最大的工業城市和經濟中心，黨政「一把手」突然之間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冊」，威信掃地，在市民中帶來的震動可想而知。

這是重慶局勢陷入大動亂的一個重要起因。

在此形勢下，各級領導唯恐「右傾」捱整，紛紛「向左看齊」。市委派駐各單位的工作組自然在領導「鬥黑幫」的運動中更加向「左」轉。

被當作重慶頭號「黑幫」典型的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成為市委工作組的批鬥重點。工作組建立專案，匯集材料，但卻找不出鄭思群工作和生活作風方面足以用來定罪的大問題。據一位重大學生回憶，在市委工作組大張旗鼓號召批判揭發鄭思群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之後，在學生印象中

1 李井泉《關於我在重慶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的檢查》，1967年2月8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宣傳組印，1967年2月10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鄭思群的罪狀也只有這樣幾條：

一、到銅梁去看望當兵鍛煉的學生，帶了一頭豬去給學生改善生活，「腐蝕學生純潔的心靈」。

二、1966年6月12日從北京高教部開會回來，晚上身邊工作人員陪他看了大字報，他說「弄得亂糟糟的」，這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

三、1965年高考結束，參加監考的馬列主義教研組老師向鄭思群匯報工作，說他們為考生趕跑考場外面吵鬧的「知了」，鄭思群很滿意；當匯報到他們在考場上為考生讀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時，鄭思群大為不滿，說：「你們這是脫了褲子放屁——多事！」工作組上綱上線，說鄭思群攻擊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毛澤東思想是「放屁」！

四、搞獨立王國。鄭思群是重慶市委委員，當重慶市委和高教部開會時間發生衝突時，他不參加重慶的會，而到北京參加高教部的會。[1]

但是，僅憑這幾條材料顯然還難於把鄭思群當作「反黨黑幫」打倒，無奈之下，工作組便以慣用的手法羅織罪名，將鄭思群的「海外關係」[2]和與蘇聯專家的交往[3]作為突破口，對其進行逼供。據當時市委工作組辦公室副主任張光明回憶，被工作組當作鄭思群問題重點的這兩條罪名主要是：

第一，解放初期，他的哥哥到香港來，要求鄭思群去香港見面。哥哥據說是聯合國的官員，當時又值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中美兩國正在朝鮮打仗。時機

1　黃昌國《文革中我在重慶當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的經歷》，載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華夏文摘增刊563期．文革博物館通訊397期》，2007年3月20日出版。

2　中共執政後特別是在強化「階級鬥爭」宣傳之後，嚴格限制大陸居民與海外親友的聯繫，凡在海外有親友者，不論其有無聯繫，均被視為有「通敵」嫌疑，因此「海外關係」成了一種可怕的政治「污點」，有「海外關係」者在許多方面都會受到歧視和排斥。

3　中共執政初期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大批蘇聯專家被派到中國的許多部門支援工作。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凡對蘇聯專家或對蘇聯提出意見者多被以「反蘇」罪名打成「右派分子」。然而到了60年代初期，中、蘇展開論戰，中共視蘇聯為「現代修正主義」之後，對蘇聯表示友好或與蘇聯專家有過交往又成了「裡通蘇修」、「通敵叛國」的罪行。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的特別，身份的特殊，政治十分敏感。鄭思群沒有去香港會見哥哥，而囑其夫人與之見了面。一般認為，像鄭思群這樣高級別的幹部，即使是家屬會見境外親屬，也是要報告組織的，但是沒有查到有關報告和批准的記載。在「玻璃上都要抓出蝨子」的那種年代，自然就產生了很多懷疑。

第二，中蘇友好時期，重慶大學聘請有幾個蘇聯專家。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專家撤回，鄭思群與他們仍有通信，並且繼續委託其照料在蘇聯留學的兒子。他與蘇聯專家來往信件的內容、交給兒子帶給蘇聯專家的禮品，被認為有不合程序和超出規定的地方，甚至有人懷疑他所接觸的蘇聯專家是「克格勃」。[1]

鄭思群是當時重慶市行政級別很高的「七級幹部」，革命資歷遠在一般工作組成員之上，對市委工作組強加給他的罪名當然不能接受，對工作組的逼供迫害更是憤懣已極。8月2日凌晨，鄭思群被發現在工作組「監護」（關押）他的重慶大學松林坡專家招待所用剃鬚刀片割破頸動脈血管自殺身亡，終年55歲。

市委聞訊後，按當時「自殺等於叛黨」的習慣認識，匆忙宣佈永遠開除鄭思群黨籍。因鄭思群平時工作作風樸實，平易近人，與學生關係很好，他在市委工作組迫害之下的自殺和市委對其「鞭屍」式的無情處理，使重慶大學許多師生感到震驚和悲憤不平。一位後來參加了「保皇派」赤衛軍的重大學生回憶了工作組公佈鄭思群自殺消息時的場面：

到8月2日，星期二，下午，各系工作組緊急召開師生大會。先傳達中央文件：「8月1日起大米漲價，從每斤8分3厘漲到每斤8分7厘。」那時，物價上漲是要下中央文件的，大好形勢就是「物價穩定」！聽漲價文件、看《參考消息》，這是大學生享受的政治待遇；工作組照本宣科了漲價理由，話題一轉，通

1 張光明《騷亂的重慶——文革十年親歷記》，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報鄭思群當日早上5點自殺死亡，學生們懵了，女同學「哇哇」哭了起來；工作組以為左派會喊：「打倒鄭思群！」可左派黨員骨幹此刻像死靈魂，寂靜之後，會場一片嘈雜，秩序大亂。工作組怒吼：「鄭思群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敵我矛盾，大家要站穩立場！」黨員們這才想起幫工作組維持秩序。[1]

另一個當年的造反派學生周孜仁在回憶錄中寫下了他的印象：

鄭思群是八月二日晨五時自殺的。學生們得到消息已是晚飯時分，採礦系同學李遠旭衝進我們寢室大呼：「鄭校長自殺啦！」全室頓然驚駭，同學們當即將碗盤一砸，或慨然無言，或仰天長歎，甚至掩面痛哭……年深日久，筆者已無法準確記起那一天晚學校發生的所有細節，可我自己幹的事情卻清晰依舊：那一夜我通宵無眠，待同學們酣然入睡，我獨個兒憤激難平，匆匆給西南局及書記李井泉寫了一封狀告重慶市委及工作組的信……[2]

鄭思群是重慶地區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非正常死亡的高級幹部。此事引起的震動，並不亞於甚至超過了任白戈被點名，特別是對重慶大學的師生來說。許多人不相信鄭思群這樣的老革命會自殺，甚至懷疑是遭到了謀殺。周孜仁的回憶錄中寫道：

有好事者從松林坡現場偵察回來，突然爆出一大堆只有福爾摩斯才能夠解答的疑團，推論是：鄭思群不是自殺，而是：他殺！罪魁禍首不可能是別人，只能是：工作組！

於是同學們紛紛湧向松林坡，在專家招待所附近的牆壁、草坪和石階上到

1　黃昌國《文革中我在重慶當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的經歷》，載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華夏文摘增刊563期．文革博物館通訊397期》，2007年3月20日出版。

2　周孜仁《鄭思群之死和重慶的八一五運動》，載《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365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處查找疑點，有人爬上圍牆，說是發現了血跡，於是把長滿青苔的磚頭撬回去，用報紙小心翼翼包好，準備送北京交黨中央備查。為保護自殺現場，同學們完全不經意地便形成了某種組織，松林坡成了重慶大學的「斯莫爾尼」。大家自覺地晝夜輪流值守，並派出人員與市委、市公安局進行交涉，同時做些籌款之類的工作以備不時之需……那些天，隨時都會從松林坡上傳下些聳人聽聞的新進展，每一條新消息都足以把重慶市委推上斷頭台。[1]

正如周孜仁回憶文章中所說：「事實上，運動到了那一步，鄭是自殺還是謀殺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仇恨已被激化，狂熱已被點燃，動亂已如流水下灘，不可阻擋。」[2]8月3日，中共重慶市委在重慶人民大禮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學文革積極分子大會，正式傳達北京新市委於7月29日召開的大、中學校文革積極分子大會精神和毛澤東有關撤銷工作組的指示，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講話。大會尚未結束，重大學生就已聞訊在校內寫出大標語：

「擁護黨中央，擁護毛主席，趕走工作組，自己鬧革命！」

當晚，重大校園裡出現了《就鄭思群自殺事件給西南局、李政委[3]的一封信》等要求重新審查鄭思群死亡事件的大字報，對市委工作組表示了公開抗議。

當全國不少大專院校因工作組阻撓、限制造反派師生「鬥黑幫」的過激

---

1 周孜仁《鄭思群之死和重慶的八一五運動》，載《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367頁。

2 周孜仁《鄭思群之死和重慶的八一五運動》，載《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368頁。

3 李政委：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當時他還兼任解放軍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因其長期擔任軍隊中的政委職務，下屬幹部都習慣於以「李政委」相稱以示親近。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行動而與造反派師生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在重慶大學，卻因工作組「鬥黑幫」的過激行動造成領導幹部非正常死亡，而引發廣大師生與工作組的嚴重對立，並促成了重慶大學師生率先向市委造反的惡果。這是重慶大學文化大革命初期與許多大專院校不同的一個特點。

在全國許多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師生剛開始都處於「少數派」地位時（當時許多地方都把造反派師生稱作「少數派」），重慶大學造反派師生一起來就成了多數派，這是重慶大學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特點。

八一五事件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於1966年8月8日公佈，在這個所謂「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指導下，文化大革命掀起了新的高潮。

8月13日，重慶大學學生周孜仁起草的號召向市委造反的大字報《致全市大專院校革命同志的一封公開信》得到全校數千人簽名響應。數千師生集合前往附近的重慶建築工程學院串連，受到冷遇。下午，在重慶大學文工團戲劇隊房間裡，由機械系六七級學生、校文工團樂隊隊長吳慶舉主持召開了總結會，各系派代表參加。到會代表中的無線電系周家喻，冶金系熊代富、查正禮，電機系黃順義等，後來成為八一五戰鬥團的主要領袖人物。

兩天後的一個意外事件，使重大師生的造反行動越出了校園。

因對工作組評價上的分歧，與重慶大學同在沙坪壩區的重慶師範專科學校（今重慶師範大學）學生中出現兩派對立，反工作組一派處於劣勢。其「輕騎」、「排炮」兩個小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組觀點佔絕對優勢的重慶大學師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生求援。

8月15日，重大數千師生，頂着烈日，冒着酷暑，前往師專聲援，他們被保工作組一派群眾圍在暑氣逼人的師專大操場上，雙方展開激烈辯論，附近的師專附中（今第八中學）學生及一些工人、機關幹部和居民，也帶着不同觀點前來加入辯論或看熱鬧。這樣，就在這一天的重慶師專，出現了文革爆發以來第一次較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

一位親歷了八一五事件的重大學生，多年後回憶了他的見聞：

8月15日早上來集合的有3000多人，師專附中、重慶市六中又來了近千人，共4000餘人，人數之多出乎意料。兩隊糾察維持秩序，摩托車開道，隊伍整齊威風，秩序井然，一路秋毫無犯。師專「排炮戰鬥隊」、「輕騎戰鬥隊」壯着膽聚集在校門口迎接，師專文革籌見重慶大學衝來這麼多人，忙把大門關了起來，不准進。但很快猶如電影中十月革命工人武裝衝進冬宮，幾千人蜂擁而進。

群眾在師專運動場排好隊，準備開會。師專文革籌的人圍在操場四周起哄，衝會場，師專文革籌還叫些工人來助威。重慶大學是工科，學生野蠻，糾察隊員更是人高馬大，師專的文弱書生哪能與重大學生論力！被擋在廣場周圍辯論。高音喇叭，擴音機，電線等廣播器材都是重慶大學聲援隊伍帶來的，連汽油發電機也抬來了，各種專業的學生七手八腳，很快裝好設備。

為了大會成功，也邀請師專文革籌代表上主席台。文革籌代表不顧議程，上台呼喊：「重大的同學們，你們受蒙蔽了，有壞人在挑動，你們別上當，快回去，坐下來，學習十六條，宣傳十六條，貫徹十六條（那時剛下了十六條）。要相信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台下一片狂喊：「狗坐箢篼不識抬舉，轟下去！」

會場亂了。在一片嘈雜聲中宣讀了重大聲援師專革命師生的信，師專反工作組的代表致歡迎詞。雙方搶喇叭，話筒。「哇啦哇啦」，聽不清楚。廣場上一片叫罵、吵鬧。後要師專文革籌表態：「今天的行動是不是革命行動？」當時造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反的人任何行動都要官方表態是革命行動才放心。

對方毫不猶豫地說：「是暴徒鬧事！」這下就更不得了了。……[1]

事後，重慶師專八一五戰鬥團在其主辦的《八一五烽火》報上連載了《八一五史話》，文中對這一事件有如下敘述：

由重大4000多革命師生組成浩浩蕩蕩的隊伍，衝開了緊閉的鐵柵門，開進了學校。

遊行隊伍的前頭，高舉着毛主席像，兩旁紅旗招展，雄壯的軍樂，吹起了殺氣騰騰的《造反歌》……

重大4000多革命師生在操場上集合了。同他們一起來的還有六中和師專附中的部分革命同學。

一件惡意挑釁的事件發生了。主席台上出現了四塊標語牌，寫着這樣四個黑敦敦的大字：「不受歡迎！」

……重大同學激怒了，馬上有數十人搶先登上主席台，把幾十張毛主席像高高舉起，四個黑字被遮蓋了。

……主席台後面是圖書大樓，這幢房子正在整修，市中區建築修繕一社的工人正在房頂上工作。保皇幹將拿起黑牌爬上了腳手架，要把黑牌插上房去。

四個散發着臭氣的黑字，竟敢和毛主席像爭高低！……我們也要衝上去，把毛主席像插在最高最高的地方！

毛主席像屹立在圖書大樓的上空了。但是保皇幹將拿起黑字牌，卻要去爭地位，發起了瘋狂的反撲。

看到這種情景，房頂上的工人肺都氣炸了，他們一躍而起，一個箭步射了

1　黃昌國《文革中我在重慶參加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的經歷》，載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華夏文摘增刊563期．文革博物館通訊397期》，2007年3月20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過去，說時遲，那時快，早有個青年工人一手揪住黑牌，帶住一拔，然後像抓住個壞蛋似的，狠狠地從高空往下摜去……

台下爆發了震天動地的歡呼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1]

正在大操場一旁對師專圖書館大樓進行大修的建築工人們，同情被圍攻的重大學生，不光是幫他們扯掉了「黑字牌」，還給他們送去了開水，極大地鼓舞了重大學生的士氣。後來這些工人及在現場負責的青年施工員朱登明，遭到黨政領導的追查和批判，此後他們便成為著名的工人造反軍一支隊成員，朱登明成為其主要負責人。這是八一五事件導致工人造反的一個間接後果。

在雙方僵持的整個過程中，重大師生和師專文革籌雙方都不斷派出代表去向市委反映情況，要求市委領導到場解決問題，但市委一直不予答覆。直到傍晚，重大師生派出的代表向市委提出三點強硬要求：

一、如果你們認為我們的行動符合毛澤東思想，那麼就請你們到師專去；如果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不去；

二、我們的同志捱餓，曬太陽，如果出了問題，完全由你們負責；

三、如果你們實在不去，我們的4000革命師生全部到市委來。

在這樣的「最後通牒」特別是後兩條的要挾下，市委書記處不得不派出書記辛易之[2]前去師專現場處理問題。辛易之到師專後，被糾纏多時難以脫

---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師專紅衛兵總部、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烽火》第二、四期，1967年1月31日、2月15日出版。

2 辛易之：時為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分管農業）。1966年8月15日因代表市委出面處理八一五事件，被重大八一五派視為「鎮壓八一五事件的劊子手」。但在1967年「一月奪權」時，五十四軍認定其為革命幹部，向八一五派推薦將其作為結合對象，並安排奪權後建立的革聯會於2月27日召開鬥爭前市委負責人魯大東大會，讓辛易之在會上揭發、批判魯大東，作「火線亮相」。後因八一五派（特別是其中的市委機關幹部）內部對結合辛易之仍有分歧，加上革聯會未獲中央承認，辛易之的結合暫未成為事實。1968年中央首長「四二七」指示中指責辛易之「滑頭滑腦」，更使他難於得到結合。後只好調離重慶，調任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身。重大師生要他回答「今天發生的事件是不是革命事件」、「市委抽調大批學生下鄉勞動、搞四清運動，是不是錯誤的」等問題，並要求對師專的一些人用「不受歡迎」四個字與毛主席像爭高低的「反革命行為」作出嚴肅處理。辛易之當然既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又不可能對所謂的「反革命行為」作什麼處理。一位當年在重慶大學廣播站工作的重大學生多年後在他的博客中回憶了當時情景：

與會群眾高漲的革命熱情支撐着他們從清晨到下午，此時有人提議，應當要求市委對革命群眾的這一行動「表態」，於是大會立即派人與市委聯繫。記得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來到大會會場時已近黃昏，隨即在他的講話中並沒對這一天群眾的行動做出明顯的評價，更談不上肯定和支持。非但如此，他的講話含含糊糊，環顧左右而言他，而且還說如果是大家心中有氣，可以對他撒等等，講完之後，他就準備離開。由於參與大會群眾對辛易之不得要領的講話感受到非常不滿，又見他準備走人，於是會場上就響起了「辛書記不能走」的呼聲。當時辛易之已進入了他的專車，這一下更激怒了在場的群眾，於是在場的一些人便圍住了辛易之的車不讓走，但是最後辛易之還是走了。這就是所謂「圍攻市委書記」事件的真相。[1]

這樣，就形成了重慶第一次造反派師生與市委領導當面爭執、對峙，或者說「圍攻市委書記」、「向市委造反」的局面。

事後，重慶造反派便將此日視為造反開始紀念日，造反派亦被稱作「八一五派」。重慶大學造反派師生成立的組織就取名為八一五戰鬥團。

從八一五事件發生的次日即8月16日起，重慶大學及位於市委大門對面的

四川省西昌地委書記。文革結束後先後調任內江地委書記、四川省財辦副主任、省人大常委會常委、財經委員會主任等。

1　張德昂《文革雜憶》，發表於央皿博客。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六中學的造反派師生，開始在市委門外貼出向市委「造反」的大字報，引起一些反對造反的幹部和市民圍攻。市委為避免激化矛盾，秘密發出了四點指示：

一、不准到市委門口參加辯論；

二、不准到市委門口寫反擊大字報，如果對市委有意見，也不要貼大字報，可以由工作隊轉；

三、不准職工去看大字報；

四、不准（職工）家屬去看（大字報）。

市委同時警告：若有違反者，「是黨員開除黨籍，而且出了問題，團、隊、組負責人要受處分」。[1] 這裡所說的「團、隊、組」，是指當時派駐各地區各部門領導運動的四清工作團、隊、組。

重慶市委發出這「四條指示」的本意是試圖制止事態擴大，避免發生社會動亂，但反而被視為「鎮壓群眾運動」的「黑指示」，遭到批判。

到8月下旬，重慶許多市民因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認識已明顯形成為兩大派，一派是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為代表的造反派，與之相對立的另一派即當時所謂的「保皇派」或保守派，包括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基層幹部，以及唯恐受到政治運動衝擊而決心緊跟基層黨委以求自保的許多人。他們同廣大領導幹部一樣，對這場文化大革命運動「很不理解」，加上運動初期批判「三家村」時的許多做法及輿論導向，使他們誤認為這是又一場類似於1957年「反右派」那樣的政治運動，便旗幟鮮明地站到了造反派的對立面。

1　關於這「四條指示」，因無正式文件，傳達中有不同版本，以上文字引自《反革命兩面派的自白（重慶市委內一小撮人積極推行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材料）》，載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司令部主編《造反軍報》第三期，1967年1月18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各級黨委號召「炮打」自己

1966年8月17日，毛澤東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傳達到全國縣、團級單位領導層。

8月18日，北京召開了慶祝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毛澤東第一次檢閱了紅衛兵。紅衛兵這種全新的群眾組織形式得到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公開承認和熱烈支持，正式出現在文革舞台上。不過，絕大多數人此時並未意識到這個群眾組織形式會給中國大陸的社會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

8月20日，重慶市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在大田灣體育場召開慶祝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重慶大學造反派師生在會場上貼出了「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標語，散發了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創作的《革命造反歌》的傳單。據後來首都赴渝師生的調查，認為這是重慶文革中第一次散發傳單。[1]四個散發傳單的學生當時被抓了起來。

這時，全國許多地方已出現了「炮打」、「炮轟」一些黨委的口號，但這並非都是造反派提出的，恰恰相反，最初普遍是由各級黨委在貫徹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時，按照全會文件之一的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提法而主動提出的。各級黨委這時都紛紛提出「炮打司令部」、「炮打（或火燒）司令員」、「引火燒身」之類口號——如同在「四清」運動中主動「洗澡、下樓」一樣，以為這樣才是緊跟黨中央的部署，才能正確領導運動。比如：

8月17日，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在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的講話中號召：「打破一切舊框框，集中力量炮打司令部。所謂的炮打司令部，就是黨組、公司經理、司長、局長、特別是黨組。」「只許炮打司令部，不許炮打群

1　外地赴渝45院校八二八事件聯合調查團赴京匯報小組《關於重慶市八二八事件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報告》，1966年9月29日，北京。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眾。」[1]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在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回到河南，就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炮打司令部」，並動員學生炮打「我這個司令官」。8月19日，劉建勳等省委領導人又到鄭州大學，召開了全體師生員工大會，會上宣讀了劉建勳《我的一張大字報》，號召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2]

8月22日晚，陶鑄在對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電話指示中說：「中央最近開了一次會，有個極其重要的指示。從最近各地運動的情況來看，許多情況說明，還是怕字當頭，不敢叫群眾炮打司令部。」[3]

8月25日，陶鑄、張平化、王任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接見中南地區赴京同學時，在講話中一致譴責了中共湖南省委提出的「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組」的「三個相信」口號，號召同學們回到湖南「去對市委、省委、中南局開炮，一齊炮轟司令部」。[4]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國際關係學院文革籌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一鬥、二批、三改。首先是鬥，這個鬥就是炮打司令部，而不是同學與同學之間鬥。」並號召：「大家團結起來，首先炮打司令部！」[5]

同日，中共黑龍江省委機關報《黑龍江日報》發表短評《向「司令部」

---

1 李先念在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的講話，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出版。

2 一丁《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載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華夏文摘增刊335期．文革博物館通訊172期》，2003年4月8日出版。

3 陶鑄1966年6至9月給中南局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電話指示，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出版。

4 《張平化王任重陶鑄對中南地區在京同學的講話》，1966年8月25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出版。

5 李富春在國際關係學院文革籌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開炮》。

9月3日，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主要領導人在廣西大學貼出《歡迎大家向我開炮（我的一張大字報）》，要求廣大師生員工炮轟自治區黨委「司令部」。[1]在一份落款為「成都地質學院大慶戰鬥團」的摘抄資料油印傳單中，稱此大字報的作者署名是韋國清（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大字報還有如下文字：「但是，至今為止，你們向區黨委（特別是我）貼的大字報還不夠多，火藥味還不夠濃，我再一次向革命的師生員工們要求：向我開炮！炮擊司令部，徹底消除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

在這樣的背景下，8月25日，中共重慶市委為貫徹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召開了各大專院校文革籌委會[2]代表和學生代表「炮轟市委」會議，力求在文化大革命中爭取主動。當時列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3]，代表西南局到會講話，號召「集中火力，炮轟市委」。劉文珍當時具體講了些什麼，官修史書上都沒有提及，在一份署名為「重慶職工子弟中學『先鋒戰鬥隊』」，1966年8月31日印發的油印傳單《紅色傳單——第0006號》中，公佈了劉文珍那天的講話：

「我代表井泉同志講幾句話，井泉同志完全支持同志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今天這個會是炮轟市委，炮打市委，不是炮轟市委的哪個人，是炮轟市委的錯誤。市委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為啥轟不

1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8頁。

2　文革籌委會：文革初期，各大專院校都由上級派出的工作組領導「運動」，原校黨委一般都處於「靠邊站」或停止工作，接受審查的狀態。1966年7月底、8月初，因毛澤東下令撤銷工作組，駐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一律撤銷，退出學校，另由學校師生按照「十六條」的要求組成領導「運動」的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這些文革籌委會一般均由工作組或上級領導選拔或推薦的「政治條件好」的師生組成。

3　劉文珍：1911—1982年，時為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宣傳部部長、中國科學院西南分院院長。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得、打不得呢？市委是重慶地區的司令部，司令部的問題不解決，重慶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搞徹底。」

既然中共領導幹部一致發出了「炮轟」、「炮打」的號召，早已習慣於「黨叫幹啥就幹啥」的敏感的青年學生當然就會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

8月26日晚，重慶大學造反派師生冒雨成立了八一五戰鬥團。他們在《宣言》中宣稱：

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是革命的八一五戰鬥團的最高統帥。我們最敬愛的黨中央是革命的八一五戰鬥團的最高司令部。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八一五戰鬥團的指導思想和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

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的主要負責人有吳慶舉（機械系六七級學生，校文工團樂隊隊長，共青團員），黃順義（電機系六七級學生，校「文革籌」成員，共青團員），周家喻（本名周家瑜，文革中一般被寫作周家喻，無線電系六八級學生，共青團員），熊代富（冶金系六九級學生，校「文革籌」成員，共青團支部書記），秦安全（無線電系六六級學生，共青團員），查正理（冶金系六七級學生，校「文革籌」成員，共青團員），蔡增華（電機系教師）等。

滿腔熱情的年輕師生們在傾盆大雨中高呼革命口號，一心要在革命的暴風雨中鍛煉成長。

他們渴望的「暴風雨」很快就降臨了。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八二八，扯頭髮」

1966年8月28日早上，剛成立不到兩天的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32個學生，來到與市中區僅有一江（嘉陵江）之隔的江北區「宣傳『十六條』」，鼓動造反。他們在江北區當時的中心區老江北城張貼標語、大字報，散發傳單。他們在米亭子小學校門對面牆上貼出的一張大字報題為《集中火力，炮轟市委》。說起來，這張大字報應該算是傳達貫徹西南局宣傳部劉文珍部長的講話精神的，誰也想不到它卻惹出一場大禍。

這時，全江北區230名廠辦、社辦半工（農）半讀和民辦中學教師正在江北下橫街小學學習點「集訓」——按照市委統一佈置，在區委工作組領導下，集中進行「人人過關」、「背靠背揭發」的「學習」。他們住宿在下橫街小學，吃飯、學習在米亭子小學。教師們普遍處於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以為又一場「反右派」運動來了，為免除被打成「右派」的厄運，他們不得不拚命表現自己「保衛黨組織」的決心。

8月28日中午，當教師們發現重大八一五貼出的以「集中火力，炮轟市委」為題的大字報後，便認定這個提法是「反黨」的「反動口號」，是新的「匈牙利事件」[1]，他們「為黨立功」的時候到了，於是，他們爭先恐後地積極採取「革命行動」，果斷地用兩條「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標語將那張大字報覆蓋了。

1　匈牙利事件：1956年匈牙利民眾為改革蘇聯模式的政治經濟體制而引發的一場被西方稱為「革命」但被蘇聯稱為「反革命暴亂」的事件，蘇聯出動軍隊和坦克進行干涉，推翻了匈牙利改革派建立的新政府，改革派領袖納吉被蘇聯誘捕後處決。在中國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匈牙利事件被反覆宣傳為反革命分子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事件，許多地方都把向黨政領導人提意見、請願稱為「匈牙利事件」，將參與者打成「右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後人將會很難理解：為什麼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已經代表西南地區的中共最高當局公開號召「集中火力，炮轟市委」之後，重慶市的一些基層幹部和群眾竟然還會以為這個口號是「反黨」的「反動口號」。僅僅是因為信息不暢，西南局的號召未能及時傳達到基層幹部和群眾中去才造成的意外嗎？

這當然應該算一個原因。不過，還必須注意的是，這是一段十分混亂的時期，全社會都被毛澤東出人意外一反常態的「運動」方式，被突如其來的紅衛兵浪潮衝得亂了方寸，因此，不能以正常狀態下的社會常識來理解那時的一些情況。

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已經在高級幹部中傳達，但仍作為高級機密向基層幹部和群眾封鎖（這對於一向宣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來說，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因此，當時在社會上甚至還對流傳出來的《炮打司令部》進行闢謠。1966年8月29日在重慶出現的一份署名為「新北大二戰士徐康明、徐聖選」的鉛印傳單《緊急呼籲！!!》中，就這樣寫道：

今天我們剛到重慶，即發現在重慶流傳着據說是毛主席寫的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的傳單，關於這張大字報，陳伯達同志24日在北京大學有明確指示，指出這樣隨便傳是「不合適，不妥當」的，現在我們將伯達同志的指示抄錄如下，希同志們見到後，不要再傳這張大字報，更不要到處張貼，已經傳出或張貼的，希望同志們以革命利益為重，採取適當的辦法妥善處理。

「毛主席要發表的文章總是經過《人民日報》發表，或者經過新華社廣播。現在這一張大字報沒有經過《人民日報》發表，也沒有經過新華社廣播，也沒有向毛主席請示，就這樣隨便傳，不合適，不妥當。大家不是聽毛主席的話嗎？大家不是要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辦嗎？毛主席沒有發表這樣的指示。」

以上講話，經北大文革籌委會送陳伯達同志審核後，在北大多次廣播。如有錯誤，我們完全負責。希望同志們把這張傳單用大字報張貼。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努力學習最高指示，

忠實執行最高指示，

熱情宣傳最高指示，

勇敢捍衛最高指示。

這份傳單顯然是得到重慶市的黨政領導支持、批准的，否則當時不可能獲准到印刷廠（當時屬於官方嚴格控制的「特種行業」）鉛印後散發。傳單的印發日期，比八二八事件還要晚一天。

還必須注意的是：剛過去不到十年的那場「反右派」鬥爭，給人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許多人，不論是領導幹部還是民眾，都已習慣於把「反右派」運動的經驗教訓套用到文化大革命中來。正如「反右派」運動中黨組織可以號召你幫助黨整風，你卻不能隨便向黨組織甚至普通黨員提出批評意見一樣，如今上級黨委號召「炮轟市委」，你卻不可以真正把它落實到行動中去，當然更不能到群眾中去煽動了。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慶市江北區那些可憐的教師們，便在工作組的指使下與重大八一五的學生發生了糾紛，重大學生認為他們覆蓋大字報的舉動是「破壞革命的大字報」，「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行為」，要求交出「反革命」和「幕後指揮」，而教師們則堅持認為重大學生號召「炮轟市委」的大字報是「反黨」。雙方都拚命把對方往「反革命」的泥坑裡推，恨不能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他們先是「打語錄仗」——各自誦讀對自己有利的《毛主席語錄》，然後又「對歌」——各自唱起給自己打氣的歌，教師們唱《我是一個兵》、《團結就是力量》，重大八一五的學生們唱《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與爭執雙方觀點接近的市民和正在暑假中的學生紛紛前來助戰，相互展開辯論、圍攻，都把對方視為「反黨」、「反革命」，爭論中便難免出現一些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意氣用事的「過火行動」，如抓扯，揪鬥、打人，強迫低頭認罪，強迫戴高帽子遊街……

8月31日深夜（9月1日凌晨），署名「重慶十八中『紅衛兵』總部」的傳單《工農兵群眾趕快行動起來瞭解八二八慘案的真相——第一次告全市同胞書》，趕寫和印刷出來了。傳單以聳人聽聞的文字「控訴」重大八一五「暴徒」的罪行，聲稱：

「到現在為止，有40名左派老師被鬥爭，被紅會醫院[1]營救出來的重傷員就有十幾人。」

「被打傷的同時失蹤的老師達一百人。」

「在大街上，他們把市委工作組的一個女同志全身衣服脫光，把頭髮扯光，頭上再壓口大瓦缸，上面再加口大鍋蓋，搞到卡車上去遊行」……

傳單明確指出：「這群暴徒中有勞改犯，有一些黑五類[2]的子女，更使人氣憤的是這慘案的組織者就是——重大八一五戰鬥團。」

傳單的最後還特別加了一段：

「革命的同志們！告訴你們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現在是午夜一點四十分，本來八一五團的暴行我們還要繼續寫下去，但是我們接到了紅十字醫院的緊急電話：重大八一五的暴徒用卡車搶走了兩名重傷員，這群暴徒又想利用深夜毀滅人證，我們十八中的全體『紅衛兵』立即出動，現在已站在從江北通往市中區的馬路上，準備攔車營救我們的革命同志……」

這一傳單寫作和印刷的內情，當時曾有許多猜測，後來有文史資料記

---

1 紅會醫院：指江北區紅十字會醫院。

2 黑五類：中共執政以來在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反右派等政治運動中重點打擊的一些人員，相繼被劃分為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這五種被剝奪一切政治權利，長期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賤民」，統稱「五類分子」（在20世紀60年代初一批「右派分子」獲准「摘掉帽子」後，一些地方將此提法改為只提不包括「右派分子」在內的「四類分子」）。文革中將「五類分子」鄙稱為「黑五類」。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載，它是根據市委「要充分揭露」的部署，由中共江北區委書記鄭天民親自主持，幾位「筆桿子」集體編寫的，區委常委會議審議後，交市委負責人審定，由市委出面安排並出資，交新華印刷廠、印製二廠，作為政治任務，趕印數十萬份。[1]

與此同時，又有一份署名為重慶市江北區下橫街教師學習會葉向東等（署有八位教師的名字），落款日期為8月30日的鉛印傳單《憤怒的控訴　嚴正的譴責——「八二八慘案」受害者致革命群眾的信》傳遍全市，這份傳單「代表252位中、小學教師」控訴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的「滔天罪行」，聲稱在「八二八慘案」中教師被打的「大約有100人次，嚴重到必須住院搶救的達12人之多」，「現在下落不明的竟達190多人！!!」

八二八慘案的消息傳開後，對文化大革命本來就「很不理解」的廣大黨政幹部認定這是「右派學生」鬧事，是新的「匈牙利事件」，便以此作為打擊造反派的典型事例，鼓動和支持一些學生、工人、基層幹部、街道居民向造反派反擊，在全市大造輿論，印發大量揭發、控訴「八一五暴徒」的傳單，一些單位和街道居民委員會甚至把這些傳單拿到群眾學習會上像學習「十六條」那樣組織「學習」，江北區還在下橫街小學舉辦了「八一五暴徒」的「罪行展覽」……

一時間，圍攻、揪鬥、批判八一五派學生和與他們持相同觀點或同情他們的市民，成了重慶街頭的日常景觀。

當時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印刷最精良的是以第十八中學、十六中學、十四中學毛澤東主義戰鬥團聯合調查組的名義，以全開道林紙鉛印數十萬份的「巨幅」傳單《鐵證如山，罪責難逃——關於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一小撮反動分子在江北城蓄謀製造流血慘案的聯合調查》，這份超大型的傳單，

1　吳安寧《江北城八二八事件鉤沉》，載政協重慶市委學習文件及文史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一輯219頁，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除了在重慶市廣泛張貼外，還由官辦的重慶大學赤衛軍赴北京代表帶去13萬份。八二八事件的影響遍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西藏高原都有人給「八二八慘案受害者」發來聲援電報，寄來慰問品。

9月2日，重慶城裡出現了一份鉛印（當時只有得到官方同意才能獲准鉛印）的傳單《我必須退出八一五戰鬥團（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盧永周的自白書）》。重大電機系電力六七級二班學生盧永周，在南岸區被作為「八一五暴徒」抓住，批鬥關押，被迫寫了這個自白書，宣佈：因重大八一五「階級成份異常複雜」，「走上了反動的道路」，決定退出該組織。官辦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為這份自白書加編者按稱：重大八一五「幹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勾當，是全重慶市假紅衛兵的總指揮部，是北大、清華等學校來渝的右派勢力的巢穴」，「在全重慶市犯下了滔天罪行」……不過，當這份傳單出籠時，盧永周已經參加到了重大八一五靜坐絕食和赴京告狀的行列中。

重慶市的黨政領導人試圖以發動群眾對重大八一五進行批判、打擊、圍剿來維持社會穩定，使運動「健康發展」。但是這種做法適得其反，不僅導致事態擴大，激化了兩派不同觀點群眾間的對立情緒，而且在反擊造反派中，因沿襲了「反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批「三家村」時的一些慣用手法，牽強附會，無限上綱，捕風捉影，虛構編造，將這個小衝突誇張宣傳為所謂「暴徒逞兇」的「慘案」，結果被造反派抓住了「造謠」（如「八二八，扯頭髮」之類）的把柄——連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都認為江北那個「八二八罪行展覽」有「擴大事實」的問題，應該撤銷，但重慶市委沒有立即接受這個意見。

重慶市委的這些做法，真正成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反而使反擊造反派的一方大失人心，使不少市民站到了同情、支持造反派一方。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重大八一五上京告狀

重大八一五遭到全市性有組織的圍攻、打擊後，要求市委出面解決問題，制止群眾圍攻、揪鬥學生，要求市委公開承認重大八一五是革命群眾組織並登報、廣播。然而，當時正坐鎮重慶的李井泉卻指示重慶市委負責人魯大東[1]「頂住」，因此魯大東對重大八一五的要求置之不理。

9月3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及其他一些大、中學校的造反派師生在市體育場召開了揭露八二八慘案真相控訴大會，會後舉行了示威遊行。當晚，得知重慶市委在重慶師範專科學校召開十二所大專院校代表會議，辛易之代表市委就八一五事件做檢查。重大八一五便在深夜（4日凌晨）組織了幾千人的大隊伍到師專去找辛易之，要市委對八二八慘案真相作出澄清。在得不到滿意答覆的情況下，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在重慶師專宣佈絕食。

辛易之仍然拒絕答覆重大八一五的要求。眼看絕食不起作用，9月5日凌晨，重大八一五與重慶師專、重慶建工學院、重師附中等校大批造反派師生，還有川劇院、兒科醫院等二十幾個單位的少數人員一起，宣佈上京告狀。當時參加了這次行動的重大學生黃肇炎回憶：

1　魯大東：1917—1998年，文革爆發時為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重慶市政協主席，文革開始後任市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1966年7月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被點名批判後，受命主持市委日常工作，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度被打倒。1968年4月中央首長在「四二七」指示中否決了五十四軍一直想結合的前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後，魯大東才被正式提上「結合」的議事日程，並被安排突擊寫出檢查，揭發李井泉、任白戈「罪行」，得到通過。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常委，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1969年10月任重慶市革委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1969、1973年分別在中共九大、十大上被安排為候補中央委員。1971年5月任重建的中共重慶市委第二書記。1973年12月任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文革結束後先後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第二書記、省長。1977、1982年連任中共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後任中共四川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8年病逝。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天才蒙蒙亮，我們整隊集合，高唱着國際歌，步行出發，在沙坪壩的大街上行進。市委領導的七八輛轎車魚貫而行，從我們隊伍旁邊駛過。「打倒重慶市委！」「重慶市委鎮壓學生運動決沒有好下場！」等口號聲伴隨着他們的離開。[1]

這支悲壯的告狀隊伍從沙坪壩出發步行，到了成渝線上的九龍坡區茄子溪車站後，遭到黨政機關組織來的工人、農民、幹部的阻攔、圍攻。一個四等小站突然被這麼多人包圍，形勢驟然變得十分危急。因為重慶天熱，學生當中有的人只穿了背心和短褲，就憑着年輕人的滿腔熱情、一時衝動，走上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赴京告狀之路。他們一部分人搶先登上了從重慶開往內江的308次列車（該車被迫開往成都後改車次開往北京），但還有大批人員滯留車站。為了避免工人、農民和學生的衝突，鐵道部按照當時的中央精神，被迫加派了一列臨時客車，上了2300多人。

9月6日，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發出傳單《特急號外》，稱「黨中央和毛主席在9月5日派出兩列專用列車將重慶八一五戰鬥團等五六千人全部接運北京」。同日，另一份署名「重醫《紅旗》、《衝鋒號》戰鬥組，重慶河校」聯合發出的油印傳單《特快新聞》甚至說是「林彪同志親自派兩列火車到茄子溪，將全部人馬接往北京」。但這些說法馬上遭到鐵路局方面的駁斥，署名「成都鐵路局運輸處全體革命職工」的一份傳單《關於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乘車的事實真相》，否認加派列車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派出」的，而是鐵路局被迫而為……署名「茄子溪車站全體革命職工」的鉛印傳單《特急聲明》則駁斥了所謂林彪親自派車的謠言，詳細介紹了那天的經過情況：

---

1 黃肇炎回憶《「文革」親歷（3）：815派在打壓中成長（3）》，載黃肇炎博客：http://blog.sina.com.cn/kmlaohuang。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9月5日清晨六點鐘左右，茄子溪火車站突然來了重大、重醫、建院、師專等20餘個學校的學生，自稱4000餘人。到達後，強要茄子溪火車站站長馬上派車，將他們送到北京去。站長說：「我們站小，沒有車，也無權派車，你們這樣多人，應到重慶火車站統一安排。」他們說：「我們不去重慶火車站」，並強行要上正在茄子溪車站停留的冷藏列車，當時車站秩序十分混亂。重慶鐵路分局得知消息後，立即派出幾名同志來勸說，要求他們回重慶後分期分批走。但他們堅持要「當天必須上車」。這個時候，已是中午十二點鐘過了，正好有一列由重慶開往內江的308次普通客車開進了茄子溪。他們見到車來了，火車尚未停穩，應下車的旅客尚未下來，他們就一哄而上，強行擁上車1200餘人（註：這趟列車定員是800餘人，上面還有400餘名旅客），這樣，影響了沿途工農兵乘車，打亂了運輸秩序。雖然我們再三喊勸他們下車來商量分期分批走，但上車的人不聽，仍然強行往上擠，就這樣，拉走了1200餘人。未上車的，還有3000餘人，我們再三勸說他們留下的人，分三天三批走，但他們根本不聽，非要當天離開茄子溪到北京去。3000餘人，將一個小小的茄子溪車站佔得水洩不通。車站站台、指揮運輸生產的運輸室、客運室、四條軌道之間都擠滿了人。這時，正好到達了幾輛危險品和爆炸品物資的車，在這個緊要時刻，嚴重地威脅着鐵路運輸生產和安全，嚴重地威脅着人身安全，嚴重地威脅社會主義建設，眼看就有中斷鐵路運輸的危險。為了不致造成以上問題的嚴重後果，同時，為了沿途工農兵旅客正常乘車，經請示上級後，採取了一個緊急措施，臨時拚湊了一列車，同意給其運走1000多人，剩下的學生回重慶再分期分批走，並請他們把確實人數統計一下。他們統計的結果是2329人。他們同意分成兩批走，第一批走1500人，第二批走829人。但當臨時列車到達後，他們卻一擁而上，2000多名學生都擠上了車（經查明，實際上車將近3000人）。在這樣情況下，火車無法運行。我們提出強烈要求：不能上這樣多人，否則就不開車。但他們根本不聽，強行開車。結果列車開到江津站，實在無法前進，被迫停車三個多小時，由他們自己再三動員，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下車了900多人。[1]

然而，不管事實真相如何，民眾的同情總是傾向於弱者並寄希望於「青天」的，因而，「黨中央、毛主席派了專車」或「周總理派了專車」的說法仍然不脛而走。這一事件在重慶市內引起極大震動。

9月11日，留在學校的重大八一五人員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名義發出了一份反擊的傳單，標題很有當時的特色：

急急急　急急急　急急急　十萬萬萬火急

重慶市反革命大反撲的宣言書

——評「重慶十八中紅衛兵總部」的《第一次告全市同胞書》和葉向東等人的傳單《八二八慘案受害者致革命群眾的信》

一

這份傳單澄清了所謂八二八慘案幾個主要事實的真相，認定編造八二八慘案謊言的「這兩個反動傳單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這是重慶市委一貫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結果」，重大八一五在傳單的最後宣稱：

事實總是事實，真理永遠也封鎖不住！你們越要反革命，越要別人喊「保衛市委」、「保衛區委」、「區長萬歲」，我們就越要造你們反！就越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就越要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造謠的一方和闢謠的一方，都竭力要把對方打成「反革命」，都竭力宣稱自己才真正忠於毛主席。這就是當時流行的社會心理和思維方式。

在這一段到處遭到圍攻、批鬥的最困難的日子裡，重大八一五提出的兩句口號通過傳單、大字報、標語在重慶市內流傳開來，重大八一五留在學校冶

1 茄子溪車站全體革命職工《特急聲明》，1966年9月7日。鐵路工人紅衛兵翻印，1966年9月7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金分團的梁文福（後來成為重大三〇一武鬥隊的隊長）等同學，於9月6日把這兩句口號寫成巨幅標語（由冶金分團負責人喬明成書寫），掛上了市中心的解放碑。它們成為重大八一五標誌性的口號：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

可捱打，可捱鬥，誓死不低革命頭！」

後來中央音樂學院赴渝師生將這兩句口號譜成了歌曲《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戰鬥》，成為重慶造反派廣為傳唱的戰歌。

自八二八事件後，重慶群眾圍繞對重大八一五的評價，展開了激烈辯論。受黨政領導影響的群眾認為「八一五是反革命」、「暴徒」、「糟得很」，而造反派則以當時官方媒體大力宣傳的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武器，認定「八一五」就跟當年的湖南農民「痞子運動」一樣「好得很」。於是，重慶市的造反派以「八一五好得很」為口號，統稱為「八一五派」。

八二八事件發生後，外地赴渝師生也被捲了進來。支持重慶市委的部分師生當然站在聲討「八一五暴徒」一方。四川大學王春秀等38人組成了八二八慘案調查組，寫出了《不准右派翻天——關於重慶江北八二八慘案的調查報告》，稱「八二八慘案是『八一五』中一小撮壞蛋一手製造出來的，這一小撮人和社會上的壞人一起夢想翻天，復辟資本主義」。[1]

但是，這樣的輿論在當時形勢下已經不能佔上風了。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45個外地赴渝高等院校的師生247人組成了更為龐大的「八二八事件聯合調查團」。據調查團自己介紹，他們當中「紅五類[2]子女佔76%，黨、團

1　四川大學八二八慘案調查組（王春秀等38人姓名略）《不准右派翻天——關於重慶江北八二八慘案的調查報告》，1966年9月16日。

2　紅五類：文革中，最初出現的一些紅衛兵，深受中共「階級鬥爭」、「階級路線」宣傳教育的影響，認為自己血統高貴，相對於被專政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提出了「紅五類」的概念，即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最初的紅衛兵只准這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加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員佔90%以上，沒有黑五類子女參加」[1]，他們深入到學校、工廠、機關、醫院、商店、街道等進行調查，還在江北區召開了兩次大型調查會，在江北區和重慶大學設立了兩個群眾接待站，搜集到了大量的證明材料，將一度宣傳得幾乎家喻戶曉的「八二八慘案」的所謂真相徹底顛倒過來，認定為「純粹是重慶市委用顛倒黑白、造謠誣蔑等卑劣手段所編造出來的騙人鬼話。這是他們鎮壓革命的八一五戰鬥團和一切革命群眾的政治大陰謀，是不折不扣的聳人聽聞的重大政治迫害案！也是扼殺重慶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鐵證」。[2]

中共重慶市委陷入了空前的被動。

動手打人為何成風

從八二八事件開始，重慶不同觀點的群眾在辯論中動手打人，逐漸成為風氣。這是初期的武鬥。

文革初期的打人風，很大程度上是在黨政領導的支持、縱容或默許下發生和發展起來的。當時各級幹部中普遍流傳過關於打人的三句話：

「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

關於打人的這三句話，當時各地有不同說法（有的說「左派右派」，也有的說「好人壞人」），其出處，事後也有不同說法。有的說出自江青，有的

1 外地赴渝45院校八二八事件聯合調查團赴京匯報小組《關於重慶市八二八事件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報告》，1966年9月29日，北京。

2 外地赴渝45院校八二八事件聯合調查團赴京匯報小組《關於重慶市八二八事件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報告》，1966年9月29日，北京。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說出自林彪，有的說出自毛澤東。從當時情況來看，應該是出自毛澤東更為可信。

據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所載，毛澤東是在1966年6月作出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如下指示的：

「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1]

隨後，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對北京市海淀區中學生的講話中就說：

「人的錯誤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風暴中出現打人的事情不是壞事。毛主席說過：『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今後不要再打人了。』」[2]

這大概是向群眾公開宣傳這三句話的最早出處。

8月2日，中共太原市委在湖濱會堂舉行中小學師生報告會，山西省委負責人在報告中說：「運動中我們不提倡打人，但群眾迫於義憤，打了人，也沒有什麼。右派打了左派，左派光榮；左派打了右派，活該；左派打了左派，誤會。」會後即開始出現打人。[3]

不過，後來官方的調子有了變化，不再宣傳這三句話了。

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張平化，8月31日在湖南省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批評湖南省委時說：

「八一九事件後，人家在市委捱了打，從市委跑到省委，省委不堅決支

1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出版。

2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出版。

3　太原市教育委員會教育志編寫組《太原教育大事記（1840—1985）》，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持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又喊了一些紅衛兵、赤衛隊把他們夾起來。講話時態度不是鮮明的。比如：在那種情況下，還講好人打好人怎麼樣，好人打壞人怎麼樣，壞人打好人怎麼樣。講那些話，是極不嚴肅，完全模糊了階級立場。」[1]

可見此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曾宣傳過這三句話。

而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8月14日接見北京外語學院十位同志的講話中，聽到有代表問起這三句話時，則乾脆說：

「沒有這個東西，要文鬥，不要武鬥，才是主席的話。」[2]

陳毅認為：「要文鬥，不要武鬥，才是主席的話。」顯然就是否認這三句話是毛澤東說的（由此可知當時確實流傳這三句話是毛澤東說的）。不過，從當時的政治環境、政治氣候看，江青不大可能在公開場合「偽造最高指示」。從當時許多地方領導幹部都在公開講話中引用這三句話來看，這三句話應該是從上面層層傳達下來的，大有來頭。

另有一則歷史資料可為佐證。

1966年9月初，在重慶出現的一份經輾轉翻印、原印製者為「石家莊河北師大附中紅衛兵」，原印製日期為「1966年9月1日」的鉛印傳單《快報》，內容是「現將首都紅衛兵來哈（爾濱）於8月28日下午3時在中共哈爾濱市委後院答覆各地紅衛兵代表提出的問題摘要如下」，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問：有人說，毛主席說：「好人打好人是誤會，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壞人活該」。這話對嗎？

答：毛主席是說過這話，但主席說：「過去打人的就打了，今後不應再打了，再打就是犯法行為。」這個重要部分沒有說清，出現了打人，變相體罰等問

1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出版。

2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題，是別有用心的人幹的。

由此可知，當時毛澤東有關打人問題的這三句話確實是流傳很廣、影響極大的。雖然這三句話沒有載入「十六條」，也沒有出現在普通民眾能看到的官方文件或報刊社論中，但是，從高層到基層的許多幹部都曾在報告、講話中反覆引用過、強調過、宣傳過這三句話，民眾對這三句話也普遍有所聞。

打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蔚然成風」了。

官辦保守派組織率先打、砸、搶

因為缺少北京那樣能「得風氣之先」的高幹家庭眾多的背景，重慶市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先出現的群眾組織，基本上沒有像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北京大學附中紅旗戰鬥小組那樣的早期自發組織，而是一開始就帶上了強烈的「官辦」色彩——這類群眾組織在中共中央作為「樣板」大力宣傳推廣的北京紅衛兵組織的啟發下，在黨政領導的授意、佈置和支持下，由市委文革辦公室和已經蛻變為黨政機關的「群團組織」——共青團市委、市學聯、市總工會等具體操辦下建立起來，因而後來被稱為「官辦」組織。

當時重慶有12所大專院校，計有：西南師範學院（今已併入西南大學），西南政法學院（今西南政法大學），西南農學院（今已併入西南大學），四川美術學院，四川外語學院，重慶大學，重慶建築工程學院（今已併入重慶大學），重慶醫學院（今重慶醫科大學），重慶郵電學院，重慶交通學院（今重慶交通大學），重慶師範專科學校（今重慶師範大學）及1966年才從中專學校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重慶機械工業學校升格的重慶工業學院（今重慶工業管理學院）。

從1966年8月下旬開始，重慶市陸續成立了大專院校中的群眾組織：毛澤東思想赤衛軍和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8月24日，重慶全市各大專院校按黨政領導的佈置統一成立了赤衛軍。赤衛軍的名稱，後來在一些正式場合被稱為「毛澤東思想赤衛軍」，但在一份重慶大學赤衛軍於8月28日轉印的鉛印傳單《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原作者為清華附中紅衛兵齊向東）中，卻署名為「重慶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赤衛軍總部」。可見當時這個組織的名稱是不規範的，因而社會上一般只稱「赤衛軍」。這個組織最初包括大專院校中的「紅五類」學生及教職工，後來學生大多轉到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後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中，赤衛軍就成為以大專院校「紅五類」教職工為主體的官辦群眾組織。

在赤衛軍中最主要的，起領導、示範作用的是重慶大學赤衛軍。重慶大學赤衛軍成立次日，即召開了批鬥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鄧時澤、校團委書記劉稚民的大會，會後宣佈將二人交學校機械廠群眾「監督勞動」並責令檢查——這是真正的「奉旨造反」，因為鄧、劉二人已於6月間即經市委批准、由市委工作組宣佈定性為「鄭思群黑幫」成員並在《重慶日報》點名批判。

8月27日下午，重慶市毛澤東思想赤衛軍在市體育場舉行誓師大會。赤衛軍主要負責人有：王遠舉（西南政法學院學生，市學聯副主席），李傳芳（女，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學生會主席，院文革副主任，市學聯副主席），李長春（重慶大學動力系六六級學生，校文工團合唱隊隊長），梁經權（重慶大學機械系六六級調幹生）。他們均為中共黨員（或中共預備黨員）。

在9月召開的大專院校領導幹部會上，主持市委工作的書記處書記魯大東強調：學校的教師參加赤衛軍，壯大赤衛軍的隊伍。[1]

---

1 魯大東《我的初步檢查和揭發》，1967年3月4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翻印，1967年3月11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在全市大專院校赤衛軍成立的同日（8月24日），重慶醫學院一批「紅五類」學生（主要是幹部子女），在黨政領導支持下串聯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隨後，重慶市委就通過市學聯主席莫澤禮和市委文革辦公室副主任李友同他們聯繫，並隨時傳達一些指示。莫澤禮還幫助串聯了西南師範學院、西南農學院、重慶郵電學院等校加入，並於8月31日組織23個學校的人員在重慶醫學院會議室成立了重慶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聯絡站。[1]

9月3日，經重慶市委「建議」，重慶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在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召開代表大會，通過成立宣言。市委派來了管絃樂隊和記者。

9月8日，重慶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正式成立。總部辦公地點被市委安排在紅嶺（即鵝嶺，「破四舊」風潮中改名）公園。重慶醫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發起人劉桂蘭擔任總部政委。重慶大學學生李長春（赤衛軍負責人）經市學聯和市委文革辦公室「推薦」安排，轉而擔任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指揮。

同時，參照北京的先例（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等給首都紅衛兵一司、二司、三司擔任輔導員），由市委提議，經請示成都軍區批准，駐重慶的陸軍第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2]、政治部主任梁大門奉命擔任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輔導員，並派來了十個解放軍聯絡員。五十四軍軍部（重慶警備司令部）正位於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駐地紅嶺公園馬路對面坡下，也便於就近「輔導」。

9月8日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成立這天，《重慶日報》發表了署名為「重慶醫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劉桂蘭」的文章《向解放軍學習，永遠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士》，此文實際上是向全市公開宣佈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1　劉桂蘭《告全市人民書——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1966年11月20日（油印傳單）。

2　韋統泰：時為陸軍第五十四軍軍長、軍黨委副書記，1964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7年10月任軍長、軍黨委書記。1969年5月調任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後調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第七機械工業部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核心小組組長。1982年12月離職休養。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的政治綱領。

9月9日，《重慶日報》按照市委指示，以套紅通欄標題顯著報道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成立的消息，發表其《向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電》，並配發社論《向英雄的紅衛兵致敬》，稱「這是我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大喜事」。隨即，市委按照李井泉「要號召工人階級動員自己的子女參加紅衛兵」[1]的指示，號召各單位發動「紅五類家長」踴躍「送子參軍」（即送子女參加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重慶日報》進行大肆炒作，全市掀起勞動模範、老工人「送子參軍」熱潮。

在此期間，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也在黨政領導授意和支持下陸續組建起來。開始均由「紅五類」出身的學生串聯組織，其中起領導和骨幹作用的多是在工作組領導學校文革運動時期的校「文革籌」成員或依靠對象。市委還層層組織選拔「紅五類」紅衛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見」。這在當時是一種由黨政領導賜予的極大榮譽。

按照一般的理解，文革初期在黨政領導授意下成立的這類赤衛軍、紅衛兵組織，都是以「保衛黨委」為主要目的的保守派。不過，不應忽略的是，「造反有理」當時已經成為官方媒體大力宣傳的最時髦的口號，是「紅司令」的「最高指示」、時代的「主旋律」，這些保守派也不能不在某些方面表現一些「造反精神」——特別是對已經被上級黨委定性的「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及「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他們會表現出強烈的「造反精神」。

比如，9月3日，重慶大學赤衛軍將已調離重大的前黨委副書記宋殿賓及其妻張道臻抓回學校，掛黑牌，戴高帽，在風雨操場批鬥，並把鄧時澤（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正榮（無線電系黨總支副書記）、賀學洪（冶金系黨總支副書記）、王德倫（教務處副處長）等抓到會場陪鬥，首開醜化、武鬥領導幹

1 李井泉《關於我在重慶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的檢查》，1967年2月8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宣傳組印，1967年2月10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部的先例。[1]

又比如，重慶有名的「特園」（抗日戰爭時期重慶著名民主人士鮮英[2]的公館，民主人士與中共代表聚會地，被中共駐重慶代表董必武譽為「民主之家」），在1966年8月底開始的大規模抄家中，被重慶大學赤衛軍查抄，園內挖地一尺，各屋內翻了個遍，大客廳內珍貴的歷史見證物簽名軸（上有抗戰勝利前後到過特園的國共兩黨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簽名）從此不知下落。後來鮮英家屬從看守他們的赤衛軍口裡得知，鮮宅是當時市領導點名首批抄家名單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衛軍組成抄家隊伍進駐特園，赤衛軍總部就設在特園。[3]

當保守派組織在「破四舊」階段大搞打、砸、搶和抄家的時候，多數造反派組織尚未出現，極少數已經率先成立的造反派組織也處於受壓制、受打擊的地位而難有什麼作為。然而，後來的許多文章或著作，都不加分析地把發生在「紅八月」（在北京以外的省、市一般是「紅九月」）「破四舊」階段的打、砸、搶、抄，籠統地算到了造反派賬上。

需要說明的是，與北京的早期紅衛兵（或曰「老紅衛兵」）和西安的「紅色恐怖隊」之類組織不同，重慶的官辦紅衛兵、赤衛軍，在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抄家和打、砸、搶的時候，基本上沒有出現那種活活打死老師、打死校長、打死「牛鬼蛇神」之類的血腥事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重慶學生中沒有

1　重慶大學校史編委會編，伍子玉主編《重慶大學校史》下冊，重慶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130—131頁。

2　鮮英：1885—1968年，字特生，四川西充人。曾任四川軍閥劉湘司令部行營參謀長、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參贊、重慶銅元局局長等，1940年卸職回重慶。其自建別墅式住宅小區特園，成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民盟）的籌建地和總部所在地，並成為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對外召開會議及會見各界人士的場所。1950年後曾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民盟四川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68年在北京含恨病逝。

3　鮮述秀《我的家特園》，載《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三期29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自恃血統高貴、可以無法無天的高幹子弟群體——北京和西安的「紅色恐怖」血腥事件都是這個群體的「戰績」；另一方面，是重慶的官辦紅衛兵、赤衛軍起來得較晚，而且剛起來不久，注意力就轉到了對付造反派的鬥爭中（以八二八事件為代表）。還有一個間接的原因是，重慶的中、小學教師，以及三分之二的高中畢業班學生，在1966年7月中旬至8月下旬期間，已被各區、縣黨政領導按照市委統一部署分別集中到了各地半封閉的集訓點裡，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人人過關」、相互揭發批判的大字報混戰，而與外面的學生處於相對隔離的狀態，教師們儘管惶惶不可終日，卻又暫時避開了學生們亂打亂鬥的鋒芒。

中學生紅衛兵「逼上梁山」

重慶市的黨政「一把手」任白戈被打倒後，為了穩定重慶局勢，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多次從成都來到重慶坐鎮，並帶來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和中共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漢民協助重慶市委工作。按照分工，劉文珍在重慶「蹲點」，主要抓中學生的紅衛兵組織建設工作。

1966年8月31日，在劉文珍的大力促成下，重慶50多所中學的紅衛兵在重慶市第七中學召開了代表大會，籌備成立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

9月1日，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成立。西南局宣傳部長劉文珍和市委領導到會祝賀。他們想通過「加強領導」，把重慶的學生運動引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因此，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在籌建期間就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安排他們在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辦公，統一製作了旗幟、袖章，甚至還發了一批軍裝。

但是，在毛澤東的號召和部署下，文革運動已經完全脫離過去歷次政治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運動的常軌，向領導幹部造反已逐漸成為大氣候。市委的權威遠不如北京南下串聯學生的影響大，一個叫董九三的清華大學學生成了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實際上的「輔導員」，中學生們甚至把他視為自己的「司令」。這些中學生紅衛兵已經不再順從上級黨委的控制，其總部成員和許多基層組織都傾向以重大八一五為代表的造反派。市委很快就發現了這一問題，趕緊下令《重慶日報》撤銷了已經排好版的有關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成立的報道。

重大八一五上京告狀後，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及基層組織中不少人更對重大八一五表示同情與支持。為了趁重大八一五主力在北京告狀未歸之前解決中學生紅衛兵的問題，9月15日，重慶市委在潘家坪高幹招待所開會時研究決定，讓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與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合併」。[1]

9月16日，市委向劉文珍報告了中學生紅衛兵與重大八一五關係密切的情況，劉文珍決定斷絕對中學生紅衛兵的物質供應，撤出市委聯絡員。

9月20日，按照市委的佈置，中學生紅衛兵總部的電話線被拆除，辦公地點被強佔。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與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強行合併，合併後的組織統稱「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此後被群眾譏稱為「思想兵」）。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的主要負責人有：總指揮李長春（原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指揮），政委劉桂蘭（女，原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政委），副政委兼糾察總隊政委及組織部長孟軍（女，重慶醫學院學生），副總指揮李傳芳（女，原赤衛軍負責人），副總指揮沈誠（西南政法學院文革籌副主任、政法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1003團政委），常委王桂香（女）、王大慶等。他們多是中共黨員（或中共預備黨員）、共青團員。

1　魯大東《我的初步檢查和揭發》，1967年3月4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翻印，1967年3月11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常言道「官逼民反」，強行合併的做法引起激烈反彈，反而促成了本來可能成為又一支「官辦保守派」隊伍的中學生紅衛兵向造反派方向急劇轉化。

9月21日，就在《重慶日報》按照市委指示刊登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與中學生紅衛兵合併，改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消息，並宣佈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已經撤銷的時候，拒絕合併的中學生紅衛兵在第四十一中學（今已改還原名巴蜀中學）召開「全體代表大會」，據稱來自103個學校的代表一致抗議市委將中學生紅衛兵強行合併的做法，他們選出了新的臨時主席團，主要負責人劉先裕（第四十一中學高六六級學生、共青團員）。

當天，一份字跡稚拙、文句欠通順甚至還夾雜着錯別字的油印傳單迅速散發到各地並得到一些學生組織翻印、轉抄：

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聲明

（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代表大會通過）

聯合公報是市委和文革一手編導而成的，扼殺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革命群眾組織的匕首。

我們代表重慶市中學生嚴正聲明：

我們堅決反對這種違背十六條指示的所謂的聯合公報。我們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從根本上否認它！！！這種冒名竊取我總部名義，私自由他們一小撮人在重慶市委和市文革的牽自（制）下搞定的聯合是非法的！！！

一句話就是說，我們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從來就沒有這種聯合公報，也從來沒有和任何人一起發表過任何公告，僅就現在社會上出現這種奇怪的公報，我們嚴正聲明，中學生紅衛兵沒有這種非法的公報，《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聯合公報》等一律宣佈無效！！！

9月24日，中學生紅衛兵3000多人在人民大禮堂向市委靜坐抗議，提出八項要求（給中學生紅衛兵和外地紅衛兵合法地位，公開登報聲明兩總部合併是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陰謀，各革命組織在政治上要有平等待遇，市委對八一五戰鬥團和八二八事件必須表示態度，不得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停止對不願參加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紅五類學生的家長的政治迫害，魯大東和市委其他負責人出來接見學生回答問題，半工半讀學校學生脫產搞文化大革命津貼要照發等）。

因市委遲遲不能（顯然也不可能）作出使他們滿意的答覆，9月27日凌晨，中學生紅衛兵們仿效重大八一五大哥哥大姐姐們的做法，毅然宣佈「步行上京告狀」。在寂靜的秋夜裡，這些大多還是未成年人的中學生，含着熱淚踏上了他們人生中第一次遠離家鄉和親人、後果難以預測的悲壯的告狀之路。

市委聞訊後，趕緊下令各學校組織教師和家長到鐵路沿線學生們逗留的茄子溪、江津、永川等火車站去攔截、勸阻，一個個火車站上，悲憤的口號聲、抗議聲，家長、子女的哭聲、爭吵聲、斥罵聲不絕於耳。雖有部分學生被拉回去了，但仍有1500餘名學生在永川乘上火車，於10月6日到了北京……

當時的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岳林後來在一份檢查中回憶說：

中學生紅衛兵北上告狀走到江津時，魯大東派我去處理。我到了江津和永川，將中央關於國慶節前不要去北京的通知作了公佈。也組織了車子動員到永川的中學生紅衛兵回重慶……後來和中學生紅衛兵25個代表談判，他們提出是去北京告市委的狀，才認識到動員他們回重慶是錯誤的，當時即作了表示，要到北京去告市委的狀我們表示歡迎。由燕漢民請示省同意乘車北上。[1]

至此，一個被市委「逼上梁山」的、與重大八一五「並肩作戰」的中學生造反派組織正式出現，而且成為重慶第一個全市性的造反派群眾組織。

1　岳林《向毛主席請罪，向人民請罪》，1967年3月11日。載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主編專刊，1967年3月13日出版，隨《新重慶報》附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造反派代表上了天安門

在重慶當時的12所大專院校中，西南政法學院、重慶大學、重慶建築工程學院、重慶師範專科學校在沙坪壩區，西南師範學院、西南農學院、四川外語學院在北碚區，重慶醫學院位於沙坪壩區與市中區之間，四川美術學院、重慶工業學院在九龍坡區，重慶交通學院、重慶郵電學院在南岸區。高校最多的地區是沙坪壩，其次是北碚，這兩個地區也就自然成為造反派學生力量最強、影響最大的地區。

繼重大八一五之後，9月3日，位於重慶市遠郊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成立了造反派學生組織八三一戰鬥縱隊（「八三一」這個名稱是紀念他們在8月31日與校方及保守派發生的一次衝突），主要負責人有岳朝亮（歷史系學生，中共黨員）、羊衍海（中文系六七級學生，共青團員）、李盛龍（外語系學生，共青團員）、胡繼澤（外語系學生，共青團員）、張闖（中文系六七級學生，共青團員）、周德英（女，政教系學生，共青團員），周榮（美術與漢語言文學系六七級學生）等。這個組織後來成為造反派中與重大八一五相對立一派的代表。

最初的紅衛兵，幾乎是只有所謂「紅五類」出身的學生才能參加的。但是它一經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公開支持，成為廣大青少年都渴望參加的組織後，很快就不得不發生了「順應民情」的變化。在一份日期為1966年8月30日，署名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回川革命串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戰鬥小組」的鉛印傳單《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萬歲》中，就有這樣的文字：

「紅衛兵」的成員，必須以紅五類子弟（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為核心，樹立紅五類子弟的絕對優勢。

「紅衛兵」還要吸收一批經過鬥爭考驗、立場堅定的其他勞動人民子弟。

「紅衛兵」還可以吸收經過鬥爭考驗、確實能同家庭劃清界限、真正能夠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革命的剝削階級家庭子女。

這時離紅衛兵的公開問世還不久，其組織成份就已突破了開始時嚴格的「階級成份」限制。對於造反派來說，自然更不會讓那些人為的限制束縛自己的手腳了。因此，重大八一五戰鬥團、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一類造反派群眾組織，很快就突破了所謂「紅五類」、「灰五類」的限制，而對廣大群眾敞開了大門。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在8月26日成立時發佈的宣言（草案）中就明確提出：「凡是堅決聽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充分發揚敢想、敢說、敢闖、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師生員工，現在和將來都可以參加八一五戰鬥團。」

造反派的這種做法，自然使保守派大為反感，他們因此攻擊造反派「藏污納垢」、「招降納叛」，成了「牛鬼蛇神的庇護所」。然而，保守派這樣的心態和行為，卻正像當年毛澤東譏諷的「王明路線」搞「關門主義」一樣：「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1] 使得保守派更加孤立。

上京告狀的重大八一五人員於9月15日得到了「毛主席接見」（參加了毛澤東第三次檢閱紅衛兵的集會、遊行），喜訊和北京的造反信息傳到重慶後，造反派師生大受鼓舞。國慶節前夕的9月29日，在首都紅衛兵的幫助下，造反派的重慶市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後更名為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告成立。他們先以枇杷山公園為辦公地點，不久由市文革辦公室安排遷入重慶市少年宮。主要負責人先後是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的秦安全和周家喻。

國慶節前夕，八一五派紅衛兵決定在節日當天獨立組團參加慶祝遊行。

文革風暴已經讓市委領導人六神無主，窮於應付，一心只想防止群眾性

1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55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的動亂進一步蔓延，因此聽說造反派學生要獨立組團遊行，便提前通知各單位官辦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工人糾察隊等搶先佔據遊行必經的主幹道，將造反派排斥於「正統」遊行隊伍之外。

1966年10月1日上午，重慶市照例舉行一年一度的國慶遊行。但這次遊行與往年不同的是，再沒有那種提前綵排、展示各行業建設成就的盛裝遊行隊伍，新穎而又單調的綠軍裝、紅袖章（當然主要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幾個官辦組織的袖章）、毛主席像、毛主席語錄牌和紅旗成為這次國慶遊行的統一格調。

更讓人們意外的是，在遊行隊伍還有一部分沒有走近解放碑下接受市委領導人檢閱，造反派的遊行隊伍還被阻隔在七星崗、觀音巖一帶的時候，主席台上便匆匆宣佈遊行結束，以表明市委拒絕承認造反派政治地位的態度。

據當年造反派學生重慶市六中鋼鞭戰鬥隊增補翻印的大事記記載：

九月二十八日　當我們知道國慶遊行市委不讓八一五派以獨立的支隊遊行時，「八一五」派革命同志無不憤怒，立即發出呼籲，提出強烈抗議。為此，北京來渝同學走訪了「重慶市國慶遊行籌備委員會」，他們答應「解決」這個問題。

九月三十日　市委一反常態，晚11時45分，在市委的指使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工人糾察隊及有關單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搶佔遊行位置，說什麼「八一五」國慶節要鬧事，故意製造緊張空氣。

十月一日　……幾萬八一五派的革命學生未到主席台，他們就匆忙宣佈「大會遊行結束」，匆匆溜走。八一五派戰士高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揮着革命的大字報、土製油印機，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號，精神抖擻，鬥志昂揚……[1]

1　《重慶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六中紅衛兵三二一一一戰鬥團「八一八」編印，「鋼鞭」翻印，1966年10月5日（油印本）。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當年一位旁觀了這一遊行的工人在日記中記下了他所見情景：

當山城的革命群眾知道重大八一五等革命組織還未遊行完時，觀看遊行和遊行完後的革命群眾便自動讓出道來，讓八一五派的隊伍順利通過。重大八一五等革命組織的戰士一個個義憤填膺，懷着滿腔對黑市委黨內走資派的階級仇恨，高舉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畫像和毛主席語錄牌，打着重大八一五的義旗，手捧着並高舉起毛主席的語錄本一邊走一邊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們想念毛主席！」……「萬炮齊轟，重慶市委！」「火燒西南局！炮轟省市委！」……千萬個山城革命群眾匯成了一股巨大的呼聲：「八一五，好得很！」八一五就是好得很！[1]

重慶這邊市委領導人不「檢閱」八一五派紅衛兵的遊行隊伍，北京那邊黨中央卻把八一五派紅衛兵的代表與保守派代表一起請上了天安門參加國慶觀禮。10月1日，以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衝鋒》戰鬥組名義發出的傳單《號外》稱：

在這舉國歡騰、共慶國慶17週年的歡樂日子裡，在京的全體重大八一五戰士參加了首都的慶祝大會。特別令人歡欣鼓舞的是，在這全國性的慶祝大會上，重大八一五戰士有15名代表上觀禮台，一名代表上主席台，與全國人民和我們的外國友人一道歡度佳節。耐人尋味的是這位上主席台的正是在重慶市委炮製的「緊急聲明」中點名批評的周家喻同學。

10月17日，《重慶日報》以「本市赴京進行革命串聯的紅衛兵、革命學生暢談在天安門城樓受到偉大領袖毛主席親切接見的體會和收穫」為題發表了一組文章，其中包括由市委選派赴京的赤衛軍負責人梁經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1　陳家富《山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見聞錄筆記（日記）》，曾鍾據原件整理錄入並提供。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負責人李長春等，但同時也發表了與梁經權、李長春等同時被周恩來邀請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的重大八一五負責人周家喻的文章。

這說明，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的嚴峻背景下，重慶市委已經不得不承認造反派學生的合法政治地位了。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二章

造反之火燃向全社會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官辦的工人糾察隊及「保皇四軍」

為了反擊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從1966年9月初開始的針對所謂八二八慘案的宣傳中，就出現了一些以工人群眾組織名義寫的傳單，一份落款日期為9月5日的傳單《發生在江北區下橫街的八二八事件的真相》，就署名為「重慶發電廠紅衛兵檢修、東風戰鬥隊聯合調查組」，另外還有一些傳單署名「長安廠職工醫院紅衛兵」、「重鋼三廠職工醫院紅衛兵」、「重慶市糖業煙酒公司紅衛兵隊委會」等。不過，這類群眾組織有的只是虛擬的，並無真正的組織實體；有的則是在黨政領導佈置下以政工幹部為主體匆忙成立起來的臨時性組織，如大型國防企業長安機器廠就在8月31日由廠黨委佈置政治部工作人員起草了成立紅衛兵的宣言，9月1日下午發給各車間、科室，自上而下成立了「紅衛兵先鋒戰鬥團」。[1] 這樣的「假紅衛兵」為時很短，很快就被工人糾察隊等組織所取代。

重慶最早出現的統一的工人群眾組織，是重慶工人糾察隊。

重慶工人糾察隊，是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指示成立的。8月底、9月初的一天，李井泉在重慶找幾個機關、工廠的領導幹部談話，談話中，有人提出機關、工廠要不要組織紅衛兵的問題，李井泉回答：機關和工廠內不再組織紅衛兵，因為已經有了文化革命組織、工會組織，還有民兵組織。如果工人要求組織，可以依照歷史經驗組織工人糾察隊，擔負保護廠房機器的任務。[2]

---

1 中共長安廠黨委常委會《張汝聲同志代表黨委常委的檢查材料》，1967年1月14日。長安廠革命造反聯絡站翻印。

2 李井泉《關於我在重慶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的檢查》，1967年2月8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宣傳組印，1967年2月10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另據中共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漢民1967年初所寫材料中稱：「李井泉在重慶親自主持組織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重慶工人糾察隊是李井泉指示後，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國防政治部[1]、機械政治部[2]三個部開了會佈置，然後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袖章是市總工會統一印發的。」[3]

1966年9月5日，按照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部署，工人糾察隊在首家試點單位中梁山煤礦宣告成立，發出的鉛印《宣言》傳單中稱「工人糾察隊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群眾性的階級組織」，《宣言》通篇不用「造反」字樣，而強調「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敵人造謠破壞，堅決向一切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共產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切反動言行作鬥爭」。

9月6日，中梁山煤礦工人糾察隊500餘人由書記、礦長帶隊，乘11輛卡車到市區遊行示威。

接着，全市紛紛建立起了工人糾察隊。「市總工會還為工人糾察隊統一編號縫製了袖章，隨後財貿系統和學校的糾察隊也建立起來了。」[4]

重慶工人糾察隊主要負責人是楚光輝（重慶大學汽車班班長，轉業軍人，中共黨員）。

除去學校和工廠的保守派組織外，當時重慶還有一個文化系統的保守派組織毛澤東思想文藝革命軍，它主要由重慶市京劇團、川劇團、越劇團、話劇團、雜技團等文藝演出團體中的政治工作幹部、行政幹部和一些曾被工作組作

1　國防政治部：即國防工業政治部。

2　機械政治部：原文如此。當時重慶市委並無機械政治部，機械系統包括在工交口內，此處疑為「基建政治部」之誤。

3　燕漢民《我的檢查和交待》，載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八一五戰報》第六期，1967年1月14日。

4　魯大東《我的初步檢查和揭發》，1967年3月4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翻印，1967年3月11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為「依靠對象」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組成。但是，文藝革命軍成立很晚，到1966年12月3日才公開成立，次日即遇上了造反派與保守派大規模武鬥的「一二·四」事件，還沒來得及開展活動就遭到沉重打擊，因此它對重慶文革歷史的影響極小。

後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工人糾察隊和文藝革命軍這四大官辦保守派組織，都被造反派群眾視為「保皇派」，譏稱為「保皇四軍」。

「保皇派」這個提法，是從中央來的。

老百姓最早見到的是《人民日報》1966年6月25日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社論稱北京大學無產階級革命派「推翻了以陸平為首的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統治」，社論中還一再使用了「陸平等這一小撮保皇黨」的提法。

當時不少中央領導人都用過「保皇派」這個提法，如陶鑄在講話中就說：「什麼是保皇派？現在保皇派很多，你講他是，我講你是。比如北大，陸平，特別陸平是校長，黨委書記，四清開始搞得是對的，以後又講不對，保過了關。廣大學生不知道。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一出，她的大字報寫得很好。有1000餘學生要保衛陸平，保衛基層黨組織，這是錯誤的，但其中都是保皇派嗎？其中少數是，多數是盲目的。」他進一步明確指出：對待校長、黨委書記、基層黨組織，「明知是壞的，還自覺地用各種辦法去保他，是保皇派」。[1]

鄧小平聽取師大女附中工作組的匯報，當工作組談到學校還有人在保被工作組批判的兩個校長（其中一個就是後來被學生打死的卞仲耘）時，鄧小平說：「不是所有保皇派都要保到底的。不要那麼簡單，反覆一點沒有壞處，可

1 《陶鑄在衛生部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6月25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能有的保皇派會變成真左派。」[1]

「保皇派」這個提法，就是這樣自上而下氾濫開來的。以後社會上的一些造反派更進一步罵「保皇派」為「保皇狗」，甚至還編出了這樣的歌：「保皇的王八蛋，你睜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誰敢來阻攔？……」

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平反

為了進一步排除障礙，發動廣大幹部、群眾投入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實施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的部署，將前一階段各地黨政領導按照「反右派」鬥爭和文革初期批判「三家村」的經驗，對群眾進行打擊、壓制的做法，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1966年10月1日首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週年大會上，安排林彪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作的講話中宣稱：「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次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更明確提出：「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強調「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

按照毛澤東的決定，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要內容的工作會議，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會議中作

1　《鄧小平對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的談話》，1966年7月5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長篇報告，毛澤東對報告稿事先作過多次審閱修改，並批示「很好」，「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一本」。[1]林彪也在會議中作了關於兩條路線鬥爭的講話。

這一會議精神貫徹到各地，加上在毛澤東支持鼓勵下的紅衛兵大串聯的「煽風點火」，使得文化大革命終於衝破了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的範圍，迅速擴大到工礦企業以至街道、農村、部隊等各方面，形成了廣泛的群眾性造反和「打倒一切」的局面。

與此同時，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於10月5日發出《中央批轉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佈「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2]

這一《緊急指示》發出後，中央文革小組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都明確強調它適用於一切單位，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從未有過的大規模平反浪潮，此舉對深入發動群眾投身造反運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又因為在平反中對清理和銷毀有關個人檔案材料問題的不同理解、不同處理方法而發生爭執，引起進一步的兩派對立和對黨政機關的衝擊。加上《緊急指示》中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等原有規定，使得最初由工作組在有限範圍內實行過的「踢開黨委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141頁。

2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8月版280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鬧革命」進一步發展成為衝擊全社會的潮流。

以往的歷次政治運動，通常只是在運動結束之後才會有小範圍的、不事張揚的甄別和平反工作，而這次為了進一步把群眾發動起來，毛澤東決心發起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平反運動，一時間平反浪潮席捲全國。重慶市委還不得不發出（66）171、172號通知，要求各單位搞好平反工作，並支持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的平反監察委員會開展工作。[1] 這個平反監察委員會由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和中學生紅衛兵曾維才（建材學校學生）具體負責，市委文革辦公室負責人周炳林與之聯繫。

毛澤東的這一「戰略部署」，確實極大地解放了思想，打消了許多人擔心遭遇第二次「反右派運動」的顧慮。有了這樣的背景，就開始出現各地工人上京告狀的高潮，從現存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2] 可知，在10月下旬以前，幾乎沒有中央領導人接見赴京工人代表的講話，此後才陸續有了10月30日陶鑄接見湖南工人、師生、幹部代表，11月10日王力、穆欣接見山東部分來京串聯革命群眾（包括少數工人），11月12日陳伯達與首都職工造反派代表座談，11月15日唐平鑄接見江陰五一棉紡織廠等單位來京代表，同日王力、戚本禹接見全國來京工人代表，11月17日陳伯達、王力與北京工礦企業職工少數派座談，同日王力、姚文元接見杭州絲綢廠2000多來京職工，11月19日劉寧一接見無錫來京工人代表……

這樣，在這年10月中旬，就發生了重慶文革史上繼9月上旬重大八一五上京告狀和9月下旬中學生紅衛兵上京告狀之後的第三次影響較大的上京告狀事件：重慶工人北上告狀。

1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重慶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96頁。

2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工礦企業造反派的崛起

工礦企業中的造反派群眾組織，略晚於官辦保守派組織出現。剛開始時往往處於不公開或半公開狀態，即使公開的也沒有保守派組織那樣的規模和聲勢。嚴格說來，它們也不能算真正自發的群眾組織，因為既有造反派紅衛兵的串聯、鼓動（有的甚至包辦，從確定組織名稱、起草組織章程、選舉勤務組成員到部署造反行動、佈置批鬥大會等一系列具體事務），更有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和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支持。

在1966年8月底，重慶市的少數工礦企業中已經出現早期造反派基層群眾組織，如供電公司修試場的鐵錘戰鬥小組、城區供電所的硬骨頭戰鬥隊、重慶群林服裝廠（「破四舊」時改名為工農兵服裝廠，位於南岸區）的革命青年戰鬥隊等。9月上、中旬，重慶市糖果糕點公司紅衛食品廠部分工人組成了紅衛戰鬥隊，東風食品廠部分青年工人組成了紅衛兵東風戰鬥小組……

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大多是在造反派學生支持下籌備和建立起來的。最先由造反派學生組織控制局面的大學，成為工人、機關幹部和其他階層造反派的「聖地」（當時經常放映的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中的一條字幕「斯莫爾尼大學是革命的司令部」，常被大學造反派用來形容自己的學校）。工人造反軍、財貿工人造反團等組織就是在重慶大學新大樓醞釀籌建的。因為許多造反派工人都衝破市委有關不准到市委門口看大字報的禁令去市委門口看大字報，而市委大門對面的第六中學又較早由造反派學生控制了局面，因此六中也就成了工人造反派組織籌建時的一個重要聯絡地點。鄰近六中的人民小學，當時設有外地赴渝紅衛兵接待站，這也使造反派與外地特別是首都紅衛兵建立聯繫有了便利條件。

當時的重慶市副市長、市經委主任馬力在一份材料中回憶：「9月18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晚，根據（工交）政治部通知，要經委組織工作組到二印、農藥、煤焦油、重紡、紅旗、化研所等六個單位，制止造反軍開大會……工作組到廠並未發現造反軍要開會，但我仍然要他們留到國慶節前後才回來。」[1]

另據重慶市委基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回憶，第十八冶金建築公司的造反派組織是在9月25日以前就建立起來的。[2]

當時在六中與造反派工人聯繫的首都紅衛兵主要有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學生孟憲臣（後為首都一司駐渝聯絡總站負責人），北京航空學院學生朱進選、許叔興等。當時工人造反派組織名目繁多，有的叫造反軍，有的叫造反團，有的叫戰鬥團，朱進選提議把名稱統一起來，並且替他們起了一個因力求多一些「革命」元素而略顯冗長的名字：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他還親自設計和刻印（油印）了第一批工人造反軍的紙質胸章，起草了宣告成立的《告全市人民書》。1966年9月30日，由孟憲臣等首都紅衛兵主持在重慶人民大禮堂召開了成立大會。雖然到會的工人不如到會助陣的學生多，但畢竟是重慶第一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正式成立了。

10月7日，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編印上報市委、市文革辦公室的《情況反映》第73期載《關於革命工人造反軍的情況反映》中稱：「最近幾天，我們對『革命工人造反軍』的情況作了進一步瞭解。據工交口57個單位初步掌握，參加『革命工人造反軍』的約有1279人，經過深入細緻的思想教育工作，現已退出這個組織的有805人，佔參加總人數的62%……目前各單位正在繼續抓緊做工作，爭取盡快地分化、瓦解這個組織。」[3]

1　馬力《低頭認罪，革面洗心——我的交代和檢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印，1967年3月13日。

2　申寧《反戈猛擊，立功贖罪》，載《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會大東大會特刊》，中共重慶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機關革命造反派編印，1967年3月1日。

3　重慶師專八一五戰鬥團《八一五烽火》報創刊號，1967年1月24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從這份材料可以看出當時市委對工人造反派施加了較大的壓力。另外，當時的重慶市副市長、市經委主任馬力在一份材料中還談到他曾佈置駐二印廠工作組用經委的吉普車到六中附近把二印廠一個常去六中參加造反軍活動的勤雜工抓回廠裡審問，駐三輪車社的工作組把造反軍成員張政等人關起來批鬥、圍攻，逼迫交出造反軍的「聯絡代號」，把造反軍的活動打成反革命活動等。[1]

然而，國慶節後形勢已經出現重大變化。受到10月中央工作會議和10月5日《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的鼓舞，在造反派學生的鼓動下，上百名工人造反派於10月11日晚上進駐市委大飯廳請願，要求市委領導接見解決問題，承認工人造反軍是合法的群眾組織，並為各單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正式平反。市委對這樣的舉動當然不可能輕易表態，只於次日深夜派一位書記處書記出來講了些安撫、勸導性的話。

10月13日，眼看市委領導仍然拒絕接見和答覆工人造反派的要求，孟憲臣、朱進選等首都紅衛兵決定撤出市委，步行北上告狀。朱進選起草了《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北上宣言》，請六中學生趕印了一批油印傳單，宣言稱：

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鑒於重慶的嚴重情況，為了捍衛十六條，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解放工人被害、被扣、被軟禁、失去人身自由的一切革命同志，揪出、鬥倒、鬥臭、鬥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於11號晚召開緊急會議，控訴市委嚴重違背和極端仇視、歪曲、破壞、對抗十六條的嚴重罪行，會後去市委解決問題，但市委用盡破壞之能事，市委一手控制的市文革——市委鎮壓、破壞重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頭號打手，60年代的絞殺革命的白公館，進行百般刁難，於12號晚三點半一位書記出來「接見」，此位書記完全暴露了市委的醜惡嘴臉。……我們要親自去見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親自向毛主席匯報重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

1 馬力《低頭認罪，革面洗心——我的交代和檢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印。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情況，我們最相信黨中央，最相信毛主席，我們只能相信黨中央，只能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是我們工人階級的救星，是我們心裡最紅最紅的紅太陽。[1]

10月14日，在市委大飯廳靜坐請願的工人造反派全部撤回六中。孟憲臣、朱進選等北京學生召集各區工人造反派中的骨幹人員開會，研究了北上計劃，並把參加北上告狀的工人按地區編成了六個連，指定了負責的連長、指導員。

10月15日清晨，重慶工人造反軍北上告狀團從六中出發，步行北上，領隊先是楊國成（重慶市建工局402工區工人，復員軍人，中共預備黨員，24歲），後是葉祖祿（重慶市工業設備安裝公司工人，復員軍人，20歲）。告狀團約有六七百人，首都紅衛兵孟憲臣、許叔興等隨行指導，還有一批重慶學生也跟着一起北上。

焦頭爛額的重慶市委聞訊後立即派了市委辦公廳、工交政治部、基建政治部和文革辦公室的幹部（還帶上了醫護人員）追趕告狀團。當晚，市委人員在重慶市北邊的璧山縣趕上了工人造反軍北上告狀團，勸說工人們返回重慶，但是無效。為避免步行途中出事，市委便聯繫重慶駐軍派出軍車，將告狀團全部送到永川火車站改乘火車北上。告狀團到京後，重慶市委考慮到天氣轉寒，北上工人都穿得很單薄，擔心他們受凍生病成為自己新的「罪行」，還通知凡有人員北上的部門和單位各自派人給工人送去寒衣。

重慶工人造反軍北上告狀團人員在北京被安排參加了11月3日舉行的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的集會和遊行。

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引起許多工人造反派不滿，認為其中一些提法是「以生產壓革命」。重慶工人造反軍北上告狀團派出三連連長甘廷榮（重慶市工農兵服裝廠工人，20歲）和四連骨幹朱鎮

---

1 《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北上宣言》，重慶市大中學校紅衛兵重慶三江高級中學校紅衛兵戰鬥隊、九一三縱隊翻印，1966年10月13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坤（重慶市建工局402工區工人，共青團員，21歲），同其他一些地區來京工人代表一起走訪了《人民日報》社，當時的《人民日報》負責人唐平鑄接見了他們，聽取他們的意見。

北上告狀的工人造反軍人員在京因發生意見分歧，以朱登明（重慶市市中區建築修繕聯合社施工員，26歲）為首的告狀團一連（主要是建築聯社工人）分離出來，單獨成立了工人造反軍一支隊。以後他們一直以一支隊名義單獨活動。

因出發時回住處拿東西而掉隊未能走成的北航學生朱進選，在重慶六中又接待了陸續前來串聯的工人造反派，將他們組織起來，按各地區編為工人造反軍的不同分團，以留守重慶的工人造反軍成員蔣國志（國營重慶建設機床廠工人）為首組建了工人造反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有蔣國志、李方成（重慶天原化工廠教育辦公室幹部，轉業軍人，28歲）、趙蔚武（重慶電表廠工人）、藍大成（重慶電表廠工人）等。因全國形勢已經大變，工人造反軍司令部成立後得到了重慶市委的承認，從而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工人造反軍中最大的一個山頭。

此後，工人造反軍司令部中以人民交通公司職工為主的二分團，脫離司令部單獨活動，並成為工人造反軍中堅決與重大八一五站在一起的一個獨立山頭，主要負責人楊大渝（人民交通公司汽車修理總廠工人，23歲）。

11月中旬，工人造反軍北上告狀團回到重慶後，因不願接受蔣國志為首的工人造反軍司令部領導，另外成立了工人造反軍總部，主要負責人葉祖祿、朱鎮坤、楊國成、黃廉（重慶市木材公司魚鰍浩木材加工廠採購員，轉業軍人，33歲）、林嘉禾（重慶鋼鐵公司五廠工人，共青團員，28歲）等。以後，因黃廉年齡稍長，社會經驗較多，且與已經亮相造反的小說《紅巖》作者羅廣斌、楊益言關係密切，在第一次大規模武鬥「一二·四」事件及反對重大八一五「右傾」等活動中都有較突出的表現，成為重大八一五等組織的重點攻擊目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標，其名氣逐漸超過了工人造反軍其他年輕的「元老」。

北上告狀團回重慶後，一些脫離了工人造反軍的人員成為其他造反派組織的領導和骨幹。如三連連長甘廷榮成為重慶財貿工人九二一戰鬥團（後為反到底派財貿井岡山總部）主要負責人。告狀團二連的供電公司工人們則組成了供電八三〇戰鬥團，成為八一五派的骨幹。

另一個成立較早、影響較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於9月21日籌備成立。10月12日，以重慶赴京工人戰鬥組返渝聯絡站、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籌備處名義發出了《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組織章程（草案）》，開始公開發展隊伍。主要負責人早期為劉紅（又寫作劉洪，本名劉興泉，紅旗化工機械廠工人，復員軍人，因其在北京多次為首衝擊中南海、天安門和毆打解放軍等行為，被該組織於12月15日開除並於1967年1月7日以「現行反革命」罪名扭送公安局），此後的主要負責人是劉祖國（江北造船廠工人，22歲）、王庭學（重慶造漆廠助理技術員，共青團員，21歲）。後來在對革聯會的態度上發生分歧，分化為以劉祖國為首的二七戰鬥團總部（反革聯會）和以王庭學為首的二七戰鬥團總指揮部（支持革聯會）。

與工人造反軍幾乎同時在重慶大學醞釀籌建的財貿工人造反團，不久改名為重慶市革命職工造反團，於1966年10月16日正式成立，主要負責人有羅光遠（重慶市稅務局市中區分局兩路口稅務所幹部，轉業軍人）、田顯邦（重慶燈泡廠工人，廠毛主席著作學習積極分子，燈泡廠八二八戰鬥團負責人，31歲）。

成立較早而且較有影響的重慶財貿系統兩大群眾組織分別是：

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主要負責人有王紹川（重慶市第二商業局教育辦公室負責人，轉業軍人，中共黨員，30歲）、楊正中（市中區日雜商店幹部）、林德文（市食品公司幹部，23歲）、李才興（市食品公司船隊隊長，中共黨員）、印仁祥（市物資回收公司幹部，共青團員，26歲）；

財貿工人九二一戰鬥團，主要負責人有甘廷榮、汪永強（重慶人民商店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即原友誼商店營業員，中共黨員，20歲）、劉煥中（裕和彩洗染店工人）等。

這兩個組織成立的時間約在1966年11月間。財貿九二一的名字，是因這年9月21日中共重慶市委財貿政治部在全市財貿系統採取了一次對造反派的統一打擊行動，從而激化了矛盾，把一批因向領導提出不同意見而遭到工作組打擊的職工「逼上梁山」，在造反派紅衛兵支持下逃離本單位，有的（如工農兵服裝廠甘廷榮）參加了「重慶工人北上告狀團」，回來後，他們就把「九二一」當作了自己的造反紀念日和組織名稱。

重慶市第二輕工業（即手工業）局系統職工中的造反派於這年10月底成立了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二輕兵團（簡稱二輕兵團），這個組織後來在重慶文革中有較大影響，主要負責人夏祥貴（沙坪壩區鋼材改製廠工人，23歲）、庹雲龍（市中區儲奇門機修廠工人，中共黨員）。

重慶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大渡口工業區重慶鋼鐵公司，也成立了造反派群眾組織。9月8日，部分造反派工人到公司大樓前宣傳八二八事件真相，遭到公司黨政領導組織的保守派職工圍攻，雙方發生磨擦，此後不久，造反派即成立了重慶工人九八戰鬥團，以「九八」這個日期來紀念那次事件。主要負責人陳萬明（重鋼機修廠起重工，共青團員，25歲）。

11月下旬，由陳伯達和王力按照毛澤東指示精神起草的《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工礦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11月17日），經首都紅衛兵迅速傳到各地，其中第八條稱：「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種文革組織的權利……」第九條稱：「工人的聯合組織，最好採取聯合會，協會，代表會，代表大會等適合工人群眾的組織形式……」這個「十二條」，又經毛澤東親自主持重新修改，[1] 成為於12月9日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其中第九條稱：「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

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661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法的規定，工人群眾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基本保留了原「十二條」中第八條的精神（略有文字上的不同），但不再有工人組織最好採取什麼形式的規定。

這一下，有了「尚方寶劍」，從11月下旬到12月初，各地工礦企業的造反派群眾組織便有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

12月16日，重慶國防工業系統最大的造反派組織八一兵團，在重慶工業學院禮堂成立。這個成立得較晚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組織，後來在重慶文革中卻起到了較大的作用，成為八一五派的中堅。其主要負責人是陽增泰（重慶朝陽電機廠技術員）。隨後，國防工業系統另一個造反派組織軍工造反兵團成立，主要負責人康榮袍（國營江陵機器廠總工程師辦公室主任，中共黨員）、李桂芝（女，國營長安機器廠工人）。這個組織後來發展成為反到底派著名的軍工井岡山。

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代表黨中央宣佈：「工人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種革命組織的權利。」把「十條規定（草案）」中的有關精神進一步明確公開了。工礦企業成立造反派群眾組織已經成為時代主流。

機關幹部紛紛造反

造反一旦成為時代潮流，就沒有什麼領域不被波及了。黨政機關、事業機關也開始動了起來。

在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中，實際上已經有不少機關幹部加入並在其中起領導和骨幹作用。如重慶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其領導成員全是二商業局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系統的機關幹部。不過，以機關幹部為主體並以機關幹部名義建立的造反派組織，則因為重慶當時沒有像上海市委寫作班子那樣的機構及張春橋、姚文元那樣的「左派」上司授意，而出現得較晚。

在重慶較早建立的機關幹部造反派組織，是重慶市人民委員會（即市政府）經濟委員會（簡稱經委）紅色造反團，主要負責人段德昌（市經委十八級幹部，轉業軍人，中共黨員，35歲）。隨後在市委、市人委的各部、委、局，市總工會，市團委，市婦聯，市委黨校、省委第二黨校及公、檢、法等機關中先後建立起了造反派組織。這些組織大多成立於1966年底或1967年1月間。

重慶一部分市級機關幹部的造反，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因素，即在文革前的幾次政治運動中和文革初期，重慶的機關幹部中不少人受到過傷害，被先後擔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整出多起重大冤案，如「反右派運動」中重慶全市宣傳、文教系統領導幹部幾乎全軍覆沒的「張文澄[1]右派反黨集團」案，1963年按「反黨集團」性質處理，牽連到重慶市委組織部、辦公廳、團市委、市委黨校大批幹部的「蕭、李、廖」案，文革初期的《重慶日報》「三家村」案等。受到過打擊、壓制或對那些冤案不滿的幹部，文革中相信了黨中央「十六條」號召的「自己解放自己」，不少人參加了造反派隊伍。

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在6、7月間曾按上級指示大揪以副刊組

1　張文澄：1915—1998年，抗日戰爭時期在四川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成都市委組織部長、川康特委秘書長、宜賓中心縣委書記等，曾被周恩來派赴雲南任直屬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調查研究組組長。1957年時任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因為此前在四川省黨代表大會上給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提過意見並在投票選舉時沒有投李井泉的票，被李動用專政機關查出而遭打擊報復，被打成重慶黨內頭號「右派分子」，並由此炮製出「張文澄右派反黨集團」大冤案。文革結束後平反，曾任西南政法學院黨委書記，重慶大學黨委書記，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成員為主的所謂「三家村黑幫」，傷害了一批幹部、群眾。在1966年底，一些編輯、記者和工人也起來「自己解放自己」，成立了造反派群眾組織，主要負責人有邱遠勳（記者）、蕭學初（記者）、伊根瑞（記者）、劉全福（排字工人）等。1966年12月25日，重慶及外地來渝造反派召開批判《重慶日報》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重慶日報》編委、報道組組長沈世鳴（女，中共黨員）作了題為《戳穿重慶市委操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黑幕》的發言，正式宣告《重慶日報》的部分領導幹部也起來造反了。

小說《紅巖》作者造反了

文藝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捱整的重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是從「文藝整風」和文藝批判開始的。因此，文藝界人士都患有「運動恐懼症」，不大敢起來參加造反。然而，在毛澤東一手製造出來的造反大潮推動下，文藝界人士也紛紛起來造反了。

在重慶市文藝界，最早的造反派組織是重慶市群眾藝術館的革命造反小組。這個小組只有四個人（群眾藝術館文學編輯組幹部鄒雨林，美術組幹部王以時，音樂組幹部何明、謝思穎），因為向領導提了一些很一般的意見而遭到工作組的打擊，在9月上旬，他們得知重大八一五等步行上京告狀的消息後，就自己購票乘火車上京告狀，開了重慶市文藝界人士自行離開單位上京告狀的先例。

不過，當時最有影響的，是長篇小說《紅巖》作者羅廣斌、楊益言的造反。

長篇小說《紅巖》寫的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重慶及川東的中共地下黨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組織與國民黨當局鬥爭的故事，全景式地反映了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運動、農民暴動及政治犯獄中鬥爭，被評論界權威、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林默涵譽為「黨史小說」。在1961年出版後，因「生正逢時」，投合了當時強調反帝反修、狠抓階級鬥爭的需要，迅速在全國暢銷，掀起閱讀熱潮，許多青少年將這部小說作為「革命人生教科書」，文學評論界幾乎沒有誰不對這部小說作出過歌頌性的評論的，連那位喜歡用「棍子」打人的姚文元也專門寫了篇《黑牢中的紅鷹——讚〈紅巖〉》，熱情洋溢地稱頌：「《紅巖》，是為千千萬萬犧牲了的無產階級戰士樹立的一塊紀念碑；《紅巖》，是一曲悲壯動人的共產主義思想的讚歌；《紅巖》，是一幅山城革命鬥爭廣闊的戰鬥圖；《紅巖》，是一本教育青年怎樣生活、鬥爭，怎樣認識和對待敵人的教科書。」

在《紅巖》引起的轟動效應中，各種藝術形式爭相改編，影響較大的，有歌劇《江姐》、電影《烈火中永生》、連環畫《紅巖》等，在各劇種、各地方劇團的改編熱潮中，江青也親自抓了北京京劇團（即北京京劇一團）改編《紅巖》的工作，還把小說《紅巖》作者羅廣斌、楊益言請到北京去參加修改劇本，親自接見了兩位作者，並向他們贈送了《毛澤東選集》。

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8月底至9月間的「破四舊」狂潮中，另取「革命化」的名字成為時尚，重慶好幾所中學便都同時想要把自己的老校名「破除」而改名為紅巖中學。幾所中學都取同一個名字顯然不行，那時還沒有「搶註商標」一說，相持不下中，只得經有關部門協調，最後批准，三所與小說《紅巖》中描寫的地點有關的中學：原沙坪壩區童家橋中學改名為紅巖一中，原沙坪壩區楊公橋中學改名為紅巖二中，原市中區凱旋路中學改名為紅巖三中。

在紅衛兵大串聯時，許多到重慶來的紅衛兵都是慕小說《紅巖》之名而來，一方面參觀小說中寫到過的白公館、渣滓洞、朝天門碼頭等地方，一方面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像「追星族」那樣希望瞻仰小說作者的丰采，請他們簽名留念。

瞭解到這樣的背景，就會明白當時《紅巖》作者起來造反會造成多大的震動和影響。

小說《紅巖》作者羅廣斌、楊益言這時是重慶市文聯創作員（即專業作家），正在與同一創作小組的劉德彬一起創作《紅巖》的「前續」，並準備按照江青的指示修改《紅巖》。儘管《紅巖》使他們得到了很高的榮譽，但是，因為羅廣斌在1949年「一一·二七」（國民黨政權從重慶潰逃前夕對政治犯實施大屠殺）之夜從白公館看守所出逃一事，長期引起有關方面的懷疑，進行了多次審查，並對羅廣斌給予了一些政治待遇上的限制（如不讓參觀國防工廠，不讓出國等），使羅廣斌深感委屈和壓抑。

羅廣斌、楊益言起來造反的另一個原因，從當年楊益言起草的一篇紀念羅廣斌的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

羅廣斌同志為什麼能夠較早就起來造反，這不能不涉及到1965年1月在他生活中發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在北京幾次接見了他。在接見中，江青同志除了對《紅巖》作了肯定，提出了修改意見，一再勉勵羅廣斌同志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澤東思想，首先要在政治上過硬。江青同志還親自題字送了一套寶書——《毛澤東選集》給羅廣斌同志……

1966年4月，羅廣斌同志學習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4月18日《解放軍報》社論，羅廣斌同志反覆學習領會，認為這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綱領性的寶貴文獻，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他根據文件的精神，聯繫本機關的實際，就勇敢地起來造反了。他認為重慶文聯長期以來不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它所主辦刊物《奔騰》是不折不扣的周揚黑線的產物，因此在機關幹部會上，他首先指出：「重慶文聯爛掉了，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有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奔騰》的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政。」[1]

文中所說的江青「接見了他」，實際上是接見了羅廣斌、楊益言二人。

在北京得到「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接見和關照的殊榮，在受到重慶市委種種政治限制的同時從「毛主席夫人」處得到的知遇之恩，以及由此而對文藝整風和文藝批判中一些高層內幕的提前瞭解，都使他們對這場「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有了自認為是「先知先覺」的理解，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優越感和使命感。

7月22日，駐重慶市文聯的市委工作組提出，為了「防止洩密」，要求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將他們為修改《紅巖》和寫作《紅巖》續篇而進行採訪及查閱敵偽檔案時記錄、摘抄、搜集的有關資料暫交工作組代管。這自然更加引起了羅廣斌的敏感和警惕（後來羅廣斌、楊益言說這是對他們進行了「變相抄家」）。

9月2日，羅廣斌、楊益言與劉德彬串聯文聯機關的炊事員、勤雜工、司機等「勤雜人員」組成了紅衛兵戰鬥組。這個組織名義上以工人為主體、為領

1 《軍工井岡山》編輯部、《紅巖戰報》編輯部、《八二六之聲》編輯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忠誠衛士——二評山城羅廣斌事件》，載成都《軍工井岡山》報，1968年3月出版。轉摘自《批〈紅巖〉揪叛徒參考材料之五——羅廣斌問題》，紅巖村編輯部翻印，1968年7月。此文的背景是：1967年2月10日羅廣斌自殺身亡後，劉德彬、楊益言逃到北京向中央告狀。10月初，劉、楊離京到成都，繼續進行為被打成「叛徒」的羅廣斌鳴冤翻案的活動。1968年初，成都《軍工井岡山》編輯部決定出版為羅廣斌翻案的小報專版，該報負責人黃世學與楊益言、劉德彬商量並請示四川省革籌組政工組宣傳組後，商定寫出「四評山城羅廣斌之死」的長文，把羅廣斌之死作為「李（井泉）、廖（志高）死黨」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罪行來批判。「一評」為《揭開李廖死黨利用派性製造羅廣斌事件的黑幕》，由四川省文聯陳朝紅執筆；「二評」為《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忠誠衛士》；「三評」為《關於羅廣斌同志的歷史》，由劉德彬執筆；「四評」為《關於小說〈紅巖〉》，由楊益言執筆。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導，實際上的領導核心是羅廣斌、楊益言。人數雖少，但因小說《紅巖》的影響，而對其他單位的造反派起到了極大的鼓舞和號召作用。他們在10月25日就通過所謂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選舉」（剝奪了所謂「黑幫」及「黑幫爪牙」們的選舉權），在文聯機關建立了「文革籌備小組」，掌握了文聯機關的大權，使文聯機關成為重慶市最早實現了造反派奪權的單位，並成為一處重要的造反派聯絡據點。

11月8日晚上，羅廣斌、楊益言將原駐文聯的市委工作組組長牛文（重慶市文聯黨組成員、美術家協會四川分會負責人、小說《紅巖》版畫插圖作者之一）拉到市中心解放碑「辯論」。這等於是羅廣斌、楊益言在重慶市公開亮相造反，對造反派起到了極大的鼓舞、號召作用。

與此同時，因不滿於黨委或工作組動輒以「反黨」、「反革命」為棍子打人，壓制不同意見，以及文革開始時以批「小三家村」之名整人，重慶市一些文藝演出團體（如歌舞劇團、話劇團、越劇團、雜技團等）的少數人員從10月初開始到重慶大學串聯，找重大八一五「告狀」（控訴本單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或「文藝黑線」），此後便在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學生的支持幫助下陸續建立起了造反派組織。他們在10月至11月間先由到北京告狀的人員籌建，回重慶後正式建立起一個全市性的統一組織——重慶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先後有李光亨（重慶市歌舞劇團導演，中共黨員）、何明（重慶市群眾藝術館音樂組幹部，中共預備黨員）、李天鑫（重慶市歌舞劇團演員）、劉志誠（重慶市話劇團演員）、熊安文（重慶市話劇團演員）、田惠珍（女，重慶市越劇團演員，共青團員）、鄒雨林（重慶市群眾藝術館文學編輯組幹部，轉業軍人）等。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沒有接納大名鼎鼎的羅廣斌、楊益言及其文聯紅衛兵戰鬥組加入——因為他們不清楚長期遭到市委審查的羅廣斌的「歷史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擔心受到不利影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重慶市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到11月下旬已經形成較大聲勢，足以同得到黨政領導支持的保守派分庭抗禮。11月27日，是1949年被國民黨當局殺害的「一一·二七」烈士殉難紀念日，往年都是由重慶市委主持召開紀念大會，而這次則是由全國赴渝師生及重慶造反派在市體育場召開了紀念大會，羅廣斌、楊益言以革命作家和造反派身份到會，受到熱烈歡迎。

少年兒童也有兩派組織

在群眾組織遍地開花的這個時期，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情況：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像革命前輩在戰爭年代組織兒童團那樣，在少年兒童中建立了配合自己行動的組織。保守派在小學生中組織了紅小兵（或小紅衛兵），造反派則組織了小闖將。

少年兒童中的這類群眾組織，主要是幫助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們散發和收集傳單，呼喊反對對方的口號，在辯論會上對方發言時起哄、搗蛋，乘人不備時撕毀對方的標語、大字報等等。當年重大赤衛軍成員、冶金系學生黃昌國就被重大赤衛軍總部派到重大附屬第一小學去組織小紅衛兵，而另一個重大採礦系學生楊新德則被八一五戰鬥團派去組建小闖將。黃昌國回憶說：

小學本身也停課鬧革命了，老師也分成了幾派。兒童是跟着父母的觀點，八一五的兒子就是八一五，赤衛軍的兒子是赤衛軍……

我到了重慶大學附一小，一清點人數，兩個班，居然願參加赤衛軍活動的人數不少，有五六十個。剩下是八一五派的，還有父母有政治問題、兩派群眾組織都沒資格參加的，子女也不出來，但這些人心裡不會歡迎赤衛軍，只是不便公開暴露。赤衛軍在小學贏得一半多的人支持，是很高的數字了，因工人，實驗員等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參加赤衛軍的比例多，附小學生支持赤衛軍人多，主要是他們的功勞。

我那時也不懂，每天把小學生集中起來學了語錄後，重慶大學赤衛軍總部在饒家院，我每天去拿些蠟紙，就叫小學生印傳單，發傳單，撿街上的傳單，收集資料。我給他們辦了證件，享受紅衛兵串聯待遇，可以免票乘車，他們興奮得不得了。遇到赤衛軍和八一五有辯論了，他們去起哄。八一五有專門的辯論搗蛋隊……赤衛軍比較正統，不好意思搞這些小動作，我的小學生常能起到赤衛軍的搗蛋隊作用。他們很機靈，很能鑽，很會叫喊，很會罵，記得他們罵：「八一五，賣屁股！」雖很俗，但赤衛軍很解恨。他們雖不大懂，但愛憎分明，凡是八一五擁護的他們就要反對。他們見了八一五可恨的大字報，還搞搞破壞，大人破壞大字報抓到了不得了，他們去幹就防不勝防……[1]

保守派的少年兒童組織的名稱，據黃昌國回憶還是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只是為了與大、中學生相區別，把袖章稍微做小了點，孩子們對此還有微詞。當年以小學生身份參加過保守派少年兒童組織的楊耀健則有另一說法：他所參加的組織叫毛澤東思想紅小兵，因為袖章上印的是「紅小兵」，名稱不如「紅衛兵」強，他還不愛佩戴。他當時參加過紅小兵司令部政治部的工作，還被選派到重慶市博物館去參加過守衛展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成果的「紅衛兵造反戰果展覽」。[2]

對於造反派的少年兒童組織為什麼叫小闖將，黃昌國有一個說法：「由

1　黃昌國《文革中我在重慶當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的回憶》，載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華夏文摘增刊563期．文革博物館通訊397期》，2007年3月20日出版。

2　楊耀健《守衛「造反展覽」》，載《重慶文史資料》第二輯（總第46輯），重慶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另見楊耀健《一個小學生的「保皇」與「造反」》，載網絡刊物《記憶》2009年2月12日第4期（總第14期）。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於那邊出身不好的多，紅衛兵一定要出身好的，八一五也遵守這個原則，如他們叫紅衛兵，很多人會被排斥在外，所以，他們就取名『小闖將』，我們叫他『咬卵匠』。」

當年在羅廣斌、楊益言為首的造反派掌權的重慶市文聯機關，就有人在家屬小孩中組織了一個小闖將「殺殺殺」戰鬥隊，專門做那些文質彬彬的文聯造反派幹部們不便出手做的事，如給「黑幫」及其「爪牙」家門上貼白色對聯、勒令，對批鬥對象進行監視、辱罵、吐口水等。

保守派的小紅衛兵罵「八一五，賣屁股」，八一五派的小闖將也罵保守派是「麻子兵」（攻擊官辦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有市委免費提供的麻餅作夜宵點心），當時還有人專門為小闖將編了一些新「兒歌」，如：

我們的眼睛一點五，
堅決支持八一五。
我們的眼睛一點七，
堅決打倒劉少奇！
誓死保衛毛主席！

黑市委的兵，麻子兵，
黑市委的將，芝麻醬，
黑市委站在巖邊上，
看着麻兒打敗仗。
毛主席的兵，紅衛兵，
毛主席的將，小闖將，
毛主席站在天安門上，
指揮我們打勝仗。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八一五，就是好，
氣死市委和老保；
八一五，就是妙，
氣得老保雙腳跳。

麻兒麻，麻兒麻，
天天宣傳八二八，
八二八，破了產，
氣得老保團團轉。

麻子兵，嘴巴長，
好吃黑市委的米花糖，
思想兵，思想「好」，
天天跟倒黑市委跑，
黑市委的麻餅吃得飽，
吃了好把黑市委保，
黑市委誇他好保保（寶寶）。[1]

當街頭巷尾、左鄰右舍的少年兒童都快活地唱着、喊着這些新「兒歌」時，那輿論影響的力量確實是不可低估的。

對於幼稚無知的少年兒童捲入這樣的政治鬥爭，明智之士是非常憂慮

1　《山城兒歌一束》，載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西南政法學院政法紅衛兵總部、政法兵團團部主辦《政法兵團》第二期，1967年1月31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的。西南師範學院古典文學教授、著名學者吳宓在日記中就有兩則相關記載。當時吳宓以西師頭號「反動學術權威」之身被罰在教師牛鬼蛇神勞改隊接受監督勞動。他在1967年1月7日日記中記載：「下午2—5清潔勞動；宓從成君，共五人，掃除衛生科至小校門之一段馬路，連同馬路兩邊之廣場溝渠等。該處聚集外來串連之紅衛兵極眾，尤其紅衛小兵（小學學生），奔跑呼喊，跳蕩狂擲，只知遊戲，食甘蔗及糖，蔗皮及糖包紙隨意棄投，滿地皆是。吾不知如此幼稚之人物，其到處串連果有何益哉？」[1] 3月14日日記中又記載：「聞諸隊員（引者註：指牛鬼蛇神勞改隊隊員）述說：本隊在高地所種之蓮花白菜一區，有兒童三四十人，成群結隊來此，各持小刀，將蓮花白菜每株均割斷或割裂破碎，又從地中拔出，拋擲壠畔（若輩並不偷盜菜蔬，非為好利貪私，直是有意作踐、破壞牛鬼蛇神之勞動成績而已！）。按，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對小兒們無復教育，縱任其放恣橫行，於此為極矣。」[2]

吳宓認為這是「對小兒們無復教育，縱任其放恣橫行」，然而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這恰恰是最好的教育，「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就是要這樣讓下一代「在大風大浪中成長」，因此毛澤東在這年夏秋之際「視察大江南北」的講話中，就把「連十幾歲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辯論」看作是「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之一。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8頁。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67—68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保守派組織的分化

自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保守派組織風光不再。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日益明確支持造反派的態度，使各地造反派迅速發展壯大，並在輿論上佔了上風。當時重慶市內就流傳着這樣一些醜化攻擊「保皇派」的「民謠」：

保皇有功，餅乾兩封。
保皇有賞，麻餅二兩。
脫產保皇，鋪蓋兩床。
鐵桿保皇，自取滅亡！

保住黑市委，
秋後有油水。
保住廖志高，
秋後有柴燒。
保住李井泉，
秋後得現錢。
保住劉少奇，
秋後大升級！

在這樣每天不絕於耳充斥於街頭巷尾的輿論攻勢下，誰還願意讓人恥笑為「保皇派」？面對「革命造反」的「時代潮流」，不少原保守派成員紛紛「反戈一擊」，「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倒向造反派，或者是退出保守派，當起了「逍遙派」。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最先分化出來的是「思想兵」的兩位負責人劉桂蘭和孟軍。劉桂蘭是軍隊幹部之女，時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政委；孟軍是四川省一位副省長之女，時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副政委兼糾察總隊政委及組織部長。她們的思想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特別是在被市委選派去了北京之後，中共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明確態度和已經在首都佔據社會主流地位的造反派的宣傳攻勢，使她們真誠地認定自己應該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裂，堅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

10月9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召開會議，宣佈撤出解放軍輔導員，會上，孟軍發言指出市委犯了路線錯誤，也批評了解放軍輔導員對紅衛兵總部有包辦代替的問題等。

10月29日，從北京串聯回來的劉桂蘭和孟軍一起，到五十四軍軍部找原解放軍輔導員談準備向市委造反的想法。

11月20日，劉桂蘭代表她和孟軍在造反派集會上作了題為《告全市人民書——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長篇發言，詳細揭露了「思想兵」如何在市委操縱下成立及打擊造反派的內幕。

11月23日，重慶大學、西南師範學院、西南政法學院、西南農學院、重慶建築工程學院、重慶師範專科學校等大專院校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中的造反者數千人，在西南政法學院舉行大會，批判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總部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揭露省、市委操縱利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作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具的「罪行」，並在會上成立了造原總部反的總聯絡站。

11月25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內的造反派在市中心解放碑召開大會，揭露其總部所犯「方向、路線錯誤」，批判省、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2月25日，劉桂蘭、孟軍聯名在造反派批判《重慶日報》推行「資產階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級反動路線」大會上發言，揭發市委操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破壞文革的「罪行」。

1967年1月14日下午，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八一八戰鬥團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革命造反聯絡站聯合召開批判原「思想兵」副總指揮李傳芳大會，原「思想兵」總部成員王桂香、劉桂蘭等到會發言。

1月15日，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山城紅衛兵》報第十期發表了署名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縱隊孟軍、劉桂蘭、王桂香」的批判解放軍輔導員的文章《老實交待是可以的，想滑掉是不行的——在批判韋統泰、梁大門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的發言摘錄》。對堂堂的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使用了「老實交待是可以的，想滑掉是不行的」這樣的語言，其「造反精神」確實引人矚目。

同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所辦的《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展覽》被下屬成員造反，自即日起停止展出。

在1967年「一月奪權」期間，1月25日，31個造反派組織聯合組成「大會籌備處」，發出召開「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的通知（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了革聯會籌備會）。組成「大會籌備處」的群眾組織中，就有「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團」，估計它就是劉桂蘭、孟軍她們那個「紅色造反縱隊」的另一名稱，但後來再也沒有見到這個組織有什麼活動。顯然，在當時形勢下，「思想兵」的名稱已經被搞得臭不可聞，「反戈一擊」的造反者們，即使在原名稱上加上「紅色造反」的後綴，但是仍然沿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這個名稱，也很難得到一般群眾的理解，這正如他們當初把「黑五類」子女照樣視為「黑五類」一樣，人們往往也會把他們照樣視為「思想兵」，看到他們袖章上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字樣就會嘲罵。在那樣的氛圍中，他們還不如加入到其他造反派組織中去，否則是很難開展活動的。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重慶大學的兩位著名保守派頭頭：思想兵負責人李長春和赤衛軍負責人梁經權，在造反派得勢後自然都成了重大八一五的階下囚，八一五將他們當作宣揚「血統論」[1]的譚力夫[2]在重慶的代表，《八一五戰報》在提到他們的名字時乾脆稱之為「李力夫（長春）」、「梁力夫（經權）」。李長春老老實實與校內其他被批鬥的領導幹部和「反動權威」們一起「勞動改造」，因禍得

1　血統論：中共執政後，特別是在強化「階級鬥爭」宣傳後，對「家庭出身」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在文革前即已明確提出了「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的「黨的階級政策」。文革初期紅衛兵興起後，早期紅衛兵多為幹部子弟，他們把中共以「重在表現」等言詞加以掩飾的「階級政策」赤裸裸地表述為強調血統的政策，作出「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革命烈士）出身的學生才能加入紅衛兵的規定，並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因其精神背離了毛澤東廣泛發動群眾起來「重點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部署，遭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否定，1966年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長篇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對此進行了嚴厲譴責。不過，陳伯達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批判「血統論」，並非是真正要打碎這種長期壓制廣大社會弱勢群體的精神枷鎖，而僅僅是為了按毛澤東的意圖更深入、廣泛地發動群眾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來，為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效力。因此，青年工人遇羅克對「血統論」展開更加深刻的批判後，就遭到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無情鎮壓和肉體消滅。

2　譚力夫：文革爆發時為北京工業大學三年級學生，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正文之子。文革初期任北京工業大學「巴黎公社紅衛兵」負責人，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6年8月10日主持召開批鬥宋碩的8萬人大會。8月12日貼出與人聯合署名的大字報《從對聯談起》，提出要把鼓吹「血統論」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當作全面的、策略的中共路線來推行，要把它「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本本條條」，同時又提議將該對聯與「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加在一起，較為全面。8月20日在兩派辯論會上發表為工作組辯護、鼓吹「血統論」的演說。因其得到許多黨政幹部和幹部子弟的欣賞，幾天之內即風靡北京各大、中學校並迅速傳遍全國各地，引發一場大爭論。9月15日北工大東方紅、北師大井岡山等十餘所高校造反派成立批判譚力夫講話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十六條聯委會」。9月26日北京各大專院校聯絡委員會發起在師大召開批判譚力夫講話大會。全國各地造反派相繼掀起批判譚力夫講話高潮。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總結報告中對譚力夫及「血統論」對聯進行了嚴厲譴責。此後譚力夫的名字成為「反動血統論」的代名詞。譚曾一度被關押。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福，一方面避開了文革中越來越厲害的派系紛爭，另一方面與一些領導幹部和教授結下了共患難的「棚友」之誼，後來被分配到東北黑龍江佳木斯，但在領導幹部紛紛復職後，他終於得到關照，調回重慶，最後官至重慶市副市長、四川省外辦主任。

梁經權卻不幸被捲進一樁驚天大案。

重大機械系六七級學生鍾德坤，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極為憤慨，認定這是禍國殃民的罪行，並決意倣法荊軻刺秦王，刺殺毛澤東。他趁大串聯之機，在北京找到了願意相助的「同志」，然後又不知通過什麼關係找到了帶有領章、帽徽的正牌子軍裝，還找到了手槍，打算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行刺。不料，等他準備工作做得差不多時，已是1966年12月，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活動停止了。他暫時無法實施計劃。過了一些時候，北京那位「同志」不知在什麼情況下交待了這一秘密，鍾德坤遂被捕。在遭到審訊時，他對一切供認不諱，並直陳其「犯罪動機」，宣講他所認定的毛澤東之罪……自然，在當時那樣的個人迷信狂熱的氛圍中，他遭到了滿懷「無產階級義憤」的專政人員的瘋狂毒打，他們逼他交待出幕後主使人。他堅稱無人主使，純係個人行為，但這樣的回答不能滿足審訊者的要求。在嚴刑逼供之下，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便索性把水攪渾，咬定保皇軍頭目梁經權是「幕後主使人」。梁經權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捕了。

鍾德坤很快被執行死刑。而一心「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的梁經權，在飽受「無產階級專政鐵拳頭」之苦以後，也不得不胡亂作出交待，但他的交待與鍾德坤的交待完全對不上口徑，最後終於被認定他與此案無關，1970年被無罪釋放。走出監獄後，他對同學表示，今後最大的願望，就是回到家鄉，與妻子兒女在一起，平平安安，了此一生。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三章

首開大規模武鬥先例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兩軍對壘

到了1966年底，重慶市的社會秩序已經空前混亂。因為本市學生大批外出串聯，外地學生又大批湧來重慶，到11月底，重慶市已運輸了串聯紅衛兵104.4萬人次，[1] 嚴重擾亂了交通運輸正常秩序；再加上連續發生造反派強行攔截列車「上京告狀」事件和一些工人離開生產崗位，致使車站、港口堵塞狀況日益嚴重。各單位在給運動初期被整的群眾平反中，普遍發生了因被整者索要、追查「黑材料」而與領導幹部和有關人員的衝突，導致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亂，許多工作陷於癱瘓。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建築物上隨處可見的「毛主席語錄」（通常以紅底黃字寫成）的「紅海洋」，使市容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改變。市中心解放碑下的高台階，原是國慶節和五一勞動節時市裡黨政領導人檢閱遊行隊伍的主席台和觀禮台，這時變成了群眾組織可以隨意上去召開辯論會和批判會的重要場所。解放碑碑身下部基座周圍和環繞碑身的高台階周圍都被糊滿了標語和大字報。紅衛兵宣傳車經常在大街上呼嘯而過，各群眾組織的高音喇叭廣播喧囂聲壓倒了以往的市聲……

10月中央工作會議後，各地按照中央部署相繼召開了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促使各級幹部轉向支持造反派的「三級幹部會議」。中共重慶市委也在11月3日至13日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並在會上檢討了前一階段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方向性、路線性錯誤」。

工人糾察隊等組織逐漸發現文化大革命並非「反右派」運動，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聲音的《人民日報》不但沒有像當年那樣發表《這是為什麼》、《工人說話了》一類社論，反而連篇累牘地發表支持造反派、貶斥「資產階級

1 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版405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保皇派」的社論、文章。受到西南局和省、市委支持的工人糾察隊，其言行卻處處與中央精神不合拍，處境日益被動。這時，從北京又傳來一個周恩來的講話，「建議」工人建立的群眾組織不要以大革命時期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工人糾察隊等名字來命名。這更使得重慶工人糾察隊十分難堪。

為了跟上形勢，穩住陣腳，爭取政治上的主動，重慶工人糾察隊決定接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幟，拋棄原由「當權派」所起的、周恩來講話中已經明確要求不再使用的名字，更名為重慶工人戰鬥軍，並決定於12月4日這個星期天在重慶市體育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入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

大會海報貼出後，重慶造反派和首都三司[1]等外地駐渝造反派紅衛兵都認定這個大會是「工糾」的「陰謀」，是「假批判、真包庇」，決定要對大會造反。

到群眾集會上去造反，是當時的一種時髦行為。只要稍有不同意見，便可糾集一些人，呼着「造反有理」的口號，打着旗幟，衝上主席台，搶奪廣播話筒，發表造反聲明，使你這個會開不下去……而這種舉動又往往會導致群眾間的衝突。

中共重慶市委對「一二·四」大會可能導致兩派衝突十分擔憂，竭力想說服工人戰鬥軍（即工人糾察隊）不開這個大會。主持市委工作的書記處書記魯大東1967年初在一份檢查中回憶：

去年11月29日下午，辛易之和燕漢民對我講，街上貼出了海報，12月4日工人戰鬥軍要在大田灣開大會。11月30日黑市委書記處和燕漢民在潘家坪開

1　首都三司：全名為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1966年9月6日成立。因在此前已有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俗稱一司，1966年8月27日成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俗稱二司，1966年9月5日成立），後起的這個首都紅衛兵大型組織便被稱作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因其「造反精神」最強，深得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喜歡。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會，12月1日在小溫泉召開了幹部會，說明市委已經犯了路線錯誤，如果再滑下去，就有變成四類幹部的危險。聯繫談到12月4日工人戰鬥軍召開的大會，一定要說服他們不開，如果他們一定要開，就通知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不去參加。12月2日上午我和辛易之在重鋼招待所會見工人戰鬥軍負責人楚光輝等三人……我發言的大意是：目前少數派與多數派有對立情緒，如開大會，少數派來衝會場，則很可能發生衝突。所以12月4日的大會切不要召開。會見最後，他們表示非開不可，楚光輝還保證絕對不發生衝突。我才表示給他們準備開會條件，以示支持。12月2日下午市委即在電話上通知各部委和各區委，一定通知所屬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不參加12月4日的大會。12月3日夜晚，王廉仍多次勸說他們不開大會，結果無效。[1]

工人戰鬥軍召開「一二·四」大會的目的，本來就是要挽回政治聲譽，甩掉「資產階級保皇派」的帽子，自然不能按照市委要求停開大會。而廣大的工人糾察隊隊員，早已憋了一肚子氣，堅決要通過這次大會來向公眾表明他們是忠於毛主席、黨中央的，他們也是敢於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的。

12月3日上午，離大會還有一天時間，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為首的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開了八一五派（即重慶造反派）聯席會議，制定了對大會造反的方案，並決定如果到主席台發言造反不成，則將隊伍開到市中心解放碑另行召開真批判大會，與「工糾」的假批判形成對比，以爭取廣大中間群眾。

但是，另一些人卻認為這一計劃太不過癮，太「溫良恭儉讓」了。當天下午和晚上，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工人造反軍和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組

1 魯大東《我的初步檢查和揭發》，1967年3月4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翻印，1967年3月11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織的一些負責人又制定了另外兩套方案，除了安排誰衝主席台、誰控制兩側看台、誰卡住大門外，還特別安排了要在主席台後邊馬路上先停放三輛救護車以運送傷員……

眼看一場流血衝突爆發在即，正在重慶協助市委工作的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漢民，都到重慶大學去向八一五總團負責人進行勸說，希望他們不要到「一二·四」大會上去。但是對於正唱響「造反有理」主旋律的造反派紅衛兵來說，這些勸告自然是毫無作用的。

武鬥之勢已如箭在絃上。

當晚，位於重慶市體育場旁邊的重慶市文聯院內燈火通明。幾所中學的造反派紅衛兵在文聯院內實行「戒嚴」（限制文聯保守派的行動自由），一些造反組織的負責人在文聯會議室緊張會商。文聯造反派中已傳遍了「明天大田灣開會要發生流血衝突」的說法……

萬人大武鬥血濺體育場

1966年12月4日是一個星期天。工人糾察隊為表明自己堅決響應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幹革命不影響生產，特意選了這個休息日來召開大會。再過三天就是農曆節氣「大雪」。山城重慶上空彤雲密佈，氣象肅殺。

清晨的寒霧尚未散去，人們便已從四面八方湧向了市體育場。一面面有着「毛澤東思想」、「革命」、「戰鬥」、「造反」字樣的旗幟在寒風中獵獵飄動，一些隊伍唱着毛主席語錄歌，呼着口號，一些隊伍敲打着鑼鼓，還有的宣傳車用高音喇叭播放着聲明、宣言……

重慶市體育場建成於1956年2月，除去當中的草地足球場和環場跑道外，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僅四周看台即可容納4萬多人，是建築在起伏山丘上的重慶老城區中唯一便於舉行大型公眾集會的場所。隨着各群眾組織隊伍的到來，體育場內已是人山人海，場外的道路和周邊空地上也是人滿為患。到會者除了來自各地區各單位的工人戰鬥軍（即工人糾察隊）外，還有他們請來的同樣反對造反、同樣是由「官方」組建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文藝革命軍等組織，當時他們被造反派譏稱為「保皇四軍」。他們都已聽說了造反派要來衝會場的傳言，早已是義憤填膺，嚴陣以待。為防止造反派的破壞，工人戰鬥軍司令部還組織起了數千人的大會糾察隊伍，層層設防，擺好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架勢。

大會尚未開始，磨擦便已發生。一會兒是首都三司的紅衛兵發現了工人糾察隊寫的標語「誰反對工人糾察隊就砸爛誰的狗頭」，認為是反動標語——因為三司提出的口號是「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工糾」竟敢把自己與偉大領袖相提並論，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會兒，又有幾個首都三司紅衛兵刷寫挑釁性的標語「工人糾察隊必定垮台！」「工人糾察隊總部必定完蛋！」引起工人糾察隊人員的義憤，雙方發生了爭執和抓扯……

按照當時慣例，任何群眾組織集會都要「歡迎各革命群眾組織和革命群眾參加」，以示「大民主」。工人戰鬥軍司令部的大會海報上當然也寫了這樣的時尚套話，而且在會前，重大八一五戰鬥團還煞有介事地派代表到工人戰鬥軍司令部去聯繫過參加大會、「支持革命工人運動」事宜，工人戰鬥軍負責人自然也客氣地表示了歡迎。因此，儘管大會組織者十分不情願，也不得不讓造反派的一些組織擠進了會場。

在雙方都劍拔弩張、摩拳擦掌的氣氛裡，大會終於開始了。

大會剛剛開始，發言尚未進行，還沒有任何依據可以說明這次大會是「假批判、真包庇」，急不可待的造反派就藉口「主席團成員未介紹家庭出身」而開始造反了。本來，無論大會發言還是街頭辯論，首先自報家庭出身，這是文革初期「血統論」流行時的一條不成文規矩，若是「出身不好」，馬上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便會被轟下台去。但自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來，「血統論」已經受到批判（主要是因「血統論」的鼓吹者譚力夫及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保老幹部而妨礙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實際上，造反派大多是「血統論」的受害者，但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造反派只要有一個藉口就行了。

先期進入會場的造反派人數雖少，但卻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他們搖旗吶喊，高呼「造反有理」、「八一五好得很」等口號，拚命向主席台衝擊。被阻隔在會場外的造反派大隊人馬，聞知場內已經起事，便也奮力向早已水洩不通的場內發起衝擊。重大八一五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的三輛宣傳車也一邊駛進場內，一邊以高音喇叭呼喊着造反口號……

一場混戰就這樣開始了。

率先爬上主席台的重大八一五兩個負責人要求發言，遭到拒絕，並被早有準備的大會糾察人員連拉帶推趕下台去。據說這兩人一個被打掉了眼鏡，一個被卡傷了脖子。另一個衝上了台的首都紅衛兵曾一度搶過了廣播話筒高呼：「八一五好得很！」也被抓走……

台下的兩派群眾，也從起初的推擠、謾罵發展成扭打，旗桿、標語牌等都被當成了鬥毆的武器。雙方還出動了上百的攝影「記者」，站在汽車、宣傳車頂上和主席台、看台的高處，搶拍各自所需的鏡頭。會場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帶領工人糾察隊一派群眾高呼：「八一五——壞得很！八一五——滾出去！」那些坐在看台上的小紅衛兵（小學生）們，也在老師帶領下緊張地擠在一起，脹紅着小臉拚命用稚氣的聲音加入這狂熱的吶喊。從會場一些側門外還傳來亂七八糟的鑼鼓聲、衝鋒號聲……

為了盡量制止衝突，重慶市委事前已派了市文革辦公室幹部到會場瞭解情況，打聽了體育場各側門出口是否暢通。為了及時掌握情況，市委文革辦公室還架設了專線電話（後來這些都被造反派認定是製造流血事件的「預謀」）。衝突發生後，被派到會場觀察的文革辦公室幹部一方面竭力勸說雙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方停止鬥毆，一方面打電話向市委反映。市委當即派了書記處書記岳林和文革辦公室負責人趕到現場做勸解工作，並要求把所有的鬥都打開，迅速疏散群眾。

由於重慶市委的干預，這場持續兩小時左右的大規模流血衝突終於平息下來。人群像潮水般從體育場的各個出口湧出，從各條通道漫過。體育場內和場外的道路上、路邊空地上，到處是折斷的旗桿，撕碎的旗幟、標語，丟棄的鞋子、帽子，一片狼藉。

會場上的大規模流血衝突平息了，但是會場外的武鬥卻又蔓延開來。兩派群眾都被衝突激怒，或出於報復，或為了抓「兇手」，掀起了打、砸、搶、抄、抓的狂潮。局面完全失控，中共重慶市委被迫基本轉入「地下工作」狀態。

在這一次「抓兇手」狂潮中，急欲翻身的造反派報復心切，來勢兇猛，不少保守派成員被抓到了造反派控制的第六中學等地關押。當年重慶著名的評書演員徐勍，回憶了他見到的情景：

下午，我走到觀音巖外科醫院門前，只見一支殺氣騰騰的造反派隊伍，人人橫眉怒目，高呼「還我戰友」、「討還血債」之類口號。街上行人見之無不驚恐。也有人流露出疑問的目光，我也感到疑惑不解：這是建國17年來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嗎？工人糾察隊、思想兵，這些以黨、團員為主體的群眾組織，真的比國民黨楊森的兵還兇惡嗎？聽說主持今天大會的還有全國勞動模範黃榮昌這樣的老工人……我心中湧上一連串問號。

我乾脆跟在遊行隊伍旁邊，跟着看熱鬧的人流，邊看邊走。走到七星崗，一些工人從興隆街裡出來，肩上還扛着捲起的旗幟，看樣子是一些從體育場撤出來的基層工廠的「工糾」。八一五的遊行隊伍發現了，一聲吼：「打死那幾個老保！」當場把他們抓住，旗幟撕了，人也打得鼻青臉腫，又聽得一片嚷：「弄回去！弄回去！關起來再說！」衝上去一群八一五的中學生，聽說是六中的，把這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幾個「老保」抓起就走。[1]

當年在重慶市文聯任業務組長的楊世元，後來回憶說：

羅廣斌帶了一幫人去北京告狀，說「黑市委」操縱「工糾」打死了造反派。全文聯都動員起來，為羅廣斌上京告狀準備材料，作調查。連我們這些「牛鬼」都動員起來了，我和（張）繼樓、向曉、馬戎也被喊去參加，去醫院調查被「工糾」打傷的造反派。結果一調查才曉得，不是那麼回事。好多醫院的護士都是我老伴的學生——我老伴是護校的。我們去三院調查，她們就把我拉到一邊，悄悄給我說真話，說那些造反派「傷員」來了，一兇二惡的，拍桌子打巴掌，要開這樣藥那樣藥，有的其實沒得啥子傷。真正受傷重的「工糾」，不敢說話。我們在外科醫院找到一個被六中三二一一一抓到學校去審問，從樓上摔下來的「工糾」，是個老工人，老實巴交的，摔成了深度顎裂，不敢說話。我們去了，才給我們說了幾句真話。後來我們還聽說綦江有「工糾」要上京告狀，路上被打死了的。[2]

著名學者、西南師範學院古典文學教授吳宓在12月6日的日記中也記載了西師造反派八三一戰鬥縱隊抓捕炊事員中的工人糾察隊人員引起的混亂，「昨本校之八三一縱隊竟捕去食堂之廚工（炊事員）數名，送城中拘押不放，今日西南師院全體廚工一致罷工，多人無所得食……」[3]

造反派的大肆抓人已經引起了許多問題和公眾的不滿，由重大八一五主

1　徐勍《口舌人生中的一段插曲》，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華夏文摘增刊586期．文革博物館通訊419期》，2007年7月4日出版。

2　楊世元回憶，何蜀整理《文革風暴中的重慶市文聯》，未刊稿。

3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七冊547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持的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不得不於12月8日專門發出了一封致全市人民的信，信中對抓人問題作出七點決定：

一、確有證據的兇手，交群眾處理；

二、對一般受蒙蔽的群眾，應當給予適當的教育；

三、對持有不同意見的群眾，不得以力服人，更不許隨意亂抓；

四、對造謠者，必須用事實給予駁斥，但不許隨意扣留，更不許動手；

五、對待管制的兇手，必須按黨的政策辦事，不能體罰，更不能逼、供、信；

六、在抓的兇手中，應按情節的輕重，給予適當的處理；

七、發現有階級敵人破壞者，立即逮捕法辦。[1]

不過，當時局勢已經陷於半無政府狀態。群眾組織作出的這種決定，既無法律效力，也沒有紀律約束力，因此亂抓亂鬥的情況很難得到制止。

到這時候，重慶就真正進入毛澤東所希望的「大亂」局面了。

「親愛的戰友你在哪裡」

「一二·四」大規模武鬥事件發生後，早有準備的造反派立即大造輿論，稱之為「黑市委」一手製造的「鎮壓造反派」的「慘案」，並斷言造反派被打死了人。當天下午，造反派就舉行了抗議集會和遊行，5日上午，羅廣斌、楊益言領導的重慶市文聯文革小組在文聯機關率先召開了「一二·四

1 《致全市人民一封信》，載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西師紅衛兵團、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主辦《紅巖》報第四期，1966年12月22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烈士」追悼會，有人介紹了到醫院看望造反派傷員的情況，有人介紹了「一二·四」會場及「工糾打死造反派」的情況。

5日下午，全市造反派在體育場召開了控訴大會（原打算叫追悼會，但因一時沒找到屍體，只好改稱控訴會），重大八一五代表在大會上說：「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陰謀策劃其御用工具——重慶工人糾察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赤脯上陣，拳打足踢，揮戈揚矛，大打出手。他們用鋼釬、木棍、鐵錘、鐵矛、旗桿、主席語錄牌……等等，打死打傷八一五派200餘人，造成世所罕見的流血慘案。」

著名作家、小說《紅巖》作者羅廣斌在大會上作了慷慨激昂的發言，他說：「一個星期以前，我們在這兒追悼犧牲在中美合作所裡的革命先烈，一個星期以後的今天，我們又在這兒追悼犧牲在重慶體育場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英雄。」他呼籲：「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緊急行動起來，和革命群眾一起，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一邊，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1]

「死人」問題一時成了雙方關注的焦點。

早有準備的造反派大造輿論，斷言造反派被打死了人。有關「工糾打死造反派」的所謂「目擊者」的揭發、控訴大量出現在傳單、小報和大字報上。

南充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甘嶺戰鬥隊（赴渝支隊）寫於12月4日夜的《我們也要發言了》一文中這樣說道：「我們親眼看到一個個男女學生被打，他（她）們都倔強地昂首前進，他們不愧為八一五派的英勇戰士。一個男同學被打得一臉的血。一個女青年被抬出來，頭髮亂蓬蓬的，血從下身流出來，浸濕了被撕爛的絨褲。」「一個女學生被矛頭刺破了肚子，血染下身（現已死，聽說是北京政法學院的）被抬出來，一群人擁上去，一個個野獸（工人糾察隊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辦《八一五戰報》創刊號，1966年12月9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員）還跑去搬開死者的臉說：『嘿，裝得好像呀！』」[1]

103工區一個工人糾察隊員寫的《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一個工人糾察隊員談「一二·四」血案》中說：「我還看見一個二十來歲的學生被打；一個十來歲的姑娘（身穿藍衣，短頭髮）躺在地上，滿口是血，只有一口氣了。還有一個小姑娘躺在地上，腸子都被踩出來了。」[2]

以一個「小闖將」名義寫出的《一個受害者談「一二·四」血案部分情況》中說：「北京第三司令部的一個女同學在主席台上被一個工人糾察隊用尖的鐵器一下子刺進了她的眼睛裡，頓時鮮血直流，眼睛迸血，昏倒在主席台右邊的欄杆那裡。」「我還看到一個人揹着一個屍首想藏到主席台下面的廁所裡去，可是馬上被發現了。」[3]

重大八一五中梁山聯絡站寫的《兩個紅衛兵的慘死》，記述了他們走訪搬裝子弟校兩位「一二·四」血案的目睹者（原毛澤東思想紅小兵）的談話，其中說：一個小闖將在主席台下面鞋子被擠掉了，彎腰下去穿鞋子，「這時一個工人糾察隊員（女的，三十多歲）看見這是一個小闖將，就故意向前一擠，一腳將這個小闖將踩到地上，後面的人（都是些工人糾察隊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也擁向前，你一腳，我一腳，就把這個小闖將踩死了」。還看見一個八一五派的女學生在主席台下的梯坎上被工人糾察隊的人扼住頸子，「那雙扼頸子的手用力向裡收！然後就將這個女娃兒摔下去，就摔死了」！[4]

---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辦《八一五戰報》創刊號，1966年12月9日出版。

2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辦《八一五戰報》第二期，1966年12月18日出版。

3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叫日月換新天——重慶「一二·四」血案材料選》，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赴蓉挺進縱隊編印，1966年12月（油印資料）。

4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叫日月換新天——重慶「一二·四」血案材料選》，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赴蓉挺進縱隊編印，1966年12月（油印資料）。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當時因風傳「黑市委」要毀屍滅跡，造反派在各交通要道口設卡檢查過往車輛，並在「一二・四」事件當晚，即由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二七戰鬥團、工人造反軍總部等組織接管了石橋鋪火葬場，強令火葬場將正待火化的14具屍體暫停火化。

這在石橋鋪火葬場的歷史上也屬於「史無前例」的事件。

這個火葬場建成於1958年，是當時西南地區的第一家火葬場。當年，董必武、吳玉章、謝覺哉、徐特立等老一輩革命家曾先後來此參觀，讚賞重慶在西南地區率先興辦火葬場，勉勵職工辦好火葬事業。自火葬場建成以來，火葬機爐始終保持常年運行。1966年「一二・四」事件後，火葬機爐因受「革命」的衝擊而第一次連續三天停爐停化。

當時甚至傳出了離奇的謠言，稱火葬場下面到處是地洞，地洞裡有幾十處出口，那座山都挖空了，火葬場地板上設有電鈕控制的機關，一按電鈕，屍體就可以被翻到地洞裡去，還可以轉運走……一些支持工人糾察隊的首都紅衛兵為此派出代表，與造反派的「一二・四」聯合調查團和石橋鋪火葬場臨時聯合指揮部代表一起進行了調查，隨後發佈《調查公報》進行了闢謠。[1]

當年在火葬場任火化工、後在重慶市殯儀館副館長任上退休的羅賢文，在2005年對記者回憶說：

「1966年12月4日下午，造反派藉口大田灣廣場『一二・四』事件中犧牲的戰友被焚屍滅跡，數百人手執鋼釬棍棒進駐火葬場悼念大廳，強行停爐停化，連續三晝夜中斷火化，致使停屍間屍滿為患。那天我正在一線，非常清楚當天沒有一具不明不白的死者運來火化，可他們偏不相信，把場長綁架走軟禁，還鼓搗把一具車禍死的遺體當作被打死戰友，折騰三天後他們一無所獲撤

1　首都紅衛兵「一二・四」事件聯合調查委員會《調查公報》調字0003號，1966年12月12日（油印傳單）。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出，火化才恢復正常。」[1]

羅老先生的記憶有誤，當時被造反派當作「戰友」的屍體不是一具而是四具。12月6日，在極端情緒的支配下，一些人斷然採取了一個在造反派內部也引起爭議的「革命行動」：從火葬場強行搶出四具自認為「可疑」的屍體，連同當晚從重慶市第一工人醫院（在兩路口，即今重慶市急救中心）停屍房搶出的另一具屍體（死者是因風濕性心臟病去世的第二十五中學八一五派學生李天敏），作為「可疑屍體」放到體育場展出。

12月7日下午，經重慶市文聯由羅廣斌、楊益言主持的文革小組和一些外地紅衛兵的籌劃，所謂「一二·四慘案」屍體在體育場開始預展。外地紅衛兵擔任糾察，主持廣播解說，原定的「可疑屍體」展覽很快就被宣傳為「烈士遺體」展覽，前去參觀的人被要求向屍體默哀，還要臨時摘下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這是在當時狂熱的個人迷信氣氛中流行的一種不成文規矩，大概是表示不能讓毛主席也向死人默哀）。

當年一位工人在日記中記載：「8日下午，羅廣斌也來大田灣指導屍展情況（此後羅廣斌便代表山城八一五派，帶領「一二·四」告狀團上京告重慶黑市委炮製「一二·四」慘案的狀去了）。」[2]

對這個屍體展覽的「盛況」，當時保守派有一份傳單記敘：

參觀的人絡繹不絕，人山人海，其影響之大真是難以形容。總之，由於「受難者的屍體」使得山城處處可見左臂上帶着白花的「悼念者」，滿載着花圈、輓聯的汽車開到各八一五派的駐地和聯絡站，甚至「成都革命造反派」從成都也送來了裝潢十分精緻的花圈，裝了滿滿的兩大車。[3]

---

1 《石橋鋪 西南首家火葬場沉浮錄》，載2005年3月13日《重慶晚報》。

2 陳家富《山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見聞錄筆記（日記）》，曾鍾據原件整理錄入並提供。

3 重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挺立在山城」縱隊《在「一二·四」死難者屍體的背後》，1966年12月10日（油印傳單）。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屍體展覽」和號召人們去辨認「烈士」屍體的消息傳到設在城中心解放碑附近重慶市群眾藝術館展覽館的重慶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在這裡的文藝界司令部勤務員、市歌舞劇團歌唱演員、27歲的李天鑫，滿腔悲憤激發出靈感，一氣呵成寫出了追悼「一二·四」烈士的歌曲《親愛的戰友你在哪裡》，歌中深情地唱道：

讀着《毛主席語錄》想起了你，
親愛的戰友你在哪裡？
那天我們一起去開會，
會場上我們卻失去了你，我們的好同志！
你上台揭露了重慶市委，
你發言戳穿了陰謀詭計，
你面對邪惡敢於鬥爭，
你站在毛主席像前傳播真理，
你勇敢戰鬥，你英勇無比，
誰知那一雙黑手把你青春奪去！……

歌詞大約有三四段，後面幾段的頭一句分別是「唱起了造反歌想起了你」、「提筆寫大字報想起了你」等等，曲調前一半抒情，後一半激昂，哀婉動人。一時間，重慶市區的街頭、車站、碼頭，到處掛起了抄成大字報的歌單，有人站在桌櫈上像抗戰時期教唱救亡歌曲那樣義務教唱，學唱的人走了一批又來一批，其熱情和投入遠勝過當今之卡拉ＯＫ愛好者。這首歌迅速傳唱開去，成為搞臭「工糾」，批倒市委的有力武器。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烈士」真相

當時「懷疑一切」的思潮已經在社會上氾濫，因此，「屍展」中的屍體也不會不引起懷疑。

屍體問題很快就引起了包括造反派在內的廣泛的質疑和爭論。

12月8日，以「外地革命師生赴渝串連隊」名義發出的一張傳單《緊急澄清事實》稱：

12月7日在大田灣體育場展出屍體五具，死者姓名、所屬單位不詳。只是疑為「一二·四」殉難者，希知情者認領並介紹死者情況及死亡原因，以便瞭解「一二·四」事件真相。

必須指出，昨天「外地革命師生駐文藝界聯絡站」海報上所說的大田灣體育場停放的部分殉難烈士遺體，希前往瞻仰默哀，是缺乏調查研究的，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希參觀者不要引起誤會。

儘管已經出現這樣的不同意見，但是一些造反派仍然執意以此作為打擊「黑市委」的武器。就在8日下午，由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鬼見愁」的紅衛兵率領，一些造反派把在體育場展出過的五具屍體抬出體育場，從兩路口向上清寺方向示威遊行，隨後衝進中山四路重慶市委大院，強行將屍體抬到了市委辦公廳樓上機要室停放，逼迫市委交出「黑材料」。次日通過造反派中的一些紅衛兵出面勸說，加上對屍體身份的質疑已經引起造反派的內部矛盾，才不得不將屍體抬走。

保守派發現了造反派在屍體問題上的尷尬與內部紛爭，也從最初的驚慌失措、被動挨打狀態中清醒過來，開始反擊。12月10日，重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挺立在山城」縱隊發出油印傳單《在「一二·四」死難者屍體的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背後》，嚴正指出：

凡參加過大田灣「屍體展覽會」的觀眾同志們，至今你們一定沒有忘記曾在你們耳邊響起的「慷慨激昂」之聲吧，介紹屍體的解說員不是這樣說的嗎：「這裡的五具屍體，四具是從火葬場搶來的，一具是從第一工人醫院搶來的。」既然是從上述單位搶來的，那就不需要「知情者認領和介紹死者情況」了，因為死者送進火葬場焚化，都必須要登記死者姓名、單位和死亡原因等，至於醫院呢，那就從送入醫院的時候起，對各方面都有詳細的記載了。你們為什麼不到有關單位去查，卻要放到大庭廣眾之下來展覽，這不是想藉此激起群眾的憤怒，來達到你們可恥的目的又是什麼？！

12月5日清晨，山城就貼滿了八一五派的為「一二·四」受難烈士提出的幾點要求，其中有要將死難者授予「烈士」稱號，他們的家屬定為「烈屬」，要在大田灣建立紀念碑，在碑上要刻「烈士」生平事跡等等。奇怪的是當天下午的「追悼會」上，居然沒有一個「烈士家屬」在台上控訴，難道山城人民死了親人都漠然視之嗎？更使人奇怪的是從「一二·四」到現在已經一週了，仍然未見有「受難者」的家屬尋找親人，我們要問：「一二·四」受難者的屍體到底在哪裡？受難者到底有多少？姓名和單位是什麼？八一五派的主要負責人必須立即向山城革命人民回答！

正告八一五派的幕後策劃者，你們若拿不出像樣的屍體，說不出死者的單位和姓名，你們就應當向山城革命人民認罪，交待你們的政治陰謀，向被迫害的工人糾察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賠禮道歉，公開恢復他們的名譽。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在另一份傳單中挖苦說：「追悼會也開了！孝花也戴了！為『烈士』做的花圈也獻了！獻給『烈士』們的輓歌也唱了！要在大田灣為『烈士』們修紀念碑的大話也說了！可是『烈士』們已經『壯烈犧牲』了十天，怎麼『八一五』派還沒有調查出『烈士』的姓名呢？……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山城四百萬群眾焦急地等待着你們的公佈，全國人民等待着你們的公佈。『八一五』的將領們，你們的心情大概也很焦慮吧？我們也真為你們着急，交不出來怎麼辦呢？」[1]

在各種猜疑、爭論與攻訐的紛擾中，那具從醫院搶出的學生李天敏的屍體首先被家屬領走了，有人曾將其家屬接到重慶市文聯去進行勸說，動員其承認李天敏是「烈士」，但遭到拒絕。

接着，12月11、12日，工人戰鬥軍在石橋鋪火葬場也舉辦了另一個屍體現場展覽，說明造反派在體育場展出的屍體是假的「烈士」屍體，還請了一位死者家屬（死者屍體在體育場展出過）到場哭訴死者的死亡經過，證明其並不是在「一二·四」那天被打死的「造反烈士」。

與此同時，一批堅持「獨立思考」的首都紅衛兵，對從火葬場搶出的四具屍體作了追蹤調查，於12月10日至15日陸續用傳單、大字報將調查公報發表出來，其結果令造反派十分難堪：那四具屍體分別是：

12月4日下午在河運學校附近遇車禍死亡的近郊農村婦女廖承秋，20歲；

12月4日晨病故的重慶針織廠女工雷宗琪，33歲；

12月3日夜因心臟病去世的臨江門石粉廠工人（據稱是曾被勞改的「戴帽反革命」）蔣志鵬，46歲；

12月3日因急性白血病去世的四川省第二監獄勞改犯人梅高銀，33歲。[2]

於是，「搶勞改犯屍體冒充烈士」的消息不脛而走，成為造反派鬧出的大笑話、大醜聞。

事後證實，將這些屍體搶去冒充「烈士」，並非造反派在不明真相的情

---

1 重慶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長征隊赴南充挺進縱隊返渝調研組《「烈士」的親人在哪裡？——評「烈士」屍體展覽》，1966年12月13日（油印傳單）。

2 首都紅衛兵「一二·四」事件聯合調查委員會《調查公報》，油印傳單。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況下出現的失誤，實際上，在屍體被搶前後，已經有火葬場工作人員及死者家屬、單位向造反派說明了屍體的身份，出具了相關證明（省二監獄為證明梅高銀屍體的身份，還向造反派出示了檔案、照片、病歷等），但這些說明均被造反派拒絕採信，並認為任何證明都可以偽造，現在的專政機關不是專資產階級的政而是在專無產階級的政。省二監獄派到駐六中的工人二七戰鬥團去說明梅高銀屍體身份的幹部，還遭到造反派的無理扣押。

造反派力圖查清「慘案」真相，尋找「烈士」遺體，找到打擊「黑市委」和保守派的更有力的證據，組織了龐大的「一二・四」慘案聯合調查團，從最初的數十人迅速發展到近三百人，不但有核心組、調查組，還有情報組、聯絡通訊組、組織組、宣傳組、秘書組、後勤組、接待組、保衛組等。他們大部分是充滿革命激情的年輕人，相信了「工糾打死造反派」的傳言才參加到調查團來的，一心要將這一驚天大慘案查個水落石出。他們到全市各重要工廠、醫院、機關、學校，有的甚至打入工人糾察隊內部，整整調查了一個月，也只是基本摸清了造反派的受傷人數，掌握了全部住院人員名單，收集了大量的衝突現場的照片。

但是找不到一點有關「烈士屍體」的線索。

造反派在屍體問題上栽了個大跟斗。

也許有人會奇怪，重慶市委及其支持下的保守派，在八二八事件的宣傳中因為被抓到了造謠的把柄，給了造反派反敗為勝的機會，而這一次，造反派在「烈士屍體」問題上製造的謠言，比「八二八，扯頭髮」走得更遠、影響更為惡劣，按照保守派在「八二八」之後的宣傳條件和強大能量，不是完全應該大肆反擊、大獲全勝嗎？為什麼他們澄清真相、批駁謠言的努力反而毫無效果呢？

只要瞭解當時的形勢，就不會感到奇怪了。10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形勢不同了。毛澤東、黨中央支持什麼樣的觀點，持這種觀點的人和派別就等於是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佔據了「政治制高點」，就屬於「政治正確」。而只要「政治正確」，就一切皆對，一切皆贏；反之，則一切皆錯，一切皆輸。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邏輯。在這裡，根本就不存在什麼民主不民主、真實不真實的問題。

「一二·四」事件後，外地赴渝紅衛兵早已將輿論傳遍了全國，有的地方（如成都）甚至還召開了「『一二·四』殉難烈士追悼會」。儘管在事件發生幾天之後重慶就陸續有傳單、大字報澄清了「烈士遺體」的真相，指出了以「勞改犯」屍體冒充「烈士」的嚴重問題，但這微弱的聲音無力與佔據「話語霸權」的「時代主旋律」相爭。

很快，造反派「政治正確」的謠言就當着「無產階級司令部」諸多主要成員的面，造到了首都北京的全國性集會上。

全國造反派集會為「烈士」默哀

1966年12月17日，重慶造反派有關「一二·四」慘案的宣傳造成了最大的全國性影響。

這天，為慶祝《紅旗》雜誌第15期社論《奪取新的勝利》發表，首都三司發起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全國在京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劉志堅、張春橋、謝鏜忠、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東興等——幾乎所有當時常在公眾集會上露面的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出席了大會。

因為首都三司的紅衛兵直接參加了「一二·四」大會上的造反行動，又參加了事後的「聯合調查團」和「赴京控訴團」工作，還有的三司紅衛兵以「目擊者」身份發表過控訴「工糾打死造反派」的文章，所以在首都三司負責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人所致的大會開幕詞中，便特別出現了這樣一段話：

「在這場尖銳複雜、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同志們，在重慶，在成都，在長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們的一些革命戰友為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們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在這段話裡，重慶被排在第一位，足見當時重慶「一二・四」事件在全國同類事件中的份量。

在全體（當然包括主席台上的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內）起立為「殉難的革命戰友致哀」之後，一些群眾組織代表分別發言。在發言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發言者除去幾個首都紅衛兵外，只有一個外地代表——重慶造反派「一二・四慘案赴京控訴團」的代表，著名作家、小說《紅巖》作者羅廣斌，其他發言都是聲討首都近來出現的攻擊中央文革、攻擊林彪的所謂「反革命逆流」，而被安排在第二個發言的羅廣斌，他長達40分鐘的發言卻是控訴「一二・四」慘案。他列舉了一些「目擊者」的證言，聲稱在這次血案中革命群眾被打死了十多人，強烈要求「嚴懲製造血案的罪魁禍首，立即解散重慶工人糾察隊，打倒重慶市委，解放重慶山城」。

隨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發言中又說了這樣的話：

「我們準備為人民犧牲，我們已經犧牲了很多好同學，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進。」

這個講話實際上等於肯定了有關重慶「一二・四」慘案「工糾打死造反派」的謠傳。

在這樣一個「全國在京革命派」的集會上，當着幾乎所有常在公眾集會上露面的中央領導人的面控訴「一二・四」事件，控訴者又是一位聲望正高的「革命作家」，這就使得重慶「一二・四」事件的影響迅速擴大到全國。

在大會當天，重慶工人糾察隊赴京告狀團的駐地就被首都造反派查抄，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人員被趕走……

報道這次大會的《首都紅衛兵》報和羅廣斌的大會發言錄音很快被帶回重慶，廣為傳播，工人戰鬥軍和與之同觀點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文藝革命軍等「保皇四軍」，遭到沉重打擊。造反派以「抓兇手」、「鎮壓反革命」等名義到處抓人，私設公堂和監獄，為造反派組織的發展壯大和下一步的奪權鋪平了道路。

後來，不少權威性的文革史著作都一致把上海康平路事件（上海造反派工總司以武力打擊保守派工人赤衛隊的大規模武鬥事件）認定為全國第一次大規模武鬥，稱「這是上海的也是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1]「在全國開大規模武鬥的先例」，[2]「康平路事件是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開端」[3]等等。

實際上，只要對重慶「一二·四」事件與上海康平路事件作一下比較，就會發現：

重慶「一二·四」事件發生於1966年12月4日，而上海康平路事件發生於同年12月30日，比重慶晚了將近一個月。

重慶「一二·四」事件發生在十多萬人集會的體育場，上海康平路事件發生在兩萬多人靜坐的街道上。

重慶「一二·四」事件受傷人數，據造反派的調查組公佈的數字，最初為200餘人，後來為405人。[4]上海康平路事件，仍據造反派的統計（《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是100多人。[5]

---

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170頁。

2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285頁。

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131頁。

4 此數字由當年參加「一二·四」聯合調查團的西南師範學院教師楊向東提供。

5 范文賢《無法無天的上海灘——所謂一月革命始末·康平路事件》，載《上海法制報》，1986年6月16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重慶「一二・四」事件發生後，不但由外地駐渝紅衛兵迅速向全國造出了輿論，而且還在北京的全國性集會上製造了影響。而上海康平路事件發生後，已是1967年1月，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將主要注意力轉向了奪權。上海工總司在康平路事件後也未像重慶造反派那樣圍繞「慘案」大造輿論，而是很快（1月5日後）便轉入了所謂「反對經濟主義」的新攻勢。特別是上海造反派的「兩個文件」（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1月9日的《緊急通告》）得到毛澤東肯定後，對「兩個文件」的宣傳更是成了壓倒一切的大事。因此上海康平路事件在當時並未造成像重慶「一二・四」事件那樣的全國性轟動效應。

全面考察當時的全國局勢，在上海康平路事件發生之前，群眾性武鬥事件在一些大、中城市已多有發生，只是規模及影響都不如重慶「一二・四」事件。張春橋是參加了北京工人體育場那次全國造反派集會的，他親自聽到了羅廣斌對重慶「一二・四」事件的控訴，當然十分清楚這一事件的影響和給造反派帶來的好處。在後來發生上海康平路事件時，重慶「一二・四」事件等已經發生在前的大規模武鬥事件，對他和上海造反派不會沒有啟發。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四章

兩大派分道揚鑣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造反派自行「大亂」

到1967年1月，同全國大部分地區形勢一樣，保守派在重慶基本上已處於分崩離析之勢，造反派組織佔據了文革舞台。

然而，「一月奪權」風暴，卻又導致了造反派的大分裂。

被統稱為八一五派的重慶造反派，在1966年12月初就已經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當時圍繞對「一二·四」大會應該如何採取行動，對「慘案」發生後如何對待被懷疑為「烈士」的屍體、如何對待「工糾」廣大群眾等問題，就有過激烈爭論。而在當時那種提倡鬥爭，反對寬容，強調「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提倡「痛打落水狗」、「追窮寇」的時代環境中，任何意見分歧都可能上升為「原則」衝突，再加上所謂「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之類問題夾雜其間，矛盾就更加複雜化了。在「一二·四」事件之後由少數群眾組織負責人倉促建立起來的山城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也因為意見不能統一，得不到許多群眾組織承認，失去了原本應有的統領全市造反派（即八一五派）的權威性。

從1966年底開始，重慶造反派中就出現了這樣的口號：「八一五派必須大亂！」

這個口號，並不是像後來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似乎是由反對重大八一五的那些群眾組織提出來的，實際上，這是當時整個重慶造反派——八一五派的共識。而這一共識，又是在毛澤東所反覆強調的「不要怕亂」、「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等等「最高指示」的開導、鼓動下產生的。

在署名為「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革命造反戰校（29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的油印傳單《二談「八一五派大亂」勢不可擋》（1967年1月8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印發）中，就有這樣的文字：

毛主席教導我們：「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對於目前八一五派存在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只有用鬥爭的方法才能解決。企圖用壓制矛盾爆發，生拉硬扯，牽強附會地把八一五派連在一起是辦不到的！進行認真嚴肅的革命整頓就是進行鬥爭！八一五派必須大亂！

這是兩種思潮、兩條路線的鬥爭。因為那些打進來的敵人和修字號人物及不良分子決不會輕而易舉地交出手中的大權來，黑市委也不會簡簡單單地收回黑手，他們必然要糾集一夥人，利用一些人，蒙蔽一部分人，反撲、離間，力圖保住自己的勢力，引起一場大亂。另外，由於思想上的分歧，也可能造成亂。亂，就是整頓初期的必然。八一五派必須大亂。

如何對待革命的大亂。有的人一聽到亂就害怕。其實亂並沒有害處。毛主席說：「……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是亂它幾個月……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

只有在亂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出每個人的真正面目，揪出那些假的「造反者」……在這亂的怒濤中，一切陰謀家的面目都將暴露無遺了。

讓我們在四處點火，大喊大叫：「革命的亂好得很！」

重大八一五主辦的《八一五戰報》發表的「紅巖評論」《談當前八一五派的亂與治》中，在論及「八一五派必須大亂」這個口號時也說，有兩種不同的「亂」，一種是革命的「大亂」：「這種『大亂』好得很！這種『大亂』是積極思想鬥爭的具體表現，是發現真正的左派核心的最好方式，是教育戰士觸及靈魂、統一思想、純潔組織、提高戰鬥力的有效措施。非如此，八一五派不能前進，也不能壯大。」「沒有這樣的『大亂』就不能有真正的『大治』。」

這篇評論宣稱：

「『八一五』革命派需要『大亂』，這是形勢提出的要求。……我們主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張重大『八一五』首先來個革命的『大亂』」。[1]

這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觀點。

「一四」大會使矛盾公開

1967年1月2日晚上，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由工人造反軍總部黃廉主持在文化宮召開會議，討論準備在1月4日召開紀念「一二·四」慘案一週月大會的問題。因為得到消息：工人戰鬥軍等保守派將於4日在體育場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以黃廉為首的一部分造反派負責人計劃再次破壞其大會，並召開另一個造反派的大會，而此舉顯然會引起新的衝突，導致新的流血事件。以重大八一五為首的許多造反派組織不同意這樣做，在討論會上發生爭論。重大八一五代表提出，工人戰鬥軍及其他保守派組織的廣大群眾是受蒙蔽的，是要革命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造反派應該把鬥爭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掌握好鬥爭大方向，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群眾流血，防止階級敵人趁機搗亂，更好地爭取受蒙蔽群眾，造反派不應該召開這個大會。

重大八一五反對召開「一四」大會，還有一個沒有明說的觀點：即這樣的打算明顯是有人要想製造又一次群眾性流血衝突，以新的血案來掩蓋在「一二·四」事件屍體問題上的尷尬處境。而工人造反軍、西師八三一、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則認為重大八一五是被「一二·四」慘案的鮮血嚇倒了，不敢再與保守派作堅決鬥爭了。

---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辦《八一五戰報》特刊第六號，1967年1月23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兩派辯論至凌晨兩點，最終重大八一五的意見說服了大多數，決定造反派的大會延期舉行，不與保守派召開的大會發生衝突。

但是，事情馬上又起了變化。得到羅廣斌、楊益言和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支持的工人造反軍總部黃廉等人，認為現在應該由工人（其實黃廉等人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左右局勢了，不能再聽從重大八一五的指揮了，於是便以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名義於1月3日向各造反派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在4日到體育場參加「一二·四」慘案一週月紀念大會。

重大八一五得到通知後，立即發表緊急聲明《我們為什麼不參加元月四號的大會》，向社會公開了他們在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辯論會上的觀點。

八一五派的內部矛盾再次公之於眾。

1967年1月4日，已經得知造反派又要來衝擊大會的保守派，為避免衝突，將原計劃召開的大會取消了。

由黃廉等少數人以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名義召開的「紀念一二·四慘案一週月大會」在市體育場舉行，但這個大會遭到重大八一五等許多組織的抵制，不少知名的大組織都沒有到會。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的「阿斗戰鬥隊」宣傳車還一直在會場邊廣播干擾。黃廉結結巴巴唸完西師青年教師楊向東連夜替他起草的發言稿，大會草草結束。

隨後，存在僅一個多月的這個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被重大八一五等組織宣佈「砸爛」。

從「調查團」到「聯絡站」

這樣，在中央號召「大聯合、大奪權」的1967年1月裡，重慶造反派（其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他地方也大多如此）卻反而出現了大分裂：以重大八一五為代表，形成造反派中得到「支左」[1]部隊支持、佔主導地位的一派，而以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工人造反軍（包括司令部、總部和一支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為代表，形成與之對立的更為激進的一派。

當時造反派在市中區人民小學內設立了「一二·四」慘案聯合調查團，造反軍總部黃廉、重大八一五總團熊代富等都是調查團核心組成員。後來因西師八三一的工作人員在內部造反，兩次「炮轟」重大八一五總團的「右傾」，重大八一五人員全部撤出，調查團即為西師八三一、工人造反軍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所控制。

當一些組織發起對重大八一五總團「右傾」的批判後，反重大八一五「右傾」的這一派就以調查團駐地為聯絡站經常會商，因而一度被稱為「聯絡站」派。這一聯絡站的主要負責人是工人造反軍司令部李方成。然而，重大八一五等組織為攻擊「聯絡站」一派，卻選取該派中他們認為問題較大的兩個代表人物——工人造反軍總部負責人黃廉和《紅巖》作者羅廣斌作為靶子，譏稱這個「聯絡站」為「廉羅棧」（實際上黃廉當時多數時間在北京，基本上不在「聯絡站」）。

羅廣斌問題，成為兩派分歧的一個焦點。羅廣斌、楊益言站在反對重大

1　支左：支持左派，特指解放軍部隊支持左派群眾組織。文革中因毛澤東支持的造反、奪權造成各級黨政機關癱瘓，社會陷入空前動亂，毛澤東決定讓軍隊介入地方事務以穩定局勢，於1967年1月21日對南京軍區黨委的報告批示：「林彪同志：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酌處。」「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隨即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名義於1月23日發出了經毛澤東批示「照發」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據王力回憶，此決定是毛澤東指定他馬上起草後不經過任何人直接交毛批發的。見《王力反思錄》845—848頁），但毛澤東對「左派」的概念從無明確解釋，致使各地部隊的「支左」無章可循，產生大量矛盾。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八一五「右傾」的一方，因小說《紅巖》的影響而成為「聯絡站」一派的旗幟。而重大八一五、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駐渝聯絡站等則認為羅廣斌在文革前多次受到市委審查的「出獄」問題（羅廣斌自己說是組織難友越獄逃出，而一些被捕的國民黨特務則交待是把他放出去的）很值得懷疑，在小說《紅巖》創作及改編電影的過程中，羅廣斌等又與「文藝黑線」有說不清的關係，因而他們認定羅廣斌在文革中的激進表現是有「野心」，羅是混入造反派中的「政治扒手」……

對重慶駐軍的評價也是兩派分歧的一個焦點。駐重慶的五十四軍（兼重慶警備司令部）領導人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旗幟鮮明地擁護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在響應毛澤東號召開始「支左」後，就把重大八一五等視為重慶地區的左派組織，已經與重大八一五總團建立起了良好的信任關係；而「聯絡站」一派則因五十四軍主要負責人是原市委委員，與李井泉和「黑市委」有說不清的關係，因而懷疑重慶警備司令部是「黑司令部」……

從這些分歧中已經可以看出其背後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即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對許多問題並無清晰、明確、準確的規定或界定，比如，怎樣才能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怎樣才能算是「革命左派」？「牛鬼蛇神」又應該是具體指哪些人？怎樣的「造反」才可以稱得上「有理」？……「無產階級司令部」自己都常常表現得含糊其辭，游移不定，忽左忽右，模稜兩可，怎能不造成下邊群眾思想的混亂！

保守派組織退出歷史舞台

儘管保守派得到黨政領導的支持，一開始幾乎獨佔了重慶文革歷史舞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台，但是毛澤東支持造反派的部署不可抗拒。在重慶八二八事件中，保守派想一舉壓垮造反派，反而弄巧成拙，被造反派抓到了「造謠」的把柄，造成了自己的尷尬被動和造反派的發展壯大。而在重慶「一二·四」事件中，保守派力圖改善形象，接過「造反」的旗號，穩住陣腳，卻反而招致毀滅性的沉重打擊。

1967年1月8日，重慶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工人戰鬥軍、文藝革命軍在大田灣體育場召開了最後一次大會，大會名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奪取新的勝利誓師大會」。由於造反派對「保皇四軍」的這種「垂死掙扎」已經不屑一顧，加上造反派在「一四」大會後分歧加劇，內部矛盾日益突出，同時，一些地區和單位的造反派已經開始或正在準備奪權，因此，造反派這一次沒有再到會場去衝擊造反，但卻有一些原「思想兵」、赤衛軍中殺出來的「紅色造反者」到會場騷擾，要求上台作造反發言，建工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紅色造反聯絡站的宣傳車一直在會場門口「揭露大會陰謀」。

1月11日，重慶市毛澤東思想赤衛軍總部主編的《赤衛軍》報創刊號出版。同日，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主編的《紅衛兵報》出版了第11期。這大約是他們在輿論上最後的亮相。因為各印刷廠很快就為造反派奪權，1月17、18日，重慶市印製一廠（承印《赤衛軍》報）和印製七廠（承印《紅衛兵報》）廠內外造反派聯合行動，抄砸了這兩家小報的編輯部，查封了已經印好的報紙3萬份，宣告這兩家小報的終結。

1月12日，西南師範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一〇〇五團和毛澤東思想赤衛軍宣告解散。

1月13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沙坪壩區分部被重大八一五等大、中學校造反派學生「砸爛」。

1967年1月20日，《人民日報》「史無前例」地發表了新華社向全國播發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的上海工人赤衛隊（與重慶工人糾察隊具有同樣性質）幾位隊員的《向毛主席請罪書》（公開聲明退出赤衛隊，承認自己「站到了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上」）；同時還轉載了上海《文匯報》專門為此撰寫的社論《歡迎向真理投降》。這種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表態，更使得重慶工人戰鬥軍（即工人糾察隊）繼續找中央申訴的希望破滅，一度氣焰沖天的工人戰鬥軍迅速土崩瓦解，一些保守派組織成員紛紛模仿《人民日報》發表的那個樣板請罪書，寫出自己的請罪書，表示「向毛主席請罪」、「向真理投降」，並將其保守派組織袖章用大頭針別在請罪書上以示決裂。

後來，在1967年2月底開始的「鎮反運動」中，不少造反派組織被鎮壓下去，保守派曾一度看到了恢復組織的希望。但是，五十四軍堅決執行毛澤東「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堅決支持他們認定的左派八一五派。

3月26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司令部（即五十四軍）以致「重慶市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革聯會公函的形式，向社會公眾明確表態：

近來，到我部來訪的人員，提出很多有關原工人戰鬥軍、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文藝革命軍（以下簡稱保守派組織）的問題。如謠傳「中央來文要求警備司令部支持四軍重新起來造反」，「現在我們（指四軍）天天去警備司令部，他們嘴裡不好說，實際其心裡早就支持我們」等等。這些謠傳，一時甚囂塵上，給不明真相的群眾造成了錯覺，既破壞了人民解放軍的聲譽，也影響了山城文化大革命的更好進行。

公函毫不含糊地聲明：「原保守派組織的鬥爭大方向是錯誤的。他們是李井泉通過原市委一手炮製的。」「目前原保守派組織中的某些少數人員企圖重新恢復組織，我們是堅決不贊成，不支持的。」[1]

1　重慶大學校刊編輯部主辦《重大八一五》報第2號，1967年3月31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至此，原保守派組織不得不徹底打消恢復組織的念頭，退出重慶文革歷史舞台。其部分成員從此成為「逍遙派」，另一些成員則分別加入了造反派的不同組織。

革聯會成立名單背後

在保守派全面崩潰的同時，「一月奪權」卻進一步激化了造反派中兩派的矛盾。

1967年1月21日晚上，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聲音」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人民日報》1月22日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各地造反派聞風而動，開始全面奪權。

在此之前，已經有一些地方率先進行了奪權。

最早是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奪了省、市黨政機關大權。14日發出通告正式向全國宣佈。2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通告並發表社論《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1月16日，哈爾濱紅色造反者聯合總部成立並發表奪取省、市黨政財文大權的《紅色造反者聯合接管公告》，31日正式成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

1月21日，廣東造反派宣佈奪了省、市黨政大權，次日在《南方日報》刊登了奪權通告……

早期的這些奪權，只有山西省和黑龍江省得到了中央承認。此後，中央又陸續承認了貴州省（1月底）、山東省（2月初）和上海市（2月初）的奪權。但是，究竟應該怎樣奪權，因事起倉促，毛澤東沒有具體考慮，中央也沒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有明確指示，因此各地就只好充分發揮「革命群眾的首創精神」，各自按照報上宣傳的先期奪權的樣板採取的方式，並盡量揣摸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意圖進行奪權了。

在1月21日晚聽到《人民日報》社論廣播後，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即向全市造反派發出緊急呼籲，倡議由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出面召集各造反派組織開一個聯席會議，討論大聯合大奪權問題，次日，在紅衛兵司令部駐地少年宮召開了有37個群眾組織參加的聯席會議，研究了奪權行動方案。

1月24日，重慶天氣寒冷，而廣大造反派心中卻熱血沸騰，因為他們按照毛澤東的號召投入了「偉大的一月革命」。

從1月24日至26日，重慶造反派50多個群眾組織，在按照毛澤東指示「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五十四軍支持下，展開了向重慶市黨政機關奪權的統一行動，並組成了以五十四軍軍代表為首的「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籌備會」，宣佈奪取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

參加醞釀、協商、建立革聯會的群眾組織有八一兵團、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總部、紅巖機器廠八三一戰鬥團、重慶工人九八戰鬥團、四川煤炭系統革命工人造反兵團、重慶無產階級造反工人二輕兵團、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反修兵團總部、重慶市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重慶紅農八一五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革命農民造反軍總部、重慶地區軍隊院校紅色造反者聯絡站、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西南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重慶大中專院校指揮部、重慶機關紅色造反聯合總部、重慶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四川省工農兵業餘文藝革命造反兵團重慶團、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渝紅色造反聯絡站、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駐渝聯絡站、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渝聯絡站等56個組織。[1]

1　《新重慶報》，1967年2月8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這個名單中，沒有重大八一五、西師八三一這兩大正鬧對立的學生組織，這倒可以理解，因為這些學生組織都屬於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這個全市性的大組織，暫時還沒有在組織上鬧分裂，搞出「第二司令部」、「第三司令部」之類的形式。

然而，名單中沒有工人造反軍司令部和總部這兩個號稱擁有數十萬人馬的大組織，而只署了「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司令部江北區永紅兵團」和「四川省重慶輪船公司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分團」這兩個基層組織的名字，這就有些引人注目了。因為在1月25日以「大會籌備處」名義發出的《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籌備委員會通知》上，署名的30個群眾組織中，第一名就是「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

這是怎麼回事？

實際上，工人造反軍司令部和總部都參加了籌建革聯會和奪權的前期活動。據重大八一五事後記敘，造反軍總部負責人葉祖祿參加了在少年宮研究奪權方案的聯席會，還在會上發表了「我們工人抓革命促生產，沒有時間來奪權，這個交給你們12所大專院校」的意見，當時曾受到批評。[1] 另據八一五派記者記敘，工人造反軍司令部負責人蔣××（註：即蔣國志）也參加了革聯會的籌備，並在1月31日的協商籌備會上代表造反軍司令部作了堅決支持成立革聯會的發言。「2月1日上午蔣××參加了協商會議。工人造反軍總部見司令部的來了，就沒有來，因為他們兩家一直是對立的，誰也不承認誰。」[2] 後來的反到底派領導成員、參與了革聯會籌建工作的二輕兵團負責人夏祥貴則回憶，名單上沒有工人造反軍，是因為造反軍司令部與造反軍總部在署名上發生爭

1 重大八一五戰鬥團五八四二三部隊《奪權經過》，1967年2月17日，鉛印傳單（隨《新重慶報》附送）。

2 《新重慶報》紅色造反者魯迅戰鬥隊、紅巖戰鬥隊、重慶人民廣播電台紅色造反隊、新華社重慶記者站「只把春來報」戰鬥者《革聯會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1967年2月21日，鉛印傳單（隨《新重慶報》附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執，都想由自己一方代表造反軍，互不相讓，後來就乾脆都沒有署名。[1]

據重大八一五戰鬥團五八四二三部隊事後所寫《奪權經過》一文記載，1月25日奪市人委的權時被推舉參加查封看管市人委印章的五個群眾組織中，有工人造反軍總部、二七戰鬥團總部、紅色農民八一五造反司令部、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全國工農兵紅衛軍榮復轉業軍人革命造反軍重慶總部，這都是當時較有影響的全市性大組織，但後面這個組織很快就因中央明令取締全國性群眾組織和不允許榮、復、退、轉軍人單獨成立組織而被迫退出重慶文革舞台。

在參與奪權的群眾組織中，真正起作用的實際上只是幾個較大的組織。1月26日，42個群眾組織在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開會，商討奪權後如何掌權事宜，決定：

由工人造反軍總部、紅農八一五、退伍軍人造反軍、財貿八一五、重慶地區軍事院校紅色造反聯絡站、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組成七人監管小組管理市人委；

市委宣傳部由中學生紅衛兵、六中三二一一一戰鬥團、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教職工革命造反司令部、體委八一五、四川美術學院紅色尖兵團共管；

市委辦公廳、市監委、市委組織部由教職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解放軍、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監管；

市委財貿政治部由財貿八一五、財貿九二一監管；

市委工交政治部由八一五野戰軍、二七戰鬥團、二輕兵團、交通學院九一五戰鬥團監管；

市農林局、農工部由紅農八一五、西南農學院八二六戰鬥團監管；

市委國防工業政治部由八一兵團監管；

市郵電局由郵電八一五監管……

1　夏祥貴口述，何蜀整理《夏祥貴談重慶文革》，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重慶駐軍空前的武裝大遊行

重慶的這次奪權，是在重慶駐軍支持下進行的。

駐重慶的陸軍第五十四軍領導人，因給「思想兵」當輔導員問題而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被搞得灰溜溜的。堂堂軍長韋統泰少將，竟然還遭到造反派紅衛兵的綁架——1967年1月8日，以周家喻為首的造反派紅衛兵代表到五十四軍軍部大門口要求韋統泰出來接見和回答問題，在韋統泰出來後，幾個中學生採取突然行動將其抱抬上車，送到設於重慶市少年宮的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扣留，要求其承認擔任「思想兵」輔導員期間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關押約一週，在市中心解放碑召開了批判大會後才將其送回軍部。

不過，這一綁架事件使韋統泰與造反派紅衛兵有了多日近距離接觸和對話，對這些與他兒女年齡相仿（他的兒女當時都在重慶的中學讀書）的「革命小將」有了進一步瞭解，進而認定這些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熱情支持的「革命小將」是開展文革運動應該依靠的「左派」，從而明確了支持以重大八一五為代表的造反派的立場。

1967年1月23日，毛澤東批准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名義聯合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五十四軍黨委聞風而動，迅速作出了支持重慶造反派即八一五派，並支持八一五派奪權的決定。他們把重大八一五總團的負責人請到軍部商談，對奪權後將要成立的臨時權力機構組成人員，也作了推薦——因為他們已經調看了一些造反派負責人的檔案，對這些人的政治面貌和歷史表現進行過研究。

1月28日，重慶駐軍2000名指戰員舉行「堅決支持重慶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的武裝示威遊行，表示對重慶八一五派奪權行動的公開支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文革結束30年之後，一位當年五十四軍幹部子弟以「韓微」的筆名在「老兵網」上發表了連載小說《重慶大武鬥》，雖然內容多為虛構，但其中也有以紀實手法記錄的一些當時片斷場景，如對這次武裝遊行的描寫，就可資參考：

建國17年來，重慶市民們還從未見過如此壯觀的軍隊武裝大遊行。一個個方隊整整齊齊，戰士們肩扛五六式半自動步槍，雄赳赳，氣昂昂。機槍、火箭筒、迫擊炮、無後坐力炮夾雜其中，顯示了現代步兵強大的戰鬥力。炮兵車隊威風凜凜，大口徑火炮形成了鋼鐵的洪流。遊行隊伍沿着蜿蜒的山路依次行進，不見首尾。在隊伍的最前面，是軍部的宣傳車，車上的大喇叭不斷播放着軍黨委統一過的口號：

「堅決支持山城革命左派！」

「向造反派學習，向造反派致敬！」

「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段描寫中，除去「遊行隊伍沿着蜿蜒的山路依次行進」一句不夠準確（「山路」應為「山城公路」）外，其他描寫應該是能夠反映當時情況的。

自1966年10月初《中央軍委緊急指示》下達後，軍事院校師生中的造反派也活躍起來。到1967年1月奪權時，在重慶的軍事院校中，已經建立起一些造反派組織，主要的有：後字二四二部隊（後勤工程學院）紅色造反者總團，第七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總團，第七軍醫大學一〇五紅色造反團、一〇五紅工造反團，總字四一二部隊（通信兵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總字四二四部隊（通信兵技術學校）紅色造反團，總字四二一部隊（通信兵雷達技術學校）紅色造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反團，總字一五三部隊（炮兵學校）紅色造反團等。不過，在1967年1月下旬毛澤東發出軍隊「支左」指示之前，他們很少參與地方上的造反派活動。1月27日，重慶軍隊院校紅色造反者聯絡站召開成立大會（實際上這個組織已經在此前參與了奪權活動）。從奪權開始，重慶的軍事院校造反派參加了地方上的活動，並且以「解放軍」的身份「支持左派」，逐漸捲入地方上的派性鬥爭之中。

1月29日上午，陰雲密佈，寒氣襲人，重慶造反派群眾和解放軍駐渝部隊指戰員30多萬人在市體育場舉行「大聯合大奪權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宣佈造反派已在解放軍支持下奪取了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並將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書記處書記魯大東、辛易之、孫先餘、廖蘇華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等揪到會場，戴上1米多長的紙糊高帽子批鬥示眾。

次日，重慶《新聞報道》（《重慶日報》被造反派奪權後，從1967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聞報道》，革聯會成立後，於2月1日改為《新重慶報》）發表了大會報道及照片。報道稱這個大會是「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的輝煌戰果」，並用了個十分醒目的黑體字大標題：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權黑市委完蛋。

報道中分別介紹了工、農、兵、學、商各界代表在大會上的發言，其中說：「本市駐軍部隊和重慶地區軍事院校的紅色造反者，個個鬥志昂揚，人人精神抖擻，參加了今天的大會和遊行。他們說：我們堅定不移地站在山城革命造反派一邊，滿腔熱忱地、毫不含糊地、最堅決地支持山城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大奪權的鬥爭，一定同全市革命造反派心連心、肩並肩，共同戰鬥，徹底打垮黑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堅決打擊一切破壞生產和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組織。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敵人不投降，就叫它徹底滅亡！」

會後，「走資派」和「頑固分子」們被拉上卡車押着遊街示眾。遊行隊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伍還當眾焚燒了從新華書店庫房清理出來的劉少奇、鄧小平像。

「黑電文」

奪權，當時被宣傳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盛大節日」。然而，這個「節日」的喜慶氣氛過於短暫。

奪權導致了造反派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一些本已參加奪權的群眾組織（如工人造反軍司令部、總部）又中途退出。

1967年2月1日，在重慶市委附近人民小學內的聯絡站，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50多個造反派群眾組織的代表通過決定，聯名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發出急電，急電稱：

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周家喻為首的一些群眾性組織的領導人，執行了一條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他們完全違背了毛主席關於大聯合大奪權的指示，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群眾路線，客觀上迎合了黑市委的需要，於1月24日，以重慶12所大專院校學生為主體，以重大八一五為核心，排斥了所有的工人革命造反組織，單方面的接管了黑市委和重慶全部市一級黨政領導機關的大權。……我們認為，這不是真正的奪權，而是假奪權，這不是真正的大聯合，而是在搞分裂。其實質是欺騙群眾，使黑市委及其竊據的各種大權名亡實存，使我市文化大革命流產。[1]

1　《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急電》，載《首都紅衛兵》報重慶版創刊號，1967年2月9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這個急電，由工人造反軍司令部《造反軍報》編輯王洪泰（重慶市糖果糕點公司幹部）起草。在急電上簽名的有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總部、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司令部、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一支隊、重慶工人二七革命造反委員會、重慶二七革命造反聯絡總部、重慶市革命職工造反團總部、重慶財貿工人九二一戰鬥團、重慶「一二·四」慘案聯合調查團、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首都一司駐渝聯絡總站、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聯絡站、武漢地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駐渝聯絡站、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團駐渝聯絡站等54個組織。[1]

在急電上簽名的組織中有二輕兵團，即前一個籌建革聯會的名單中的「重慶無產階級造反工人二輕兵團」，但其主要負責人夏祥貴這時正在北京，不瞭解此事，這個簽名並不代表二輕兵團總部的態度，二輕兵團後來仍然是革聯會成員單位（直到當年4月二輕兵團才加入「砸爛革聯會」的陣營）。

這個名單上有的不同組織其實就是一兩個人在代表，如「重慶市革命職工造反團總部」和「重慶市稅務局市中區分局紅色警衛隊」，就是羅光遠在代表，他既是稅務局紅色警衛隊的發起人和負責人，又是職工造反團的發起人和負責人。

名單中的重慶工人二七革命造反委員會，據二七戰鬥團總部主編的《二七戰報》創刊號（1967年1月30日出版）上的文章稱，是已被二七總部開除的「政治扒手」劉紅在另立「司令部」不成後又另外打出的招牌。

這個名單中有的組織雖然名稱顯得小，如「重慶市文聯紅衛兵戰鬥組」，但影響力卻不可低估，因為這個組織的核心人物就是小說《紅巖》作者羅廣斌、楊益言。

---

1 《首都紅衛兵》報重慶版創刊號。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這個名單中有的組織的簽名遭到該組織否認。如，2月3日，新六中三二一一一戰鬥團發表嚴正聲明，稱該團事先並不知道要開此會，會議進行兩天後才得到通知派去兩人參加，並不瞭解會議宗旨和前後情況，因此在急電上的簽字作廢，並稱在急電上簽名的該校東方紅戰鬥縱隊、紅色敢死隊、川外天安門公社等是「托派組織」、「托派分子」。[1]

看來，為了拚湊50多個群眾組織的名單（與籌建革聯會那份名單的數目相對抗），這一派不得不想了些辦法，耍了點小聰明，因此後來被重大八一五等譏稱為「反革命的小聯合」。

這個被八一五派譏稱為「黑電文」的《急電》，實際上並未發給中央，因為當時已經被支持革聯會的一派奪權的郵電局，不同意拍發這樣的電報。後來只好在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主辦、於2月9日出版的《首都紅衛兵》報重慶版上發表。

羅廣斌之死

羅廣斌代表重慶市文聯紅衛兵戰鬥組出席「聯絡站」的會議並在給中央的急電上簽名之時，重慶城裡已經掀起了公開點名批判和打倒羅廣斌的浪潮。這個浪潮是由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駐渝聯絡站發起的。

1967年1月31日，羅廣斌正在市郊大渡口區的重慶鋼鐵公司向造反派工人群眾作報告。這天晚上，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駐渝聯絡站在重慶城中心突然發動了「打倒羅廣斌」的宣傳攻勢，到處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拋出了批

1　新六中三二一一一戰鬥團《紅衛兵》報第14期，1967年2月9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判羅廣斌的文章《羅廣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內部的定時炸彈》，文章稱羅廣斌「歷史有問題」、「是周揚黑線上的人物」、「與黑幫分子沙汀、馬識途等關係十分密切」，「是重慶文藝界最大的鐵桿保皇分子」，「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內部的一顆定時炸彈」、「山城頭號政治大扒手」……

當晚，北航紅旗的宣傳車還在重慶市的中心區解放碑周圍高聲朗誦諷刺羅廣斌和楊益言想向革聯會進行反奪權的打油詩：「老羅和老楊，整天工作忙，一個想當書記，一個想當市長……」

羅廣斌應該是在得知這一情況後，才到「聯絡站」會上去的。也許正是這一情況促成了他「跳出來」，在「黑電文」上簽了字。

2月4日，由西師八三一發起，由西師青年教師楊向東和中文系學生侯光清主持，在羅廣斌、楊益言支持下創辦的《新山城》報，在重慶市文聯創刊，作為「聯絡站」一派的報紙，準備與2月1日開始出版的革聯會機關報《新重慶報》（即原《重慶日報》）分庭抗禮。但這一派畢竟無權，無權就缺少應有的經濟條件和行政手段，只出版了創刊號這一期即夭折。

《新山城》報創刊號上，發表了《打倒機會主義，實現山城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代發刊詞》、《山城工人運動好得很》、《山城革命造反派，向何處去？》等，全都不點名地批判了重大八一五。

2月5日中午，一大群革聯會一派的紅衛兵衝入文聯大院。這時羅廣斌與妻子胡蜀興和一位老友正在屋裡談話。衝進屋來的為首紅衛兵自稱是北航紅旗的，要羅廣斌跟他們走一趟。當時，北大學生侯均初正在閣樓上，聽到羅廣斌理直氣壯地邊走邊說：「走，前邊帶路！有什麼了不起，我就當17年前沒有從白公館跑出來！」因為親耳聽到了羅廣斌這句最後的話，所以侯均初後來無論如何也不相信他會自殺。

羅廣斌被帶到了大坪附近的馬家堡，解放軍後字二四二部隊（後勤工程學院）的「八一樓」關押。當晚，革聯會一派即對羅廣斌進行了突擊審訊。審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訊者主要是想從羅廣斌的「歷史問題」上找到突破口，但毫無收穫。

2月6日，重大八一五和西師八三一召開辯論大會，雙方都指責對方背離了運動的「大方向」。重大八一五的代表周家喻在辯論中說：

「……我們在辯論的過程中隨時都不能離開我們辯論的焦點，澄清事實的目的也在於這點，即當前鬥爭的大方向究竟是什麼？是批判所謂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的右傾機會主義呢，還是大聯合大奪權？還是揪出目前破壞大聯合的最大的政治扒手，在內部製造反對派、挑起打內戰的政治扒手羅廣斌？」[1]

周家喻認為批判重大八一五的「右傾」不是當前鬥爭的大方向，那麼，八一五派的「揪出政治扒手羅廣斌」又是大方向嗎？

到底誰掌握了大方向？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辯論，總是沒有結果，沒有輸贏的。但是，誰都會認定是自己這一派才掌握了真理，「唯我獨左」，「唯我獨革」，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

在羅廣斌被公開點名批判和綁架關押期間，全國的形勢已經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羅廣斌應該從報紙、廣播中和八一五派人員的談話及傳單、大字報中有所瞭解。

1月31日，由《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1967年第三期《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以大量篇幅專門談到了「鎮反」問題，明確指出：「在奪權的過程中，必須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缺少的條件。」「在當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一小撮代理人決戰的階段，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蔣特務，都紛紛出籠。這批牛鬼蛇神，造謠惑眾，欺騙、拉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組織，瘋狂

1　《鐵的事實，不容歪曲——在2月6日與西師8．31辯論會上周家喻的發言》，《八一五戰報》第九期（復刊號），1967年2月17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地進行反革命活動。」「牛鬼蛇神一齊跑出來，是一件大好事，我們正好趁此機會來一個大掃除，『掃除一切害人蟲』。」

2月4日，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通告——關於被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奪領導權的群眾組織的若干規定》，提出「對打入革命群眾組織、篡奪領導權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黨，必須立即逮捕法辦」，「必須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對待所有群眾組織及其行為」，等等。

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的運動，不覺間變成了矛頭對準「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的「鎮反」。運動的「大方向」變了嗎？這一微妙的變化，不能不引起敏感的羅廣斌的思索。他當時到底想了些什麼，再也無人知道，只知道他留下了一封給江青的信，標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此信在羅廣斌死後很快被有關方面收存，現在是否在哪個檔案櫃裡不得而知）。這個標題，顯得是在為自己辯解。顯然，一度成竹在胸、豪情滿懷的羅廣斌，已經感到了政治上極大的壓力。

1967年的春節是2月9日，正當許多老百姓盼着在這個一年一度的傳統節日回家團聚之時，1月29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今年春節不放假的通知》，在全國各大報刊登，同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宣佈：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新階段。當前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以排山倒海之勢，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全面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為了堅決執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奪取革命、生產雙勝利，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國務院決定：1967年春節不放假；職工探親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暫停執行，以後再補。」

這個通知，使許多老百姓有苦難言。親人團聚的希望破滅了。

而對正被八一五派關押着接受「審查」的羅廣斌來說，不僅是有家不能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歸，親人不能團聚，而且還面臨極大的政治壓力：八一五派的廣播中，已經把他說成是破壞山城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的罪魁，是「山城頭號政治大扒手」，是「最大的分裂主義者」，是「埋藏在造反派內部的定時炸彈」……從他被綁架後對他的審問情況來看，八一五派和革聯會竭力要將他的「歷史問題」與現實聯繫起來，要將他定為在文革中跳出來搞破壞的「叛徒」、「特務」。而他的那個「歷史問題」，已經被重慶市委和公安機關反覆調查了那麼多年，卻始終沒有作出一個令他或調查者滿意的結論。他很清楚，在中共所開展的這樣大的政治運動中，這類「歷史問題」被拿出來上綱上線做文章是很方便也很有殺傷力的……

這些壓力到底是從哪一方面促成了他作出最後的決斷，無人能夠知道。只知道他在最後一天，在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中夾着的一張照片《「中美合作所」兩口最大的「活棺材」之一「渣滓洞」監獄》背後，留下了一句顯得像是遺言的話：

「這本毛主席語錄和這張照片是胡蜀興的。羅廣斌，1967年2月9日。」

2月10日，農曆正月初二。寒冷的清晨，42歲的羅廣斌，在革聯會一派的關押地後字二四二部隊（後勤工程學院）的「八一樓」三樓上，借上廁所洗臉、解便之機，從容脫下毛領皮襖（皮襖衣袋裡放着手錶、鋼筆、錢、糧票、《毛主席語錄》等物），取下呢帽、圍巾，一件件掛好後，從廁所窗口縱身跳樓自殺。

跳樓前，在門外等候的看守小張（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八一八戰鬥團紅衛兵）發現羅廣斌爬上了窗台，驚問：「你要做啥子？」羅廣斌回答他的是「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兩句口號。

羅廣斌之死，引起各方震動。重大八一五負責人周家喻一聽到消息後首先就懷疑是反革聯會一派「殺人滅口」，以掩蓋其「反革命罪行」，但他到現場聽看守及公安人員講解後，同意了自殺的結論。革聯會一派隨即宣佈羅廣斌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為「畏罪自殺」。反革聯會一派則認定羅廣斌是被「謀殺」。楊益言、劉德彬已在此前先後逃離重慶，上北京向中央告狀。

後來，重慶反到底派和支持反到底派的成都兵團、八二六派對羅廣斌之死有這樣一個評價：

「生前，羅廣斌和造反派並肩戰鬥，患難與共；死後，羅廣斌仍然與造反派一起，承受千斤重壓。羅廣斌，是資本主義復辟逆流中的第一個受害者，二、三月『鎮反』，鮮血從這裡開始滴，鐐銬開始從這裡響！」[1]

羅廣斌被八一五派宣佈為「叛徒」，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這個三人創作小組和跟他們站在一起的重慶市文聯機關造反派被宣佈為「羅氏三家村叛徒集團」。而重慶造反派的領頭羊重大八一五，則被反革聯會一派宣佈為背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被「黑市委」收買了的「叛徒集團」。大家都成了「叛徒集團」——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果。

羅廣斌之死，標誌着重慶造反派兩大派的衝突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你死我活的爭鬥進一步展開了。

---

1 《軍工井岡山》編輯部、《紅巖戰報》編輯部、《八二六之聲》編輯部《揭開李廖死黨利用派性製造羅廣斌事件的黑幕——評山城羅廣斌事件》，載成都《軍工井岡山》報，1968年3月出版。轉摘自《批〈紅巖〉揪叛徒參考材料之五——羅廣斌問題》，紅巖村編輯部翻印，1968年7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五章

都是「復辟逆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臨時最高權力機構

1967年2月8日，「一·二四」奪權建立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重慶市革聯會宣告正式成立。五十四軍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出任革聯會主任，常委12人（以後增加到21人），除軍隊代表二人（五十四軍劉潤泉與重慶軍分區政治部主任馬駿容）和革命領導幹部一人（重慶市第二商業局黨組書記兼局長徐正身）外，其他名額分配給以下群眾組織——

工人四人（八一兵團、二七戰鬥團、重慶工人九八戰鬥團、紅巖八三一戰鬥團各一人）；

農民二人（紅農八一五、革命農民造反軍各一人）；

財貿系統一人（財貿八一五戰鬥團）；

文教衛生系統一人（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革命師生代表一人（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這些進入革聯會的群眾組織代表，如工人代表中的八一兵團陽增泰、二七戰鬥團王庭學、重慶工人九八戰鬥團黃履中，農民代表中的紅農八一五艾啟貴、革命農民造反軍趙行貴，財貿系統代表財貿八一五戰鬥團王紹川，革命師生代表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熊代富等，都是該群眾組織的總部勤務組成員或主要負責人，只有文教衛生系統代表——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譚柏樹（重慶市曲藝團演奏員，共青團員）不是文藝界司令部的負責人，只是其基層組織重慶市曲藝團輕騎兵的負責人。

從這個革聯會常委名額分配方案，可以大致瞭解到當時在八一五派中起主導作用的有哪些群眾組織，不過，其中有的組織實際作用並不大，只是為了體現代表性而不得不安排的（如兩個農民造反組織的代表）。工人組織中的紅巖機器廠紅巖八三一戰鬥團，作為一個基層組織能單獨分配到一個常委名額，則是因為該組織的「抓革命促生產」搞得好，得到了新華社報道並在《人民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報》等大報刊登，成為八一五派引為驕傲，經常拿出來展示的樣板。

在革聯會中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是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勤務組組長王紹川。他是重慶市第二商業局幹部，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在部隊上加入中國共產黨，軍銜上尉。因「家庭出身」問題（長期任鄉村教師的父親買了些田地，以保證有足夠的地租給居住鄉下的祖母作養老金，土改時被劃為地主），文革前夕的1964年底被安排轉業。五十四軍黨委調閱了革聯會常委人選的檔案後，認定他是部隊這個「毛澤東思想大學校」裡培養出來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決定讓他出來主持日常工作。但是，就因這個「家庭出身」問題，後來他成了反革聯會一派的重點攻擊目標，革聯會也就被說成是「由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掌權」。

革聯會主任劉潤泉1967年3月上旬在重慶國防工業系統「抓革命促生產」、「三結合」經驗交流會議上的講話中，對這段時期的重慶形勢有一個簡要的總結：

「革命造反派內部產生了分裂，一方是『革聯會』，一方是『聯絡站』。1月20日至2月2日，我們召開了『革聯會籌備委員會』的會議，討論和研究了工作，發了一個書面的聯合公告。在這同時，又有一些組織在開另一個會議（開聯絡站會議），他們並給中央發了『急電』。當時工人造反軍的幾個頭頭，一方面參加了『革聯會籌備會議』，另一方面又去參加了『聯絡站』的會議。在『聯絡站』的會議上，羅廣斌發了言。會後，他們拋出了兩支毒箭，一支是藉反以周家喻為首的重大八一五的右傾機會主義為名，反『革聯會』；一支是把鬥爭的矛頭指向解放軍，他們說什麼『重慶市的聯合是槍口下的大聯合』等等。」[1]

1　《重慶市革命聯合委員會常委會主任劉潤泉同志在市國防工業系統「抓革命促生產」、「三結合」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大會秘書組，1967年3月12日。四機關革命造反縱隊一支隊翻印，1967年4月14日（油印件）。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救世主」

在文化大革命中，首都紅衛兵在各地「煽風點火」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為他們身處中國的政治中心，高幹子女眾多，信息渠道廣，又能經常直接從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等人那裡得知毛澤東的意圖和好惡，能得風氣之先，當他們到了首都之外的地方，便很容易起到「革命先鋒」或「欽差大臣」般的煽動作用。同時，他們自身的主觀性、片面性、幼稚病和派性等等，又往往會影響到外地造反派，加深外地造反派中不同派別的分歧和對立。

在重慶造反派形成初期較有影響的首都紅衛兵中，有一個清華大學學生董九三，他對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走上造反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許多中學生紅衛兵視為他們的「董司令」，而被重慶市委視作眼中釘，千方百計將其逼走。

在1966年底的造反和1967年初的奪權前後，外地特別是首都紅衛兵在重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較有影響的有——

首都一司駐渝聯絡總站，主要負責人孟憲臣（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學生）、鍾東（清華大學學生）等；

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主要負責人劉連仲（北京農業大學學生）、張金根（北京政法學院學生）、馮邁（北京廣播學院學生）等。

他們都堅定地站在西師八三一、工人造反軍這一方，認定重大八一五「右」了、「修」了。

另有少數三司人員在重慶以首都三司駐渝紅色聯絡站名義支持重大八一五和革聯會，但後來被首都三司開除。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駐渝聯絡站，主要負責人李雲生。作為首都三司發起單位的成員，他們自然是跟三司、一司駐渝聯絡總站持同一觀點的。他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們當時在重慶還做了一件不事張揚的重要工作——把文革前受到李井泉打擊迫害的「蕭、李、廖」這個有名的「反黨集團」冤案成員分別從不同的秘密拘禁地找到，接到該聯絡站在重慶的駐地（市政協）保護起來，並在這些幹部上京告狀時安排他們在地質學院住下，讓他們集中提供「揭發李井泉」的材料，並着手為他們的冤案翻案。在羅廣斌身亡並被八一五派當作「叛徒」展開批判之後，他們又積極參與了為羅廣斌鳴冤、翻案的活動。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的朱進選、許叔興等學生，在籌建工人造反軍和組織重慶工人北上告狀團的活動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決策和組織作用。在他們離開之後的北航紅旗駐渝聯絡站，主要負責人則是王紀文、李高風、周凱等幾位北航研究生。他們堅決站在重慶駐軍和重大八一五一方，在1967年1月底，正是由他們率先發起了「打倒羅廣斌」的宣傳攻勢。

可以看出，在重慶的文革舞台上，首都紅衛兵的「天派」與「地派」已經在一些問題上有了較明顯的分歧，並且對重慶造反派產生了影響。

當時較有影響的北京學生中，還有北京大學的朱學文、侯均初（歷史學家侯外廬之女）、李景屏、韓敏中等四個女學生，她們到重慶是慕小說《紅巖》之名而來，到重慶後一直在市文聯支持羅廣斌、楊益言造反，被視為羅、楊的「秘書班子」。但是她們除李景屏外都「出身不好」，因而既不是「新北大公社」成員，也沒有打出什麼組織旗號。羅廣斌被綁架後，侯均初與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學生余綱勇等首都紅衛兵陪同楊益言逃離重慶，經貴陽去北京告狀。朱學文與李景屏在得知羅廣斌身亡消息後，趕去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查看現場，被八一五派抓到六中關押，幸被清華井岡山駐渝聯絡站周學勤（清華大學土建系六六級學生）以「提審」之名救出，跑到朝天門碼頭乘船逃離重慶。

在重慶影響較大的外地學生中，除了首都紅衛兵，就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的「鬼見愁」（後由該校總勤務組批准作為紅色造反團駐渝聯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絡站），其中最有名的有周闖（海軍系六五級學生）、毛綺（女，空軍系六五級學生）等。周闖是重慶人，西師八三一負責人之一周榮的弟弟，較早回到重慶「煽風點火」，廣為人們熟知，一些普通市民看到哈軍工鬼見愁的宣傳車駛過街頭都會指點着說：「周闖！周闖！」而毛綺作為女學生，在「一二·四」事件後造反派搞「烈士屍展」和抬屍遊行並衝進市委時，都十分活躍，引人注目。他們本來一直與西師八三一、工人造反軍、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站在一起，觀點激進，但在「屍體」問題引起的矛盾中逐漸產生疑惑，改變立場，贊同了重大八一五、北航紅旗駐渝聯絡站等組織的觀點。在2月19日反革聯會一派召開的批判重大八一五右傾的大會上，周闖上台發言，公開宣佈支持重大八一五、支持革聯會，和他的哥哥周榮分道揚鑣，成了對立的兩派。這在當時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外地赴渝師生的聯絡站還辦了一些「重慶版」小報，如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駐渝聯絡站的《東方紅》報重慶版（1967年1月28日創刊）、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駐渝聯絡站的《紅旗》報重慶版（創刊期不詳）等。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首都三司的《首都紅衛兵》報重慶版（1967年2月9日創刊），反革聯會一派給中央的急電（被八一五派稱為「黑電文」），就是在這份小報創刊號上公開發表而造成影響的。

在重慶造反派兩大派的分裂中，首都紅衛兵顯然起到了重要作用。首都紅衛兵中的兩派矛盾，與重慶當地情況相結合，使得重慶兩派衝突更為複雜。當時流行的《國際歌》中唱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反革聯會的首都紅衛兵，均被八一五派譏稱為「救世主」——當然，支持革聯會的首都紅衛兵，如率先公開批判羅廣斌的北航紅旗駐渝聯絡站，就不會被認為是「救世主」了。

1967年2月23日，首都三司、一司、清華井岡山、北地東方紅等駐渝聯絡站聯合發表《外地革命師生赴渝造反兵團公告》，宣佈不承認革聯會，要繼續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批判重大八一五總團的右傾。

但是，中央已經三令五申要求北京外出串聯的學生們回校「復課鬧革命」，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首都各大學生組織也都已經發出了要求所屬成員返回學校的通知。支持革聯會的北航紅旗駐渝聯絡站已於2月16日發出給山城人民的告別信，返回了北京。反革聯會一派的首都紅衛兵們也不便繼續在重慶滯留不歸了。不過，在離開之前，他們還想發起最後一戰。

2月22日，由原首都一司、首都三司、首都二司造反聯絡站等各組織聯合組成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首都紅代會）成立。3月3日，原首都一司、三司駐渝聯絡總站便以「首都紅代會駐渝聯絡站」名義，點名向重大八一五負責人周家喻、熊代富、黃順義及革聯會準備「結合」的前市委領導人辛易之、段大明等發出挑戰書，要求在解放碑辯論重慶革聯會問題。駐重慶的這些首都紅衛兵，還是那麼一些大家都已經熟識的面孔，現在卻打出「首都紅代會」的新旗號，這在一些人眼裡顯然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八一五派對此更是嗤之以鼻。

3月4日下午，重慶天氣陰沉，春雨綿綿，原首都一司、三司駐渝聯絡總站以「首都紅代會駐渝聯絡站」名義，與重大八一五在市中心解放碑觀禮台上冒雨辯論革聯會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實行了「三結合」等問題，雙方各執己見，都靈活運用毛澤東的「戰略戰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對自己有利的話題就大講特講，慷慨陳辭，對自己不利的話題就竭力迴避，「王顧左右而言他」。這種辯論都不可能有什麼結果。贊同某一派觀點的人就會把對自己有利的話聽進去，認為自己一派贏了。就這樣一直「辯論」到晚上9點左右，最後在八一五派群眾「革聯會，好得很！革聯會，好得很……」的起哄聲中草草結束。

事後，重慶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全文模仿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寫了篇《別了，張氏聯絡站》（指張金根為首的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站），竭盡挖苦諷刺之能事。而重大八一五則寫了篇《紙船明燭照天燒》，作為給三司駐渝聯絡總站送行的「祭文」，最後一句是：

「別了，救世主！」

「鎮壓反革命」

「一月奪權」被宣傳為「偉大的一月革命風暴」，毛澤東認定文化大革命將會極大地「解放生產力」，造反、奪權會使生產得到更大發展，然而，「抓革命促生產」的奇跡並未出現。儘管重慶駐軍指戰員走出營房承擔了維護社會秩序、支持工農業生產的重任，儘管有一部分造反派紅衛兵出於維護文化大革命成果、「走一二·九道路，與工農相結合」的美好願望，自願到工廠、車站、碼頭以義務勞動協助解決生產、運輸中的困難，重慶紅巖機器廠造反派奪權後在造反派紅衛兵支持下一度取得的「抓革命促生產」成績還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當作先進典型向全國作了報道……但是，造反、奪權從根本上打亂了原有的領導指揮系統，破壞了許多應有的規章制度，煽動起了「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狂潮，必然導致社會的極度混亂和生產的全面下降甚至癱瘓。據當年革聯會調查研究小組統計：

「特別是一月中旬，各煤礦的生產突然猛降40%，工業用煤嚴重不足，電廠庫存煤只夠維持一天半，有的工廠被迫部分停產，生活用煤也很緊張，嚴重威脅到生產和人民生活。」[1]

另據多年後《重慶市志》的統計，重慶全市這個月工業總產值比上月

1 重慶市革聯會調查研究小組《向山城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的匯報（修改稿）》，1967年4月17日。五機關革命造反縱隊翻印，1967年5月4日（油印件）。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966年12月份）下降9.9%，鋼材下降10.6%，煤炭下降14.4%，主要產品產量有45.6%下降。全市碼頭、港口、車站堵塞積壓物資12萬噸。[1]

「一月奪權」並未帶來「抓革命促生產」的新面貌，反而導致社會大動亂和生產急劇下降，這必然使長期信奉「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毛澤東警惕「階級敵人」的破壞，因此在1月28日頒發的《中央軍委命令》（八條）和在此前後發出的一系列報刊社論文章中，都頻繁出現了「鎮壓反革命」的提法。

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批准發佈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時稱「公安六條」），要求公安機關「採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這實際上已經發出了「鎮反」的信號。其中第四條針對當時全社會風起雲湧的群眾組織規定：

「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准外出串聯，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准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嚴辦。」

這裡所提出的對一大批各種類型「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准外出串聯」，不許「混入革命群眾組織」，「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明令將那些有「歷史問題」或「家庭出身」問題的人清除出群眾組織並剝奪其「大民主」權利直至「依法懲辦」，其打擊面之廣，堪稱「史無前例」。

1　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版407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967年1月30日，毛澤東對譚震林關於國務院農口幾個單位情況的報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此件值得一閱。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質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請你們注意這個問題。譚震林的意見是正確的。此件請周印發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這實際上是發出了開展「鎮反運動」的號召。

次日由《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1967年第三期《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更以大量篇幅談到「鎮反」問題，明確指出：「在當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一小撮代理人決戰的階段，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蔣特務，都紛紛出籠。這批牛鬼蛇神，造謠惑眾，欺騙、拉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組織，瘋狂地進行反革命活動。」「牛鬼蛇神一齊跑出來，是一件大好事，我們正好趁此機會來一個大掃除，『掃除一切害人蟲』。」

2月4日，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通告——關於被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奪領導權的群眾組織的若干規定》。

同日，中央文革小組發出批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和『紅旗軍』的頭目，應當立即採取專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眾。」中央文革小組這個「二四批示」，率先在湖南掀起了針對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鎮反運動」。

2月16日，新華社播發《決不容許把鬥爭矛頭指向英雄的解放軍和真正的革命左派/福建革命力量粉碎了反革命逆流》的新聞電訊；17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堅決捍衛三結合的正確方針》；18日《解放軍報》為此發表社論《徹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稱「……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勾結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拚命反對『三結合』聯合奪權的正確方針，公然把鬥爭矛頭指向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指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

這些重要社論及報道，均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覆播送，那些殺氣騰騰的語句，通過各地各單位各群眾組織的廣播站、宣傳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灌輸到人們耳中，當時的人們大多耳熟能詳，真正是深入人心。特別是《紅旗》雜誌社論中那句「牛鬼蛇神一齊跑出來，是一件大好事，我們正好趁此機會來一個大掃除，『掃除一切害人蟲』。」四川省公安廳副廳長楊崗3月中旬在重慶佈置「鎮反」工作時，對這個說法就作了這樣的解釋：「大掃除就是大鎮反。」[1]

在這樣強有力的「戰略部署」和輿論導向下，「鎮壓反革命運動」便在全國許多地區先後開展起來了。

因為是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部署，最初的「鎮反」是得到各群眾組織擁護和支持的。

2月初，重慶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1月23日由公安局造反派與西南政法學院政法兵團紅衛兵聯合奪權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與工人造反軍總部聯繫研究後，得到造反軍總部同意，決定對前哨街（即臨江門，「破四舊」時改名）的造反軍前哨支隊中一人以「現行反革命」罪進行處理。2月7日出動部隊包圍前哨支隊將其逮捕。

「鎮反」的打擊範圍迅速擴大。

2月15日，重大八一五向全市「革命人民」發出公開信《我們永遠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我們永遠當革命人民的小學生》，提出：革聯會奪權後，一小撮

1　《羅讓交待關於「鎮反」問題》，載反到底公檢法指揮部、工總司財貿第一造反縱隊《全盤否定重慶二三月「鎮反運動」資料彙編》第一輯18頁，1967年10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走資派不甘心失敗，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個人野心家結成了反革命的「神聖同盟」，「在今天的山城，這一些牛鬼蛇神，不是別人，就是羅廣斌、劉洪、黃廉一夥政治大扒手」，「這樣的個人野心家，不是別人，就是西師八三一、川大八二六和北京三司駐渝聯絡站中的某些人」，並且在最後呼喊出這樣的口號：

「誰砸『革聯會』誰就是反革命！」[1]

這已經表明，重慶的這次「鎮反」，除去打擊以往意義上的「牛鬼蛇神」外，還有一個新的特點，就是打擊那些反對革聯會的人。

在「鎮反」中，兩派衝突與武鬥幾乎同時展開。這時的武鬥，主要以毆打被捕的「現行反革命」和抄砸群眾組織的辦公處、聯絡站為特徵。

2月12日，革聯會召開成立大會，五十四軍派出300人參加大會。反革聯會一派到場造反，發生衝突。當晚，反革聯會一派到《重慶日報》社抄砸大會報道鉛版，發生衝突。

同日，反革聯會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駐渝聯絡站（駐重慶市政協）被革聯會一派抄砸。

2月13日，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抄砸了支持革聯會的首都三司駐渝紅色聯絡站（駐重慶市人民交通公司）。

2月14日，首都三司出版的《首都紅衛兵》報29期發表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的《打倒以重大八一五總團一些人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把重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文章。同日，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駐重慶大學分站、四川大學八二六駐渝聯絡站（駐市六中）等被革聯會一派抄砸……

---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十期，1967年2月25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三大右派組織」

從1967年2月下旬開始，「鎮反」掀起高潮，反革聯會一派的許多群眾組織相繼被五十四軍、革聯會或八一五派以「反對革聯會」、「破壞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反動組織」、「右派組織」、「非法組織」，勒令解散。大批群眾被逮捕、拘留、揪鬥或「勒令」自首、請罪。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工人造反軍的前哨支隊、六號門縱隊等被作為「反動組織」明令取締，其負責人及骨幹成員被召開公審大會逮捕並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新重慶報》作了重點報道。

在「鎮反」中，一些八一五派的群眾組織（如北碚區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行使了專政機關的職能。

因為當時八一五派按照五十四軍的意見，正在準備把前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曾經被重大八一五稱為「鎮壓八一五事件的劊子手」）拉進革聯會作為「結合幹部」，革聯會於2月27日召開了鬥爭前市委負責人魯大東的大會，安排辛易之在會上揭發、批判魯大東，作「火線亮相」，會上還喊出了「辛易之受蒙蔽無罪」的口號。此舉在造反派中引起極大反感，包括參加革聯會的一些八一五派組織都想不通。反革聯會一派則更是稱之為「拉郎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60年代初，中國大陸曾放映過一部香港喜劇電影《拉郎配》，講古代某皇帝要選未婚民女進宮做嬪妃，嚇得老百姓紛紛為女兒找男子突擊結婚，以致天下未婚男子紛紛被強拉成親，鬧出許多笑話……

3月4日，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出版了被鎮壓之前的最後一期《紅巖》報，報上刊登了一幅由該校美術系「劍與火」戰鬥隊畫的漫畫《拉「郎」配》，畫上是一個濃妝艷抹的醜女人（裙子上寫着「非法革聯委」）在硬拉一個戴眼鏡的老幹部要成親，老幹部（身旁寫着「××當權派」）嚇得直擺手表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示不幹，但他背後有一個人在幫着使勁推。畫的下方還配有一首打油詩：

「革聯女士」羞答答，拚命把「革命幹部」拉，「三結合」就差一個你呀，我們就是那個合法，哎喲喲，呀兒喲，我們就是合法……[1]

據說，後來在中央解決重慶問題的會議上，周恩來看到反革聯會一派代表交上去的這幅漫畫，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不過，在這幅漫畫剛發表的時候，反革聯會一派卻是笑不起來的。

就在那期《紅巖》報出版的三天之後，3月7日，北碚區駐軍宣佈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是「右派組織」，勒令解散。次日，革聯會所屬的北碚區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和新成立的西南師範學院春雷造反兵團等發佈聯合公告，宣佈接管西師一切黨、政、財、文大權。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被宣佈為「反動組織」，勒令解散。西師八三一負責人周榮等七人被北碚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以「現行反革命」罪名拘捕。

3月9日，五十四軍對後字二四二部隊（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實行戒嚴，宣佈取締該學院反革聯會的紅色造反者總團，先後拘捕其負責人及骨幹成員30多人，同時抓走駐該學院的其他反革聯會紅衛兵29人。

3月10日，革聯會建立的重慶交通學院聯合奪權指揮部發佈公告，宣告砸爛該學院反革聯會的九一五戰鬥團團部。交院九一五負責人八人被拘捕。

3月11日，以重大八一五為核心的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發出通告，宣佈開除反革聯會的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重慶交通學院九一五戰鬥團，並對參與反革聯會活動的重慶河運學校航鋒戰鬥團、十三中九八戰鬥團、四川美術學院紅色尖兵戰鬥團給予嚴重警告處分。

此後，後字二四二部隊紅總、西師八三一、交院九一五，就被八一五派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西師紅衛兵團、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主辦《紅巖》報第15期，1967年3月4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稱為「三大右派組織」。

曾經參與組建革聯會的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也站到了反革聯會立場上，宣佈退出了革聯會。2月下旬，重慶師專附中中學生紅衛兵、石油校八一五戰鬥團、紅巖二中紅衛兵團等造了中學生紅衛兵總部的反，成立了中學生紅衛兵紅色造反臨時聯合委員會（簡稱紅聯會），發出《緊急聯合聲明》，宣佈原中學生紅衛兵總部退出革聯會的所謂嚴正聲明對他們無效，並申請加入革聯會。重慶第一個全市性的造反派群眾組織、一度在重慶文革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就此解體。

國防工業系統繼八一兵團之後成立的另一造反組織軍工造反兵團，因為遭到八一兵團的排斥，在參加革聯會成立大會時被八一兵團撕毀旗幟，發生衝突，此後也站到了反革聯會立場上，在「鎮反」中整個組織被勒令解散，負責人和骨幹成員遭到批鬥和強迫請罪。

參與籌建革聯會的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反修兵團（簡稱反修兵團），是以合同工、臨時工為主的跨行業群眾組織，在「鎮反」中也被當作「大搞反革命經濟主義」的反動組織摧毀，大量人員被拘捕、批鬥……

這次「鎮反」，在一些單位的打擊面相當大。比如重慶市民政局所屬紅山茶場（又名九鍋箐農場），南桐礦區人武部及公檢法於3月2日發佈聯合公告，公開宣佈該場革命烈火造反團、民政兵團紅山分團、紅山八一五戰鬥團、造反軍六七一分團、二七戰鬥團「一二·四」分團等五個組織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同時逮捕這些組織的成員14人，拘留46人，勒令登記自首223人，另外還逮捕了不屬於這五個組織的人員4人，拘留查辦13人，登記自首8人，合計打擊308人。打擊面佔五個組織成員總數590人的50%以上，佔全場總人數的34.1%。[1]

1　《關於紅山茶場五個群眾組織被錯打成反革命組織的調查》，載重慶反到底公安紅一方面軍《公安反到底》第六期，1968年2月24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在「鎮反」中，打、砸、搶、抄、抓之風盛行。凡是被認定為「反革命組織」、「右派組織」、「非法組織」的群眾組織，均遭到抄砸。凡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均遭到批鬥、毆打、遊街示眾、強迫請罪……這一輪針對被打擊的群眾組織和個人的小型武鬥，為此後的大規模武鬥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從當時重慶市公安局市中區分局「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的一份「鎮反」簡報中可以看到這次「鎮反」造成的「紅色（或曰白色）恐怖」情況：「截至三月二十九日為止，經市局革委批准派出所明令宣佈取締的反動組織三個，被革命組織砸掉的八個。通過這段時期工作，共打擊處理了421人，其中逮捕53人，管制5人，勞改40人，戴帽4人，刑事拘留108 人，拘留審查211人。對犯罪分子進行了公開處理，召開了處理大會204次，參加會議人數達163292人，會上處理了296人，其中逮捕36人，管制3人，勞教17人，戴帽5人，刑事拘留81人，拘留審查154人。……群眾扭送到派出所的反壞分子66人，一般問題184人，有2322個群眾到派出所檢舉反壞分子，收到檢舉揭發材料4749件。通過打擊處理，階級敵人受到很大震懾，有的非法組織自動瓦解，有的組織主動到公安機關請罪，有的到派出所坦白交待。據統計，非法組織自行瓦解的有34個，主動到公安機關請罪的18個，到派出所坦白交待問題的有692人。」[1]

「鎮反」抓了多少人

在這次「鎮反」中重慶抓了多少人，一直有不同說法。

1 重慶市公安局市中區分局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1967年3月30日鎮反簡報，載反到底公檢法指揮部、工總司財貿第一造反縱隊《全盤否定重慶二三月「鎮反運動」資料彙編》第一輯14頁，1967年10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據1967年4月「鎮反」遭到否定後革聯會調查研究小組所寫的《向山城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的匯報（修改稿）》中統計：全市「從2月下旬到4月上旬……逮捕歸案174人」，「三縣八區刑事拘留1200人，截至4月17日已釋放898人」。[1] 而市公安局「革委會」公佈的數字則是「拘捕了2200多名」[2]（多年後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採用的應該就是這個數字：「到3月底，全市共拘捕2253人」[3]）。

統計數字的不真實，在中國社會生活特別是當代政治運動中是一個常見的問題。反到底派後來在一個關於「二、三月鎮反運動」的材料中說：「據調查核實，南桐礦區一個大會，拘捕了180多人，但上報時，僅統計逮捕一人。綦江打通地區兩個大會拘捕了120人，上報時，只統計7人。市中區地區宣佈取締的『反動組織』有12個，但只統計上報3個。類似情況，在當時大抓大捕的混亂情況下，不是個別現象。」[4]

關於群眾組織的情況，在「鎮反」遭到否定後，革聯會調查研究小組《向山城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的匯報（修改稿）》中披露：文革中，「我市無產階級革命派組成了400多個革命組織，近200萬人，其中1000人以上的較大組織79個，屬於跨行業、跨地區的35個。」革聯會成立後，要求各組織實行「歸口大聯合」，「據對市屬506個單位的調查，截至3月底已實現大聯合的264個」，「正在準備大聯合的114個」，「暫時聯合不起來的128個」。在

1　重慶市革聯會調查研究小組《向山城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的匯報（修改稿）》，1967年4月17日。五機關革命造反縱隊翻印，1967年5月4日（油印件）。

2　反到底公檢法指揮部、工總司財貿第一造反縱隊《全盤否定重慶二三月「鎮反運動」資料彙編》第一輯12頁，1967年10月。

3　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132頁，1999年12月31日。

4　反到底公檢法指揮部、工總司財貿第一造反縱隊《全盤否定重慶二三月「鎮反運動」資料彙編》第一輯12頁，1967年10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鎮反」中，「從2月下旬到4月上旬，全市共取締反動組織24個，非法組織一個」。另據八一五派的重慶市公安局革委會統計，全市從2月24日到3月17日止，由公安局明令取締的「反動組織」36個，由群眾出面砸掉的82個，自行解散的146個。[1]

後來反到底派重慶公安紅一方面軍在《向山城革命群眾揭露重慶市二、三月「鎮反運動」的情況》中有另一個數字：「在『鎮反』運動中，據不完全統計，全市被取締和整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共762個（分佈在400多個基層單位，大多數是工廠的）。」重慶市綦江縣「全縣一百幾十個造反組織幾乎被全部整垮。另一方面，卻扶植了107個已經垮台的保守組織」。[2]

不過，反革聯會一派的部分群眾組織在「鎮反」中被壓垮，並不等於群眾組織數量的減少。因為，當時已經形成各級黨政領導機關被全面奪權的形勢，除軍事管制以外的各部門各單位，基本上都由群眾組織控制局面並主持日常生產、工作。任何一個單位，當其造反派組織被壓垮後，必有另一個得到軍隊或革聯會扶持的群眾組織出來取代其地位。比如，在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被壓垮後，取代它的有革聯會支持的春雷造反兵團；在後字二四二部隊（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紅總」（紅色造反者總團）被壓垮後，取代它的有革聯會支持的「文籌」（文革籌備委員會）；在綦江縣松藻礦區工人造反軍打通戰鬥團於3月2日被壓垮後，取代它的是革聯會扶植起來並以當天日期命名的「三二戰鬥團」；在重慶燈泡廠八二八戰鬥團於3月13日被作為「反動組織」取締後，取代它的是革聯會扶植起來並以當天日期命名的三一三戰鬥團；在重慶市文聯，當羅廣斌被八一五派抓走並在關押地自殺身亡，楊益言逃往北京告狀後，以羅、楊為首的紅衛兵戰鬥組和文聯文革小組被壓垮，而由工農兵

1 《重慶二、三月「鎮反運動」大事記》，載重慶反到底公安紅一方面軍《公安反到底》八、九期合刊，1968年3月20日出版。

2 《公安反到底》第七期，1968年2月26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文藝兵團（以一些工廠、機關的業餘文學作者和業餘文藝活動骨幹為主組成，全稱為四川省工農兵業餘文藝革命造反兵團重慶團）進駐文聯再次奪權（向以羅、楊為代表的造反派奪權），革聯會和重大八一五還在文聯機關扶植起另一個堅決反對羅、楊造反派的尖兵戰鬥組。

因此，儘管在「鎮反」中有相當一批群眾組織被壓垮，但群眾組織特別是基層單位中的群眾組織，數量並未減少，某些地方甚至還有所增加。

真正減少了數量的，是一些跨行業跨地區的較大組織。2月27日，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小組公開報道貴陽棉紡廠按行政系統搞聯合的經驗，[1] 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有關報道及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好形式》，向全國推廣貴陽棉紡廠自下而上地按車間、部門實現「歸口大聯合」的經驗。3月16日，重慶紡織系統八一五派組織率先仿效，「歸口」成立「重慶紡織兵團」。與此同時，一些跨行業組織在「歸口大聯合」的形勢下宣告撤銷，回本單位參加「歸口」。3月20日，重慶革聯會發出關於按單位、按部門實行「歸口大聯合」的通知……

在此期間，群眾組織的小報也大多停辦。3月14日，八一五派聯合創辦的《山城戰報》創刊號出版，並在《告讀者》中稱：因重慶目前各革命群眾組織小報太多，已給印刷工作和紙張供應造成困難，為保證毛主席著作的正常印刷和響應毛主席「要節約鬧革命」的偉大號召，自即日起各革命群眾組織小報除《山城紅衛兵》外一律停辦，並聯合創辦《山城戰報》。從3月22日出版的第三期起，《山城戰報》改為由重慶市「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革聯會宣傳委員會主辦——從群眾組織小報變成了「官辦」小報。

這時，經毛澤東批准發出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也使這一「規範」群眾組織的形勢得以發展。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44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3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大專院校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草案）》，其中稱：「下廠下鄉和在外地串聯（包括參加外單位奪權的和設在外地的聯絡站）的革命師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參加本校文化大革命。」

3月10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軍隊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等支左、支農、工業問題的通知》，要求這些單位的群眾組織「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聯，也不要同本地區外單位或地方組織搞串聯。所有外出人員一律返回，地區性的和幾個單位組成的聯絡站，一律撤銷。地方群眾組織，也不能到軍隊串聯」。

3月1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廣播車停止上街廣播的通知》。

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1]……

這些文件，全都傳達出一個明確的信息：文革走向收尾，造反運動結束。生活似乎就要回到過去的「正軌」，革聯會通知各街道打掃衛生，洗刷大字報專欄。許多人都認為：運動就要結束了……

炮轟革聯會

但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從4月初掀起的「反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風暴，扭轉了這個試圖「規範」群眾組織，使運動走上「正軌」的形勢。

各地愈演愈烈的「鎮反」，顯然已超出毛澤東最初的意圖，嚴重偏離了

1 以上中央文件當年均公開發佈，現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其「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已經在許多地方處於「收尾」狀態，面臨夭折的危險。毛澤東不得不調整了部署，並把前一階段的「鎮反」與所謂「二月逆流」聯繫起來，把責任算到了譚震林、葉劍英等人及各地「支左」部隊負責人的賬上。前一階段的一些造反派行動曾被認定為「反革命復辟逆流」，而這一次又反過來把打擊這些造反派的行動認定為「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雙方都是「復辟逆流」，真不知他們是在「復辟」什麼！

1967年3月24日，經毛澤東批准發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為被打成「反革命」並遭到開槍鎮壓的青海「八一八」公開平反。

4月1日，毛澤東批准發出《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即著名的中發〔67〕117號文件，明確宣佈：

「不得隨意宣佈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宣佈一個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必須經過中央批准。」

「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僅僅因為衝軍區和對軍區提意見，或對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取消。」

「不准對群眾組織亂加取締，更不得採取解放初期對待反動黨團組織採取登記骨幹分子的辦法。」

「對於犯了一些錯誤，甚至嚴重錯誤的革命群眾組織或革命群眾，應採用整風的方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解決問題，不應該也不允許要群眾上街、掛牌子、貼大標語、開大會請罪。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強調群眾請罪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嚴禁假藉『鎮反』名義，鎮壓革命群眾。」

毛澤東還在審批這個文件時親筆加上了一段話：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許多外地學生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軍事機關一事，卻看得太嚴重了。」[1]

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將於次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表明了否定前一階段「鎮反運動」的明確態度。

就在這天，能得風氣之先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在他們出版的《東方紅》報22期發表由首都三司、一司、北地東方紅、清華井岡山等赴渝聯絡站和北大赴渝戰鬥隊聯合供稿的《妖霧瀰漫嘉陵江，黑雲滾滾壓山城——一向中央文革、首都人民匯報重慶的資本主義復辟》，稱八一五派奪權是「和平過渡」、「改良主義」，革聯會是「反革命的三結合」，革聯會變本加厲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重慶籠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為了否定前一階段的「鎮反」，把群眾再次發動起來，毛澤東又一手導演了文革中的第二次大規模平反運動。前一次是為被工作組和黨委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這一次則是為被各地「支左」部隊和公安機關打成「反革命」並關進了監獄的群眾平反。前一次平反浪潮導致了各級黨委的癱瘓，這一次平反浪潮則導致了「砸爛公檢法」和「揪軍內一小撮」的野火燃遍全國……

在北京「春風」的吹拂下，4月3日，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恢復活動。這是被「鎮反」壓垮的反革聯會一派群眾組織開始恢復的重要信號。

反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是毛澤東和中央的號召，革聯會當然也積極響應。4月7日至8日。革聯會由副主任王紹川主持召開「炮轟大會」，歡迎各群眾組織炮轟革聯會的錯誤，聲討「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在會上，一些群眾組織指出了革聯會的若干「缺點和錯誤」，如強行結合辛易之等當權派；以「歸口大聯合」的名義撤銷一些老造反組織；籌建工代會時只講黨員、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05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學毛著積極分子等條件，結果讓工代會代表混進了50%的「工糾」；藉群眾組織整風之機打擊造反派；利用鎮反打擊造反派；不能正確對待革命小將（西師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

二輕兵團負責人夏祥貴在發言中尖銳提出：「革聯會是我們把它扶起來的，可是現在它卻成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工具，我們大家一道起來把它砸爛吧！」率先提出了「砸爛革聯會」的口號。夏祥貴的發言引起一陣混亂，當時正在為革聯會機關報《山城戰報》擔任主筆的重大學生周孜仁，正好有一則日記記錄了現場情況：

4月7日—4月8日。革聯會召開炮轟大會。各革命造反派組織紛紛上台發言，申訴（或者說是控訴吧）本單位資本主義復辟的情況。解放軍有很大的責任。當然，問題也是直接涉及到革聯會的。會上，展開了一場嚴重的鬥爭，血和淚的控訴激蕩着人們的思想和感情。二輕兵團的一個代表跳上台去，大聲說道：「同志們，革聯會是我們把它扶起來的，我們為它大喊大叫，為它鳴鑼開道，可是現在它卻成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工具，沒有為我們幹一件好事。我們不要它了！大家一道起來把它砸爛吧！」一席話，把同志們激怒了，大家在下面亂噓、起哄：「滾下去！」「滾下去！」師專唐宗明走上去：「同志們靜一靜，靜一靜，我說，革聯會是我們自己的，有錯誤，有缺點，我們炮轟它，幫助它改進，砸不是辦法……」外院余朝文衝上去：「同志們，剛才這個人發言是個大陰謀，我代表川外八二六表態，堅決砸爛革聯會！」全場大嘩，一群人衝上去，把余推開，迅速在話筒前排成長隊，要求發言。

「我代表二三〇七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發言，我們堅決支持革聯會，革聯會是我們自己的，革聯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我代表八一兵團表態，我們堅決支持革聯會，革聯不能砸，只能炮轟，只能支持，革聯會就是好……」「我說，我是二輕兵團的，剛才那個人不能代表二輕兵團，只能代表他自己，我們二輕兵團的廣大戰士堅決支持革聯會，革聯會就是好，好得很！……」發言，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一個比一個激昂。情緒，一個比一個衝動。會場上，掌聲雷動，口號起伏，支持派和砸派，在這個會場上迅速地分化、集結……[1]

最後，五十四軍參謀長耿志剛作了個表態性的發言，堅定地說：「我們警司支持革聯，革聯就是好，我們過去、現在、將來都要支持革聯會，堅決支持造反派和革命組織。」「我們支左沒支錯。」「鎮反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這次抓人主要是其本人歷史、社會關係有問題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問題的。」五十四軍政治部副主任、革聯會主任劉潤泉在總結發言中也說：「我們支持革聯，沒支持錯。革聯會有兩條，一是有30多萬人的群眾基礎，二是革聯會的左派力量佔絕對優勢。」[2]

不管軍隊幹部的話說得怎麼硬，這時，革聯會的下屬組織已經是一片混亂。

4月11日，重慶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召開形勢辯論大會。由司令部常委鄒雨林傳達了革聯會「炮轟大會」情況。一些文藝單位的群眾組織紛紛發言控訴本單位「老保翻天」、「整造反派」等「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指責文藝界司令部在「資本主義復辟逆流」中沒有站穩立場，沒有為基層受到打擊、壓制的群眾組織說話。市歌舞團的一位造反派代表在發言中乾脆提出：對革聯會，「如司令部表態要砸，我們就和司令部站在一起，否則就連司令部一起砸！」

會後，要求「砸爛革聯會」的群眾藝術館東方紅戰鬥隊等一批組織拉出隊伍，成立了重慶文藝界紅一方面軍，負責人是原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負責人中的鄒雨林、田惠珍及鄧重光（重慶市電影公司技術人員）。此後，文藝界紅一方面軍又與雜技團延安縱隊等組織聯合成立了文藝界延安兵團，成為重慶文藝界砸派（反到底派）的統一組織。

---

1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135—136頁。

2 何蜀整理《羅廣斌專案組筆記》，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迅速壯大的砸派

1967年4月初，以反對革聯會的重師附中紅衛兵、重慶三中六七戰鬥團、重慶六中紅衛兵、重慶一中紅衛兵和重大紅巖公社（6月1日擴大成立重大井岡山公社）為核心，成立了重慶井岡山紅衛兵，主要負責人徐光明（重大紅巖公社負責人，當時正在北京出席中央解決四川及重慶問題的會議，會議結束回重慶後被推舉為總部勤務組組長）、黃開全（重師附中高三學生，附中紅衛兵負責人）、蕭星岷（重慶一中高三學生，一中六七戰鬥團負責人，共青團員）、吳桂倫（女，重大電機系學生，共青團員）和劉福筠（女，重慶建工學院學生，建院井岡山負責人）。4月12日，由井岡山紅衛兵發起召開了一次主要由中學生和中專生組織5000多人參加的「反擊二月逆流，砸爛非法革聯會」大會，會後舉行了穿過城中心主要街道的大遊行。這是自「二月鎮反」以來在市中心舉行的第一次公開號召「砸爛革聯會」的大遊行，在市民中引起不小的震動。

4月13日，革聯會召開各造反組織群眾大會，對一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眾組織進行公開平反。

此後，被捕群眾陸續獲釋。反革聯會一派重新聚集隊伍，因其「砸爛革聯會」的一致立場而被稱作「砸派」（後於7月中旬改稱為反到底派）；革聯會一派仍稱「八一五派」。

4月中旬以後，「砸派」隊伍有如「春風吹又生」的野草一般迅速壯大。

4月15日，重慶市教職工井岡山兵團成立。

4月19日，中共重慶市委機關井岡山兵團成立。

4月20日，重慶市總工會井岡山戰鬥隊成立。

原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解體後，一些骨幹成員重組了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九一」是一年前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成立的日子），主要負責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人劉先裕（原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負責人）、王木全（第九中學學生）等。

原八一五派中一些群眾組織分化出來，投向砸派一方，如西南政法學院政法兵團、西南農學院八二六戰鬥團、四川外語學院八二六戰鬥團等，幾乎是「成建制」地轉到砸派一方（有少數人拉出隊伍另打旗號留在八一五派中，如西南政法學院緊跟毛主席戰鬥團、西農八二六星火燎原縱隊、川外八二六星火燎原縱隊）。

一些原來只有八一五派組織的學校，如第六中學、第二十九中學等，又分化出了加入砸派的紅一方面軍，各中學的紅一方面軍還組成了紅一方面軍司令部。

當時因為毛澤東選定林彪為接班人，林彪被宣傳為對毛澤東最忠實、最緊跟的「光輝榜樣」，所以一些從原八一五派組織中「殺出來」參加砸革聯會的人們，紛紛打出了林彪領導過的「紅一方面軍」的旗號，如電力系統紅色造反兵團紅一方面軍、省汽車公司汽車兵團紅一方面軍、省輪船造反兵團紅一方面軍、印刷工人紅一方面軍、衛生系統紅一方面軍、園林紅一方面軍、市公安局紅一方面軍、市檢察院紅一方面軍等等，甚至在市級機關中最早成立的造反組織市經委紅色造反團中也分化出了一支紅一方面軍。

4月18日，老紅軍、老幹部胡倫（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郝振乙（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關明臣（重慶市財政局副局長）等13人發表聯合聲明，宣佈支持「砸爛革聯會」。

革聯會機關報《新重慶報》中的九一四縱隊於4月26日宣佈加入「砸爛革聯會」行列，主要負責人有沈世鳴（女，原《重慶日報》編委、報道組組長，中共黨員）、張懷真（原《重慶日報》工業部編輯）。

財貿八一五戰鬥團中分化出來的紅一方面軍八個兵團，與財貿九二一戰鬥團共同組成了財貿井岡山總部，主要負責人有甘廷榮（財貿九二一負責人）、汪永強（財貿九二一負責人）、劉煥中（財貿九二一負責人）、黃齊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財貿職工俱樂部工作人員）、吳憲堯（重慶市財稅局幹部）、沈旭容（女，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市分行幹部，22歲，共青團員）、雷光榮（紅衛食品廠機修工，五好工人，28歲）等。

原來幾乎是八一五派八一兵團「一統天下」的重慶國防工業系統，也在「鎮反」中被壓垮的軍工造反兵團的基礎上，聯合從八一兵團中分化出來的人員，組織起了砸派最大最強的工人群眾組織軍工井岡山總部（5月21日成立）。主要負責人有李木森（江陵機器廠助理技術員，28歲，共青團員）、鄧長春（望江機器廠工人，21歲，共青團員）、周應古（建設機床廠工人，26歲）、李桂芝（女，長安機器廠工人）、劉錫邦（長江電工廠助理技術員）等。

甚至一些人數極少的小單位也發生了分化。只有十多個美術家的中國美術家協會四川分會（當時在重慶化龍橋），原有其加達瓦領導的八一五革命造反隊和吳強年領導的長征造反隊，都是支持革聯會的，這時也分化出了反對革聯會的井岡山戰鬥隊（徐匡、阿鴿二人）和東方紅戰鬥隊。

原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是全市性的跨行業大組織。在革聯會建立後，因革聯會按照中央號召要求撤銷跨行業組織，實行歸口大聯合，二七戰鬥團總部產生意見分歧，支持革聯會決定的人員以王庭學為首成立了二七歸口辦公室。1967年4月，因原二七戰鬥團總部以劉祖國為首堅決站到砸革聯會一邊，二七歸口辦公室為了捍衛革聯會，就乾脆改名為二七戰鬥團總指揮部，與原總部對抗。

4月27日，砸派西南政法學院政法兵團到重慶大學校內示威遊行，與重大八一五衝突。次日，政法兵團到革聯會大院（即原市委大院）內靜坐抗議，連續四天。

5月2日，八一五派組織人員欲將在革聯會大院內靜坐抗議的砸派強行驅逐，砸派聞訊後組織人馬前來營救，兩派發生武鬥。

這相當於重慶兩大派武鬥的一次「熱身」。這時還只是武鬥的「初級階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段」，雙方都還比較「文明」，抓扯扭打中受傷者雖然據說有上百人（包括幾位前來制止武鬥的解放軍戰士），但傷情都不重，倒霉的是那些遭到打砸破壞的公物。

「紅五條」引發更大衝突

1967年4月初至5月中旬，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解決四川、重慶問題的一系列會議。與會中央領導人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為主，先以解決四川省宜賓地區的問題為突破口，給文革前被李井泉處分過的原宜賓地區幹部劉結挺、張西挺夫婦及其追隨者們平反，以此作為打擊李井泉的重大理由，然後解決四川問題，主要是解決四川「二、三月鎮反」造成的問題。

重慶造反派中的反革聯會一派，因為在「二、三月鎮反」中遭到了鎮壓，所以獲准派出十名代表參加會議。據部分當事者回憶，這些代表是：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楊向東，重慶大學紅巖公社徐光明，重慶工人造反軍總部朱鎮坤、黃廉，解放軍後字二四二部隊（後勤工程學院）紅色造反者總團張龍寶，重慶市財貿工人九二一戰鬥團劉煥中，重慶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劉先裕，重慶革命職工造反團羅光遠，重慶市文聯文革小組楊益言（小說《紅巖》作者之一），國營江陵機器廠軍工造反兵團蘇靜康。其中，張龍寶曾被重慶警備司令部逮捕，黃廉曾被革聯會專政委員會逮捕，徐光明曾被八一五派扭送公安局關押，楊益言則在逃離重慶上京告狀後遭到了革聯會一派的「通緝」。

5月6日，中央已經作出了解決四川問題的九條決定，基本精神是否定四川的「二、三月鎮反」，指責成都軍區打擊造反派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將原由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黨政領導授意組建的產業工人戰鬥軍等保守派組織定性為「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後操縱的保守組織」。

不料，當天在四川的省會成都發生了震驚世人的流血衝突：已經得知中央對解決四川問題態度的造反派迫不及待向保守派發起攻擊，與大型國防企業一三二廠的產業工人戰鬥軍發生衝突，產業軍以「護廠」的名義取出槍支，對「衝擊國防工廠」的造反派開槍，造成死傷多人的流血慘案。當晚，消息傳到北京後，中央不得不為解決四川問題的決定加上了一條處理「五六」流血事件的意見，於是，解決四川問題的九條變成了十條。

5月7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與會代表，由陳伯達代表中央宣讀並講解了《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由王力將陳伯達的地方口音「翻譯」成普通話），這個被稱為「紅十條」的決定嚴厲申斥了原中共中央西南局領導人李井泉，稱：「以李井泉為首的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堅持執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職務，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撤銷李井泉的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

決定中批評了「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從2月下旬以來，支持了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後操縱的保守組織，把革命群眾組織『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川大八 二六戰鬥團』等，打成了反革命組織，大量逮捕革命群眾。他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變成了『鎮壓反革命運動』。」

決定中還傳達了一條新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在四川的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犯錯誤是難免的，只要認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他們改正也快。』」

「紅十條」將四川省的原黨政領導人全部排除，對新的領導班子作出任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命：「由新任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張國華[1]同志、司令員梁興初[2]同志和前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同志、前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同志，負責組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以張國華同志為組長，梁興初、劉結挺同志為副組長。」

在這次會上，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蕭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新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都講了話，最後周恩來在講話中說：

「重慶問題，作為專案，毛主席批示叫重慶的兩方，軍隊方面、地方的『八一五』，有兩種看法，對革聯會怎麼算，都找來了，單獨研究搞清楚，然

1　張國華：1914—1972年，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爆發時為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西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員。1967年初拉薩造反派認為張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毛澤東得報後批示：「林彪、恩來、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各同志：請你們研究一下，張國華、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壞人，一二日內擬電告我。發出表態，是為至盼！」2月12日，中央軍委覆電西藏軍區。24日，中央文革小組又覆電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等，稱中央軍委電報是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的，中央文革小組完全擁護。張國華是站在毛主席路線一邊的，儘管他工作上有缺點錯誤，但基本上是個好同志。5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任命張為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成都軍區第一政委。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主任。1969年4月被安排為中共九屆中央委員。後又安排為中央軍委委員。1971年8月任重建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1972年2月21日在成都病逝。

2　梁興初：1913—1985年，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爆發時為廣州軍區副司令員。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任命梁為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1969年4月被安排為中共九屆中央委員。1971年8月任重建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書記。同年九一三事件後被認定與林彪有關係。11月16日成都軍區黨委、中共四川省委聯合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開始批判梁與陳仁麒、謝家祥「集團」。隨後被隔離軟禁。1972年8月15日《四川省委、成都軍區黨委擴大會議總結提綱（修改稿）》稱四川批林的阻力來自梁興初、陳仁麒、謝家祥路線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惡果，梁、陳、謝上了林彪的賊船，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8月16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同意後上報毛澤東，毛批示同意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出。1974年12月中央決定免去梁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副主任職務，下放太原化工廠「勞動鍛煉」並繼續接受審查。文革結束後1981年撤銷以上審查結論。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後作出決定。」[1]

「紅十條」的下達，特別是中央對「鎮反運動」的明確否定，使重慶的反革聯會一派歡欣鼓舞。因為五十四軍黨委的力爭，中央發現了重慶問題的特殊性（得到駐軍支持、擁護「鎮反」的八一五派並非保守派），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重慶這個當時還屬於四川省轄市的大城市的問題，「作為專案」另行解決，重慶兩派各選派20名代表，與五十四軍領導人和個別原黨政領導幹部代表，以及新上任的四川省革籌小組，在周恩來領導下繼續開會。不過，這些所謂的群眾代表，也只在5月13日那天的會上有了一次發言機會，反革聯會一派只有六個代表發言，八一五派的更少，此後就是中央宣佈處理重慶問題的意見了。實際上，請來的這些所謂群眾代表只是走個假民主的過場。一切都已經由「無產階級司令部」及其新建的四川省革籌小組在「暗箱操作」中確定好了。因為這種「暗箱操作」，所以與會代表們很難提前得知中央的具體意見，以致八一五派代表在探知一些片言隻語後向重慶傳回了不可靠的「中央八條」及周恩來誇獎重大八一五代表周家喻是「高水平、高風格、高姿態」等虛假信息，成為笑柄，周家喻從此落下一個「周三高」的外號。砸派還為此畫過漫畫進行諷刺，將周家喻畫成一個很高的熱水瓶——「高水平（瓶）」，熱水瓶口是一個戴眼鏡的人頭。

5月16日凌晨，在人民大會堂西北廳，周恩來向出席解決重慶問題會議的全體代表宣讀並逐條講解了經毛澤東批准的《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時稱「紅五條」或「中央五條」）。

《意見》號召重慶造反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

1　《蕭華江青周恩來在宣讀〈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會上的講話》，1967年5月7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道路的當權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指向重慶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在軍隊內，在群眾中，對劉、鄧、李、任等人的罪惡進行充分的揭露和徹底的批判」，這個中央意見，正式將前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任白戈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將原重慶市黨、政領導蔑稱為「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使重慶市黨、政領導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作遭到實質性的全盤否定，鑄成了重慶市文化大革命中最大、影響最惡劣的冤案，進一步助長了「打倒一切」思潮的氾濫，加深了廣大市民的思想混亂，加劇了社會動亂。

意見既肯定重慶駐軍在「支左」中有成績，又承認他們「在處理持有不同意見的革命群眾組織的關係問題上，錯誤地支持了一方，壓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門錯捕革命群眾，把一批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要求「對被錯誤宣佈為『非法組織』或『反動組織』的革命群眾組織要平反，對錯捕的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要釋放，並恢復名譽」。

值得注意的是，意見對造反派兩大派矛盾的焦點革聯會採取了迴避態度，既未予以承認，又讓一直領導革聯會工作的重慶駐軍以更高級別的領導幹部出面領導新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五十四軍副政委藍亦農[1]、副軍長

1 藍亦農：文革爆發時為駐重慶的陸軍五十四軍副政委。1967年5月16日由中共中央任命為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1967年7月升任五十四軍政委。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主任。年底因部隊換防調離重慶，後任昆明軍區副政委、昆明市革委會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被安排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10月被中央任命為中共貴州省革委會核心小組代理組長、省軍區第一政委。1971年5月任重建的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主任。同年九一三事件後，1972年9月15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轉發《貴州省地、師級領導幹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總結提綱》，稱藍亦農與貴州另一領導人「站在林彪反黨集團一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藍亦農同志的錯誤更嚴重」。1973年8月至1980年7月下放工廠學習、勞動。文革中所定罪名被推倒後，1983年5月至1985年6月任昆明軍區顧問。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白斌[1] 分別擔任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正、副組長）。

周恩來在講話中，對中央為什麼要迴避革聯會問題作了這樣一番解釋：

「在文件中避開革聯會，是不是和稀泥？不是的，如果涉及革聯會，爭論就沒有結果的，一月革命以來，奪權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可是必須要革命組織聯合起來，才能奪得好。重慶大聯合沒有聯合好，有一派同意，有一派反對。開始沒有意識到『三結合』，『三結合』是後來才發展的。革聯會吸收幾個人（過去負責的一些同志）也沒有在群眾中真正『亮相』，所以有爭論。條件還不成熟，但是，不能說這是資本主義復辟逆流，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搖身一變。尤其體現革聯會是野戰軍領導的。解放軍是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奪權後有了權對另一派壓制，形成對立，形成二、三月的緊張。說革聯會對了，但條件不成熟；說不對，那時又做什麼？……如果爭論下去，就是吵架，如果再這樣吵下去，三天三夜都吵不完。我們應向前看，在四川作出表率，就是由軍隊領導人出面組織臨時籌備小組，向前進，促進其聯合，把爭論停止下來，再要爭論就會不能前進，影響生產任務，廣大勞動人民是不同意的。」[2]

周恩來的這番解釋實際上是無法說服人的，因為他那「不爭論」的說法，是與當時所反覆強調的「不拿原則做交易」、「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等時代主旋律相背離的。

在這次接見結束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重大八一五的負責人吳慶舉突然向周恩來報告：「總理，今天發生了一件嚴重違背十六條的事件，今天下午首都紅代會在火車站搶去了我們八箱揭發批判李井泉的材料，每集四冊，

1　白斌：1921—1990年，文革爆發時為駐重慶的陸軍第五十四軍副軍長。1967年5月16日由中共中央任命為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8月調離重慶，先後調任國防科委第21基地司令員、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等。

2　《周恩來、康生第二次接見重慶代表講話記錄》，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2002年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共15000冊，還有羅廣斌的材料。這些材料被他們污蔑為『黑材料』。請看這是他們搶走材料的聲明。」

周恩來沒有當場對此事表態，但他的態度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他把吳慶舉交給他的首都紅代會搶材料的聲明隨手遞給身邊的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說：「紅代會搶去的材料，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副總理解決。」然後便指揮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結束了會議。

針鋒相對的兩派大遊行

周恩來說，如果在革聯會問題上爭論下去，就會繼續吵架，「三天三夜都吵不完」，因此要求不爭論。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

「無產階級司令部」在革聯會問題上的「和稀泥」，不但未能解決矛盾，反而把矛盾推給了民眾去自行解決。這就不是什麼「三天三夜吵不完」的問題了。

1967年5月16日深夜，「紅五條」的內容傳到重慶，重慶馬上出現了戲劇性的熱鬧場面——

5月17日，砸派在市內舉行擁護「紅五條」和「歡呼革聯會壽終正寢」的盛大集會遊行。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大門外紮起了兩座巨大的紙糊「革聯會之墓」，旁邊插着祭幛、招魂幡之類玩藝兒。在歡天喜地的遊行隊伍中，有一支引人注目的「哭喪隊」，假裝呼天搶地舞着手帕抹那並不存在的眼淚。遊行隊伍旁邊，還奔跑着一些頑童，用竹竿挑着不知從哪裡捉來的癩蛤蟆（川語俗稱「癩格寶」），快活地喊着砸派的諷刺性口號「革聯會，就是好，革聯是個癩格寶」……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5月18日，八一五派針鋒相對地在市內舉行「誓死保衛革聯會」的示威遊行，對「紅五條」未承認革聯會公開表示不滿和抗議。最為引人注目的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隊伍，由一群滿臉殺氣、手握銅頭皮帶的體工隊學生簇擁着一面巨幅標語牌，上面大書「強烈要求張國華、梁興初到重慶答疑」[1]……

這兩天的大遊行，實際上成為兩大派在展開全面內戰前夕對各自力量的一次大展示、大檢閱。

5月19日出版的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八一五戰報》第21期，頭版發表了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對目前時局的嚴正立場》，其中，隻字不提中央解決重慶問題的「紅五條」，卻強硬地提出：

「堅決支持革聯會，誓死捍衛『一月革命』的偉大成果，『一月革命』萬歲！革聯會的革命精神萬歲！」

「山城八一五革命造反派必須聯合起來，徹底粉碎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勾結社會上的牛鬼蛇神，蒙蔽一批群眾，搞反奪權的大陰謀。我們的態度是：針鋒相對，寸權不讓，寸權必奪！」

「山城的砸派從『二月黑風』以來，就一直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你們必須改絃更張，懸崖勒馬，正視自己的錯誤，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全文以兩句口號結束：

「革聯會必勝！

砸派必敗！」

5月19日晚上，重大八一五總團負責人一齊到五十四軍軍部，質問軍部首長：「這五條能不能打包票，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的？」在場的軍部負責

1　「紅五條」是由張國華、梁興初和四川省革籌小組另外兩位成員劉結挺、張西挺一起向中央提出的草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人毫不含糊地回答：能打包票。[1]

5月20日，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副政委藍亦農、副軍長白斌，重慶軍分區司令員唐興盛，五十四軍副軍長韓懷志、參謀長耿志剛等，到重慶大學風雨操場，向正舉行辯論大會的八一五戰鬥團全體成員發表講話。

白斌講話中明確說：「革聯會不是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的產物」，「革聯會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中央的「五條」「字面上沒有革聯會，實質上是有革聯會的，因為我們是支左，我們支持的是革聯會一派，我們支持的是革聯會，我們要理解精神實質」。

藍亦農講話中說：「由革聯會過渡到籌備小組，是更上一層樓。」並以當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作戰中將繳獲印軍武器全部交還印軍一事，來說服八一五派要對砸派高姿態。[2]

在五十四軍領導人的苦口婆心勸說、開導下，八一五派終於認清形勢，改變了態度，明白了革聯會與革籌組只不過是像方糖與圓糖那樣外觀上的不同，「方糖甜，圓糖也甜，砸派有個鏟鏟權」（「鏟鏟」係川語，空白、一無所有之意），於5月21日——「紅五條」下達五天之後，舉行了遲到的擁護「紅五條」的集會遊行，並提出了「革聯開新宇，革籌更上一層樓」的自慰口號。

八一五派與砸派的「路線之爭」日益演變為利益之爭，兩大派在辯論、宣傳中從動口到動手，終於以「武器的批判」代替「精神的批判」，開始了逐步升級的大規模武鬥。

---

1 《駐軍首長在重大八一五形勢辯論會上的講話．藍副政委的講話》，載革聯委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師專紅衛兵總部、八一五戰鬥團主辦《八一五烽火》第14期，1967年6月4日出版。

2 《駐軍首長在重大八一五形勢辯論會上的講話》，載革聯委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師專紅衛兵總部、八一五戰鬥團主辦《八一五烽火》第14期，1967年6月4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六章

武鬥在制止中升級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從動拳頭到拚鋼釬

「無產階級司令部」想要避開革聯會問題，而重慶兩大派（加上支持八一五派的五十四軍）卻無法避開這個「原則性」的問題。重慶大武鬥，就從對革聯會是「捍衛」還是「砸爛」開始了。

八一五派堅持認為革聯會是「偉大的一月革命」的成果，必須堅決捍衛；

而砸派則堅持認為革聯會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工具」，必須堅決砸爛。

毛澤東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1] 兩派都認定自己堅持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方是「反動路線」、「反革命」、「資本主義復辟」，當然沒有調和的餘地，那就只有「壓倒」對方，只有打了。

1967年4月20日，鑒於「砸爛革聯會」呼聲日高，重慶師範專科學校八一五戰鬥團成立「誓死捍衛紅色政權指揮部」，在成立宣言中宣稱：山城的「鋼桿八一五戰士」「好容易在『一月革命』的東風中大聯合奪了黑市委的權，建立了山城嶄新的紅色政權『革聯會』，今天有人叫叫嚷嚷地要『砸爛』她，要吃掉她，我們一百個不答應！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毛主席說，『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我們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5月下旬，因「紅五條」未承認革聯會並決定另建革籌組，革聯會失去了「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的合法性，不便繼續存在，重慶市革聯會變成八一五派

1　此語錄出自毛澤東1957年為「反右派」運動起草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解放軍報》1967年1月15日作為「毛主席語錄」刊載。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的統一指揮機構，各區縣革聯會則紛紛更名為「捍衛紅色政權指揮部（或聯合總部）」（簡稱捍紅指揮部或捍紅總部），後成為八一五派指揮武鬥的專門機構。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當時反覆宣傳的毛澤東的這些教導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從5月下旬開始，重慶兩派之間的爭執就日益發展成為武鬥。這時的武鬥，主要還是在難分輸贏的辯論中砸對方的宣傳車、廣播站，不讓對方發表不同意見——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不許放毒」。

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全國各地都發生了大同小異的派性紛爭，武鬥已經遍及國中。5月22日，《人民日報》不得不專門發表社論《立即制止武鬥》，社論說：「近來，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一些群眾組織之間，出現一股武鬥的歪風。它干擾了鬥爭的大方向，妨礙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影響和破壞生產，破壞革命的秩序，破壞國家財產，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我們必須堅決煞住這股歪風。」社論對「無產階級革命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武鬥和「無產階級革命派」內部的武鬥都作了分析和批評，進行了苦口婆心的勸告，然而，社論又指出：「當前，正當全國億萬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展開大批判、大鬥爭的時候，出現這股武鬥歪風，決不是偶然的。」

怎麼不是偶然的呢？社論卻沒有解釋。看來，連「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喉舌都難以對這個問題作出解釋，各派群眾組織就只有自己去加以理解了。

因為「紅五條」號召「重慶市各革命組織應當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指向重慶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此後，為表達方便起見，重慶市革籌組和造反派都將李井泉、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簡稱為「李任死黨」。重慶的兩大派武鬥開始後，雙方都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認為是「李任死黨」在挑起武鬥，都認為對方是受「李任死黨」蒙蔽、操縱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工具」；而自己一方，則是在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進行英勇鬥爭。

於是，「立即制止武鬥」成了一句無法落實也無人理睬的空話。

當時還是武鬥的「初級階段」，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拳頭、棍棒、石塊、鋼釬、匕首等等「冷兵器」。當然也有新的「發明創造」，在重慶市中心繁華地帶解放碑周圍幾個廣播站之間的武鬥中，就曾有一種俗稱「大彈槍」的「新式武器」一度吸引了公眾的目光：

武鬥雙方在各自佔據的樓房頂層平台上（當時的樓房都不高，據說有一不成文的規定，樓房高度不得超過解放碑，因此最高的「大樓」也只有四五層），以翻倒過來的桌子腿為發射架，繃上一根長條橡皮筋，做成大彈弓，向對方彈射石塊或鵝卵石。看熱鬧的市民們經常站在馬路中間仰頭觀看兩邊樓房上的人們作發射表演，一旦石塊因彈射力不夠而中途掉了下來，看客們便會一哄而散四下奔逃……

這樣的武器，遊戲成份多於戰鬥作用，自然很快就退出了「歷史舞台」。

武鬥畢竟不是兒戲，人們很快就聞到了血腥味。

5月23日，兩派在石油技工學校武鬥。

5月24日凌晨，砸派河運學校航鋒戰鬥團與八一五派石油學校大慶公社武鬥，八一五派死一人……

隨着武鬥的擴大，鋼釬日益成為雙方拚搏的主要武器，而武鬥的陣式也越來越像古代的兩軍對壘。當時武鬥人員常用的鋼釬，多是用鋼管做成，因鋼管中空而輕便，一頭砸扁打磨成矛頭狀。後來有人為了提高「殺傷力」，在鋼管前頭裝上了三稜刺刀。使用者在舞弄鋼釬時可能很有點張飛、趙雲或林沖的感覺吧？當年一位中學生根據其親歷武鬥的見聞所寫的一部紀實文稿中，對這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種鋼釬戰作了如下記敘：

拚鋼釬講究人多勢眾，一排排人，清一色的勞保服勞保皮鞋，籐帽壓得矮矮的，有的還戴上大口罩，一人握一根鋼釬，在口哨聲中一起進一起退。文革中，到處都是高音喇叭，武鬥一開始，便放「騎兵進行曲」。也有的武鬥隊有自己的戰歌，武鬥時就放那戰歌來助威。河運校的戰歌是「水兵進行曲」，那旋律也很激昂的。這樣，在氣勢上便先勝一籌，表面上的威風，也足以嚇倒膽小的人。

隨着武鬥升級，鋼釬做得越來越長，有的竟達一丈餘。拚鋼釬的戰術技術也日益改進，漸趨完善。那年月，「全國學解放軍」，年輕人誰都會幾手拚刺刀的動作，誰都知道「二百米內硬功夫」、「刺刀見紅」等軍事術語。「突刺——刺！」「殺——！」「防左——刺！」「殺——！」「防右——刺！」「殺——！」各個學校的操場上，都可以見到演練的武鬥人員們。那時，軍校的學生教員也分成兩派，於是也就分到各個學校當軍事教官。教官耐心教，武鬥隊員又認真學，哪怕他烈日當頭，哪怕他滿頭大汗滿身濕透，也不喊苦不叫累。於是，戰鬥技術大長進，戰鬥力也逐日加強。

1967年五、六、七三個月，重慶到處都在進行鋼釬大戰，冒出許多武鬥之花，特別是幾所技校，很是了得。鋼技校的，一律白色勞保服，可能最威風。石油校的則戴清一色的鋁盔，可能最管用……[1]

重慶著名評書藝術家徐勍當時正被邀請到八一五派設於市中心群林市場（「破四舊」時改名為工農兵市場）的「痛打落水狗」廣播站主講《我所知道的羅廣斌》，幾十年後他回憶當年看到的鋼釬戰時說：

我在群林廣播站樓上親眼看到過兩派在解放碑周圍用鋼釬廝殺的情景，

1　李衡之《重慶武鬥瑣記》，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騎兵進行曲」的音樂一響，兩邊的武鬥人員端着鋼釬，慢慢接近，快逼近對方時，一陣吶喊衝上去，戳一槍就跑，也不管戳到對方沒有……[1]

假如當時有間諜衛星拍下了這種鋼釬戰的場面，一定會讓人恍然覺得時光倒流回到了中世紀，回到了《三國演義》或《水滸傳》的時代。

毛澤東稱讚五十四軍

眼看兩派衝突不斷加劇，武鬥已經在全市蔓延，五十四軍卻沒有及時採取切實的制止武鬥措施，而是於1967年5月26日致電成都軍區並報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匯報自己的工作成績。電報中說，近幾天，該軍領導人全力以赴，在重慶先後約見了工人組織、學生組織和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紅總等組織負責人，聽取批評意見，此外，通過接待來訪，對反對派群眾進行了工作，並同有些組織舉行了軍民聯歡會。通過這些工作和活動，消除了一些誤解，對立情緒有所緩和，思想感情較前有所接近，反對派表示擁護中央處理重慶問題的「五條」，願意接受市革籌領導，原則上同意實現兩派聯合，等等。[2]

電文中稱「反對派表示擁護中央處理重慶問題的『五條』」，這是一種很巧妙的「刀筆吏」手法，在文字中暗含了對反革聯會的砸派的貶抑之意，似乎反革聯會的砸派是通過五十四軍做工作才表示擁護中央處理重慶問題的「五

1 徐勍《口舌人生中的一段插曲》，載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華夏文摘增刊586期·文革博物館通訊419期》，2007年7月4日出版。

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57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條」的。實際上恰恰相反，八一五派才是經過五十四軍苦口婆心做工作，才從最初的憤慨、抵制轉變為「表示擁護」中央「五條」的。而且，在這樣的時候大談「對立情緒有所緩和」，豈不是自欺欺人，誰會相信？

「明察秋毫」的偉大領袖卻相信了，不但相信了，而且加以讚賞。5月27日，毛澤東將五十四軍有關重慶問題的電報批發給各軍區、各軍、各兵種，並以中央軍委名義批示：「五十四軍在重慶的工作做得不錯，可供你們參考。凡屬兩派革命群眾組織互相對立很嚴重的，只要進行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對於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反動組織，也要細緻地進行思想政治工作。」[1]

有了「最高指示」撐腰，五十四軍領導人當然認定自己「工作做得不錯」，是全國、全軍的樣板，就更加躊躇滿志了。

八一五派將這條「最新最高指示」大加宣傳，以此打擊認為五十四軍「拉一派打一派」的砸派。

然而砸派卻不以為然。他們認定五十四軍領導人是「山城趙永夫」[2]，執行的是「帶槍的劉鄧路線」，遲早會被揪出來，因此他們繼續對五十四軍展開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56頁。

2　趙永夫：文革爆發時為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1967年1月部隊奉命「支左」後任西寧地區駐軍聯合辦公室副組長。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決定支持青海「八一八紅衛隊」一派群眾組織，被「青海省軍區機關革命造反群眾司令部」（後改為指揮部）奪權，趙永夫以「顧問」名義成為指揮部乃至軍區的實際領導人。2月23日，趙永夫主持的青海省軍區宣佈「八一八紅衛隊」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趙親自指揮部隊強行進佔被八一八奪權的《青海日報》社，與佔據報社的八一八衝突，開槍打死打傷300餘人（其中群眾亡169人，傷178人；部隊亡4人，傷26人），逮捕、拘押萬餘人。3月24日經毛澤東批准發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中稱：「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205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決定「趙永夫隔離受審」。此決定發出後，全國許多地方造反派都掀起了在當地「支左」部隊中揪「趙永夫」的浪潮。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嘻笑怒罵的攻擊。

砸派的四川美術學院紅色尖兵團，當時畫有一幅著名的漫畫《拉一派打一派》，張貼在解放碑旁邊重慶美術公司一側十分醒目的高牆上。畫面上，一個面目猙獰的軍人正瞇着一隻眼在拉開一個彈弓——這彈弓是一個頭朝下倒立着的人，軍人手捏着的彈弓柄是那倒立人的腰，那倒立人嘴裡銜着一把滴血的匕首，手臂上戴着「八一兵團」袖章，那往上叉開的兩腿就是彈弓的支架……

中學生紅衛兵交出《遺書》

因砸派一致提出「砸爛革聯會」（或「砸爛偽革聯」），八一五派便以強硬的態度提出「誰要砸我革聯會，先交遺書和腦袋」。

然而，對於「毛澤東時代」的人來說，死，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當「反革命」）。

1967年5月28日，砸派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針對八一五派「先交遺書和腦袋」的口號，公開發表《遺書》，以大量模仿中共多年來反覆宣傳的那些革命先烈的豪言壯語，表示為「砸爛革聯會」不惜犧牲的決心。這份特殊的《遺書》中寫道：

「是七尺男兒生能捨己，作千秋雄鬼死不還家」，從我們跟着毛主席造反的第一天起，我們的腦袋就交出來了。我們把他交給了毛主席，交給了輝煌壯麗的革命事業，我們早就是提着腦袋跟毛主席幹革命！

……假若有一天，我們英勇地犧牲了，這封信，就是我們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戰士交給毛主席，交給祖國人民的遺書！我們，只有一個信念：用生命和鮮血保衛毛主席！我們只有一個要求：把我們的忠骸埋在紅巖的青松旁。我們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只有一句遺言：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戰士絕不給毛主席丟臉！

現在，是我們執行自己的誓言，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中央文革的時候了。面對刀山火海——我們，闖！身迎劊子手的屠刀——我們，上！！任你用刺刀剖開胸膛，掏出來的也只有一顆對黨和毛主席無限忠誠的丹心！[1]

《遺書》最後羅列的一串口號中，有一句很有時代特色：

「要毛澤東思想，寧可不要腦袋！」

從摘錄的這些《遺書》中文字，可以看出當時的青年學生們是何等的狂熱，甚至可以說是已經處於瘋狂、癲狂狀態。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是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過早地結束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全市性的大規模武鬥，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在6月上旬日益蔓延開了。

6月1日，解放軍後字二四二部隊（後勤工程學院）兩派武鬥，武鬥中越南留學生被打。

同日，兩派在重慶發電廠、電力技工學校及楊家坪等地武鬥。

6月2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武鬥，傷數十人。

同日，兩派在重鋼和大型國防企業建設機床廠、嘉陵機器廠、江陵機器廠等地武鬥。

6月3日，重慶市第三中學（今南開中學）兩派武鬥，死一人。

……

1　重慶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西師紅衛兵團、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主辦《紅巖》第23期，1967年6月1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兩派大武鬥拉開序幕

1967年6月5日下午，位於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的兩派：八三一戰鬥縱隊與春雷造反兵團，爆發大規模武鬥衝突。

重慶文革中造反派兩大派的大規模武鬥衝突在北碚區爆發，是很難令人理解的事。

北碚，原是嘉陵江小三峽中觀音峽與溫塘峽之間的一個偏僻小鄉場，因其境內有堅硬的砂岩石樑伸入江心，這種石樑古稱「碚」，其地又位於重慶老城之北，故稱北碚。該區地處江北、巴縣、璧山、合川四縣交界之處。20世紀20年代後期，著名社會改革家盧作孚在此慘淡經營，開始他的鄉村建設試驗，短短五年間，在北碚就建立起了新的科學事業——中國西部科學院、峽區博物館，新的教育事業——兼善中學，新的工礦企業——三峽染織廠、天府煤礦公司和北川鐵路，新的衛生事業——地方醫院，還開闢了嘉陵江溫泉公園、平民公園、運河公園等公共園林休閒場所，創辦了《嘉陵江日報》。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經盧作孚的倡導，在北碚成立了嘉陵江鄉村建設實驗區區署，盧作孚之弟盧子英任區長。在盧氏兄弟的苦心經營下，這個小鄉場變成了中國鄉村建設的楷模，聞名遐邇的模範區、文化區，環境優雅的衛星城鎮。20世紀50年代初曾一度在此設北碚市，成為川東行署駐地。後川東行署撤銷，改屬重慶市。

這裡風景優美，民風純樸，市容整潔美觀，多年以來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其境內的北溫泉和「川東小峨眉」縉雲山，成為人們旅遊、度假的最好去處。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作家汪曾祺（當時還只是北京京劇團的編劇）因奉命參加改編京劇《紅巖》，曾隨劇組到過此地，他在一篇散文中回憶道：

我們在北溫泉住了十來天。住數帆樓。數帆樓是一個小賓館，房間不多，全樓住客就是我們幾個人。數帆樓廊子上一坐，真是安逸。樓外是竹叢，如張岱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所常說的：「人面一綠」。竹外即嘉陵江。那時嘉陵江還沒有污染，水是碧綠的。昔人詩云：「嘉陵江水女兒膚，比如春蓴碧不殊」，寫出了江水的感覺。[1]

然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改變了、顛覆了。「革命是暴動」。誰也想不到，重慶兩大派的大規模武鬥，竟會在這個戰爭年代也沒有發生過動亂或大的暴力事件的地方，在西南師範學院這樣的「高等學府」校園內率先爆發。

1967年6月5日下午，已經爭執、磨擦、對峙多日的西南師範學院兩派開始大打出手。西師八三一用棍棒、鋼釬進攻佔據着新建的圖書館大樓的春雷造反兵團。春雷造反兵團憑藉早已修築好的工事，居高臨下，用石頭、石灰、棍棒、鋼釬進行還擊，進攻一方久攻不克，守衛一方難以解圍，雙方都有許多人受傷。雙方都向外發出告急聲明、呼籲……

消息傳開後，市內兩大派均派人前往增援，由此揭開了重慶造反派兩派大規模武鬥的序幕。這次大規模武鬥持續到6月8日結束，時稱「六五—六八」事件。

當時住在西師校內的吳宓教授，在日記中記載了他聽家務女工唐昌敏講的和他親眼見到的一些情況——

6月5日：「晚，聞唐昌敏報告：今日八三一進攻春雷總部（居高臨下之新圖書館），大敗，傷多人；校大門及校後門均嚴閉，禁人出入，為阻春雷之外援衝進校內，云云。」「晚間八三一廣播不斷。8—9時，忽來怪聲巨響，類抗戰時期之空襲警報鳴笛，而更粗厲，聞之心跳、欲嘔，且若暈眩……」[2]

6月6日：「夜1時醒一次，晨5：30起，皆聞八三一號召『戰鬥』之廣播

1　汪曾祺《四川雜憶》，《草花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5—6頁。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47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不斷。」「宓得悉春雷總部即新圖書館，其三樓四樓仍為春雷堅守，而一樓二樓則早為八三一軍攻佔，其外則為春雷軍包圍一圈，更遠則兩軍各據一半，分疆對峙。昨日下午4時攻守大戰開始，八三一大舉仰攻新圖書館（山上之碉堡），激戰大敗，蓋由三樓四樓之春雷軍由窗口抬擲巨石下擊，八三一死一人，傷百餘人。劇戰終夜，春雷軍之死傷亦相等。入夜，八三一佈哨守全院圍牆，並嚴閉大小校門，只納外來之八三一援軍。然八一五等來援春雷軍者大量衝入校內（晚8—9宓所聞之怪聲，即是八三一軍毀壞春雷援軍自外來者之汽車，或拆卸車輪，或鑿壞汽車之橡皮輪胎，放出其中之壓縮空氣，致有大聲耳）。總之，雙方之外來援兵大集，終夜混戰，死傷甚眾；迄今仍分疆（雙方駐守區，皆戒嚴，斷絕交通，禁止行人來往）對戰（援春雷之八一兵團兵皆荷槍實彈，餘軍皆用磚石、棍棒、鋤與鐵器、刀劍、硫磺熏燃及水龍、彈弓等，互擊相鬥），勝負未分。」「9時散歸。……（途見許多男女兒童搬運碎磚、小石，供兩軍作戰投擊之用）。」「上下午，各聞如昨晚之怪聲巨響三四次，惟在白晝，可望見舍前游泳池之南（文化村二舍與六舍之間）廣場中黑煙大起，捲升天空如柱，怪聲巨響即發自該處（以目可望見，故不覺其可怖）。夕聞唐昌敏言，始知有救火隊之救火車一輛來此，由水管吸收游泳池之水入車，其時即發出此怪聲巨響；救火車然後開往新圖書館，復由水管射出水至新圖書館三樓四樓，俾其內之春雷軍可用該水下淹困居於一樓二樓之八三一軍云。聞此救火車後為八三一之友軍砸毀其機器；又聞小校門已被自外衝破，門已壞頹，今人盡可出入，不復能防守矣。」[1]

6月7日：「聞唐昌敏言：……（3）大小校門已摧毀，故今日出入無阻。（4）校內電話線已割斷；自昨晚起，不復聞八三一之廣播矣。……（6）八三一今勢蹙，故凡家中有大人或子女為八三一隊員者，其家今皆慄慄危懼，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47—149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恐春雷及其友軍來抄家、捕人；吾鄰左右數家，已將重要衣物送至校外藏匿，且送幼孩至鄉間暫住云云。」[1]

6月8日：「上午7：30後，宓出，擬往三教樓或菜圃上班，乃正值多人，各持木棍（如鋤柄），由六舍、一舍後山、川外語學院三路奔來，向幼兒園沿延安路東趨，似將有大戰……宓乃退歸。」「近9時，持大棍之春雷軍（本校學生）來，排列於本舍（一舍）前，游泳池周圍及馬路上則云是八一五軍。遠處呼聲大起，久久戰鬥。結果：盤踞新圖書館一樓、二樓內之八三一軍全被驅出；春雷與八一五軍遂進攻辦公大樓（八三一總部），命樓內非春雷人員願降者舉手走出，可免轟擊，目的在攻取全樓。」「成文輝來，言八三一援軍大至，並未失敗（辦公大樓之圍已解）；現兩軍勢均力敵，各據其總部為堡壘，對峙作戰，而於其間畫一斜直線＼，分校園為兩半，各得其半為轄境（宓舍在春雷境內）云。」[2]

吳宓日記中所記聽來的有關「死傷甚眾」、「八一兵團兵皆荷槍實彈」等只是以訛傳訛的不實傳聞，實際上這次武鬥並未死人也並未帶槍。不過他記錄的其他許多細節都是真實的。

重大八一五得知西師武鬥消息後，出動了武鬥人員前去增援。6月6日派去的一批人員，到現場後被制止武鬥的解放軍勸回。次日因西師春雷再次告急求援，重大八一五又出動200餘人，由總團負責人、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帶領前往。到現場後，重大體育隊學生組成「敢死隊」，一些人頭戴解放軍練刺殺用的護盔，身穿護甲，頂着門板、架着雲梯實行強攻。當年曾參與增援西師春雷的重大八一五《八一五戰報》主筆周孜仁，多年後回憶了他見到的現場情景：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50頁。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50—151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西師圖書館現場讓我大吃了一驚：完全一幅典型的原始部落械鬥圖。廢墟一樣的樓頂上站滿了手持棍棒的軀體。他們全光着身子，或者穿着破爛不堪的背心，裸露的臉部、肩膀、肚子、腿部和手臂均被熏得斑斑駁駁的漆黑。沒有頭盔保護，他們便把被子裡撕出的棉花裹在頭上，很像蠻山荒嶺間的印第安土人頭上插滿翎毛。廢墟間火煙繚繞，其味焦臭刺鼻。

……總攻開始，號手將衝鋒號吹得很淒厲，雲梯被長繩迅速拉上三樓，武鬥人員頓時潮水一般從四面八方向大樓湧撲過去，緣雲梯攀爬而上。多是些中學生。他們什麼裝備沒有，光着頭，也不穿勞保服什麼的，但勇如飛蝗，勢不可當，全不管石飛如雨，只顧悶着頭前赴後繼，奮勇爭先。有人被砸，有人落梯，或仰墜，或立撲，血流橫飛，喊聲震天，但無一退縮，那場面真的個驚心動魄。飛石是從二樓傾瀉下來的，如瀑如雨，颯啦啦擲地有聲。三、四樓的「春雷」為配合衝鋒登樓者，便奮力向二樓撒石灰扔石頭以為掩護。雲梯上雖有傷者墜落，但更多人已冒死上樓，爬進窗口接應早已疲憊不堪的「春麻兒」。[1]

這一事件發生後，又出現了與半年前「一二·四」事件後十分類似的情況：西師八三一宣稱自己一方死了人，並且在傳單、大字報、小報上大肆炒作，在西師八三一主辦、6月13日出版的《紅巖》報「六五—六八」慘案特刊上，不但有記敘事件經過的文章宣稱自己一方有人「犧牲」了，而且還煞有介事地發表了編輯部文章《踏着烈士的鮮血奮勇前進》和悼念「烈士」的悼詞。與「一二·四」事件後的情況一樣，激動一陣過後才發現「烈士」並不存在。

重大八一五的周孜仁回憶了此事對他的刺激：

事發第二天，重慶街頭卻出現驚人消息，說西師八三一在「六五血案」中

1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184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有「三百壯士」跳樓，其穆烈悲偉絲毫不讓於抗日戰爭著名的狼牙山五壯士。這一消息頓時把我打懵了。我承認，在我過去所寫文章裡，敘事不實者有之、誇張駭聽者有之，究其原因，最多不過道聽途說、派性偏見而已。在親歷了慘烈血火的切膚之痛，陡然發現輿論與真實竟如此天差地別，這卻是第一次。我記得非常清楚，就打那一刻開始，我的膽兒也突然間忒大了，我也讓哥兒們馬上寫出八一五的悲壯故事：在六五血案後緊接發生的「施家樑遭劫」中，八一五有「八百壯士投江!」……[1]

不過，對「烈士」的真假，當時的許多人似乎並未認真計較，因為從「一二·四」以來，這類事已經見得多了，見慣不驚了。人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六五—六八」事件引出的另外兩個轟動一時的戲劇性事件吸引過去了：

一是重大八一五負責人、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被砸派俘虜；

二是砸派與重慶駐軍發生了直接衝突。

熊代富被俘

西師「六五—六八」大武鬥，因重大八一五等組織的增援，終於將腹背受敵的西師八三一打敗。但為了防止遭到報復，八一五派迅速撤離了西師校園。

1967年6月8日，砸派的軍工井岡山總部調集大隊人馬，分乘數十輛大卡車浩浩蕩蕩開往北碚，支援西師八三一。到北碚後，得知武鬥已經結束，重大八一五

1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185—186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的武鬥人員剛剛離去，正在返校途中，軍工井岡山人員急忙掉轉車頭追擊，在離北碚城不遠的公路上一處名為施家樑的地方，將重大八一五車隊包圍，一番遭遇戰後，八一五派潰敗，大批人員被俘，特別讓砸派感到意外驚喜的是，重大八一五總團負責人、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也成了軍工井岡山的俘虜。

此役，反到底派稱為「施家樑大捷」，八一五派稱為「施家樑慘案」。

熊代富是重慶大學冶金系六九級學生，共青團支部書記，文革初期是校「文革籌」成員。參加造反後，因有當學生幹部和共青團幹部的經驗，在群眾組織中顯得比較「成熟」，被重大八一五總團派到市裡參加工作，後來就以「革命師生代表」的身份被安排為革聯會副主任。他是革聯會初期12名常委中唯一的「革命師生代表」。革聯會在「二、三月鎮反」中，對反革聯會一派進行了無情鎮壓，「種下的仇恨要發芽」。砸派起來「砸爛革聯會」時，熊代富自然就成為眾矢之的。

抓到了「偽革聯」副主任熊代富，砸派欣喜若狂。簡單審訊後，即將熊代富作為「武鬥頭頭」，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處理」，途中為防不測，除了綑綁看押之外，還將熊代富注射了麻醉劑，但在火車上被一個八一五派的乘警認出，到京後，得到情報的八一五派駐京人員便組織人馬將熊代富救走。此一戲劇性事件，當時成為重慶市民街談巷議的絕好材料。熊代富則因這一番遭遇而落下終生殘疾。據他的同學周孜仁回憶：

80年代末，我在深圳某公司就任經理，曾禮聘熊前來就任副經理。距那次被抓已過了20餘年，他那隻被綑過的手還傷痕纍纍，繩跡犖犖如新，整隻手已變形如鳥爪一般可怕。他告訴我說，被抓那天，先是被打得昏迷不醒，繼而被對方用鐵絲和繩索反綁起來扔進西南農學院暖棚的泥地裡，醒來已不知過了幾日幾夜。後來又被注射大量麻醉劑弄去北京，病癒後手便無法復原了。[1]

---

1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193—194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熊代富以後的經歷也頗富戲劇性。他被營救回來後，較長時間都在住院治療，幾乎脫離了文化大革命。但因為他的名氣和代表性，在1967年底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他仍被安排為校革委副主任。1968年6月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他又被安排擔任了副主任。1971年4月，他經過嚴格的組織手續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1973年7月，被安排擔任重建的共青團四川省委副書記。6月，被安排擔任重建的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在工作中，他與老幹部相處較為融洽，頗得信任。在「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都冷靜對待，沒有跟着一些前「造反戰友」重新造反，而始終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一些前造反派成員甚至罵他是「投降派」、「宋江」。因為他的這些表現，在1976年10月，也就是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後，他還被提拔擔任了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直到1987年，在「整黨」中，迫於鄧小平嚴令下「一刀切」似的「清理『三種人』」的形勢，這位原本可能有光輝前程的忠實於共產黨的年輕幹部，才被定為「造反起家、幹了壞事、情節嚴重的人」，開除中共黨籍並撤銷一切職務。以後他離職經營私營企業，幾經奮鬥，取得較大成功。

警司公函與軍工井岡山覆函

「六五—六八」事件後引發的另一事件，就更是轟動一時了。

軍工井岡山人員在北碚追擊八一五派時，在嘉陵江邊碰上一些軍人正要與八一五派人員一起乘船渡江返回天府煤礦。軍工井岡山人員認定這些軍人是來幫助八一五派武鬥的「兇手」，便抓走其中以偵察連長陳幹清為首的四人，押回軍工井岡山總部所在地重慶醫學院審問，想要得到五十四軍直接支持八一五派搞武鬥的「鋼鞭材料」。但四個軍人堅稱自己是去制止武鬥的，絕無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支持武鬥之事，特別是那位連長陳幹清更是毫不畏懼，與軍工井岡山負責人拍桌子爭吵辯論，最後軍工井岡山總部將三個士兵「教育釋放」了，將「態度惡劣」的陳幹清關押起來。

此事引起五十四軍的極大憤怒，憤怒之下便有失冷靜。1967年6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警備司令部以「（67）警司字第22號」文件的編號，以文革群眾組織一樣的口吻，向軍工井岡山發出了一份「史無前例」的公函，公函對陳幹清等被抓一事作了詳細描述：

6月9日8時左右，重慶炮校偵察營一連連長陳幹清率本連40餘名戰士，和警司派出的部隊（均係徒手）共同在西師執行調解武鬥任務後，乘軍車返回天府煤礦（歸警司統一擔任軍管），在北碚渡口候船時，軍工井岡山1000餘人，手拿木棍，頭戴安全帽，從北碚街上，吹着衝鋒號，朝渡口衝來，先打、抓群眾，後圍住我偵察營的軍車，不問青紅皂白將連長陳幹清、班長周長軍、戰士鄭克儉、劉家榮等四同志，從車上拉下來，拳打腳踢，搶走帽徽，強行抓走。14時左右，陳等被押至西農八二六，17時左右又押至軍工井岡山總部進行非法審訊，審訊前用木棒壓在肩上，鐵棒壓在頭上，逼着戰士承認「打死了人」，並說：「不老實，就打死你。」審訊中，均遭毒打。23時左右，班長周長軍等三同志被趕出門外。周長軍、鄭克儉重傷入院治療，劉家榮輕傷歸隊。連長陳幹清至今仍被扣押未放。[1]

公函十分嚴厲地說：「我們嚴正指出，軍工井岡山必須立即釋放連長陳幹清，並對這一事件進行賠禮道歉。」最後還警告說：「否則，如對我們的勸告置若罔聞，一切後果，由你們完全負責。」

公函最後還特地註明：「抄送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各革命群眾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27期，1967年6月18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組織」。這就顯然是有意將事態擴大了。八一五派的不少小報都如獲至寶地刊登了這個公函。

不料，軍工井岡山總部見到這個公函後，不但沒有釋放陳幹清，反而還立即於6月12日寫出了一個針鋒相對的覆函，並且滿城張貼。覆函以強硬的口氣指出：「你部於6月11日給軍工井岡山的公函已收悉。由專政機關給革命群眾組織發出如此『公函』的事例是罕見的，但又是預料得到的——你們的所言所行，早已對我軍工井岡山和其他真正革命造反組織發表過沒有行文的『公函』。」「十分明顯，企圖扼殺我軍工井岡山，進而鎮壓圍剿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把西師八三一、西農八二六、重醫兵團等革命組織再次打成『反革命』，為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開脫罪責，為其嘍囉向革命造反派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提供『理論』根據，從而實現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這就是『公函』的實質。」覆函還「警告炮製『公函』的指使者：不准你們打着紅旗反紅旗，不准你們藉實行通令之名，行鎮壓革命造反派之實！如果你們不懸崖勒馬改絃更張，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我軍工井岡山將與山城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奮起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堅決打倒之」。覆函最後還要求：「警司必須立即收回非法的、反毛澤東思想的『公函』，並在『公函』所及的範圍內公開消毒，否則必將自食其果！」[1]

這一戲劇性的衝突，使五十四軍領導人面子上十分難堪，同時又顯得非常被動——想不出應該採取怎樣的進一步行動。而軍工井岡山則以「不畏強權」的姿態贏得廣大民眾的欣賞，迅速崛起成為砸派中影響最大的群眾組織。

除去軍工井岡山的這個覆函外，在重慶街頭，當時還常可見到一些青年學生似乎是比賽誰更敢於「摸老虎屁股」、敢於向軍隊挑戰而寫出標語、大字報或傳單的，比如：

1　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赴蓉兵團主辦《紅巖》報成都版第一期，1967年6月28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7月3日，砸派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主辦的《九一縱隊》報第二期發表了《藍亦農、白斌回頭是岸》。

7月17日，解放軍後字二四二部隊「紅總」發表《敦促藍亦農、白斌二同志改正錯誤書》。

當時較為有名的，還有首都紅代會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赴渝人員以「北地東方紅警備司令部」名義發表的《關於砸爛重慶黑警司的嚴正聲明》及《敦促藍亦農、白斌投降書》，這個《敦促藍亦農、白斌投降書》全文模仿毛澤東在淮海戰役時起草的那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毛澤東原文開頭稱：「杜聿明將軍、邱清泉將軍、李彌將軍和邱李兩兵團諸位軍長師長團長」，而《敦促藍亦農、白斌投降書》則以戲謔的口氣改寫為「藍亦農校官、白斌校官和諸位師長團長營長連長」，接下來照樣是「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極盡挖苦嘲諷之能事。

更還有讓五十四軍領導人切齒痛恨的「反動標語」：「絞死匪首白斌」。

當時，任何一張大字報、一條標語或一句口號，只要是站在某一派立場上的，就都會被視為是該派的觀點，代表了該派的意見。這些狂熱的青年學生，有的只是一兩個人的一時興起甚至只是為了好玩，只圖一時痛快，不顧後果，以自己不負責任的言論，加深了砸派與五十四軍指戰員之間的感情裂痕，給砸派廣大群眾帶來嚴重的後患。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七章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全面內戰」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七七」槍聲

1967年7月7日，兩派武鬥打響了真正的「第一槍」——動用了小口徑步槍，而且打死了人。

當時，砸派的二輕兵團佔據着嘉陵江大橋南橋頭的二輕局大樓，控制了南橋頭交通要道。二輕兵團原是革聯會發起單位和成員單位，並在「一月奪權」中，得到五十四軍的支持，奪了重慶市第二輕工業局的權，後來因為在「鎮反」等問題上與五十四軍發生分歧（五十四軍要將二輕兵團總部的兩個骨幹成員作為「現行反革命」抓捕，遭到二輕兵團負責人夏祥貴拒絕），在4月「反對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中，二輕兵團退出革聯會，加入「砸爛革聯會」陣營並成為砸派的中堅。

7月7日這天，先是二輕兵團扼守南橋頭交通要道的哨卡與過路的八一五派發生了磨擦，攔截收繳了八一五派運送的印刷紙張。隨後，八一五派要求歸還紙張，雙方發生衝突，八一五派的新六中三二一一一戰鬥團和二七戰鬥團總指揮部等便從二輕局背後高坡上的人民小學向二輕兵團發起進攻。進攻者居高臨下，猛扔石塊、磚頭，二輕局辦公大樓的大玻璃窗被砸碎了，二輕兵團十幾個人受了傷，只能往辦公桌下面躲。他們打了幾次電話向警司告急，但解放軍遲遲不來制止武鬥。在危急情況下，二輕兵團動用了二輕局保衛科的小口徑步槍「自衛還擊」，進攻者被打死二人。

槍聲驚動了各方。起初遲遲不理睬二輕兵團告急電話的五十四軍，這時一下子開來了四輛「制止武鬥」宣傳車和一批全副武裝的士兵，把二輕局大樓團團包圍起來，要求交出「殺人兇手」。二輕兵團則認為自己是「自衛還擊有理」，拒絕交人。雙方就這樣僵持着，部隊把二輕兵團包圍了一天一夜。次日，在砸派其他組織的支持下，二輕兵團全部撤到江北。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當年一位旁觀者在日記中記下了他所見到的情景：

7月8日 昨日嘉陵江大橋二輕兵團與六中三二一一一發生武鬥開槍打人。據大字報死三人傷多人。其中一13歲小孩被刀戳死流血很多。今天我去那裡簡直是人山人海。警司四車戰士手持武器守住二輕。二輕戰士仍然端刀持矛，從屋頂到大門緊密放哨，並與警司廣播唱對台戲。午後忽從大橋兩頭相對開來全副武裝的卡車多輛，警司深怕又引起武鬥，立即前去制止。殊知此時二輕兵團全部人員即趁機執將武器、刀槍等衝出大門向大橋對面（江北方向）揚長而去。5時許，三二一一一和警司人員進駐二輕總部。經搜出地雷13枚。群眾惶恐不安亂竄奔逃。我亦逃至對門高處。

地雷經群眾過眼後即由警司戰士捧到車上開回警司。[1]

日記中所謂搜出的「地雷」，其實只是二輕兵團從二輕局下屬一個小廠買回準備在國慶節時用的禮花彈。而警司戰士這種將「地雷」讓群眾「過眼」的舉動，則明顯地表現出了藉機打擊砸派的鮮明立場。

兩派都要打「人民戰爭」

這時，兩派的輿論戰也提高了調門。

1967年7月1日，砸派重慶印刷工人、二十九中紅一方面軍、六中指揮部主辦的《小人物》報第三期發表《用人民戰爭制止武鬥》。

1 陳懋智《重慶武鬥日記（1967年6月18日—10月27日）》，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7月5日，八一五派西師春雷造反兵團《春雷》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打一場人民戰爭，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提出：「我們對敵人不能抱絲毫幻想，也不能單純依賴專政機關」，「我們必須奮起自衛」，「只有這樣，才足以制止反革命的武鬥歪風」，「只有用這種人民戰爭的方法，才能捍衛鬥爭大方向」，聲稱「七月血戰的戰鼓早已敲響」，號召「打一場漂漂亮亮的人民戰爭」。

7月13日，砸派軍工井岡山望江東方紅公社和重慶井岡山紅衛兵總部合辦的《井岡山》報發表長篇專論《人民戰爭救山城》，文中以江青6月3日講話提出的「對自衛的武鬥不能反對」為依據，提出：「我們必須拿起武器來，給予打人殺人的兇手以沉重的反擊！」「用革命的武裝力量和強大的政治攻勢來制止武鬥！」號召打一場「千千萬萬革命人民粉碎李任死黨反革命圍剿的自衛反擊的人民戰爭」。

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中、青年人，都在文革前閱讀或學習過一篇重要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那是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20週年而於1965年9月3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要求全國人民認真學習的重點文章，由國防部長林彪署名。文中通過對抗日戰爭勝利歷程的回顧，稱頌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稱「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經過中國革命的長期實踐的檢驗，證明是符合人民戰爭的客觀規律的，是無往而不勝的」。這些論點，以及文中引用的毛澤東語錄：「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也都早已為當時的中、青年人耳熟能詳，銘記在心，在文革武鬥中得到了「活學活用」。文化大革命不也是「革命」嗎？它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不也應該是「武裝奪取政權」和「戰爭解決問題」嗎？

雙方都號召打「人民戰爭」，都把自己一方視為「革命人民」，而把對方視為人民的敵人，都力圖通過「人民戰爭」以「武裝奪取政權」，靠「戰爭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解決問題」。

本來，重慶市革籌組和五十四軍，在制止武鬥中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然而，軍人也是人，也是生活於特定時代環境中的人，他們的思想、感情，也深受當時社會思潮、時代氣氛的影響，在「支左」工作中他們早已身不由己陷入派性不能自拔，因此，他們一方面確實也想、也在努力制止武鬥，而另一方面卻又有意無意地在縱容、助長武鬥的發展。

6月12日，重慶市革籌組正式辦公，與解放軍重慶警備區發出聯合通知，提出制止武鬥的八條禁令。然而，就在當天，市革籌組組長藍亦農、副組長白斌首先就到了八一五派控制的重慶醫學院兒科醫院，看望在西師大武鬥中受傷的八一五派傷員和八一五派兒科醫院九一五戰鬥團。

當時的四川省革籌組，特別是其中的劉結挺、張西挺夫婦和他們手下的許多辦事機構人員，則明顯偏袒和支持砸派。

1967年7月13日，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陪同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及貴州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到重慶視察（謝、王等次日即被周恩來緊急召去武漢）。在重慶視察期間，支持砸派的劉結挺在一次接見砸派代表的講話中提議：砸派這個名字不好，既然你們已建立了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可以叫反到底派，造反到底嘛。

從此，砸派以反到底派之名出現。

兩派都有各自的後台，都有各自的靠山，誰也別想壓服誰，卻又都想壓倒甚至壓垮對方。武鬥就只會規模越來越大地發展起來。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從「七二五」走向「全面內戰」

「七七」槍響後，形勢就更加不可收拾。「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樣的毛澤東思想，早已深入人心。長期的革命傳統教育、階級鬥爭教育、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類教育，使廣大青年一代對投入真刀真槍的戰鬥早已充滿渴望，早已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了。

毛澤東對武鬥的態度，顯然是對武鬥的發展和升級起決定性作用的。

1967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談話中說：「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廬山、贛州經過大武鬥，形勢大好，陣線也分明了。」[1]

好一個「經過大武鬥，形勢大好，陣線也分明了」！

另據王力回憶：「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說：『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主席還誇獎（武漢）鋼工總在水院修築工事好，還說自己要親自去看一看。」[2]

時任林彪辦公室秘書的張雲生把各地武鬥情況向林彪匯報時，「林彪似也牢騷滿腹。他自言自語：『文化大革命，變成武化大革命嘍！』」[3] 7月下旬，林彪聽到關於各地發生搶槍事件的匯報後，口述了給毛澤東的信，信中說到：當前的問題仍然是兩派對立，武鬥升級，特別是少數群眾組織搶奪部隊槍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發生，情況比較嚴重，因此急需採取一些嚴厲措施，否

---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91頁。

2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1012頁。

3 張雲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183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則……兩天後從上海帶來了毛澤東的親筆批示，說，對於群眾搶槍的事，不必看得過於嚴重。所謂群眾搶槍，有些地方實際上是部隊向他們所支持的一派發槍。因此，對此事的處理似可不急，待時機成熟後再去從容解決。[1]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此期間，「無產階級司令部」對7月20日發生在武漢的七二〇事件[2]的處理導致全國掀起「揪軍內一小撮」狂潮，7月22日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河南省一派群眾組織代表時，江青在講話中對「文攻武衛」[3]這

1 張雲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230—233頁。

2 七二〇事件：1967年7月20日發生在武漢的部分民眾和軍人公開抗議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的事件。此前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等激進的造反派在1967年「二、三月鎮反」中被武漢軍區打成「反革命」，組織被取締，骨幹遭抓捕，在從4月開始的全國「反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高潮中，各地均按中央要求陸續給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但武漢軍區仍遲遲不給工總平反。支持軍區的百萬雄師一派堅持認定工總是「牛鬼蛇神」，並對造反派發起武力打擊，武漢兩派武鬥迅速升級。7月14日，毛澤東、周恩來赴武漢就地解決問題，並將正在四川調查解決西南問題的中央代表團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召到武漢。7月18日，周恩來在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師級與二級部長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了由毛澤東確定的中央意見：武漢軍區要主動承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給工總平反，釋放被捕的工總負責人；工總等組織是左派，大聯合要以他們為核心；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復，這個工作中央幫助來做。周恩來還說明：我的意見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並規定暫時保密，先向部隊廣大幹部戰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會後，中央指示卻被省軍區獨立師領導人傳達下去。廣大指戰員與百萬雄師人員極為憤慨，把抗議矛頭對準了中央代表團成員中無軍職無實權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藉王力與謝富治到水利學院發表了支持造反派的講話為由，20日，獨立師官兵與百萬雄師人員發起了全市性公開抗議示威，一批軍人衝擊東湖賓館，圍攻謝富治和王力，並將王力綁架。這個行動直接威脅到了住在東湖賓館（對外嚴格保密）的毛澤東的安全。毛澤東被迫倉促撤離武漢飛往上海。此一事件遂被中央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武漢軍區領導被撤換，獨立師被解散並撤銷番號。文革結束後，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覆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漢軍區黨委的報告，為該事件平反。

3 文攻武衛：江青在1967年7月22日凌晨接見河南代表時的講話中說：「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議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這個口號經江青肯定後迅速傳遍全國，成為群眾組織間進行武鬥的理論依據。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一口號的公開肯定，以及中央一度準備「武裝左派」的考慮[1]以及在個別地方已經付諸行動的消息，都直接助長了武鬥的升級。

重慶的七二五事件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生了。

當時從重大八一五控制的沙坪壩區到市中區，有兩條公路，一條順着長江、嘉陵江兩江之間的山樑上，經小龍坎、石橋鋪、潘家坪、大坪、鵝嶺等地，另一條沿嘉陵江南岸岸坡，經土灣、紅巖村、化龍橋、李子壩等地。下面這條公路，路程較短，但在化龍橋路邊山坡上有反到底派的據點重慶工業學校。這個中專學校由該校紅巖兵團控制，以制高點的優勢扼守着交通要道，時常對過往的八一五派人員進行攔截搜查甚至毆打抓捕，成為八一五派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紛紛舉行表態性的集會遊行，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等「黨內、軍內一小撮」表示強烈抗議，歡呼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光榮回到北京。重慶駐軍與兩大派也都各自舉行了示威遊行。正在重慶視察的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劉結挺也參加了駐渝部隊舉行的聲討武漢七二〇事件大遊行。

7月24日，嘉陵機器廠八一兵團人員乘車路經化龍橋時，與工業校紅巖兵團發生武鬥衝突，嘉陵廠的車輛、人員被扣。下午5時，沙坪壩區八一五派聲討武漢七二〇事件大會後遊行路經化龍橋時，又與工業校紅巖兵團發生武鬥衝突。

連續發生的武鬥衝突，使八一五派下定了拔除這顆眼中釘肉中刺，打掉這隻攔路虎的決心。

---

1. 1967年8月25日由毛澤東批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中，就公開提出：「關於武裝革命群眾，必須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弄清情況，通過協商，報告中央批准，然後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7月25日凌晨3點，八一五派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多路人馬強攻工業學校，為確保此戰必勝，八一五派動用了通過各種途徑集中起來的槍支，拉開了槍戰的序幕。

工業校紅巖兵團完全沒有料到武鬥會驟然升級到槍戰，學校裡只有幾支小口徑步槍，還大多打不響。雖然佔據着制高點的優勢，但在強大的火力攻擊下，他們那些鋼釬、棍棒、石頭之類的「冷兵器」哪有抵擋之力？在八一五派的進攻中先後被打死九人（其中一人是外校幼兒師範學校的女生），另有一人被小口徑步槍子彈擊傷頭部，被八一五派俘虜後扔進一防空洞中，未得到及時救護而死。

在這個夏末一天的凌晨，從工業校周圍響起的密集的槍聲、爆炸聲和校內廣播喇叭中傳出的「強烈抗議」、「緊急呼籲」聲，驚醒了附近和嘉陵江對岸的居民。八一五派不辨工業校內的虛實，害怕中埋伏，未敢貿然衝進工業校，而是一直在開火，過足了槍癮，直到午後，斷定對方確實沒有抵抗之力，才衝進了校內。一些已經打紅了眼的武鬥隊員，衝進去後見人就開槍，一個紅巖兵團的學生就是在樓梯上被一個衝上來的八一五派武鬥隊員用一支信號槍迎面一槍打中面部而死的。被俘虜的反到底派人員，差不多都遭到了報復性的「放血」——用刺刀或匕首刺傷臀部、腿部或肩臂部。

這一次力量懸殊的武鬥中，八一五派卻也遭到了嚴重的損失：重大八一五的參戰人員竟被開槍打死兩人，一位是重大八一五的三〇一武鬥隊成員、採礦系三年級學生張全興，22歲；另一位是重大八一五的「戰地攝影師」、機械系三年級學生唐世軒，23歲。

這是重慶大學在武鬥中最早死難的兩個學生。

為了清查「開槍兇手」（自己這方開槍的自然不算兇手），同時也為了報復，八一五派佔領工業校後，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鬥隊將抓獲的反到底派俘虜200餘人押回重大關押，毒打審訊，其中一個交通民警被重大八一五懷疑最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有可能開槍（既是警察，一定比學生會用槍），遭到長時間關押，幾次差點被槍斃。

兩個重大學生是不是被反到底派人員開槍打死的，始終未能查清。據反到底派的親歷者回憶，工業校紅巖兵團當時只有六支小口徑步槍，其中只有一支能用，而且他們在八一五派的火力進攻開始後已經撤到裡面一幢樓上，距重大八一五兩位死難者的位置較遠，小口徑步槍的有效射程根本無法到達那裡。因此，有人認為，這兩個重大學生是被八一五派自己一方的亂槍打死的。

有這種可能嗎？

沒有親歷過文革武鬥的人，很難想像當時那種「史無前例」的「戰場」情形。湖南的一位文革親歷者陳益南，在紀念文化大革命爆發40週年時出版了一部長篇回憶錄《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其中，生動具體地記敘了他親歷的一次攻打湘潭市敵對派別「高司」派的武鬥。那次武鬥中發生的兩件事很有當時的「特色」。一件事是他們在一處山頭上與對面山上的「敵軍」對射時，自己一方有人扔手榴彈，因為毫無訓練又加上心慌膽怯而橫着扔到了他的面前，幸好沒有拉導火索，甚至連後蓋也沒有擰開，因而未造成後果。另一件事，則是他們在向「敵陣」衝鋒時自己人開槍打傷了自己人。書中寫道：

雙方對射了一陣，對方又退了。

我們這一方的人便又蜂擁而上，又是一陣陣漫山遍野地「衝啊！」喊叫聲。

我端着槍，衝到一個山坡腰上時，看見一個穿背心的青年撲躺在地上，大聲喚叫喊痛，兩個佩着「紅中會」紅衛兵袖章的女中學生蹲在他旁邊，正輕聲的安慰他。我停下一看，只見那個青年人背右側被打了個板栗那麼大的洞，鮮血從那個洞口直往外湧，一塊還連在背上的皮膚，隨着湧出的血流，緩緩地上下漂蕩着。

我問：「怎麼搞的？」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一個女學生答：「剛才衝鋒時打傷的！」

「衝鋒？」我有些納悶，這個人怎麼會背上受傷呢？衝鋒應該傷前胸呀！難道是後面人開槍打的？

我回頭一看，果然，我們在衝鋒，可後面山上仍有些人蹲在那兒開槍，恐怕還有機槍，因為，頭頂上「嗚嗚嗚」地不停地響着子彈嘯叫聲。[1]

在重大八一五周孜仁所寫回憶錄中，也記載了一位重大武鬥隊員給他講述的參加空壓廠武鬥時親見的混亂情況，當時重大武鬥人員奉命攻打空壓廠醫院和水塔一線：

我們是分三路上去的。正行進間，聽冶金系縱隊方向有人問：口令！不等回答，雙方就交了火。我們是由「紅農八一五」的人帶上去的，突然發現前面有對方工事，大家急忙臥倒，緊接着從後面響起了炮聲，炮彈呼呼地從我們頭上飛過去。撲下身子回望，發現是空壓廠的坦克在掩護我們進攻。對方工事很快被摧毀了，但我們還是不敢進攻，整個指揮一團糟，我們害怕坦克打了我們自己。一直等到坦克開走了，我們才向山頭衝上去。[2]

空壓廠那場武鬥發生在8月2日。而在那之前一週發生的第一次動用槍支武鬥的七二五事件，情況只會更加混亂。八一五派的武鬥隊伍是臨時由不同單位抽調集中起來的，又是第一次進行槍戰，用槍的人（除去少數復員、轉業軍人外）大多未經過正規訓練，拿到槍只想多打一陣過癮，對「戰場」的地形地物

1 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206—209頁。

2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228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也大多不熟悉，分屬不同組織的武鬥隊各自從正面公路上和側面山坡上的不同角度往工業校方向開火，而且沒有一個令行禁止、組織嚴密的指揮系統……在這樣的混亂情況下，發生自己人開槍誤傷自己人的意外，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不過，當時是不會（也無法）去進行冷靜、客觀的調查分析的，反正是在與對方交戰中被打死了人，罪責就一定得算到對方的賬上。

在8月2日出版的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八一五戰報》第34期上，發表了一組悼念張全興與唐世軒兩位「死難烈士」的文章，發表了兩位「烈士」的日記摘抄，在編者按中還破天荒地呼出：「張全興烈士萬歲！唐世軒烈士萬歲！」

頭版頭條的編輯部文章《踏着烈士的血跡前進》發出呼籲：

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敵人是不會放下屠刀，也不會立地成佛的！當敵人舉起大刀、長矛、槍支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不能祈禱，不能哀求，恰恰相反，我們必須武裝起來，照樣辦理，拿起大刀！拿起長矛！拿起槍支！拿起一切可以拿起的武器，自衛！自衛!!自衛!!!

第二版的通欄標題是：

以血還血，以命抵命。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武鬥發生的當天上午，張國華、劉結挺正在隔着一道山樑、相距不遠的五十四軍軍部給該軍領導人作指示，下午才乘飛機返回成都。從凌晨即開始的整個武鬥的消息，顯然被五十四軍嚴密封鎖了。也就是說，這次武鬥是在前來制止武鬥的省革籌主要負責人的眼皮底下發生的，而他們竟然都被瞞過了。五十四軍對這次武鬥的態度，不言而喻。

這樣的態度，怎麼可能真正制止武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反到底派打開軍火庫

「七二五」工業校武鬥發生時，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總部正在重慶醫學院召開會議，準備貫徹兩天前國防工業系統兩大派已經達成的《關於立即停止武鬥，抓革命促生產的協議》，討論如何上繳鋼釬、匕首之類的「兇器」。

會議進行中，突然得知工業校被八一五派動用槍支攻佔，與會人員大為震驚，整個會議議程立即改變。

軍工井岡山總部勤務組副組長鄧長春提議發槍自衛。勤務組成員經過一天多的激烈爭論，最後，除一票反對外，通過了向下屬成員發放軍工廠成品槍支的決定。

這是重慶武鬥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決定。

重慶在抗日戰爭時期就遷入和建立了一批兵工廠，在日本飛機不斷進行大轟炸的嚴酷形勢下，這些兵工廠的職工不怕犧牲，堅持生產，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文革前開始的「三線建設」中，又經中央批准開始建立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到1967年底，除個別項目外，重慶兵器工業基地的第一批項目基本建成。」[1] 生產槍、炮、坦克、彈藥的幾大軍工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廠、空氣壓縮機廠、江陵機器廠、嘉陵機器廠、長江電工廠等，都在市中區周邊，有的與市中區只與長江或嘉陵江一江之隔。在文革武鬥中，重慶這個常規兵器工業基地成了全面內戰的武器彈藥庫。這是重慶武鬥規模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7月27日至28日，重慶大型國防企業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

---

1 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303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廠等兩派爭相搶奪軍械庫和成品車間的武器彈藥，並向外擴散。空氣壓縮機廠八一五派將坦克開出廠，到楊家坪街上示威……

當時的形勢是，生產槍、炮和炮彈的工廠主要由反到底派控制，而八一五派主要控制了生產坦克和子彈的工廠。因此，在常規武器的使用上，反到底派佔了上風。重慶軍工廠生產的一些現代化武器，當時主要是用來支援越南「抗美救國」戰爭的，其中不少新式武器連解放軍的野戰軍都還沒有配備，就被用到了重慶大武鬥中。

對反到底派的武器優勢，當年重慶民間曾有過這樣的笑話：反到底派使用的現代化武器中，有用於海軍艦艇上的二管或四管連發高射機槍，民間俗稱「海二連」、「海四連」，有的老頭弄不清楚什麼「海二連」、「海四連」，在茶館裡聊天吹牛時，就想當然地吹噓說：毛主席支持反到底派，看到反到底派得不到重慶的軍隊支持，就派來了海軍二連人，後來看二連人力量不夠，又派來了海軍四連人……

為了扭轉不利局面，得到駐軍支持的八一五派，就開始從部隊手裡「搶」槍。這種「搶」，當時被稱為「明搶暗送」，即部隊並不加以有效的制止，有的甚至還會對來搶武器的人暗示武器的存放地點、通往路徑等等。這種現象，當時在全國各地都有，因此毛澤東和中央也都清楚。

7月28日，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鬥隊下午和晚上兩次搶奪沙坪壩區武裝部各類槍械、彈藥。搶奪武器之風迅速蔓延到全市各區縣，從這天到次日，市中區、沙坪壩區、江北區、九龍坡區、北碚區五個武裝部的民兵武器、社會槍支、公安武器均遭八一五派數次搶劫。

同時，重慶市公安局八一五派在局辦公大樓等處修建了武鬥工事，動用了公安業務用槍若干支及步話機……

重慶兩派武鬥從此進入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血戰楊家坪

楊家坪，在重慶市九龍坡區的北部，位於市中區與沙坪壩區之間的長江北岸，是岸坡上一片較為平緩的地區，所以叫「坪」。這裡有開通了無軌電車的兩（兩路口）楊公路與市中區相連。當時九龍坡區的黨政機關區委、區人委均設於長江南岸的李家沱，兩岸之間還沒有大橋相連，楊家坪尚未成為該區的政治中心，但卻是重慶市的重要工業區之一。這裡有大型國防企業建設機床廠、空氣壓縮機廠，有重慶發電廠、新華印刷廠，還有長江邊的九龍坡火車站、港口及貨場、倉庫，成為重慶重要的水陸貨運樞紐和倉儲區。文革大武鬥中，主要是因為這裡有生產槍支和坦克的建設機床廠和空氣壓縮機廠，便成為兩派爭奪的焦點。

1967年8月1日開始，兩派在楊家坪地區大規模武鬥。建設廠、二十中、三十五中、衛校及財貿等單位的八一五派敗退撤離。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派去制止武鬥和進行救護的人員遭到槍擊，死二人，傷十人。

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的武鬥十分慘烈，動用了坦克和輕重武器。該廠俱樂部被燒燬。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鬥隊為獲得該廠八一兵團提供的武器，派出人員參加該廠武鬥，在攻打該廠醫院和水塔一線時，三〇一武鬥隊縱隊長謝宗正和隊員張顯明、陳茂明等三人身亡，另一隊員董繼平因鋼盔被打掉，頭部中彈，重傷致殘。

這是武鬥以來重大學生傷亡最大的一次。

被傷亡激怒的八一五派於8月2日佔領全廠後，出於報復，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鬥隊將該廠被懷疑為「砸匪」的無辜群眾一人從家中抓出殺害。八一五派還將先後殺害的無辜群眾七人拖往石灰窯焚屍滅跡，途中發現有槍殺後未死者再補槍致死……

8月2日、3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的大規模武鬥進入白熱化階段。八一五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派佔據的制高點——謝家灣有名的弧形建築「彎彎大樓」（建設機床廠職工宿舍大樓），被反到底派用四連高射機槍平射擊中起火燒燬；反到底派在進攻該廠軍庫時，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負責人、紅一連指導員王木全（九中學生）等多人身亡。

因楊家坪建設、空壓廠地區武鬥炮火打斷電話線，從8月2日起，2字頭市內電話全部中斷通話。

8月4日，因受武鬥影響，八一五派控制的《新重慶報》、重慶市郵電局聯合發出啟事，稱因報紙用紙一時供應不上，《新重慶報》從明日起減少發行數量，只在本市地區供應部分零售報，訂戶一律暫停發送。直至9月底才重新開始收訂。

喋血楊柳街

就在全國許多地區都陷入「全面內戰」炮火中的時候，據王力回憶，1967年8月4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很重要的信。王力說：因為「林彪在此之前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前面說形勢很好，後面主題是奪槍問題很嚴重，必須發佈命令禁止奪槍。毛主席的信是針對這點說的，前面說同意形勢很好，這是套話，但他不同意後面林彪關於奪槍的話。毛主席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他分析說現在75%以上的軍分區幹部支持右派。」「更嚴重的是，主席8月4日的信對形勢的估計完全錯了。他認定75%以上的部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武裝左派。又說另一個主要問題是群眾專政。……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軍委擴大會上，江青拿出來傳閱的。」[1]

1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266、1012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毛澤東認為已在全國形成「全面內戰」局面的奪槍問題並不嚴重，而且還要進一步「武裝左派」。他這時所說的「左派」，指的就是造反派。

就在8月4日這天，在重慶市的中心區解放碑附近，中華路51號重慶市財貿職工俱樂部門前，發生了一起震驚市民的血案。

財貿職工俱樂部門前那段街道，舊名楊柳街。對這個街名的來歷，有個流傳甚廣的民間傳說，文革前還出版過相關的連環畫，因此重慶人大多知道。傳說講的是：明末張獻忠造反，他率領的農民軍攻入重慶城之前，在路上看到一個正往重慶城去的婦人，揹着一個小孩，牽着一個小孩，但揹着的小孩比牽着的小孩年齡要大。張獻忠感到奇怪，責問那婦人為什麼不揹年齡小的孩子卻揹大孩子。那婦人回答說，揹着的大孩子是她已經去世的哥哥留下的，牽着的小孩子是她自己的。張獻忠大為感動，就囑她到重慶城後，在家門前插上楊柳，可保平安。那婦人回到重慶城內家中後，就把此事告訴了左鄰右舍，於是一條街都插上了楊柳，當農民軍攻入城內後，果然這條街上的居民都免去了殺戮之災。此後，這條街道就被起名為楊柳街。

誰也不會想到，連傳說中殺人如麻、殺得四川「雞犬不留」的張獻忠都沒有在這裡殺人的楊柳街，文革大武鬥中卻發生了一場血腥的慘案。

本來設於中華路財貿職工俱樂部的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總部，因考慮到財貿俱樂部房屋矮小，無險可守，為了防備遭到武鬥襲擊，決定在這天搬家，搬到臨江門十字路口處的外貿大樓去。那裡斜對面就是八一五派學生控制的二十九中學，周圍還有八一五派控制的重慶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重慶市公安局、重慶市曲藝團、東方紅電影院等。為了防止在搬家時遭到襲擊，財貿八一五總部負責人王紹川還特別提出要趁午飯時行動，迅速搬完。

然而，事情往往發生在意料之外。第一趟車把東西搬到外貿大樓後，有人認為不會有什麼危險，就再次返回去搬第二次，又叫上了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的學生去幫忙。

慘劇就在瞬間發生了。正當二十九中的學生們嘻嘻哈哈地（有的女生嘴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裡還吮着冰糕）在財貿俱樂部門前幫着往車上裝運東西時，一支反到底派的武鬥隊突然奔襲而來，亂槍齊發……當場打死二十九中學生六人，其中年齡最小者是個14歲的初中一年級女生。

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重大機械系六七級學生蘇玉發，他是重大八一五野戰兵團成員，當時正和二十九中的學生一起搬東西（油印機、紙張之類宣傳用品），也不明不白中彈身亡。

當年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的成員，後來在改革開放年代成為重慶市電視台著名編劇的張魯，在《紅衛兵武鬥懺悔錄》一文中回憶了他親眼看到的那次血案的慘狀。他在事件發生前，剛從學校的「造反大樓」出來，要回家去吃中飯，正看到一夥同學自己開着解放牌大卡車去幫財貿八一五搬家。他回家走的路線正要經過財貿俱樂部，當他還未走到那裡時，慘案的槍聲已經響起，他隨震驚的路人跑到現場：

只見財貿工人俱樂部門口街邊上，一輛解放牌大卡車橫着，車廂後板打開着，正搬了一半的文件櫃歪斜倒地，車廂上下，幾個學生模樣的人橫七豎八俯着仰着……駕駛室一側的門開着，駕駛員雙腿還卡在車內，上身卻倒吊着仰在車外，後頸窩正好枕在上車的踏板上，男孩子18歲剛剛開始發育的喉包因此顯得格外突出，頸子上，比一分錢硬幣還小的一個洞，像今天的娃娃們吹泡泡糖一般吹出泡泡來，是血泡，吹到極大，就爆了，緊接着又吹下一個。倒掛着的臉上，那雙本來就又圓又大的眼睛因為倒掛顯得更圓更大，極圓極大……[1]

反到底派武鬥隊為什麼要進行這次襲擊？為什麼要對那些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大開殺戒？據知情者說，是因為事前有人向駐「完蛋就完蛋」廣播站的反到底派（重慶無線電廠）武鬥隊報告，說財貿八一五抓了反到底的人，被抓

1 張魯《紅衛兵武鬥懺悔錄》，載《紅巖春秋》雜誌1995年第一期。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者還捱了打。而這時駐「完蛋就完蛋」廣播站的這支武鬥隊剛好從建設機床廠領回了槍，一些人正想過過槍癮，按照當時他們都爛熟於心的「最高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於是就有了這場「為階級弟兄復仇」的行動……

這一血案使重慶市民大為震驚，血案發生當天，人心惶惶中，位於解放碑旁邊的重慶市三八百貨商店（全國十大百貨商店之一）被迫停止營業。市中區除個別營業點堅持半天或一兩小時營業外，各大小商店大部分都停止營業……

這一事件，也激起了八一五派的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對反到底派的深仇大恨，成為一週後八一五派攻打交電大樓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廣播站的重要原因。

「八八海戰」

1967年8月8日，又一件大事震驚了重慶市民：

據1992年出版的《重慶市志》中的《大事記》記載：1967年8月8日，「望江廠造反派武鬥組織用改裝炮船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大樓、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24人，打傷129人，打沉船隻3艘，打壞12艘。長江交通為之中斷」。[1]

後人讀到這則記載時，多半會感到莫名其妙，難以理解：那個造反派武鬥組織為什麼要用改裝船隻組成「艦隊」？為什麼要「沿長江炮擊」那一處處

1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0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地方，打死打傷那麼多人，打沉打壞那麼多船隻？他們瘋了嗎？

歷來中國人修史，都有個「正統」觀念，要以某一政權為「正統」來判定是非，決定褒貶。文革中，原中共重慶市委和市人委倒台了，駐重慶的五十四軍軍部和軍黨委就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原市委和市人委的職能，成為代表中共在重慶執政的「正統」。《重慶市志》中的這一則記載，就是按照五十四軍文革時的觀點寫的，是明顯帶有派性偏見的。

《重慶市志》上所寫的那個「望江廠造反派武鬥組織」，指的是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望江機器廠東方紅公社下屬的金猴武鬥隊。望江機器廠是重慶幾大國防企業中離市中心較遠的一家，在遠離市中心的長江下游銅鑼峽旁邊。大武鬥開始後，6月20日，該廠反到底派就打敗了八一五派，控制了局面。6月25日，得知此情的五十四軍，派出了一支小分隊赴望江廠「制止武鬥」，於凌晨2時40分乘船到達廠外的洛磧碼頭，竟被該廠東方紅公社攔阻，認為他們是來「支一派壓一派」的，不讓上岸。經過六天半的僵持，直到支持反到底派的四川省革籌小組成員張西挺代表省革籌全體領導人向反到底派作出強硬指示後，反到底派才被迫同意放官兵們上岸進了廠。這個轟動一時的「阻軍」事件，使得望江東方紅公社及其下屬的金猴武鬥隊名聲大振。

當時以至事後多年，人們都不知道，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就在那被阻六天半不能上岸的船上！

槍戰開始後，又一突發事件使望江東方紅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當時兩派都在各自勢力範圍內的交通要道設立了檢查哨卡，對過往車輛和船隻、行人進行檢查，主要是防止運送武器彈藥。望江東方紅也在銅鑼峽邊設立了檢查哨卡。1967年8月3日，重慶軍分區巡邏艇駛經銅鑼峽，望江東方紅的哨卡廣播命令停船接受檢查，巡邏艇對這種無理要求未予置理，遭到哨卡炮擊，被擊沉，艇上三名青年戰士（副班長鄧朝成，25歲；張樹榮，22歲；陳榮華，22歲）不幸殉難。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此事自然遭到八一五派的猛烈攻擊，說這是反到底派「反軍」的又一罪行。當時盛行的是毛澤東那種思維方式：「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因此望江東方紅不但不認錯反而還發出強詞奪理進行辯解的傳單，或說是巡邏艇上軍人先開槍，他們被迫還擊；或說那巡邏艇是「潛水艇」，自己鑽到水下去了，是警司的陰謀……真讓駐軍官兵們氣得咬牙切齒。

楊家坪大戰開始後，反到底派控制的建設機床廠成了八一五派重點攻擊和爭奪的目標，因武鬥導致武裝割據，交通中斷，生活物資供應脫銷，建設廠地區的職工和居民幾乎已到了無米下鍋的地步。望江東方紅決定給建設兵團的「戰友」們運送增援物資（包括生活物資和高射炮），同時也去領取一批槍支。於是，望江東方紅和已經撤出紅港（朝天門碼頭）的長航[1] 紅一方面軍聯手，改裝了「炮艇」三艘，包括：望江機器廠的運輸艇望江101號、嘉陵機器廠的嘉陵1號、長江航運局屬下由登陸艇改裝的大貨輪人民5號，組成了「史無前例」的「軍工井岡山艦隊」。

「艦隊」於8月8日下午沿長江溯江而上，駛經四個主城區——長江南岸的南岸區和北岸的江北區、市中區，到達九龍坡區的建設機床廠。沿途經過的地方，如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長江電工廠等地都在八一五派控制之下，八一五派的武鬥隊當然不願讓反到底派的「艦隊」招搖而過，試圖以武力攔截，雙方便展開了一場水陸槍炮大戰。

對這場大戰，有一篇發表在互聯網上的文章《武鬥中的「海戰」》作了詳細描述。此文有些地方不夠準確，但在對「八八海戰」具體經過的一些記敘上還算比較客觀，可資參考：

話說從望江廠到建設廠這一段長江航道，當時基本上掌握在「反到底」的對頭「八一五」手裡，從郭家沱順長江而上，穿越銅鑼峽口，就到了西南最大的

1 長航：指長江航運總局重慶分局。長航總局在武漢。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造船基地東風造船廠所在地唐家沱……這裡有「八一五」勢力，所以曾被望江廠「反到底」在對江的山上架炮轟擊過。

「反到底」艦隊一出峽口，就遭到埋伏的「八一五」分子很不強烈的攻擊——他們手裡只有點破步槍，對於有臨時裝甲的「軍工井岡山」艦隊來說，連撓癢癢都不夠，只能算是搗亂，完全不具備收買路錢的資格。

各艦亂七八糟的開火還擊，逮不住開槍的小步兵，就打停泊在唐家沱的船隻和造船廠的浮船塢——這是西南地區最大的浮船塢，誰叫它這麼醒目呢？「軍工井岡山」艦隊的還擊，打傷了「人民6號」等多艘輪船和浮塢，還打死長航職工2人，打傷多人，總算艦隊司令還知道自己不是出來打鳥的，還擊只能算是象徵性的。……

這時的朝天門掌握在「八一五」手裡，他們獲悉了「反到底」的行動後，也倉促地作了一些準備。

「八一五」們調來「長江207」、「人民28」、「人民30」等幾條船，準備在長江裡攔截「反到底」艦隊。

可是，這幾條船的協同並不好，「人民28」、「人民30」號還在嘉陵江的河道裡，「長江207」就先到達戰場了，它魯莽地向下游滑了一段距離，準備獨自突擊從下游駛來的三條炮艇。

自打從郭家沱上駛以來，三條炮艇上的「反到底」們就被黑槍騷擾得惱羞成怒，這次他們總算逮住了像樣的目標。每個炮位上都做好了記號：一長一短表示準備開炮，二短一長表示開炮，一長聲表示停止射擊。

而朝天門碼頭上的「八一五」們也堆好了沙包，做好了簡易工事，架好了機槍。

雙方都做好了戰鬥準備，但實事求是地講，「反到底」一方面戰鬥慾望並不強，從一開始，「人民5號」就打開廣播喊：「港口兵團、長航兵團，你們不要打，我們是到九龍坡卸貨的。」在戰鬥中遭到南岸的輪渡公司修理廠輕武器射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擊後，「人民5號」還在廣播：「王麻二，你娃不要打喲；不然我們打過來，你娃吃不消哈。」

但是……「八一五」是不會坐視「反到底」把「戰略物資」運到他們想運的地方的。

迫不得已，「人民5號」拉響了汽笛，戰鬥開始了。

受夠了黑槍的炮手們，手忙腳亂的朝着「敵人」開炮。37毫米的炮彈，即便是不會爆炸的填沙教練彈，對於沒有裝甲的民用拖輪「長江207」來說，也是足夠致命的了，它堆再多沙包也沒有用。同時，大概幾百米之外的紅港港務大樓和碼頭上的機槍，也開始向「反到底」艦隊猛烈射擊，打得甲板彭彭作響。

「長江207」迅速起火燃燒，僥倖未死的船員跳水逃命，「望江101」主機停車，停在江面上用機槍繼續掃射跳水的船員，他們把一路上的火氣都發洩到了這幾個倒霉鬼身上。

其餘兩條船繼續上行，兩岸火力對它們進行夾射，但是效果並不理想，在前幾天加裝的厚厚鋼板幫了大忙，「八一五」的輕武器打上去只是幾個凹坑。

「人民28號」此時駛出嘉陵江口，用輕武器向「人民5號」射擊，對方則用三七高炮還擊，「嘉陵1號」也向「人民28號」開火，頃刻之間，「人民28號」就大幅度傾斜，完全失去動力，順江水漂流到下游數百米的野貓溪岸邊擱淺。「人民5號」和「嘉陵1號」集火攻擊「人民30號」，該船尾部受傷，見勢不妙，拚命退回嘉陵江內。水運204、104兩艘無武裝的小火輪開出嘉陵江口企圖施救，被威脅性射擊擊中頂篷，但仍然冒死靠上「長江207」滅火，當他們登上「長江207」時，發現船上已無活人：有的腦漿迸裂，有的腸子都流出來了……[1]

---

1 《武鬥中的「海戰」》，發表於「關天茶舍」網站，作者江上葦，提交日期：2004年5月22日十五點零五分。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這一武鬥事件，時稱「八八海戰」。

不少人都會提出這個疑問：重慶無海，為什麼要稱之為「八八海戰」？

其實，這個名稱，也正說明了文革中的造反派與文革前革命教育的思想淵源。

正如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編演的歌舞都模仿《東方紅》和《長征組歌》一樣，「八八海戰」這個名稱，也是模仿文革前和文革中都大力宣揚過的「八六海戰」。

文革前夕的1965年8月5日深夜，解放軍南海艦隊參戰艦艇奉命迎擊前來騷擾的國民黨海軍艦艇，在廣東南澳島、福建東山島附近，於6日凌晨經三小時激戰，先後擊沉國民黨軍小型獵潛艦「章江」號和大型獵潛艦「劍門」號，取得了中共執政後解放軍海軍以快速輕型艦艇編隊，以近戰、夜戰密切協同進行的最大一次殲滅戰的勝利，對台灣國民黨海軍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使海峽兩岸海軍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它標誌着國民黨海軍在台灣海峽的軍事優勢已成為過去。

這次海戰，史稱「八六海戰」。

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通令嘉獎參戰部隊，授予611艇輪機兵麥賢得（頭部被彈片擊中，失去知覺，甦醒後以驚人毅力頑強堅守在主機旁）「戰鬥英雄」榮譽稱號；海軍授予611號護衛艇「海上英雄艇」、119號魚雷艇「英雄快艇」稱號。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參戰有功部隊的代表。

到了文革中，「八六海戰」得到進一步的宣傳，宣傳中特別突出了「毛澤東思想」給海軍官兵帶來的精神力量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1967年6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報道《駐京陸海空三軍革命文藝戰士聯合演出豐富多彩的革命文藝節目/頌揚毛澤東思想 歌唱工農兵英雄/這次演出，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果》。報道提到這次演出的節目中就有為「八六海戰」新排演的「歌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是最大的戰鬥力」的七場話劇《夜海戰歌》。

7月31日，新華社報道《熱情歌頌毛主席軍事思想的光輝勝利/話劇〈夜海戰歌〉在京公演》。該劇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駐京部隊革命造反派文體戰士聯合演出委員會和海政文工團「紅色造反艦隊」集體創作。報道稱「它的演出，是對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他在軍隊裡的代理人彭德懷、羅瑞卿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建軍路線的有力批判」。

就在對「八六海戰」的狂熱宣傳中，重慶的「八八海戰」發生了。兩派在戰鬥中，都把對方視為「國民黨反動派」，都認為自己是在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戰。

8月8日這天正是農曆節氣中的立秋，然而，無論是對於有「火爐」之稱的重慶城來說，還是對於正處在狂熱狀態的造反派來說，都沒有絲毫秋意可言。

直接在被命名為「反到底一號」的「人民5號」上指揮「艦隊」的軍工井岡山總部勤務組副組長鄧長春，是望江機器廠22歲的青年工人，共青團員。這個前文藝宣傳隊的隊員，對以文藝宣傳形式造輿論很有愛好，因此，在「八八海戰」的「艦隊」中，不但有武鬥人員，還有一批反到底派的文藝宣傳骨幹，不過後來沒有見到他們以此為題材創作的文藝宣傳節目。

解放碑旁的激戰：攻打「完蛋就完蛋」廣播站

「八八海戰」使反到底派聲威大振，然而，緊接着，就在重慶市的中心區解放碑附近發生了反到底派嚴重受挫的「完蛋就完蛋」廣播站被摧毀事件。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解放碑，位於重慶市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區，是重慶市的標誌性建築。此碑建成於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的1946年，原名「抗戰勝利紀功碑」（簡稱紀功碑），中共執政後，於1950年將其改名為「人民解放紀念碑」，由當時的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重新題寫了碑名。此後每年的「五一」、「十一」舉行從蘇聯學來的慶祝遊行時，重慶市的黨政領導人都要以解放碑下的高台階作為觀禮台，檢閱遊行隊伍。他們通常是站在面朝西北方向的鄒容路一邊，從這個方向看過去，左邊有三八百貨商店、新華書店科技門市部、交電大樓、群眾藝術館展覽館，右邊有重慶市美術公司、群林市場（文革中改名為工農兵市場）、和平電影院（文革中改名為東方紅電影院，即抗戰時期著名的國泰大戲院）……正前方的馬路盡頭處，則是當時重慶市中心最有名氣的第二十九中學。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是八一五派的中堅，被反到底派譏稱為「戰犯團」；二十九中反到底派辦的一份《小人物》報，因其雜文的潑辣犀利而頗受讀者歡迎，則被八一五派譏稱為「小怪物」。

1967年7月，反到底派在解放碑一側的交電大樓設立了一個廣播站，站長何漢瑞，時年27歲，國營重慶無線電廠工人，復員軍人，中共黨員，文革前是廠民兵營副營長，文革初期曾任廠工人糾察隊隊長，後來「反戈一擊」參加造反，成為軍工造反兵團的旗手。在舉旗領隊參加革聯會成立大會時，先期成立的軍工系統最大的造反組織八一兵團的負責人不容他們這個後起之秀與其分庭抗禮，當眾糾集人員撕毀了何漢瑞立在主席台側的大旗，並將護旗的何漢瑞打成重傷。此後，何漢瑞便和軍工造反兵團的大多數成員一樣成了堅定的砸派即反到底派。這時他是軍工井岡山無線電廠東方紅的負責人、軍工井岡山總部宣傳部成員。

反到底派的這個廣播站，取名「完蛋就完蛋」廣播站。這個名字，取自當時流傳甚廣的一段林彪語錄：

「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1]

當時這段以「完蛋就完蛋」為中心詞的「林彪語錄」很鼓動了一些熱血青少年在武鬥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紅衛兵、造反派還將這段語錄譜成了歌曲。清華大學與井岡山兵團對立的四一四總部，甚至將這首歌當作了自己一派的「戰歌」。

重慶反到底派的「完蛋就完蛋」廣播站，當時還有一首自己的專用歌曲：

完蛋就完蛋！
反到底戰士鋼鐵漢，
心最紅，志最堅，
打不垮，壓不彎！
打不垮壓不彎壓不彎！
熱血滿山城，日月換新天！
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
為紅十條而戰，完蛋就完蛋！
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
為紅十條而戰，完蛋就完蛋！

交電大樓，是由重慶市交電公司與化工公司於1956年建成的四樓一底共五層的建築，在文革前，解放碑周圍一帶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所有樓房高度不

1 據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262頁）記載，林彪這段話出自1959年9月11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原文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訓部編《林彪元帥有關戰役方面的論述彙編》85頁。沈如槐書中的引文中，「上戰場槍一響」中間無逗號，「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一句結尾時無「了」字，最後的感歎號為句號。這些地方與當年在重慶流傳的文字略有出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得超過解放碑的高度（27.5米）。因此，當年這裡所謂的「大樓」，最多也就是三四層樓的房屋而已。在當年周圍那眾多的矮小房屋之中，交電大樓的確算得上是令人羨慕的大樓。它的底層是水磨石地面，樓上都是木地板，主要經營燈泡、電扇、小蘇打、檸檬酸等交電、化工產品，其中一二樓分別為零售、批發，三樓以上是辦公室。

交電大樓所在地，其實應該算是一片「福地」。

抗日戰爭時期，這裡是著名的四川美豐銀行老闆康心如的家，當時門前這條街名為柴家巷（後併入鄒容路），因此人稱柴家巷康公館。康心如從清朝末年的反清志士、同盟會員，走上「實業救國」道路，通過艱苦奮鬥，誠信待人，成為聞名中外的金融家，並在抗日戰爭時期被蔣介石提名為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在擔任議長期間，他倡議定重慶為陪都，並為發展大後方經濟、推進抗戰大業作了不少貢獻。當年陪都商界、政界甚至軍界都有不少名流是康公館的座上賓。

1939年「五三」、「五四」（即5月3日、4日），日本侵略軍對重慶實施疲勞大轟炸，市內居民死傷無數，許多房屋、街道變成廢墟、瓦礫，慘不忍睹。康公館對面的國泰大戲院，就被炸壞了房屋，柴家巷、蹇家橋等街道及附近許多房屋都被炸毀。為了讓後人不忘5月4日的那次大轟炸，在蹇家橋廢墟處新修的街道就取名為「五四路」（後來不少人以為這路名是紀念「五四」青年節，大謬）。在這次大轟炸中，柴家巷康公館居然沒有受到什麼損失，公館院內沒有掉一顆炸彈，只在公館旁邊康家的防空洞外掉了一顆炸彈。因康家的防空洞比較牢固，洞內條件也比較好，當時附近的電影戲劇界人士常來康家防空洞躲避空襲。

然而，就是這樣一片在當年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中都未受到損失的「福地」，卻在文革中的「全面內戰」時期慘遭戰火劫難。

武鬥開始後，反到底派因在2、3月間的「鎮反」中受過打擊、壓制，在宣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傳中常以「受害者」姿態出現，很能博得一般老百姓的同情。這個「完蛋就完蛋」廣播站，以其名稱的特別，也以其廣播內容的強烈煽動性，每天都吸引了很多市民駐足聆聽，使馬路對面東方紅電影院的八一五派東方紅廣播站相形見絀。它自然被八一五派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八一五派為了拔掉「完蛋就完蛋」廣播站這個「釘子」，打掉反到底派設在市中心的輿論喉舌，同時，還要報一週前的8月4日發生在財貿俱樂部門前的八四慘案之仇，便發起了攻打交電大樓的一場大戰。

8月11日至13日，以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為主力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猛攻設於交電大樓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廣播站，八一五派從馬路對面的東方紅電影院與交電大樓的反到底派交火。反到底派用的是從軍工廠成品庫房取出的全新半自動步槍，武器好，火力強，但勢單力薄，陷於孤立狀態；八一五派武器雖差一些，但人多勢眾，幾面包圍，因此雙方打得一時難分難解。

在重慶市中心的解放碑地區發生這樣大規模的槍戰，實屬「史無前例」。

激戰至13日晨6時，交電大樓三層樓內突然起火——起火原因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八一五派用反坦克火箭筒發射燃燒彈引起大火，有人說是八一五派射去的信號彈起火，有人說是八一五派用土製燃燒瓶（玻璃罐頭瓶中裝有易燃易爆物品）扔進樓內起火，還有人說是反到底派為給八一五派栽贓而自己放的火（為此「完蛋就完蛋」廣播站的站長何漢瑞被關押審查了五年）……不管是什麼原因，反正大樓內燃起了大火，又正值重慶酷熱的「秋老虎」逞威時節，大樓內的木地板及其他易燃物迅速燃成一片火海，燒至緊鄰的化工原料公司、針紡公司等處，整幢大樓被毀，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了殃。

據知情者回憶，在那次武鬥中，反到底派財貿井岡山總部的一個負責人（那時叫「勤務員」）、重慶市第一商業局的共青團幹部，見交電大樓頂上反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到底的「戰旗」被打倒了，奮不顧身跑到樓頂上去重樹大旗，腹部中彈，腸子都打出來，不過他被搶救過來了。反到底派的一批增援人員從交電大樓背後的中華路繞過來，在實驗劇場外面與從區交通局出來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遭遇，反到底派被打死了兩三個人。而東方紅電影院這邊，八一五派二機廠的一個工人（開車技術很好，他教會了二十九中不少學生開車）胸部中彈身亡……

另有知情者回憶，八一五派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當時預料反到底派武鬥人員會從交電大樓後面往青年路方向撤退，事先在學校的鐵柵欄圍牆處佈置好了封鎖道路的機槍火力點，幾挺機槍對準必經通道，紅了眼的中學生們一心要為財貿俱樂部門前的死難同學報仇雪恨。但守候到13日晨，天都亮了，卻一直未見到反到底派撤出來，八一五派學生們疲憊不堪，便收起機槍回重慶賓館駐地去了。誰知就在他們走後不到半小時，交電大樓內的反到底派人員就從那條路撤離了——若八一五派晚走半小時，或反到底派早撤半小時，很可能又是一場死傷慘重的血戰。

重慶市中心繁華地帶著名的交電大樓，就此化為一片廢墟。

當年重慶市國慶節遊行時，從解放碑觀禮台上拍攝的照片中，即可見遊行隊伍左側與紅旗「交相輝映」的交電大樓黑色廢墟。

大動亂中的各種「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聯合、三結合、清理階級隊伍、「批清」（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會」）、「一打三反」……因為忙於應付各種「運動」，重慶的當權者無暇顧及處理交電大樓廢墟有礙觀瞻的問題，這座武鬥廢墟，竟在重慶市中心繁華地帶「屹立」了將近三年。直到1970年5月，重慶市革命委員會辦公會議才通過決議，重建五金交電大樓。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炮火中的「八一五」週年紀念

1967年8月11日、12日，重慶兩派為爭奪嘉陵機器廠展開大戰。嘉陵廠反到底派因武鬥負責人李魯沂率武鬥主力帶船加入軍工井岡山的「艦隊」，參加「八八海戰」走了，剩下的武鬥人員難以抵擋八一五派的進攻，派人向反到底派江北指揮部告急。江北指揮部急派兩大主力部隊——軍工井岡山江陵兵團和長安兵團，出動了三七炮、二五炮，隔岸以炮火增援嘉陵兵團。可惜由於八一五派先發制人，重大八一五負責人吳慶舉親自帶領三〇一武鬥隊參戰，在江北軍工大規模炮火增援之前已經將反到底派全部趕出了嘉陵廠。

反到底派在開赴與嘉陵機器廠隔江相望的嘉陵江邊，向對岸目標展開炮擊途中，也順便向沿途對岸的八一五派控制區特別是重慶大學開了炮。

這是「全面內戰」爆發以來，重慶大學第一次遭到炮火襲擊。

當時在重慶大學圖書館「監督勞動」的「摘帽右派」[1]賈唯英（女，原《重慶日報》副總編輯，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共產黨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多年後回憶了她的親見親聞：

1967年8月12日下午，突然江北某工廠打過來三發三七炮彈，落到家屬區。消息傳出，全校震驚。人們帶着驚恐的神色圍在那棟被三七炮彈擊中的住宅旁議論紛紛。雖然炮彈未開花，木結構的住房也未倒塌，但是誰知道還有什麼新武器呢？一批教職工急忙離校躲武鬥。

……

1 摘帽右派：1957年「反右派」運動將數十萬人打成「右派分子」，剝奪一切政治權利，撤職、降級、降薪並強制送到工廠、農村或勞改農場「勞動改造」。60年代初，一批被認為在「改造」中表現較好的「右派分子」被宣佈「摘掉帽子」，重新安排工作。但是後來這些人才發現所謂「摘帽右派」仍然被視同於「右派」，仍然處於受歧視、受壓抑的地位。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從8月12日起，江北某廠每晚廣播，要求重慶大學的和平居民後撤5里，他們要開炮了。但人們無處可撤，只好紛紛湧向高層建築的底層避彈。幾乎所有底樓都有人滿之患。只見那水泥地上橫七豎八地鋪着油布、蓆子……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幼，擠在一起過夜，天明才敢回家。因為開炮都是從晚上開始的。幾天後未開炮了，但「要開炮了」的廣播卻未停止。大家躲疲了，於是便在窗戶上掛上棉絮，桌子上也鋪上棉絮，人就睡在桌子底下。[1]

1967年8月15日，是「八一五」造反一週年紀念日。以重大八一五為首的八一五派，為了自己這個第一次週年紀念日，準備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慶祝活動。而反到底派則相應地要在這一天給八一五派找找麻煩，讓「八一五」的「生日」過得不那麼舒服。

反到底派江北指揮部，從8月14日深夜開始發起了炮擊嘉陵江大橋南橋頭並攻佔南橋頭的戰鬥。

嘉陵江大橋，於文革全面爆發前夕的1966年1月19日建成通車，是當時重慶這座兩江環繞的山城的第一座城區公路橋，也是嘉陵江上的第一座鋼樑公路橋。它把嘉陵江兩岸的江北區和市中區連接起來，大大便利了行人特別是車輛的來往。

自從「七七」槍響後，原駐守嘉陵江大橋南橋頭二輕工業局大樓的反到底派二輕兵團全部撤走，二輕局被八一五派佔領，與附近的嘉陵印刷廠、六中等連成一片，使南橋頭為八一五派嚴密控制。反到底派的工總司，原在上清寺附近的經委辦公樓，槍戰開始後，便轉移到了兩路口重慶市體育館對面的體委辦公樓。體育館和體委兩處建築都是反到底派機關司令部控制的地盤（因為機關司令部的主要負責人就是體委井岡山的負責人、舉重運動員段炳森），加上

1 賈唯英《武鬥中的重慶大學校園》，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體委背後的重慶市文聯（駐有黃廉為首的工人造反軍總部）和附近的市教育局（駐有中學生紅衛兵司令部）、山城寬銀幕電影院（駐有二輕兵團的雄獅武鬥隊和軍工井岡山的新山城廣播站）等，使兩路口地區形成了反到底派的勢力範圍。不過，反到底派要從自己控制的江北區到市中區兩路口體育館地區，不得不經過嘉陵江南橋頭這片「敵佔區」。為了使江北區和兩路口地區之間的道路暢通無阻，反到底派便趁給八一五「祝壽」之機發起了這場大戰。

反到底派在江北區三鋼廠公路上架設了一門三七炮、一門二五炮，負責炮擊六中三二一一一戰鬥團的武鬥據點；在江北區委架設了一門三七炮，負責炮擊嘉陵江大橋南橋頭二輕局大樓和嘉陵印刷廠等幾處八一五派的武鬥據點。從深夜11時半開始，每半小時打一陣炮，本來是用來打飛機的高射炮改作平射，一串串火球拖着長長的曳光劃過夜空，嘉陵江兩岸的人們從未看到過這樣驚心動魄的炮戰場面。

8月15日清晨，反到底派停止炮擊，以長安機器廠「六月天兵」為主的反到底派武鬥人員衝過大橋，攻佔嘉陵江大橋南橋頭。據記載，此次武鬥中「打死11人，打傷多人，燒燬市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重慶市六中一幢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和部分設備，直接損失50餘萬元。燒燬1300名幹部的檔案和大量文件資料」。[1]

反到底派佔據的江北區和市中區兩路口地區終於連成了一片。

與此同時，重大八一五武鬥隊炮班，為保障「慶祝八一五造反一週年」紀念活動的安全，以從解放軍總字一五三部隊（炮兵學校）搶來並由炮校教官指導的122榴彈炮，反擊嘉陵江對岸連日來向重大校園發射「三七」高射炮彈的反到底派，共發射炮彈九發，打死江陵機器廠工人二人，學生一人，打傷七人，打壞該廠圍牆和辦公大樓。重大《八一五戰報》對此在題名為《戰地黃

1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0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花》的簡訊中報道說：我團「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8月15日被迫採用了相應措施，對這一小撮匪徒進行了毀滅性打擊，匪徒傷亡慘重。玩火者得到了他應得的下場，實在大快人心」。[1]

當時在重慶市革籌組辦事組協助軍隊幹部整理簡報的原市人委幹部張光明（前副市長余躍澤的秘書）在所寫的回憶錄《騷亂的重慶》中，專門寫了一章「驚心動魄的八月十五」，生動具體地記下了他的親身經歷：

（8月14日）夜裡12點以後，情況陡生變化：茶園、陳家館、三鋼廠一帶萬炮齊鳴，接連不斷向曾家巖一線發起地毯式轟擊。高射機槍直接打到了市委大院。曾家巖一線炮轟過後，又是一輪轟擊橋頭及緊挨橋頭的嘉陵印刷廠、第二輕工業局、六中、人民小學，以及二輕局對面的守橋部隊營房。

我們在電話裡接到報告：嘉陵印刷廠廠房着火了，印刷廠全是紙張，着火就燃，火勢引燃了紙張倉庫。一片熊熊大火，蔓延到了第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染紅了市中區和江北區的一片天。正在大家救火之際，第二輪排炮又地毯式的轟擊過來。而且比第一輪炮彈更密，轟擊的時間更長。這一輪炮擊，死傷的人更多。

下半夜，第三輪、第四輪再次排炮轟擊……

外邊炮聲越急，我們的電話也越急。一陣陣的電話鈴聲沒有斷過，都是報告武鬥情況的，都是呼籲解放軍前去制止的。為了減少流彈風險，張陵秋（轉引者註：軍隊幹部）把幾張篾席鋪在地板上，把電話機拉到蓆子上來，我們趴在蓆子上接電話，避免流彈從窗口飛進來傷人。電話太多了，記錄也顧不得做了。幾部電話同時響起來，張陵秋就把幾個聽筒取下來擺在一堆，不住的重複吼着一句話：「知道了！知道了！」

……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37期，1967年8月28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天蒙蒙亮，機關食堂炊事員打來電話，報告「反到底」的武裝衝進了食堂二樓。隨後又報告，他們趕走了住在飯堂樓上的六中學生，搗毀了學生設的「三二一一一」廣播站。學生撤出時，有一個反抗的學生被「反到底」當場槍斃在洗碗槽邊，血流滿地。屍體還在顫抖，頭上又被補了一槍，腦漿迸裂。

國防工業部值班人員打來電話，守衛機關後院的「八一五川媒兵團」，被衝進大院的「反到底」打垮了，死傷慘重。「反到底」俘獲一人，槍斃在國防工業部門口噴水池旁邊。

辦公廳大樓有群眾打來電話，昨晚有上千居民到大樓躲避流彈。天亮時，大樓被衝進市委大院的「反到底」包圍，他們出不了樓，回不了家。電話裡還聽得見小孩的哭聲。

往常大院發生這些事情，都是張陵秋打電話命令警衛連去處理。今天打電話去，部隊說暫時無法去處理。一是大院的情況不明；二是上級有命令，兩個加強連目前的任務是對一二三號樓佈防，保衛革籌組的安全。

昨晚回部隊的陳本華回來了。他是從學田灣經市委三號門摸進來的。他說，大戰之後，公共汽車全部停擺。他從大坪走路過來，雖然身着軍裝，還是提心吊膽。他描述了路上的見聞：「八一五」失去了嘉陵江大橋，大隊武裝人員正在向兩路口、大溪溝方向撤退。散兵遊勇、傷員擔架混在一起，路上擁擠不堪。上清寺周圍，中四路一帶，到處都是打死的人，真個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反到底」已經佔領市委大院大門、二門。辦公廳大樓被困的群眾已經允許回家，機關大門准出不准進。大院內，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巡邏人員。「反到底」的佈防已經到了一二三號樓門外，與警衛連佈防戰士面對面地站着，雙方都敵視着對方。[1]

1 張光明《騷亂的重慶——文革十年親歷記》，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8月15日當天，重大八一五因本校受到嘉陵江對岸反到底派炮火威脅，改在馬路斜對面的三中廣場舉行了八一五造反週年紀念大會。兵荒馬亂之中，總算還請到了新北大公社攀險峰戰鬥組、清華大學井岡山四一四總部井岡紅軍戰鬥隊、西安交通大學紅衛兵總部、紅衛兵成都部隊等外地代表到會發言祝賀。重大八一五負責人周家喻作了題為《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着山城八一五的前進道路》的發言。會後，演出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八一五風暴》。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正在重慶這個大舞台上演出的，卻不是「音樂舞蹈史詩」那樣載歌載舞的節目了。

惡戰潘家坪

1967年8月16日，鑒於嘉陵江大橋南橋頭的失守，八一五派文攻武衛指揮部上午在沙坪壩重慶市第一中學召開沙坪壩地區各單位負責人會議，為固守八一五派佔據的沙坪壩區，保證該區與市中區之間的道路暢通，決定攻打位於沙坪壩至市中區交通要道中的大坪、潘家坪一線反到底派據點，掃除「攔路虎」。

這些「攔路虎」中，最重要的是由反到底派重醫兵團控制的重慶醫學院和由反到底派航鋒戰鬥團控制的重慶河運學校。重慶醫學院已經成為反到底派的大本營，反到底派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就設在這裡，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總部也在這裡成立並一度駐紮於此（軍工井岡山總部「發槍自衛」的決定就是在這裡作出並首先在這裡實施的）。同時，重慶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又是重慶市最大、設備最完善、技術力量最強的地方綜合醫院，有了這樣一所醫院作為醫療救護保障，反到底派的武鬥人員自然勇氣倍增。而重慶河運學校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的航鋒戰鬥團，在武鬥初期的棍棒、鋼釬戰中是有名的「武鬥之花」，早就被八一五派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

八一五派文攻武衛指揮部的作戰部署會後，在歇台子解放軍總字四二一部隊（通信兵雷達技術學校）設立了「前線指揮部」，令各單位武鬥隊於17日到指揮部報到集中。

一支支全副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武鬥隊陸續到達集中地點，住滿了通信兵雷達技術學校的學員宿舍、教學大樓、辦公樓、禮堂……武鬥隊成員大多是20歲上下的青年，一個個神情嚴肅而又意氣風發，充滿獻身的激情。各武鬥隊的指揮員中，有不少是有作戰經驗或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轉業復員軍人。參戰主力武鬥隊配備有無線電報話機、步談機。前線指揮部和幾處重要的聯絡地點安裝了調頻電台。每支武鬥隊還配備了重慶醫學院、第七軍醫大學的八一五派醫護人員或重慶衛生學校的八一五派紅衛兵擔任戰地救護工作。一切都跟真正的戰爭一樣。

1967年8月18日，這是一年前毛澤東第一次檢閱紅衛兵的紀念日，重慶的造反派、紅衛兵以一場空前的激戰來表示對這個日子的紀念。

凌晨，大坪、潘家坪一帶的市民被晴空霹靂般的槍炮聲驚醒。巨大的爆炸聲是重大八一五武鬥隊炮班的榴彈炮從虎頭巖向幾處準備進攻的地點進行的首輪炮擊。八一五派向反到底派佔據的石油路重慶河運學校、郵電器材廠和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大坪重慶醫學院等地發起總攻，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等武器，惡戰至20日，死上百人，河運學校、醫學院、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房屋被打壞，郵電器材廠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武鬥指揮下令炸毀……

潘家坪，位於重慶市中區西側長江與嘉陵江兩江之間的山脊上，是大坪至石橋鋪這一片相對平緩的地區中一處略為凸起的高地。建於此處的高幹招待所（今渝州賓館），是當年重慶市唯一的國賓館。文革前，毛澤東、周恩來等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等外賓來重慶時都曾下榻此處。因高幹招待所是這一帶的制高點，控制了它就有助於拿下河運學校、郵電器材廠，威脅重慶醫學院等單位，進而對建設機床廠形成包圍，因此八一五派集中了大量兵力進行強攻，志在必得。

然而，因早已於8月1日進佔高幹招待所的反到底派控制着制高點，以極強的火力封鎖了道路，大舉進攻的八一五派儘管出動了坦克，在18、19、20日連續三天的凌晨發起了三次總攻，也未能取勝，反而傷亡慘重，當時公路邊、山坡上、水田中，到處是倒斃的屍體。

不過反到底派一方也有傷亡。據後來成為反到底農總司（全稱為重慶農民革命到底總司令部）勤務組常委的北碚農民蔣良知（退伍軍人）回憶，他所在的由北碚農民編成的建設廠地區武鬥隊「紅五連」奉命前去潘家坪「接防」（替換一支傷亡慘重的中學生紅衛兵武鬥隊）時，看到的情景是：

「我們的主陣地是在一排平房內，房屋的門窗都被打爛完了，除了牆壁以外，毫無遮蔽……房間裡的地上、牆上到處都是血跡，血腥氣很濃。」[1]

在反到底派的陣亡人員中，竟然還有一位首都紅代會成員、北京五十三53中學青年女教師包康玲，反到底派的《東方欲曉》報事後發表了《包康玲烈士生平簡介》，稱她兩次到重慶串聯，在1967年的大武鬥中「立下鋼鐵誓言：『與山城反到底派共存亡！』」，任勞任怨「搞廣播宣傳，看護傷員，參加自衛」，曾三次負傷。「8月18日，在潘家坪自衛反擊戰中，包康玲同志不幸被一顆萬惡的走資派的槍彈擊中，子彈從左頸穿入直到肺部，經多方搶救無效，於8月20日壯烈犧牲，年僅21歲。」[2]

八一五派本來還打算繼續發起進攻直到取勝為止，然而8月21日中央調查

---

1 何蜀整理，蔣良知《一個造反派農民的文革十年——原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反到底派農總司勤務員蔣良知自述》，未刊稿。

2 河校航鋒、重醫兵團主編《東方欲曉》第15期，1967年10月16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組的到來，使他們不得不頹然收兵，中止了這次得不償失的「戰役」。

這次武鬥中，潘家坪高幹招待所賓館房屋和設備因武鬥炮火損失即達400餘萬元。另據重慶市博物館統計，文革前陳列於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供國家領導人觀賞的館藏珍品碧玉香爐等十件珍貴文物被武鬥組織搶走，當時估計損失127.5萬元。[1]

這次武鬥到底死了多少人，不知是否有人作過統計。《重慶市志》上只有一個概略的說法：「雙方死亡上百人」。[2] 據蔣良知回憶，他在「九五命令」交槍後，曾獨自跑到潘家坪武鬥陣地上去看：

走到我們曾經防守過的陣地，那裡已經沒有人了。我轉到那片廣柑林裡，看到地上還橫七豎八躺着許多屍體，已經開始發臭了。我不知怎麼就數了起來，廣柑林這些屍體，竟數出了幾十具。

我又到建設廠警衛連防守過的那棟房屋前面去看，整棟樓房已經被炮火轟得只剩下一些斷垣殘壁，那裡也有不少屍體，前面的水池裡也泡着一些屍體……[3]

兩派一般都會把自己一方被打死的人作為烈士運走安葬。在事過近一個月後，潘家坪「戰場」上仍有一些屍體無人收殮。中央調查組、省革籌調查組及市革籌制止武鬥小組於9月17日傍晚一同到潘家坪武鬥現場驗屍，運回26具，尚有6具待處理。這些屍體當然不是死者的全部，而是兩派都無人認領的、查不到具體身份的人員，估計有的是農民或外地青年。在那樣的大熱天，這些露天放置了整整一個月的屍體的腐爛程度和散發出的臭氣可想而知……

---

1 《重慶市博物館大事記》，載《巴渝文化》第二輯，1991年3月第一版483頁。

2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0頁。

3 何蜀整理，蔣良知《一個造反派農民的文革十年——原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反到底派農總司勤務員蔣良知自述》，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這可苦了附近農村那些生產隊中的「五類分子」，遇到收屍特別是收殮腐臭屍體這種無人願做的事，通常都是通知（當時的習慣用法是「勒令」）他們去幹的。

重大八一五遭受重創

在「潘家坪戰役」期間，重大八一五遭受了武鬥以來最為慘重的損失。

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的武鬥，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鬥隊駐空氣壓縮機廠的人員奉命參加攻打反到底派佔據的九龍坡黃葛坪王家大山重慶電力學校。在這次武鬥中，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鬥隊死八人，傷七人，是重大八一五在武鬥中損失最大的一次。據重大圖書館賈唯英回憶：

重慶大學的專業武鬥隊，20日攻打王家山重慶電力校時，當天就被打死八人，抬回來放在圖書館大廳內閱覽桌上。我們圖書館的幾個「摘帽右派」被責令每天必到，任務就是看守屍體。圖書館成了真正的停屍房。有一個死者未找到完整的屍體，用芭蕉桿組成軀幹和四肢，然後穿上軍服，也停放在那裡，這大概算衣冠屍體吧！[1]

重大學生周孜仁在回憶錄中對此也有記敘：

武鬥者的死訊給活着的同學帶來的悲哀無疑是巨大的。8月20日上午，重慶大學八一五總團組織了一次報告會，由前線返回的同學介紹戰地情況。會場設在冶金系學生食堂，一個系的學生食堂當然比平時開大會用的松林坡禮堂小得多，

1 賈唯英《武鬥中的重慶大學校園》，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但依舊顯得空蕩蕩的：留校同學已經為數不多了。大家靜聚其中，坐着，整個世界鴉雀無聲，只有演說者一頓一挫、擲地有聲的發言：氣氛尤其悲壯肅穆。我在當天日記上記錄報告會內容，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這個山頭（王家大山）易守難攻，我們堅持了五個鐘頭，人都快昏死了。本來，我們是可以撤退的，但考慮到全局，考慮到傷員同志，因此我們一直堅持下去，直打到彈盡糧絕。我們的同志犧牲很多，我們心裡十分難過。我們一天都吃不下飯，我們要為他們報仇！」

前線指揮之一，身材魁梧的L在會上非常沉痛地說，雖然戰鬥中對方死的人比我們多，但是，我們的同學都是多好的同志呀！我們一個換他們十個也不值呀。L說得激越悲憤，聲淚俱下。台下一片沉重的唏噓和亢奮的呼喊。

王家大山的失利讓全團震動。不管怎麼說，一次戰鬥八死七傷，日後無論如何是難以交代的。再說，反到底派在軍工企業的勢力畢竟太大，武器配置畢竟太強，速戰速決已經不可能。總團的頭頭們的信心開始動搖了，很快決定把上述四個縱隊全部撤回學校休整，等候時機再行動作。[1]

反到底派為了配合「潘家坪保衛戰」，再次從江北向重慶大學展開炮擊。據賈唯英回憶：

數日均無炮仗，以為平安了。誰知18日夜間10點，突然炮聲大作，還夾着清脆的機關槍聲。大家一驚而起，出門一看，「呀，不得了！」只見一顆顆閃着紅光的炮彈從河對面不斷飛過來，是那樣密集，一顆接一顆，大家忙頂着棉絮往樹林裡跑。那炮彈呼嘯着好像是從頭上飛過去似的。實在駭人。這一夜江北某廠從晚上10時開始打炮持續到凌晨6時，打過來1000多發炮彈，所幸全部未開花。僅是木結構的圖書館震垮一角，堅固的五、六教室大樓牆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彈洞

1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248—249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而已，無一傷亡。[1]

「1000多發炮彈」只是毫無戰爭體驗的人們因驚恐而放大了的估計。重大八一五周孜仁在8月18日的日記中估計的數字要少得多，他記載：對方「向我們展開了大規模轟擊，估計打了300多發炮彈，二舍、四舍和甲舍也都捱了炮」。他還回憶：重慶大學電機系系主任，後來曾任重慶大學校長的江擇佳的廚房也被一枚炮彈擊中，在牆壁上戳了一個窟窿。江教授模仿偉大領袖的詩詞名句寫了一首題為「八一八炮轟紀念」的詩：

通宵炮聲急，
彈洞灶房壁。
可惜好鋼鐵，
不分我和敵。[2]

關於反到底派打到重大的炮彈全部未開花一事，當時許多人都以為是打的空彈或沒有裝引信的炮彈。對此，反到底派主要負責人李木森在他的回憶錄中作了說明：

後來有人說我們打重大是用的空彈，那是不瞭解情況。我們打的三七炮、二五炮，都是殺傷彈，不是摧毀彈，是用來打飛機的，炮彈小，三七炮的口徑才37毫米，二五炮才25毫米，就比高射機槍子彈大一點，爆炸時不是靠衝擊波摧毀物體，而是炸出彈片對飛機起破壞作用。因此打在建築物牆上只有個小洞，不懂的人就以為是打的空彈。另外，重大有的學生撿到一些沒有爆炸的彈頭，以為是空彈，其實那是我們的炮手用的穿甲彈，因為在此前炮擊二鋼時，炮手發現對

1 賈唯英《武鬥中的重慶大學校園》，未刊稿。

2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246、236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方用了些厚鋼板作掩體，三七炮彈打上去只是砰砰響，回聲很大，在河這邊都能聽到，為了增強殺傷力，後來打炮有時就配用了穿甲彈。[1]

連續多日的大規模武鬥，造成雙方人員大量傷亡。據賈唯英回憶：

1967年8月18日至20日，楊家坪、謝家灣、潘家坪、王家山一帶兩派打得最激烈的時候，每天都有專人到重慶大學報告本派戰死人數、姓名，進行登記，後來校登記人員告訴我，前後登記的死者計500名左右，最小者是年僅14歲的學生。這些死者，後來都安葬在沙坪公園。反到底派戰死多少人就不清楚了。[2]

「八二二」寬銀幕電影院事件

重慶兩大派的「全面內戰」，震驚了「無產階級司令部」。1967年8月21日，中央調查組一行30人於18時由成都飛抵重慶，組長陳彬，時年48歲，解放軍總參謀部軍務部副部長，曾於文革前的1961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重慶兩派對中央調查組的到來都非常歡迎，認為是對自己一方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關懷」。八一五派佔據的空氣壓縮機廠連日來遭到反到底派的強力攻擊，形勢岌岌可危，正好藉此機會通過五十四軍和市革籌組向反到底派提出停止進攻、撤除包圍的要求。反到底派則由工總司和機關司令部在體委辦公樓連夜召開緊急會議，通知各武鬥據點：中央調查組已到重慶，立即停止開槍，保持克制，好讓中央調查組只看到八一五派一方在開槍……

不料，第二天，8月22日，卻成了一個黑色的日子。

---

1 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未刊稿。

2 賈唯英《武鬥中的重慶大學校園》，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中央調查組到來的消息，並未使武鬥戰火馬上停息。長江南岸由鄧長春擔任「司令」的反到底派「黃山警備區司令部」，派出武鬥隊下山到南岸區的中心地帶上新街（區委、區政府所在地），向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佔據的南岸區武裝部、區委大樓等據點發起進攻，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死傷數十人，打壞房屋七幢，抄砸部隊、機關、企業、商店17個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電訊器材、手錶等9183件，糧食2650餘公斤。[1]

更為嚴重的是，在市中區兩路口的山城寬銀幕電影院前面，發生了震驚一時的攔截、槍擊軍車致死致傷軍人的惡性事件。

兩路口，原為重慶舊城出城後的分岔路口，往西的路去成都，往北的路去江北，故稱為兩路口。以後經過舊城改造，往西的路拓展為長江路（經鵝嶺通往大坪），往北的路拓展為中山三路（通往上清寺）。兩路口南邊坡下是菜園壩重慶火車站。

山城寬銀幕電影院，建成於1960年3月15日，是當時重慶市的第一流電影院，一個有全市6萬多人次參加義務勞動，在「大躍進」精神鼓舞下85天建成的重慶市的形象工程。它坐落在兩路口的三叉路口東北側山坡上，居高臨下，控制着從前邊的長江路「進城」（到解放碑地區）或經中山三路到上清寺方向（去市革籌辦公的原市委、市政府等處，或經嘉陵江大橋到江北）的交通要道，是兩路口一帶的制高點。反到底派的武鬥隊佔據着這裡，與馬路對面由反到底派紅中司和農總司佔據的市教育局、工總司和機關司令部佔據的體育館、體委辦公樓等地連成一片，使兩路口地區成為反到底派的勢力範圍。

山城寬銀幕電影院背後，舊時原是老兩路口場的小街。據說場口曾立有一大石碑，上刻「贏得貓兒賣了牛，兩扇磨子一齊壞」的警語，是勸人忍氣莫訟的，然而，文化大革命提倡和宣傳的卻是與之相反的鬥爭哲學、造反精神。

---

1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0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駐守寬銀幕電影院的，除去無線電廠的軍工井岡山人員建立的新山城廣播站外，本來主要是二輕兵團。8月15日嘉陵江大橋南橋頭被反到底派打下來後，二輕局大樓「收復」，但已毀於炮火，二輕兵團無法回駐二輕局，就被調到了扼守南橋頭的上清寺工業展覽館。工總司另調了原在市中區小什字的工人造反軍一支隊來駐守寬銀幕電影院。

造反軍一支隊於8月21日凌晨調來，22日上午就出了事。

22日凌晨，駐守寬銀幕電影院的造反軍一支隊已經按照工總司和機關司令部緊急會議的要求，將原設於電影院下方馬路上的檢查哨後撤至電影院票房大廳內，並且搬開了馬路上原用作減緩車速以便檢查過往車輛的條石障礙物，武鬥人員都放心睡覺了。

然而，正如當時的樣板戲《沙家浜》裡唱的：「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就在這天上午，三個持反到底派觀點但未加入反到底派組織，而自己成立了一個獨立小組織「青年近衛軍」的小青年（兩個青年工人，一個初中學生），為了搶車玩，在造反軍一支隊已將哨卡撤走的寬銀幕電影院下方馬路上，開槍攔截過往車輛，致使重慶警備區司令部路經此地的三輛小車先後遭到槍擊，五十四軍幹部處處長張甲奎、司機李永梁遇難，文化處處長郝子義、保衛處副處長曾惠平、衛生科科長齊宗勳、參謀吳士龍等中彈受傷。

事件發生後，五十四軍全軍震怒。群情激憤中，有幹部、戰士要求派出部隊立即對反到底派實施打擊，但被軍長韋統泰制止。

因為打死打傷的都是一向遭到反到底派指責攻擊的五十四軍的軍人（特別是其中的曾惠平副處長，還曾在「一月奪權」時建立的革聯會中擔任過主持「鎮反」工作的專政委員會的負責人），五十四軍和八一五派便認定這是反到底派蓄意製造的一大陰謀；又因為事情剛好發生在中央調查組到來之後，五十四軍和八一五派便一口咬定這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針對中央調查組的「反革命事件」，一定要反到底派交出兇手和幕後策劃者。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反到底派也沒想到會有這樣的突發事件使自己陷於空前的被動。為了挽回影響，反到底工總司主動將開槍攔截軍車打死打傷軍人的「青年近衛軍」人員送交五十四軍，但仍然不能解決問題，被認為是「捨卒保帥」。

最後，那位從睡夢中被槍聲驚醒、對案情一無所知的造反軍一支隊主要負責人朱登明，仍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八二二事件的主謀」抓捕，飽受毒打、審訊折磨，在解放碑萬人大會上批鬥，在《重慶日報》上點名批判，誣稱其「直接指揮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槍口對準我們的親人解放軍，瘋狂進行掃射。在據點裡，朱登明煽動說：『打得好！以後還要像這樣打！』」[1] 他被關押至文革結束之後、新《刑法》正式生效前夕，被突擊判處有期徒刑18年。

受這一事件冤枉牽連的人還有——

造反軍一支隊成員田炎。時為重慶市市中區第九建築公司工人，當年42歲左右。因他在抗日戰爭中的1942年曾投筆從戎參加中國遠征軍赴緬甸對日作戰，八二二事件發生時他正在寬銀幕電影院，就被專案組認定為「混入革命群眾組織的國民黨殘渣餘孽」，將其當年抗日救國的正義行動視為「反動」，因而是「階級敵人」，並以此為由羅織罪名，稱其向解放軍開槍進行「階級報復」，關押批鬥後判處有期徒刑14年。出獄後於1989年在貧病中去世。

工人造反軍司令部工作人員潘桂林。時為重慶市糖果糕點公司職工，文藝宣傳骨幹。因「家庭出身不好」（其父是前執政黨國民黨重慶市黨部執行委員、南岸區分部書記），又常到造反軍一支隊來玩，被專案組認定為一支隊的「黑高參」，「策劃寬銀幕事件的黑後台」，遭到抓捕、批鬥，1968年11月24日《重慶日報》還公開發表批判文章《堅決鎮壓槍殺解放軍的兇手潘桂林》，誣稱他「參與策劃和親自指揮了」八二二事件。雖查來查去都始終無法推翻其「不在現場」的事實——他在八二二事件前後的8月21日至24日因腹瀉正在醫

1 市中區建築修繕聯社革命委員會《堅決打擊反革命分子朱登明》，載1968年11月30日《重慶日報》。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院住院治療，但他仍被關押至1974年才獲得釋放。

重慶市第一工人醫院外科醫生李一士。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畢業，1952年奉調入川到重慶工作。「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在原單位「監督勞動」。因在八二二事件中出於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參加搶救五十四軍重傷的曾惠平副處長，在當時惡劣的醫療條件下，為保住其性命果斷進行了截肢手術，卻被誣為「階級報復」、「殘害解放軍」。當年11月6日由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下令逮捕，遭到嚴刑逼供，打斷五根肋骨，腎被打破。關押六年後釋放，繼續作為「階級敵人」監督勞動，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84年才得到平反。

當然，同樣冤枉的是被打死的張甲奎、李永梁，被打傷的郝子義和打傷致殘的曾惠平等軍人。他們沒有在保衛祖國的戰場上獻身和受傷，卻莫名其妙地在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中慘遭橫禍。

當毛澤東聽說重慶武鬥中打了一萬多發炮彈時，為之叫好，說「拿了槍炮，不打不過癮」[1]的時候，他是不是會在意有多少人在這「過癮」中被打死打傷？

對於這個八二二事件，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插曲。當年曾任重慶革聯會副主任的財貿八一五戰鬥團勤務組組長王紹川，多年後有一個回憶：

8月22號，五十四軍通知我到市革籌去開會，說是中央調查團來了。軍隊的車來接我去，開到文化宮，走不過去了，前面響起了槍聲，不知是怎麼回事。軍隊怕被反到底的發現他們開車送我，會攻擊他們與八一五勾結，就叫我下車自己走過去。大熱天，我怕被反到底的認出，在頭上搭塊毛巾，像電影《地雷戰》裡「偷地雷的」一樣。走上前去一看，不好，攔起好多人，走不通。不曉得前面出了什麼事。我只好又退回來，要求軍車把我送回外貿大樓。

---

1 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1967》，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220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事後他才知道出了什麼事。他在回憶時還不勝感慨地說：「那天要是我坐的車早點開過那裡，說不定被槍擊的就是我坐的車了。」[1]

歷史總是會有許多偶然性的，不過，必然性又總是要通過偶然性頑強地表現出來。毛澤東的這種文化大革命、「政治大革命」，必然會演變為血雨腥風的全面內戰，必然會導致許多無辜者死於非命。這是毫無疑義的。

1 王紹川口述，何蜀整理《王紹川回憶錄》，2005年3月3日—4月27日，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八章

從停火交槍到解散組織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邊談邊打的「重慶談判」

重慶兩派有關停止武鬥的談判，是從武鬥炮火正熾的1967年8月4日即開始在警備區主持下進行的。

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即五十四軍軍部所在地，位於重慶城西當時已改名為紅嶺公園的原鵝嶺公園下邊馬路外側，俯臨長江的一大片緩坡上。兩大派的不少負責人在參加談判時才第一次來到這個神秘的地方。後來有一位原五十四軍幹部子弟，以「韓微」之名，從一個虛構的當年中學生「齊斌」（五十四軍副軍長之子）的角度，寫了一部長篇小說《重慶大武鬥》，在「老兵網」上連載，其中，對這片地方有一段頗有實感的描繪：

齊斌的家是一幢六室一廳的別墅式的營房，它坐落在俯瞰長江和成渝鐵路的懸崖邊上。四周的院牆由一人多高的夾竹桃構成，院內種滿了以茉莉為主的各種花草，還有一小片地種植了空心菜、南瓜等蔬菜，門口的路邊挺立着兩排長青的芭蕉樹。這是典型的南國綠色格調。其他軍首長的住宅與其相似，錯落分佈在軍部大院西南角上。軍部大院原是國民黨偽國防部所在地，除生活住房和公共設施是新建外，其餘大部分是老房子。由於整個大院位於陡峭的山坡地上，各個建築依地勢而建，它們隱現於鬱鬱蔥蔥之中，高低有別，錯落有致，一改普通營房枯燥獃板的格局。人們似乎每天都有一種新鮮的感覺。唯一不足的，是行路難。高低起伏的道路，根本無法騎自行車，人們靠步行來來往往。儘管這裡也屬於市區，但去一次市中心至少也要半天的時間。[1]

談判是煞有介事的，主持談判的五十四軍負責人也十分着急，希望能盡

1 韓微《重慶大武鬥》第一章，發表於「老兵網」。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快達成協議。然而，由於當事雙方都一心想壓倒對方，而且主持談判的五十四軍領導人在感情上也總想壓制反到底派，偏袒八一五派，大家都缺乏讓步、寬容、和解的精神和誠意，所以談判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馬拉松談判，而且往往是這邊在談判，那邊在武鬥。雙方都學到了當年中共與國民黨當局「重慶談判」時邊談邊打、針鋒相對的手法。

8月6日，兩派各三名代表：八一五派葉蓁榮（師專八一五）、馮國璉（八一兵團）、楊正中（財貿八一五），反到底派周應古（軍工井岡山）、黃廉（工總司）、王興國（紅衛兵大專院校反到底司令部）經過談判，於0時40分達成《關於立即全面停止武鬥的協議》，決定於本日12時無條件停火，但這協議轉眼即遭破壞。

8月7日，兩派繼續在建設廠武鬥。警司宣傳車前去宣傳制止武鬥遭到槍擊。8月8日，兩派爆發「八八海戰」。

8月9日，兩派代表各五人：八一五派馮國璉（八一兵團）、王顯乾（重大八一五）、楊正中（財貿八一五）、劉志成（文藝界司令部）、段德昌（機關總部），反到底派董源河（軍工井岡山）、黃廉（工總司）、王常（公安紅一方面軍）、董向陽、王興國（紅衛兵大專院校反到底司令部）於0時達成《關於成立協助警司制止武鬥和處理停止武鬥後有關事宜的工作組的協議》（補充協議之一）和《關於處理各種武器、兇器、彈藥的協議》（補充協議之二）。

8月10日，兩派代表各五人（與9日代表相同）於凌晨1時達成《關於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抓被扣人員的協議》（補充協議之三）和《關於保證傷員正常治療的協議》（補充協議之四）。

8月11日，兩派在三鋼廠武鬥，八一五派被趕出廠。8月11、12日，兩派在嘉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數十人。直接經濟損失達357萬元」。[1] 反

1　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79）》135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到底派被趕出廠。8月11日至13日，八一五派攻打設於市中心解放碑附近交電公司大樓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廣播站，交電大樓毀於戰火。

8月27日，五十四軍副軍長白斌22時30分召集兩派代表各12人，傳達中央《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

8月28日，八一五派凌晨向反到底派佔據的北碚歇馬場解放軍總字四二四部隊（通信兵技術學校）發起突然襲擊，動用了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高射機槍、一二二榴彈炮、迫擊炮、無後坐力炮等武器，死傷數十人。反到底派四二四紅聯等被迫撤離。八一五派佔領北碚全區。

8月29日（即22年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代表與執政的國民黨領袖、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正式開始「重慶談判」的日子），白斌主持召開兩派談判代表預備會。

8月29、30日，兩派分別在璧山縣、綦江縣等地搶奪武器彈藥。

9月1日，兩派代表各十人（八一五派周家喻、楊正中、馮國璉、潘廣鈞、楊德凌、滕玉泉、陳偉立、蔡增華、湯大華、甘永富，反到底派李木森、段炳森、鄒毓林、劉大強、楊春、黃廉、陳小華、邵大鵬、粟遠奎、蔡日倫）於12時達成《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第一號協議》，這個協議共有七條，要點為：

一、最熱烈地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發的中央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立即在全市範圍內掀起一個更大規模的熱烈的擁軍愛民運動。

二、熱烈歡迎和絕對信任中央調查組，確保他們的安全和工作的方便。

三、雙方同意從9月2日18時起，無條件地全面停火。停火後，不得以任何藉口開槍射擊，任何群眾不得攜帶武器和兇器。

四、雙方必須無條件地立即全部釋放被抓去的革命群眾，今後一律不准抓人。

五、絕對不允許向解放軍及防地、巡邏哨、軍車等進行檢查和射擊。絕對不允許以任何藉口干預解放軍執行任務。解放軍指揮機關、營地不許外部人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員進駐。解放軍所擁有的各種武器、裝備和物資決不允許侵犯。

六、雙方同意在9月4日以前，將各自擁有的一切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分點封存，由警備司令部和雙方代表共同監管，然後全部上交（雙方代表於9月5日協商上交辦法）。上交前，不准任何組織和個人以任何藉口偷運、轉移和擴散，並在水陸主要路口由軍隊設卡檢查。封存地點兩派各11個點（略）。北碚區、南桐礦區、長壽、綦江、巴縣由當地駐軍召集兩派代表協商組成制止武鬥工作組，根據本協議處理當地武器彈藥問題。凡離開本市區的群眾組織的成員，必須全部召回本市區，武器彈藥如數帶回。

七、停火後，已離開生產、工作崗位的人員，應立即返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所有企業、事業、服務行業停業的單位，應立即恢復生產保障市場供應，安定人民生活。迅速恢復水陸交通運輸，任何組織和個人一律不准攔截、檢查、強佔或破壞車船。各單位對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員及家屬，在政治上不得歧視，在經濟生活上應一視同仁。

在兩大派談判中，還發生了一個差點導致談判破裂的小插曲。

9月5日，重慶警備區派車將反到底派工總司負責人鄧長春等談判代表12人，從南岸黃山接去參加上交武器談判，下山過江待渡時，在長江邊的海棠溪車渡渡口，遭到紅巖三中八一五派武鬥人員當場圍毆刺殺，鄧長春等四人被殺傷，其中朱雄傷重，接到警備區衛生科搶救無效身亡。

反到底派聯合指揮部為此發表了《對八一五派破壞停火協議的抗議》和《關於八一五派破壞停火協議的備忘錄》。八一五派也針鋒相對發表「嚴正聲明」，歷數反到底派的種種不是……

不過，中央「九五命令」的下達，使整個形勢明朗化，「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再以曖昧、縱容甚至欣賞的態度對待武鬥了。兩大派不得不認真對待停止武鬥談判。

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繼續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最終達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成協議。

9月9日，反到底派為表現「對毛主席最忠」，搶先將兩路口地區集中起來的各種槍1484支（挺）、炮2門、彈藥若干送往重慶警備區司令部上繳。中央調查組組長陳彬、四川省革籌調查組組長張西挺及五十四軍領導人接見了上繳武器、彈藥的代表。同時，反到底派散發了《緊急告全國人民書》，表示「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公開認錯……未經中央允許動用了國防企業的武器、彈藥是不對的」，保證「立即集中上交用於自衛的一切武器、彈藥」，隨後幾天中，兩大派都陸續分批上交了一些武器彈藥。上交前一般都要乘車遊行，展示武力，甚至大肆鳴槍。

當年一位老百姓在日記中記下了他所見到的兩派上交武器情景：

9月9日　凌晨三點半，忽傳來密集槍聲，我正好從街上乘涼進屋不久，還有不少在露天宿夜的駭得抱起鋪板就亂跑。

上午又連續有槍聲，而且就在街上，不少行人擠入房內暫避。事後聽說是打着玩的，因所有槍支已決定上繳。雖然如此可把人嚇壞了。

今天曾有近千人持着各種武器整隊去警司上繳。看來武鬥已近尾聲。

9月10日　上午八一五派約有20輛汽車滿載戰友進城，打算（參加）交武器誓師大會。下午一時許會畢，共有200餘輛卡車列隊示威過市。經嘉陵路時最後三輛卡車不知怎的竟和反到底派武鬥起來，互用棒棍石頭，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晚上中央調查團派來三輛車的人調查。

9月12日　下午反到底派上繳武器50餘卡車，各型炮彈俱有，浩浩蕩蕩頗不簡單。看來武鬥不會再搞了。[1]

老百姓畢竟是俗人。偉人對武鬥的看法就大不相同。

1967年9月18日，毛澤東在南下視察路經長沙時接見湖南省軍政領導人黎

1　陳懋智《重慶武鬥日記》，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原、華國鋒、章伯森，當華國鋒談到有些縣城還在「打仗」（武鬥）時，毛澤東說：「打一打也好，將來一旦發生戰爭，有經驗了，不會慌。」在談及群眾組織搶槍、農民進城武鬥等問題時，毛澤東說：「全國搶了30多萬支槍，我看不多，民兵就有350多萬支槍。」當黎原說到「這次是一次很好的戰備演習」時，毛澤東說：「英雄所見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戰備演習！」[1]

「很好的戰備演習」，說得何等輕鬆！

出人意外的林園血案

兩大派停火、交槍，帶來了短暫的安寧。然而，就在全國掀起學習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最新指示熱潮的時候，1967年10月27日，重慶近郊歌樂山上又爆發了一場令人震驚的血案。

血案的發生地林園，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林森於1943年病逝後，這裡成為蔣介石的官邸。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談判期間，中共領袖毛澤東曾應邀到林園下榻，住進來的次日早上，毛澤東到林間散步時邂逅蔣介石，兩人進行了「親切晤談」。林園內至今還保留着蔣、毛晤談的文物景點。從1955年起，這裡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字四一二部隊（通信兵工程學院，1986年更名為解放軍重慶通信學院）的校園。

誰也不會想到，在這個風景秀美、林木蒼翠的園林式校園中，在當年曾長期內戰的國、共兩黨領袖都能握手言歡「親切晤談」的名勝地，竟會因文革中的派性衝突而意外發生一場震驚世人的血案。

1　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1967》，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211—217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967年10月27日這天，反到底派六大總部負責人李木森、黃廉、王以時等應邀到歌樂山林園解放軍總字四一二部隊（通信兵工程學院），為該學院反到底派紅旗造反團舉辦的中層幹部學習班作「形勢報告」。當晚，反到底派財貿井岡山宣傳隊進行「擁軍愛民」慰問演出——「擁軍愛民」是中共歷來喊得十分響亮的一個口號，其意指人民要擁護解放軍，解放軍要愛護人民。到了文革中解放軍部隊開始「支左」後，這個口號就更有了特殊的意義：造反派群眾組織擁護解放軍，就表明你是革命左派；解放軍愛護造反派，就表明你是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因此，當時各群眾組織都把「擁軍愛民」的口號喊得震天響，都經常會搞些「擁軍愛民」慰問演出之類的活動。

財貿井岡山宣傳隊是在原財貿文工團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重慶市各群眾組織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中基礎好，演出水平高，在那文藝百花凋零、業餘文化生活枯燥乏味的時期，自然是大受群眾歡迎的。明知是反到底派的演出，許多八一五派的群眾也都毫不避諱地跑來觀看。

不過，當時編演的文藝節目，都充斥大量「派性」的宣傳，總是要歌頌一下本派群眾組織的「戰鬥歷程」，同時也免不了會稍帶貶損一下對立派「大搞資本主義復辟」什麼的。這就難免使該學院八一五派的紅色造反團及附近中學的八一五派學生氣惱。據事後八一五派記敘事件經過的文章談及衝突發生的起因時稱：演出中，「台上的砸派們得意忘形地舞着，蹦着。他們秉承了黑頭頭黃廉的密令，從『否定二、三月鎮反』入手，含沙射影地把矛頭指向了英雄的五十四軍……」[1] 這時，觀眾中的八一五派中學生就開始起哄，接着就有人往台上亂扔石塊阻撓演出，會場上就發生了武鬥磨擦。

該學院勤務連（俗稱警衛連）發現演出已難以繼續進行，當機立斷，把坐在前排的幾個反到底派負責人送出演出會場，接到連部駐地保護起來。

---

1 《血染戰旗紅——一〇·二七反革命大屠殺紀實》，載重慶八一五派市中區聯合指揮部、紅衛兵重慶警備區市中區分部主辦《紅旗戰報》創刊號，1967年11月5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八一五派一心想趁此機會抓獲那幾個反到底派的大頭目，便謊稱八一五派被勤務連抓了人，組織人員以「營救戰友」為名衝擊勤務連駐地，並在與值勤士兵衝突中打人、奪槍。此時正值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央「九五命令」即《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下達不久，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地認真學習，貫徹落實。勤務連執行「九五命令」，在勸阻、警告無效時，「有權實行自衛反擊」，於是開槍攔阻，造成傷亡。據記載，此事件中「32名學院學員及附近群眾被槍打死，53名學員、群眾受重傷」，[1]成為震驚一時的慘案。

這個事件的發生十分意外，因為在整個武鬥期間，重慶駐軍是傾向八一五派的。文革中，按中央軍委指示，各地駐軍管轄當地軍隊院校警衛部隊，因此總字四一二部隊勤務連屬五十四軍管轄，就被一般群眾視為是五十四軍的部隊。重慶大武鬥中，有關五十四軍派人脫下軍裝幫助八一五派搞武鬥，甚至部隊直接向反到底派開火的傳說，時有所聞。然而，這次卻是部隊向八一五派學生開了槍，而且一次打死的人數之多，是整個重慶武鬥期間罕見的。

這不能不令重慶駐軍難堪而惱怒。當時兩派小報均刊登了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的五點指示及重慶市革籌組、警備區的決定，其主要精神是，認定此事件為四一二部隊勤務連「在壞人操縱下」「開槍殺害革命群眾」的「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四一二部隊勤務連被解除武裝，集中整頓，連級領導幹部被拘留審查，排級幹部被隔離審查。文革結束後此案是否有新的處理結論，不得而知。

常被人們忽略的是，發生衝突的該學院兩派組織中，八一五派的紅色造反團，是早期的造反派組織（與首都三軍革命造反派即「衝派」屬同一觀點），而反到底派的紅旗造反團，則有較多成員原屬保守派（與首都三軍無產

1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2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階級革命派屬同一觀點）。因為歷史的原因，學院領導及較多的中層幹部都站在紅旗造反團一邊，形成反到底派將要控制學院大權之勢；也因此，紅旗造反團與駐學院勤務連關係較好，而「老造反」的紅色造反團則與勤務連關係長期緊張，重慶大武鬥開始後還搶走了勤務連的一些武器，「九五命令」下達後也沒有歸還。此外，在北京五一三事件[1]之後，首都三軍的兩派群眾組織地位發生戲劇性的顛倒，三軍革命造反派從「中央文革鐵拳頭」變成被中央文革拋棄的「打砸搶派」甚至「反革命」，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則從「老保組織」一躍而成為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承認和支持，控制首都局勢的革命左派，這也使重慶四一二部隊的兩派受到影響，反到底派的紅旗造反團揚眉吐氣，而八一五派的紅色造反團則日益感到與首都三軍革命造反派同樣命運的威脅……

這個典型事例足以說明，到「全面內戰」階段，重慶群眾組織中文革初期的「革」與「保」，「造反」與「保守」的區分，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或者說，已經混雜不清，難以再按派別來劃分，而且也不再成為兩派分歧的焦點了。

1　五一三事件：1967年5月13日在北京發生的駐京部隊文體單位、機關人員及軍事院校學員兩派武鬥事件。文革中，解放軍各大總部和各軍、兵種機關及在京的軍事院校、文體單位，都分裂成了兩派，一派為首都三軍革命造反派，與首都三司等同一觀點，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另一派為首都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被視為保守派，但該派中幾位女演員自恃能夠「通天」，得到林彪、葉群及吳法憲、李作鵬等支持。1967年5月中旬，兩派都準備舉行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的文藝演出，以表明自己對毛澤東的忠心。周恩來要求兩派同台聯合演出，但卻未作出切實可行的具體規定。5月13日晚，首都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搶先單方面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演出。首都三軍革命造反派與首都紅代會一些紅衛兵衝擊會場造反，雙方大打出手，打傷50多人。6月9日，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謝富治、江青、楊成武、粟裕、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汪東興、王新亭、邱會作、葉群及三軍負責人等在人民大會堂觀看首都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演出，正式亮相支持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三軍革命造反派從此失勢，一些成員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批鬥、關押。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武鬥間歇中的「文鬥」高潮

1967年底，因「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再強調「造反有理」而強調「鬥私批修」大聯合，重慶兩派也跟全國多數地方一樣，武鬥轉入低潮，「文鬥」掀起高潮。重慶這時掀起的「文鬥」高潮，是圍繞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中劉結挺和張西挺這對夫妻展開的。

劉結挺，原為中共宜賓地委第二書記，張西挺是劉結挺之妻，原為中共宜賓市委書記。在中共黨內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的殘酷傾軋中，兩人也曾起勁地整過別人，這本來不足為奇，但這夫妻倆卻不知怎麼得罪了更會整人也更有權整人的「西南王」李井泉，夫妻倆便在60年代初被整，1962年，劉、張二人被停職審查，隨後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文革爆發後，二人敏感到政治局勢會有重大變化，翻案的機會來了，便兩次跑到北京申訴，要求甄別平反。當時四川省委和省公安廳還曾電請中央將劉、張二人遣送回川。造反派起來後，此案引起了紅衛兵成都部隊和一些首都紅衛兵的重視，認為是李井泉打擊迫害革命幹部的一個大冤案，遂大力支持和幫助二人向中央告狀。他們通過中央文革小組報送上去的材料，不知怎麼竟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把此案當作了解決四川問題的「突破口」。[1]

1967年4月1日至3日，奉毛澤東之命，周恩來和康生主持召開了中央解決宜賓問題的會議。4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四川宜賓地區劉結挺等平反的通知》（中發〈67〉154號文件），稱：「關於四川省宜賓地委劉結挺等同志

1　周恩來在1967年4月1日解決宜賓問題的第一次會議上講話中說：「宜賓問題是個突破口嘛！宜賓問題解決了，再解決四川問題。」（《毛主席指示周總理、伯達、康生、江青等同志主持召開的解決宜賓問題的會議記錄》，宜賓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整理，1967年4月4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的案件，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十分關心，並指示周恩來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找雙方有關人員來京，加以處理。」中央認定劉結挺、張西挺等是「堅持黨的原則的好同志」，他們的案件是「李井泉一手製造的，經鄧小平、彭真、楊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顛倒了黑白」。

「突破口」打開後，周恩來又按照毛澤東的旨意連續主持召開了解決四川問題和重慶問題的會議。1967年5月7日正式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即「紅十條」），任命新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新任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劉結挺、張西挺四人負責組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以張國華為組長，梁興初、劉結挺為副組長。於是，「張、梁、劉、張」成為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四川省領導核心。當時在四川流傳開了一個口號：「張、梁、劉、張好幹部，敵人反對我擁護！」

然而，在文革中坐上「革命領導幹部」交椅的人，等於是被放到火上烤，都很難有好結果。四川省革籌組工作剛開展不久，問題就出現了。因「紅十條」給一度被打成了「反革命」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這一派（簡稱兵團、八二六派）平了反，劉、張二人認為他們應該是毛澤東欣賞的真正的左派，「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便偏袒這一派，大量吸收這一派的人員進入省革籌辦事機構，冷淡和疏遠了曾經為他們的平反出過大力的紅衛兵成都部隊一派（簡稱紅成派）。在當時那種不講寬容只講鬥爭的時代氛圍中，矛盾一旦出現就不可調和，很容易激化。紅成一派從批評、指責劉、張迅速發展到炮轟、打倒劉、張，終於拉開陣勢打響了「打劉、張」的戰役。

重慶的八一五派也對劉、張偏袒反到底派十分反感（反到底派這個名字都是劉結挺給取的），便與紅衛兵成都部隊站在一起，結成了「打劉、張」的同盟軍。

四川省革籌兩位主要領導人張國華和梁興初的態度，也對群眾組織間的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兩派矛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張國華作為「一把手」，吸取了在西藏差點被造反派當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打倒的教訓，對毛澤東支持的造反派總是讓着幾分，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偏向兵團、八二六派，同時，為了避免在險惡的政治形勢中再犯錯誤，又竭力表現出不偏不倚的態度，以「和稀泥」著稱；而梁興初則因其與重慶五十四軍的歷史淵源（過去同屬林彪領導的第四野戰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又曾在朝鮮西海岸和金城前線夏季反擊戰役中並肩作戰），在感情上自然就聽信五十四軍的意見而偏向八一五派。張、梁二人雖未公開表現出有什麼矛盾（在這方面張國華比較能夠忍讓，因而他逝世後中共四川省委和省革委的悼詞中對他有「光明正大，顧全大局」的評價），但在處理許多具體問題上，仍然使民眾看到了兩人的不同。特別引起人們議論的是，1967年10月下旬，梁興初到重慶後，乾脆就住下來不回成都去了，形成了成都軍區政委和司令員各據一方的局面。

梁興初在重慶期間，態度鮮明地支持五十四軍，偏向八一五派。最明顯的是在11月2日至6日，梁興初由重慶駐軍和市革籌負責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等陪同，在重慶警備區小禮堂接連三次接見反到底派負責人，在講話中嚴厲譴責反到底派。配合這次接見，梁興初又在11月4日與中央調查組負責人和五十四軍及重慶市革籌負責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唐興盛等前往望江機器廠，視察打撈8月3日被反到底派擊沉的重慶軍分區交通艇現場。梁興初等當場表示對八一五派的支持和對反到底派的斥責。

接着，11月9日，梁興初於午夜到解放碑地區觀看大字報並突擊檢查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廣播站（此時設於「破四舊」中更名為人民商店的原友誼商店），要求他們上繳武器。

11月12日，梁興初由重慶駐軍及市革籌負責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陪同視察反到底派控制的重慶醫學院，檢查拆除武鬥工事及上繳武器情況。當晚，五十四軍即到該學院戒嚴並進行武裝搜查，搜繳武器。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1月19日，梁興初由重慶駐軍領導人陪同接見八一五派負責人，與十來天前接見反到底派負責人相比，他就像是換了一副面孔。他在講話中公開讚揚八一五派（並稱之為「戰友們」），指責反到底派，將武鬥責任歸於反到底派一方，還說：「那天我和他們（反到底派負責人）談到早上4點，我講你們再打群眾就要反對你們，不是我反對你們，是群眾反對你們，因為我是群眾中的一個。重慶400多萬人反對你們，那時你們說完蛋就完蛋啦！」談到上繳武器時，梁興初說，他知道八一五派的七醫大紅總等組織還保存有槍，放在哪裡他都知道，但又說：「我還是相信群眾，如果你們哪個人保存槍，我也贊成，但必須保存在好人手裡（下面熱烈鼓掌），還要編成班，編成班、排、連，要聽解放軍調動，只准防守，不准進攻（下面熱烈鼓掌、呼口號）。」[1]

梁興初這種明顯親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壓一派的態度，就更使八一五派感到了「最大關懷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更加起勁地「打劉、張」，甚至提出「八一五派加油幹，打倒劉、張過元旦」。而反到底派則把劉、張當作是由毛主席決定平反、「紅十條」肯定的革命幹部，針鋒相對提出「劉、張坐牢我坐牢，劉、張殺頭我殺頭」，並且認為保劉、張就是保衛「紅十條」，打劉、張就是反對「紅十條」，因此自命為「紅十條派」，而將紅成、八一五等稱作「反紅十條派」。

12月1日，八一五派《山城戰報》（革聯會機關報）第38期、《八一五戰報》（重大八一五主辦）第47期聯合發表了一篇由重大學生周孜仁執筆寫作、洋洋灑灑一萬多字的編輯部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評四川時局》。文中有許多那個年代時髦的大話、空話、套話，也有許多將反到底派視為「反

1 《梁司令員接見我山城八一五派革命組織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山城八一五工總部電力兵團印，1967年11月21日。軍工井岡山長安兵團六二〇縱隊翻印（油印），1967年11月27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革命」而進行抨擊的誣蔑不實之詞，但是其中這一段話卻基本上是真實記錄：

我們的梁司令員從毛主席身邊來到了凱歌入雲的山城，帶來毛主席黨中央對英雄的五十四軍，山城八一五革命派和山城四百萬人民的最親切的關懷和最巨大的鼓舞。梁司令員來渝後的鮮明態度，已經使那些裝腔作勢地高呼「張梁劉張好幹部」的砸派歌手們啞巴吃黃連，只好悄悄地帶上黑材料，到北京告梁司令員的狀去了，那些以省革籌「當然衛士」自居的癩蛤蟆們這幾天也默不作聲，只好偷偷地躲進陰溝裡咀咒幾聲：「梁興初拉一派打一派絕沒有好下場。」

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地方武鬥再起，已經上繳了武器並且在政治上面臨極大壓力的反到底派這次就一敗塗地了。

12月11日，兩派在望江機器廠武鬥，八一五派佔領全廠，反到底派4000多人撤到涪陵。

12月中旬，反到底派大批離廠離校，逃往內江、達縣、宜賓、涪陵、成都、貴陽等地。

12月26日，八一五派《山城戰報》41期和《八一五戰報》54期合刊發表了長篇編輯部文章《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反復辟鬥爭進行到底——三評四川時局》，文中論述了「劉、張是在四川復辟資本主義的元兇」，並且認定劉、張「已經由復辟資本主義迅速地滑到了嘗試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邊緣」，在批駁反對「打劉、張」的幾種「謬論」時，文章宣稱：「打倒劉結挺！真是一千個正確，一萬個對頭！」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三一五」指示引發新一輪武鬥

1968年1月12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社論《論派性的反動性》，中央向全國推薦，全國掀起「圍剿派性」高潮。在這種形勢下，從反到底派中分化出少數人成立了一個「造聯站」（反到底革命派造反聯絡站），宣稱自己要重新和八一五派戰友團結在一起，打倒派性，斬斷黑手，並且明確指出這個「黑手」就是省革籌裡的某些人——亦即八一五派一直要打倒的省革籌副組長劉結挺和組員張西挺這對夫婦。

然而，還沒等到八一五派高興多久，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及重慶軍政領導幹部時，卻對重慶的八一五派和成都的紅成派「打劉、張」（即打倒劉結挺和張西挺）的做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明確宣佈「打劉、張就是為李井泉翻案」，「打劉、張就是劉、鄧復辟」。

這個講話，時稱「三一五」指示。「三一五」指示一傳達，不但八一五派不得不趕緊在表面上認錯，而且又從八一五派中分化出少數人成立了一個「忠聯站」（忠於毛主席聯絡站），宣稱要與反到底戰友團結在一起……

「三一五」指示使反到底派歡欣鼓舞，甚至是欣喜若狂，因為在那些中央首長講話中，有這樣一些重要內容——

周恩來說：重慶去年把李井泉搞去，不給反到底鬥，反到底紮了三個草人，鬥了後把它燒了，「紙船明燭照天燒。」為什麼不給他們鬥，這是大方向問題，我是聽主席說的。主席看的比我們多，是主席看小報，看了給我們講的。主席許多小報都看了。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塗……

周恩來說：二月「鎮反」根本是錯誤的。

周恩來說：反劉、張的材料，很多都是從李井泉那裡搞來的，實際上是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替李井泉翻案。

康生說：反劉、張就是給李、廖翻案。

周恩來說：就是劉、鄧復辟。

周恩來批評五十四軍：對反到底不僅是感情的問題。[1]

……

這些講話，特別是周恩來傳達的毛澤東那幾句話，對重慶兩大派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反到底派感到了「最大關懷最大鼓舞最大支持」，而八一五派則感到非常沮喪。

3月20日，《山城戰報》50期、《八一五戰報》60期合刊發表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關於堅決擁護中央首長「三一五」指示的聲明》，公開承認，自去年10月以來錯誤提出「打劉、張」的口號是「偏離了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干擾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同時發表兩報編輯部關於撤銷《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一文並歡迎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批判的聲明，接着，又在4月20日出版的《八一五戰報》第61期發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一部迎合右傾翻案風的代表作——評〈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

「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這個「三一五」指示，完全是以勢壓人，強行統一認識，不講任何道理，並不去具體分析紅成、八一五派以及暗中支持他們的梁興初和五十四軍為什麼會「打劉、張」，他們「打劉、張」所依據的材料真偽如何——僅僅一年多之後，周恩來等人再次解決四川問題時，就反過來把劉、張二人作為四川動亂的罪魁撤職、打倒。那時，「無產階級司令部」大量使用的還是紅成、八一五派「打劉、張」的那些材料。

1　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中央首長接見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和五十軍、五十四軍領導時的講話》，1968年3月19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政工組、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部隊政治部翻印，1966年3月20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三一五」指示在重慶造成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兩派武鬥再次升級。

反到底派認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給自己撐了腰，便趁機對八一五派實行報復性打擊，加上緊接着「三一五」指示之後在3月下旬發生的「楊、余、傅」事件[1]和中央發出「三反一粉碎」（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粉碎右傾翻案風）的號召，反到底派便大揪八一五派的「小爬蟲」、「變色龍」……

而八一五派對「三一五」指示雖然表面上「堅決擁護」，內心裡則憤慨萬分，五十四軍的廣大指戰員也想不通。這就造成了八一五派在駐軍默許下進行新一輪的「搶奪」武器彈藥用於武鬥。

這是重慶兩大派群眾組織之間最後一次「困獸之鬥」。

這一次，因為反到底派的武器大多已經上交，國防工廠的武器成品庫已經被軍隊嚴加控制，而八一五派則從駐軍手中「明搶暗送」得到大批武器，因此八一五派就佔了上風。

3月22日，嘉陵機器廠八一五派佔領廠區制高點。

---

1 「楊、余、傅」事件：1968年3月由毛澤東主持將三位正走紅的軍隊將領突然定為「反黨集團」的重大事件。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佈命令，稱：「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一、楊成武犯有極嚴重的錯誤，決定撤銷其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職務，並撤銷其中央軍委常委、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二、余立金犯有極嚴重錯誤，又是叛徒，決定撤銷其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職務；三、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職務。」3月24日晚，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軍隊團以上幹部會議宣佈此命令，林彪講話後毛澤東出場接見全體與會人員。3月27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在首都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十萬軍民「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周恩來代表中央宣讀處理「楊、余、傅」事件的命令並發表講話。會上提出「揪出變色龍，橫掃小爬蟲，粉碎右傾翻案風」的口號，引起各地群眾組織間互揪「變色龍」、「小爬蟲」，全國陷入新一輪大亂。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將「楊、余、傅事件」說成「都是林彪搞的」。1974年毛澤東批准為楊、余、傅平反。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對此案發出文件公開平反。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3月24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武鬥，死一人，八一五派攻佔廠區周圍及廠區高地。

3月25日，江陵機器廠八一五派衝擊該廠駐軍，搶走大批武器，部隊宣傳制止無效，被迫開槍，打死一人，打傷六人。

同日，二鋼廠兩派武鬥，死十餘人，反到底派撤離，全廠停產。

3月26日，兩派在嘉陵江南橋頭武鬥，死三人，冶金局大樓被燒燬。佔據嘉陵江南橋頭邊「特園」（歷史上有名的「民主之家」）的八一五派新六中三二一一一戰鬥團武鬥隊在撤退時，因焚燒傳單資料引起火災，致使曾接待過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中共領袖和民主黨派領袖的特園主體建築達觀樓化為廢墟。

當天下午，市中區所有煤店燃煤全部脫銷。

3月27日午後2時，八一五派攻佔設於市革籌對面團市委院內的反到底派工總司、機關司令部及化工總部，打死二人，抓走數十人。

此前，八一五派在市革籌院內集結備戰時，反到底派即向市革籌多次提出要求制止武鬥，但均遭推諉。實際上市革籌及五十四軍是以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看着這場武鬥在自己眼皮底下發生的。

同日，兩派在郵電學院武鬥，反到底派撤離。

4月7日，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全廠停產。

4月9日，因受武鬥影響，八一五派控制的《新重慶報》發佈《告讀者》，稱因紙張供應不上，從4月11日起暫停出版。至5月15日恢復日出半張（兩版），只發新華社電訊。

4月11日，重慶鐵路分局九龍坡機務段兩派武鬥，成渝鐵路一度中斷。

4月12日，兩派在電力學校武鬥，因反到底派在校實習工廠紅旗電廠煙囪頂上架設有廣播喇叭，煙囪被八一五派炸毀。武鬥中另有學生宿舍六幢被燒燬，自備發電廠被毀，經濟損失100餘萬元。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4月13日，兩派在長江航運分局武鬥，死二人，朝天門港口運輸癱瘓。

4月14日至15日，兩派在長安機器廠武鬥，死三人，機器、廠房嚴重受損，全廠停產。

4月24日，大坪地區八一五派連續搶奪駐該地區部隊武器。反到底派搶奪警備區司令部運糧專車二輛。

……

「全面內戰」為何再掀高潮

後人將很難理解：為什麼在1968年春，全國許多地方會再次掀起「全面內戰」的高潮。中央不是已經發佈了「九五」命令嗎？不是已經號召大聯合了嗎？不是已經開始「圍剿派性」了嗎？難道是造反派不聽中央的招呼，不聽毛主席的話了？難道文革局勢真的完全失控了？

其實，文革中的「全面內戰」，正是按毛澤東未曾公開的「戰略部署」再次掀起高潮的。

當年清華大學四一四總部的兩位紅衛兵領袖，通過自身慘痛的經歷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1968年4月下旬，正當重慶兩大派在中央「三一五」指示及「揪出變色龍，橫掃小爬蟲，粉碎右傾翻案風」的號召刺激下重新展開大規模武鬥之時，北京的清華大學兩派也開始了一場震驚中外的「百日大武鬥」。然而，奇怪的是，從4月23日晚上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和北京衛戍區對清華大學武鬥的有效干預竟戛然而止，次日晚，對制止清華大學武鬥能夠起到一定作用的海軍宣傳隊也奉命撤出。更為奇怪的是，在武鬥愈演愈烈，死人的事已經不斷發生之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後，處於劣勢的四一四總部組織人馬到北京市中心去展開「文攻」，但是，無論他們採取什麼手段：奔走呼號、遊行示威、靜坐抗議，甚至抬屍遊行，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採取措施制止清華武鬥，實行軍管，「中央和北京市就是不聞不問，偌大的北京，滿世界都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竟然沒有一個站出來關心一下人民群眾最基本的權利——生存權」！[1]

清華大學四一四總部的主要負責人沈如槐，多年後在回憶錄中分析道：海軍宣傳隊撤出清華是北京市革委會和北京衛戍區的不干預政策的必然結果，而——

這種不干預政策就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我把它稱之為「四不方針」。

這個「四不方針」，是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接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時的講話中說的。

沈如槐當時認為這個「四不方針」的始作俑者是時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謝富治，但是他一直都不明白，「四不方針」為什麼能得到黨中央的批准？周總理怎麼會贊同或默認？莫非這方針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2]

許多年後，他在原國務院幹部吳慶彤的回憶錄中找到了答案，吳慶彤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話：

全面奪權後，各地武鬥的烽煙四起。毛主席不僅未及時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制止武鬥，而且繼續不計後果地支持所謂「革命左派」。儘管在1967年他陸續

1　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352—353頁，395—396頁。

2　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354—355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批准周總理提出的關於制止一些地方武鬥的建議，但這並不表明他已下決心制止武鬥。例如，1967年12月18日，毛主席接見以謝佩奇為首的阿爾巴尼亞・中國友好協會代表團，在談到各地武鬥時說：「要打就打，我主張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厲害的地方，解決問題比較容易。北京不疼不癢，太文明了。」[1]

對此，清華大學四一四總部的「理論家」周泉纓說得更直白：

在蒯大富領導團派在清華大學挑起全面武鬥後不久，原來進駐清華大學制止兩派武鬥的海軍宣傳隊果然立刻奉命撤離清華大學，從而更明確地顯示了毛澤東主席後來在1968年7月28日講話中講的中央對清華兩派武鬥的所謂的「四不政策」，即所謂的「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的政策。中央的這種政策的存在，實際上是在支持蒯大富，讓他放開手腳，堅決果斷地用武力解決四一四派的問題，從而一統清華大學的天下……[2]

顯然，在毛澤東還指望他所欣賞的「左派」能夠以武力強行征服對立派的時候，「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不可能為制止武鬥採取真正有效的措施的。而各地的造反派，特別是被當地駐軍認定為「左派」的一派群眾組織，正是受到了這種秘而不宣的「戰略部署」的縱容和鼓勵，才得以把「全面內戰」的野火燃得更為熾烈。

---

1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增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14頁。轉引自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355頁。

2 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評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127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周恩來說：「重慶不能再亂了」

不過，四川、重慶畢竟不是被中央當作「文革試驗田」的清華大學，四川是「三線建設」的重要基地，重慶是援越抗美的主要後勤軍火庫，不能讓武鬥影響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局。

眼看重慶兩派武鬥愈演愈烈，1968年4月27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不得不再次接見四川及重慶的軍政領導幹部，對「三一五」指示進行雖不明言但卻是實質上的「糾偏」。「無產階級司令部」對在「三一五」指示之後尾巴翹到天上去了的重慶反到底派和成都兵團、八二六派猛擊一巴掌，抓了他們一個「打謝（謝家祥）[1] 反梁（梁興初）」，把矛頭指向五十四軍的罪名，進行了嚴厲指責，同時對五十四軍講了許多安撫、打氣的話。這次的「中央首長講話」時稱「四二七」指示。

當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提到3月18日後壞人又挑起武鬥時，中央領導人說：「總有個原因吧，要不是三一五指示闖禍了嗎？」並且在講話中鼓勵五十四軍領導人：「你們不要灰溜溜的，有多少責任就承擔多少責任，要把腰桿挺起來，精神抖擻起來。」……

中央首長的這個講話或曰「指示」，對五十四軍的態度，對重慶兩派的態度，與一個多月前的「三一五」指示相比，幾乎是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

1　謝家祥：文革爆發時為駐重慶的陸軍第五十四軍政委，中共重慶市委常委。1967年7月調任成都軍區副政委。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被安排為常委。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被安排為中央委員。同年底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共四川省革委核心小組成員、成都軍區支左領導小組副組長，增補為省革委副主任。1971年8月任重建的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的「批林整風」中，謝與梁興初、陳仁麒一起被認定為「上了林彪的賊船，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四川全省開展對「梁、陳、謝」的批判。但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仍被安排為中央委員。1975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調其回部隊工作。文革結束後1981年撤銷「批林整風」中的審查結論。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不過，略有不同的是，「三一五」指示是由省革籌和成都軍區大張旗鼓地向四川全省軍民公開傳達層層落實的，而對「四二七」指示，則沒有那樣做，只在內部作了傳達，連一個正式傳達的文本都沒有——由此也可以看出省革籌和成都軍區的態度偏向了。

「無產階級司令部」對兩大派「各打五十大板」，重慶兩大派各自都有了「無產階級司令部指示」作為精神支柱。在這樣的形勢下，不管是「造聯站」還是「忠聯站」，不管是哪一派，不管有多麼響亮的革命口號，都已經不能再像文革前期那樣激發起廣大群眾熱情參與了。文革的反覆折騰已經教育了廣大群眾，他們本能地認識到這並不是他們原來所想像的那種「大革命」，他們看到了太多的醜惡，太多的不幸，太多的朝令夕改、出爾反爾、翻雲覆雨，太多的「昨日座上賓，今日階下囚」，太多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因此，這時的群眾組織，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擁有廣大群眾的組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失去群眾。

「四二七」指示還未傳達下來時，重慶兩派又發生了兩起重大事件。

4月28日，八一五派武鬥隊兩次衝擊三五一倉庫搶奪武器，並用手榴彈炸死炸傷解放軍戰士和群眾數人；又搶走四〇五團大批槍支，打傷團長等125人。

周恩來聞訊後，於當天下午4時指示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等火速到北京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找重慶八一五派負責人談話，指出他們搶槍是違犯「九五」命令的，直接影響戰備和援越抗美的任務，是非常錯誤的。為此：一、要他們立即停止搶武器的錯誤行動。二、搶去的武器通通交回。三、公開承認錯誤，否則嚴辦，中央馬上向全國通報肇事的為首分子是盜竊國庫的壞分子。[1]

---

1 《周總理指示》，載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62期，1968年5月4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就在當天，重慶市消防大隊奉公檢法軍管會命令於晚9時25分去長安機器廠救火（廠辦公大樓失火），事先通過反到底工總司與扼守必經路段檢查過往車輛的重鋼三廠反到底派取得聯繫，順利通過，但隨後增派的消防車卻不知怎麼沒有再事先聯繫，被重鋼三廠反到底派武鬥隊當成八一五派的闖關車輛截擊，消防幹警死9人、輕重傷17人（其中解放軍戰士2人），被抓走23人，消防車被打壞3輛。

4月29日，周恩來10時30分再次打電話給張國華，就重慶市大規模武鬥問題作出四點強硬指示，要求對28日發生的八一五派搶奪351倉庫武器和長安廠辦公樓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傷消防人員兩件事必須嚴肅處理，否則通報全國，八一五搶四〇五團的槍要交回；強調重慶不能再亂了，不能把重慶搞癱瘓了，再搞，一定按「九五」命令、「二六」命令[1] 辦，這是中央的意見，軍委的意見。[2]

下午3時40分，張國華、劉結挺、張西挺、韋統泰、藍亦農接見在北京的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兩派代表各十人傳達上述指示，要求馬上落實。

4月30日，重大八一五總團負責人率八個單位的八一五派武鬥隊到駐軍某團上繳武器並作檢查。

5月2日，已經按照「四二七」指示「把腰桿挺起來，精神抖擻起來」的重慶警備區司令部發出通告，重申中央「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和周恩來

1　「二六」命令：即1968年2月6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命令》，當時因不少地方武鬥中都出現了群眾組織武鬥隊破壞鐵路交通、炸毀橋樑建築、襲擊列車、殺人劫貨等情況，中央不得不下令：「這是一種反革命的土匪行為，必須採取斷然措施，決不能再承認他們為革命造反派。」其「極少數壞頭頭是反革命分子，必須採取專政措施，堅決鎮壓法辦」。遇有「反革命土匪進行抵抗和逃竄時，我人民解放軍必須進行追擊……務期達到聚殲的目的」。命令全文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出版。

2　《周總理指示》，載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62期，1968年5月4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4月份兩次指示，嚴令各派武鬥組織於5月7日下午6時前將武器彈藥全部上繳，解散武鬥組織，否則，將予以強制取締。

重大八一五迅即發表堅決擁護重慶警備區「五二」通告的緊急聲明，決定在5日12時前把全部武器彈藥、爆破器材、軍事物資上交警備區，並「決定從即日起解散一切武衛組織，今後不得以任何藉口恢復」。[1]

兩派的各種專業武鬥隊即所謂「武衛組織」，自此陸續解散。

革命委員會成立與最後的惡戰

在「四二七」指示的推動下，重慶兩派在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的「勤務員」們，不得不趕緊競相表現擁護中央精神，盡快實現「大聯合」、「三結合」，推舉出了各自進入四川省和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的人選。

就在這最後一輪大規模武鬥的炮火硝煙中，1968年6月2日，所謂的「新生紅色政權」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在自稱的「大好形勢」中成立。

對這一「大好形勢」形成尖銳諷刺的是，成立大會上發生了二輕兵團成員抬屍衝擊主席台事件。

二輕兵團的一夥人，用門板抬着一具據說是被八一五派打死的人的屍體，要衝上主席台示威，他們與前去干涉的解放軍值勤官兵發生了扭打衝突。正坐在主席台上的反到底派的省革委常委鄧長春和市革委副主任李木森，奉五十四軍副軍長、市革委副主任白斌之命下去制止事態發展，也在混戰中被打

1 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62期，1968年5月4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傷。後來是二輕兵團主要負責人夏祥貴趕到現場制止，同時，應邀從成都趕來出席大會的省革委副主任張西挺（被視為反到底派的「後台」）也出面勸阻，才最後平息了事態。但慶祝大會已被攪得烏煙瘴氣。

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兩派代表各數十人進入革委會擔任了委員職務。

擔任市革委副主任的兩派代表有：

黃廉（反到底工總司）、袁金梁（八一五工總部）、李木森（反到底工總司）、熊代富（重大八一五）；

擔任市革委常委的有：

方文正（八一五八一兵團）、汪友根（反到底工總司）、蔣良知（反到底農總司）、韓榮華（財貿八一五）、趙行貴（八一五農聯會）、徐光明（反到底井岡山紅衛兵）、雷中伍（反到底紅中司）、段德昌（八一五機關總部）。

在此前的5月31日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中，也有一批重慶兩派群眾組織代表以「對等」原則進入，在省革委中擔任常委的有：

鄧長春（反到底工總司）、陳萬明（八一五工總部）、王興國（反到底紅大司）、周家喻（八一五紅警區）。

6月6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作出《關於維護革命新秩序的若干問題的決定》，嚴令一切群眾組織必須解散武鬥組織，召回武鬥人員，拆除武鬥工事，在6月12日下午6時前將所有武器彈藥無條件上繳。逾時不交者，以窩藏軍火論處。

然而，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並不意味着新秩序的確立和武鬥的結束。就在這個決定發佈的第二天，也就是重慶市革委會剛成立五天之後的6月7日，在重慶城內就發生了又一起動用槍支並打死了人的武鬥事件。

當時，在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重慶組學習的學員，除去回來參加四川省和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的部分人員外，其他人員到6月19日才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全部返回重慶。而反到底派西師八三一負責人周榮卻不守紀律，擅自提前從北京學習班跑回重慶。6月7日，周榮來到七星崗重慶市雜技團樓上的反到底派炮聲隆廣播站（西師八三一的校外指揮部也設在這裡），此事被八一五派得知，四十一中八一五派的武鬥人員便持槍進攻該廣播站，意欲抓獲周榮，兩派展開槍戰，八一五派死一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事件發生後，反到底派武鬥人員竟找與之有「兄弟伙」關係的官井巷民辦中學八一五派武鬥人員支援了兩支手槍，使周榮得以帶上手槍撤離險境。

在此前後，一些曾一度你死我活廝殺的兩派武鬥人員已經厭棄文革政治原則，相互間結成了不講派性只講「江湖義氣」和個人利害關係的「兄弟夥」。在重慶沙坪壩區沙坪公園的八一五派武鬥死難者墓群中，就埋葬着一個雖屬反到底派，但卻是為八一五派的利益身亡的「烈士」朱本武。這個重慶字水中學的初中六六級學生，在1968年3月8日，出於「兄弟夥」義氣參加八一五派武鬥隊，到長壽縣雲台地區川東北石油鑽探處去攻打反到底派據點時身亡（那次武鬥從6月3日起持續了六天七夜，雙方共死42人，造成損失31萬元[1]）。

以後，個別「兄弟夥」發展成了刑事犯罪團伙。

文革群眾組織至此實際上已經走到了末路。

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由於慣性的作用，武鬥還持續了一段時間。

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十天之後，6月12日至13日，兩派在北碚第十三中學（今兼善中學）和北碚區百貨大樓、新華書店等地武鬥，死六人。這次武鬥是因反到底派猛虎團回到北碚而引起的。猛虎團是北碚地區一些單位被八一五派趕出去的反到底派人員組建的跨行業的專業武鬥組織，已經被五十四軍內定為必須取締的反革命組織，因此八一五派對武力剿滅猛虎團有恃無恐。13日10

1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3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時，八一五派北碚捍紅總部攻克反到底派猛虎團佔據的北碚新華書店大樓，在武鬥中身亡的猛虎團負責人王樹良（重慶棉紡織五廠工人，復員軍人）等三人被暴屍街頭示眾三天。八一五派還在北碚街上實行戒嚴，挨戶搜捕反到底派人員。西師八三一成員楊向東在多年後回憶了他當時的親歷：

1968年，省、市革委會相繼成立，我於同年6月12日返回北碚，在北碚車站就聽說校內再度「打起來」，我不敢回校，在車站附近勞動小學夏老師處躲藏。當天中午猛虎團在街上新華書店打出旗幟。午夜，捍紅總部幾大武鬥組織四面包圍書店，用輕重機槍猛烈掃射，猛虎團在樓上拚命死守。槍戰持續數小時，槍聲徹夜不斷。次日晨，西師附中無產者女生端着衝鋒槍在勞動小學挨戶搜查，該校老師們以在外面屋子打牌為名掩護藏在內室的我。上午聽說猛虎團全軍覆沒，頭目王樹良等人陣亡，王樹良等三人被暴屍三天。藏匿五天後，我剃了長髮，化了妝，再度出逃。[1]

6月30日，鑒於市內各處出現搶奪解放軍武器彈藥，搶劫各種車輛，醞釀大規模武鬥的跡象，市革委、重慶警備區聯合發出緊急通令，嚴令禁止武鬥。

6月30日下午5時至次晨6時，長江電工廠兩派武鬥，八一五派佔領全廠，隨後從廠內運走大批子彈。

6月30日至7月2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鬥，八一五派攻佔全廠，隨後從廠內運走大批槍支。

6月30日至7月2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鬥，八一五派攻佔全廠。

7月6日，兩派在江北大石壩地區大規模武鬥，江陵機器廠四個車間和中心計量室、廠內家屬區、街上居民區遭連續炮擊，若干精密機床、計量儀器遭破

1　楊向東《多雪的春天——被囚禁於武鬥集中營的六十五天》，2005年7月3日，發表於http://img00.bokee.net/content/10029743/content0001/10029743/。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壞，廠內二〇三小學和一些家屬區房屋及石門街上民房被打壞，傷亡多人。駐軍領導召集兩派負責人談判，達成於11日晚8時停火的協議。但簽字一個多小時後（次日凌晨）武鬥又重新開始。

7月7日至9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鬥，八一五派攻佔後字二四二部隊、煤炭設計院、地質部第二普查大隊、重慶醫學院及其附屬第一醫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重醫一院藥房、庫房、材料科被搶劫一空，大量貴重醫療設備遭到破壞，傷亡多人。

這次武鬥中，反到底派遭到一個意外的重大損失：後字二四二部隊紅總負責人張龍寶，在撤離途中被亂槍擊中身亡。逃亡在外的反到底派人員在成都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7月上旬，重慶兩派在大坪、楊家坪地區的大規模武鬥，使國家財產遭受嚴重損失，群眾死傷慘重，兩路口至楊家坪無軌電車線網被打壞，導致全線停車一年餘。

7月9日至12日，兩派在江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一些家屬區房屋、職工住宅被打壞，四個重要車間遭破壞，附近民房也遭到炮擊，傷亡多人。八一五派攻佔全廠，隨後實行「戒嚴」、「清鄉」。

7月16日，重慶八一五派及鄰近幾縣同一派的群眾組織武鬥隊在成渝鐵路線隆昌石燕橋以火力攔截軍列，並在石燕橋及李市鎮、安富鎮等地先後將五車皮援越軍火搶劫一空。

周恩來聞訊後，急電四川省革委主任張國華：不論哪一派搶去的都要全部追回；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堅決按中央「七三」布告[1]辦事。

7月17日至18日，重慶兩派在交通學院武鬥，八一五派攻佔全校，隨後實行戒嚴、「清鄉」。

---

1 「七三」布告：指1968年7月3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布告》，主要是對廣西的大規模武鬥提出嚴厲譴責，將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

兩派這一次血火廝拚的大規模武鬥，目的已經十分明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為了爭奪地盤，爭奪對一些基層單位的控制權，為建立自己一派獨掌大權或基本控制大權的革命委員會掃清障礙。

武鬥初期的「路線之爭」，到這時已經基本上蛻變為利益之爭、權力之爭。

文革群眾組織的終結

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從一開始就是在毛澤東及其「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默許、縱容、欣賞甚至明裡暗裡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然而，也正是這個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不可收拾的「全面內戰」，使得毛澤東及其「無產階級司令部」對群眾組織改變了態度。在1967年7、8月全國許多地方爆發大規模武鬥的時候，毛澤東還以欣賞的口吻大談「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而到了1968年2月6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命令》，就已經嚴厲地將武鬥中「破壞鐵路交通，炸毀橋樑建築，襲擊列車，殺人劫貨」這類在一年前各地「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的武鬥中早已出現過的行為，宣佈為「這是一種反革命的土匪行為，必須採取斷然措施，決不能再承認他們為革命造反派」。

1968年7月3日和24日，中央發出經毛澤東批示「照辦」的兩個布告，即通常所稱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1]，則更明確地表達了對群眾組織

1　「七二四」布告：指1968年7月24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布告》，主要對陝西的大規模武鬥提出嚴厲譴責，定性為「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間的武鬥不再容忍的態度。這兩個文件，從名稱上看就顯得有些意味深長，不再稱「通知」、「決定」、「指示」或「命令」，而稱為「布告」。在文革以前，民眾見到的「布告」通常只是法院給判處死刑或有期徒刑的罪犯宣佈罪狀時使用的專門的公示文件，因此重慶民間便有把某些長相猥瑣形同罪犯的人開玩笑稱為「布告臉嘴」。而這一次，「無產階級司令部」對群眾組織卻使用「布告」來發佈指示了。這兩個布告把廣西和陝西等地的大規模武鬥中破壞鐵路交通，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燒燬和炸毀國家倉庫、公共建築和人民房屋等行為統統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和「反革命罪行」，嚴令「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解散一切專業武鬥隊」，「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等等。

對待群眾組織武鬥的態度，也就是對待群眾組織的態度。

實際上，從毛澤東在1968年7月27日下令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強行進駐清華大學，28日接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發表措辭嚴厲的講話時起，就已經宣告了文革群眾組織的終結。

1968年8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紀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兩週年》。文章不再號召廣大群眾繼續發揚革命造反精神，繼續「炮打司令部」，而是強調：「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全黨、全軍、全國和廣大革命群眾唯一的領導中心。全黨、全軍、全國只能有這樣一個中心，不能有第二個中心。」文章指出：「所謂『多中心論』是一種資產階級山頭主義、個人主義的反動理論，它渙散革命隊伍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妨礙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倘若各個部門、各個單位都要『以我為中心』，全國有許多個『中心』，仍舊是無中心。這種思想如果聽任發展下去而不加糾正，就會走到脫離以至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錯誤的道路上去。我們必須批判『以我為中心』的錯誤思想，加強無產階級的整體觀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念，加強革命的組織紀律性……」並提出：「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要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號令下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

當時許多人都沒有聽說過什麼「多中心論」，更不知道這個「多中心論」是誰散佈的，甚至以為是中央某人又要被揪出、打倒了。許多人都不明白這實際上是在暗示群眾組織的存在就是另立中心，這篇文章已經對文革群眾組織的繼續存在發出了警告。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由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擴大的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被全會「一致通過」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全會公報稱：「全會對於劉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極大的革命義憤，一致通過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公報還強調：要「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步伐，統一行動，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多中心論』……」

文革群眾組織已經不再有利用價值。「無產階級司令部」已經不再需要什麼「革命造反派」、「革命群眾組織」了，「多中心論」已經被定性為「反動的」和「資產階級的」。

「造反有理」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就在這樣的大形勢下，在八屆十二中全會期間，1968年10月15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在人民大禮堂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鬥、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兩大派群眾組織宣告，自即日起撤銷各自的總部。據《重慶日報》報道，這些撤銷總部的群眾組織是——

八一五派

重慶革命工人造反聯合總指揮部（包括重慶機關造反聯合指揮部、重慶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慶農民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紅衛兵重慶警備區

反到底派

重慶工人革命到底總司令部

重慶市農民革命軍反到底司令部[1]

重慶大專院校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

重慶中學生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

重慶機關反到底司令部

重慶文藝界延安兵團

同時宣佈撤銷的還有——

八一五派

重慶八一兵團總部

重慶二七戰鬥團總指揮部

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

重慶無產階級工人造反軍二分團

反到底派

重慶軍工井岡山總部

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一支隊

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總部

財貿井岡山總部

10月18日，《重慶日報》頭版頭條發表報道，報道的大標題是：

「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在鬥批改中立新功，本市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剷平山頭撤銷總部。」

---

1 當年由八一五派控制的《重慶日報》報道中所列出的這個反到底派農民組織名稱不確，應為重慶農民革命到底總司令部（簡稱農總司）。所謂「農民革命軍反到底司令部」只是作為農總司前身的另一小組織。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報道說：「這個大會，是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敬獻忠心的大會，是促進革命大團結的大會，是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掀起鬥、批、改新高潮的誓師大會。」報道歸納兩大派代表的發言要點說：

「反到底派和八一五派的代表分別在大會上發了言。他們回顧了兩年多來山城文化大革命的驚心動魄的戰鬥歷程，暢談了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深切體會。他們說，我們所取得的每一個勝利，都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都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都是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認真落實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堅決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切戰鬥號令的結果。」

大會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歌聲中結束。

群眾組織的市一級各總部撤銷後，一些基層組織也隨之無形中解散了。餘下的一些很快也在「歸口大聯合」中不復存在。

1969年1月3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辦事組、政工組發出通知稱：經市革命委員會第四次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決定，各系統革命群眾組織總部、各系統大聯委（兩派合組的大聯合委員會）一律於1月8日前撤銷。各系統總部和系統大聯委限於1月30日前將所有經費、賬冊、物資、資料文件，上交市革委會接收組，並將撤銷情況向革委會群眾工作小組匯報。原各系統總部和系統大聯委除留三至五人辦理交接手續外，其餘所有人員於1月8日前，返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1]

至此，重慶市的各級群眾組織基本上全部撤銷。

一些群眾組織實際上早已停止組織活動，只靠極少數人辦的小報、廣播

1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重慶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107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還勉強支撐着「門面」。但是這最後的一點「門面」也不再容許存在了。1969年11月17日（中央正式撤銷劉結挺、張西挺在四川省革委會中的職務前夕），成都軍區黨委、四川省革委會主要領導人張國華、梁興初、李大章、劉結挺、張西挺、謝家祥、徐馳、何雲峰、鄭志士聯名發出通知，其中明確要求：「全省所有的群眾組織所辦的小報、刊物和有線廣播（站）一律撤銷。」

按照毛澤東的部署，駐重慶的五十四軍移防滇西，於10月開始陸續調離重慶；駐滇南的十三軍調重慶接替五十四軍防務。重慶市革委會於11月26日在大田灣體育場舉行20萬人「熱烈歡迎十三軍光榮進入四川和重慶大會」。

深陷派性泥淖中難以自拔的五十四軍因移防而離去，對重慶兩派的停止武鬥及大聯合有一定促進作用。此後，群眾組織間的大規模武鬥基本上平息，武鬥形式主要轉變成為「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及其所屬整人機構（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專案組、清隊辦公室、批清辦公室、群眾專政大軍等）對被審查人員進行的刑訊逼供。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第九章

重慶大武門面面觀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武鬥中的軍隊

文革中發生在各地的武鬥，幾乎都與當地駐軍有一定關係。軍隊突然被拋入「史無前例」的險惡政治鬥爭之中，不得不在原黨政機關陷於癱瘓的局面下，承擔從不熟悉的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等工作，應付許多複雜的社會情況。毛澤東要軍隊「支左」，但對怎樣才算得上是「左派」或「無產階級革命派」，毛澤東與「無產階級司令部」並無明確的解釋，也沒有制定一套可操作的判斷標準，各地駐軍官兵只能自己去揣測、把握，大多是根據長期以來接受的階級鬥爭教育而形成的一些粗淺認識去判斷，再加上廣大官兵不是生活在真空裡，介入「支左」後，又受到當時當地社會思潮的影響，一般都很自然地會親一派疏一派，支持一派壓制一派，這樣就必然助長了一派的「唯我獨左」、「唯我獨革」思想，也刺激了另一派的對立情緒，最終往往就激化了矛盾。

在1967年11月6日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第三次接見重慶反到底派代表時，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在最後總結中說了這樣幾句話：

「在我們這個大國家，一個軍隊是小小的單位……我們一個小小單位，負擔這麼大城市的『三支兩軍』[1]工作，確實是我們力量有限。正因為我們機關小，水平低，比你們更要求革命幹部站出來，比你們心情還急迫。……研究工作，地方工作，我們根本不懂。該誰辦都不懂。」[2]

這些話，應該能夠反映出當時「支左」部隊領導人的真實思想。

---

1 三支兩軍：指解放軍部隊在文革中奉命開展的支左（支持左派廣大群眾）、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和軍管（對一些部門實行軍事管制）、軍訓（對學校師生進行軍事訓練）這幾件工作。

2 《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同志在聽取反到底派代表匯報時的插話記錄》，1967年11月8日，重慶工人革命到底總司令部政治部。軍工井岡山長安兵團六二〇縱隊翻印，1967年11月19日（油印資料）。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在當時的「三支兩軍」中，駐軍指戰員為「支工」、「支農」和解決市民生活必需品供應問題而付出的勞動，是最少爭議而最受民眾讚賞的。據記載：

1967年4月27日，重慶駐軍派出48輛軍車和2個連隊，支援運輸部門突擊運輸九龍坡火車站貨場積壓貨物。經十天突擊運輸，積壓物資由17.3萬噸下降為10.95萬噸。[1]

1967年5月，按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集中力量把重慶港口、車站、碼頭積壓物資盡快疏運出去》的電報指示，駐渝部隊和運輸部門職工再次組織以港口為重點的突擊搶運，經20天搶運，港口積壓物資由43439噸下降為28274噸，待卸鐵木駁由53隻下降為16隻。[2]

1968年3月下旬，重慶市四周專縣武鬥激烈，通往重慶的水陸交通中斷，市場糧食、煤炭供應極度緊張，出現搶購現象。重慶警備區組建糧煤專門運輸隊，以軍車帶民車突擊搶運。[3]

1968年5月，因重慶市四周專縣武鬥激烈，通往重慶的水陸交通仍然斷阻，全市糧食庫存至月底僅有4000萬公斤，其中大米僅夠七天供應，有的糧店脫銷。駐渝部隊緊急成立調糧辦公室，以軍車突擊搶運糧食，保證供應。[4]

從這些記載可知，當時的重慶駐軍指戰員實際上已經被當成了最有效、最不需要報酬的突擊勞動力。

如果僅僅是被臨時當成勞動力使用，那還不算什麼。可悲的是，當時軍隊被推上了政治鬥爭的前線，在這場「政治大革命」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這就使重慶駐軍深深捲進了群眾組織間的派性衝突，並在重慶大武鬥中出

1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08頁。

2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09頁。

3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3頁。

4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4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現了在和平年代本不應有的傷亡。

重慶駐軍在武鬥中的傷亡，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幾起：

1967年8月3日，重慶軍分區巡邏艇在駛經銅鑼峽時被望江機器廠軍工井岡山哨卡擊沉，艇上三位青年戰士不幸殉難。

同日，警備區助民運糧車隊行至楊家坪時遭遇槍擊，一輛車被打壞。另有兩輛運糧車駛經兩路口山城寬銀幕電影院時遭到槍擊，戰士四人受傷。

8月13日，駐望江機器廠部隊與反到底派武鬥隊發生衝突，重慶軍分區參謀長張廷勤和二名解放軍戰士不幸殉難。

8月19日，39陸軍醫院運菜車11時半經南岸四公里時遭到槍擊，一戰士殉難，一幹事、一司機受傷。

8月22日，重慶駐軍三輛軍車先後駛經兩路口時，在山城寬銀幕電影院前遭到企圖劫車的三名反到底派武鬥人員槍擊，五十四軍幹部處處長張甲奎、司機李永梁遇難，文化處處長郝子義、保衛處副處長曾惠平、衛生科科長齊宗勳、參謀吳士龍等中彈受傷。

重慶軍分區張廷勤參謀長之死一案，頗為複雜，現有的公開文字記載均語焉不詳。據《重慶市志》第一卷中的《大事記》記載：「望江機器廠派性武鬥隊進攻設在郭家沱中學的駐廠部隊指揮部，打死重慶軍分區參謀長張廷勤和二名解放軍戰士、一名工人。」[1] 而《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則稱：「望江機器廠造反派武鬥組織包圍駐廠部隊一連一排指揮所，連續開槍射擊，打死重慶軍分區參謀長張廷勤等三人，傷一人，部隊被迫還擊。」[2]

若按上述記載，是反到底派武鬥隊「進攻設在郭家沱中學的駐廠部隊指揮部」，「包圍駐廠部隊一連一排指揮所，連續開槍射擊」，這就成了公開

1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0頁。

2 《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重慶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99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向「支左」部隊開戰了，這在當時情況下，毫無疑問是要被宣佈為「反革命事件」，堅決鎮壓的。然而，當時卻並未發生這樣的情況，反而是駐廠部隊撤走了。可見事情還有更為複雜的另一面不為人知。另據知情者回憶，此事件中，軍工井岡山望江東方紅的武鬥人員是下午從山下上山去佈防設崗，走到半山腰時突遭襲擊，先後被打死八人，另外還有奉命開車前去搶救傷員的司機也被打死在駕駛室裡，而張參謀長被打死的地點，則是在「進攻者」看不到也打不到的地方。事後當局從未公佈過驗屍及現場勘察結果。上述兩記載中均未提到群眾組織一方的傷亡情況，只後一記載有耐人尋味的「部隊被迫還擊」一語。這一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武鬥，使軍隊與民眾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越來越響亮的革命口號背後，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派性意識。一方面，重慶駐軍與八一五派形成了日益親密的「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的「戰友」關係，另一方面，重慶駐軍與反到底派則形成了尖銳對立的、恨不得迅速壓倒對方的近似於「敵我」的關係。

文革結束之後的1985年3月20日，《重慶日報》報道《文革期間曾在我市「支左」的某部黨委專程來渝看望受迫害受衝擊的老幹部》，報道中說：

「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在重慶市進行過「支左」工作的某部黨委，聯繫實際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最近，由黨委負責同志帶領走訪組，專程來我市看望了當時受到衝擊的部分老同志，並聽取了他們的意見。

這個部隊黨委聯繫在重慶「支左」的實際，進行了徹底否定文革的專題討論。為了在思想上、感情上徹底否定文革，進一步搞好核查「三種人」的工作，總結經驗教訓，加強軍政軍民團結，部隊黨委決定，由黨委書記李九龍帶隊，來重慶聽取地方老同志的意見。在3月16日下午舉行的座談會上，李九龍同志首先介紹了部隊黨委進行的徹底否定文革教育的情況。他說，部隊當時在重慶「支左」，實際上就是支派，助長了派性，加劇了兩派的對立情緒；搞所謂「大批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判」，辦所謂「集訓隊」、「管訓隊」，傷害了地方一些幹部、群眾和民主人士；搞「突出政治」那一套「左」的東西，給地方經濟、文化建設造成了不良後果；個別「三支兩軍」人員，以權謀私，造成了不良影響。他代表部隊黨委向當時受到迫害和衝擊的幹部、群眾和民主人士表示歉意。

這個認識，應該算是比較符合實際、比較誠懇的。

武鬥中的專業武鬥隊

武鬥初起時的打架鬥毆階段，參與者並不固定，甚至還有未加入群眾組織的社會閒雜人員捲入其中。到了武鬥形成規模而使文化大革命變成「武化大革命」之後，應運而生，便出現了一種新的群眾組織：專業武鬥隊（說得好聽一點，叫「武衛」或「文攻武衛」隊）。

在西南師範學院「六五—六八」大規模武鬥事件發生後，1967年6月10日，重大八一五建立了「衛戍司令部」，並隨即建立了專業武鬥組織三〇一野戰隊（專事校外武鬥），主要負責人梁文福（重大冶金系六六級學生，共青團員）、三〇二部隊（專事校內武鬥及治安）。

6月12日至15日，北碚區砸派（反到底派）被八一五派從天府煤礦、東陽公社等地區趕出來的人員及其他一些單位的人員，在西南農學院建立了猛虎團，主要負責人邱開全（北碚歇馬鄉復員軍人，中共黨員）、王昌恆（天府煤礦工人，復員軍人，志願軍二等功臣）、王樹良（重慶棉紡織五廠工人，重紡五廠八二七負責人，復員軍人）、林銘榮（北碚航管站工人，復員軍人）等；其後，反到底派於8月20日在南岸區成立了「黃山警備區司令部」，主要負責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人鄧長春（軍工井岡山負責人）。此外還有建設機床廠的「紅大刀」，長安機器廠的「六月天兵」，望江機器廠的「金猴」，二輕兵團的「雄獅」，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的紅一連、紅二連，軍工井岡山的「艦隊」等。

這類以武鬥為「專業」的組織，後人將很難理解其成員的活動方式和思想狀況，往往會想當然地把他們想像成那種頭腦簡單、五大三粗，甚至毫無人性的當代土匪（中央「二六命令」中稱之為「反革命土匪」）或新式軍閥隊伍。

實際上，武鬥隊的成員，並非都是那樣的人，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不是那樣的人。組成武鬥隊的多是熱血青年（也有少數是少年），他們都是在文革前17年接受的「無產階級政治」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從小崇拜的是「革命英雄」，他們的許多行為方式，其實都是在模仿小說中或電影裡的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在最初以「冷兵器」進行武鬥的時候，重慶兩派的武鬥隊往往會在對陣時高喊毛主席語錄之類的口號：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

西南師範學院吳宓教授在日記中記下了一個參加武鬥的初中學生的事，這個學生是吳宓請的家務女工唐昌敏的兒子賀國昭。吳宓在1967年西南師範學院「六五—六八」大武鬥之後的6月9日日記中記載：

唐昌敏之次子賀國昭為八三一隊員，本月六日校內大戰中，有人見其左頰負微傷，仍續戰鬥。是日，戰前，曾來見其母（唐昌敏），以其八三一隊員證章等交其母，且為訣別之辭。……至今日下午，猶不見回家。懸知必已戰死矣！[1]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52—153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賀國昭當時是重慶市第十三中學（在北碚）初中學生，說他是「八三一隊員」其實不確，只能說是八三一這一派的人員。十三中九八戰鬥團，是與西師八三一戰鬥團有着相同觀點並且在「鎮反」運動中一起受到過打擊的學生組織，是北碚地區砸派（反到底派）的主力之一。

吳宓大概也為賀國昭的命運擔憂、焦慮了一夜。第二天（6月1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宓謂唐昌敏云：賀國昭或未戰死，而隨八三一軍撤退。果爾，下午賀國昭竟生還，來見其母，匆匆又去，將續在八三一軍中作戰，以潛伏校內之軍工隊之援助，準備抗擊再來攻擊之八一兵團云云。[1]

後來吳宓在一次學習發言中說：「此次『武鬥』中，許多家庭、父母力圖勸阻子弟勿往參加『武鬥』，然其子弟固皆少年，年富力強，輕生而好勇，堅決參加，一若非衝鋒陷陣，流血戰死，則不足為人者。——於是順逆正邪各組織，皆易鼓動少年為之效死。」[2] 吳宓平時以「反動權威」、「反共老手」之身被監督勞動、學習，並無機會接觸到造反派的武鬥人員，對他們那種「輕生而好勇」、「一若非衝鋒陷陣，流血戰死，則不足為人者」的狂熱表現，很難有所瞭解，顯然是賀國昭「訣別」母親的情景使吳宓有了這方面的見識。

一位曾親歷過武鬥的當年中學生，多年後在一部紀實文稿中寫道：

參加武鬥的那一代人，都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他們從小所受的就是革命教育，家長、老師、組織、社會都要他們學英雄，做英雄，不怕苦，不怕死。當年誰沒讀過《紅巖》、《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誰不知道《牛虻》、《鋼鐵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53頁。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219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不管男生女生，長大當解放軍，幾乎是所有人的第一理想。不管問誰，都可以一口氣給你背出一長串戰鬥英雄的名字來。文革一開始，這一代人那樣投入，與那十幾年的革命教育是分不開的。真的，好多人都為沒有趕上戰爭年代而遺憾，又為能趕上文革而慶幸。[1]

在「崇高理想」的鼓舞下，武鬥人員中還常會出現一些「奇跡」。上述作者在他的文稿中記載了1967年8月兩派激戰建設機床廠制高點清水池時的一些史實，當時，反到底派的增援部隊中有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紅二連：

這紅二連是南岸區的中學生組建的，頭天晚上才分頭趕到建設廠，11點鐘才領到槍，都是第一次拿到真傢伙，一個個興奮異常，晚上合衣躺在車間那冰冷的地上打了個盹，天一亮，就被派到戰場上。而且，沒有人畏縮，打得又不錯，可否算是奇跡呢？

……

就這樣，你打過來，我打過去，反覆爭奪，數易其手，從清晨一直打到太陽偏西。不斷有傷員被抬下來，到處是死屍，到處是鮮血。……打仗的人忘了那當頭的烈日，忘了肚皮的嘰咕，除了喝水，什麼也不想。從來沒打過仗的人，頭一次參戰便那樣勇敢，那樣熟練，那樣投入，也只有「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紅衛兵造反派」才能辦到。[2]

當年重大八一五戰鬥團有名的專業武鬥隊三〇一野戰隊，在多次大規模武鬥中衝鋒在前，傷亡慘重，其組成人員都是年輕的大學生。《八一五戰報》曾發表過對三〇一野戰隊熱情歌頌的文章《一支非常革命化的戰鬥隊》：

「三〇一部隊是毛主席革命路線最忠實的捍衛者！」「三〇一部隊是文攻

1　李衡之《重慶武鬥瑣記》，未刊稿。

2　李衡之《重慶武鬥瑣記》，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武衛的模範！」「三〇一部隊是重大八一五的驕傲！」「向三〇一學習！向三〇一致敬！」這是八一五革命派對我團三〇一部隊最熱情的頌揚。

三〇一部隊是在階級鬥爭最激烈的時刻，在戰火之中誕生的。自她誕生之日起，英雄的三〇一戰士就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決響應江青同志「文攻武衛」的戰鬥號召，對敵狠，殺得敵人聞風喪膽。在歷次自衛反擊戰中，三〇一的健兒冒着槍林彈雨，衝在最前面，打得最勇敢……

同時，該報還發表了通訊《我團戰士紛紛報名參加三〇一部隊》：

為死難烈士報仇！為山城人民除害！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廣大戰士連日來紛紛向有關單位遞交申請書，堅決要求參加英雄的三〇一部隊。他們激動地說：「我們山城八一五革命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和捍衛者，目前，砸眾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指揮下已經舉起了屠刀，對我八一五派施行了殘酷的大屠殺，奪去了我們多少優秀戰友的生命，面臨着張牙舞爪的匪徒，我們能退卻嗎？不能！不能！唐世軒、張全興、李盛品、蘇玉發、何孝柱、劉文舉、肖在光、高維命、段亞偉等同志已經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英勇犧牲了，我們一定要以他們為榜樣，接過他們手中的筆和槍，文攻武衛，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終生！」[1]

重大八一五三〇一部隊中，當時還出了一個大家讚頌的英雄，在《八一五戰報》上發表的《毛澤東思想的一曲凱歌/記我們身邊的麥賢得——董繼平同志》，對他的「英雄事跡」作了如下記載：

陽光雨露育青松，毛澤東時代出英雄。我們懷着無限激動的心情，給大家介紹我們身邊的麥賢得，他就是重大八一五，六一八分團優秀的紅衛兵戰士硬骨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38期，1967年9月9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頭董繼平同志。

董繼平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硬骨頭精神，不僅表現在自衛的戰場上，而且表現在醫院裡。在八月初旬的一次保衛空壓廠的戰鬥中，他為了掩護戰友不幸頭部中彈，腦漿迸出，在生命垂危的緊急關頭，他被戰友送進××醫院。

在醫院的很多天中，他一直處於休克狀態，不能吃飯，只能從鼻腔裡打點葡萄糖針，呼吸困難，只好在他的喉頭側面開個小口幫助呼吸。他右半身癱瘓了，右手也癱瘓了……但這一切，沒有嚇倒這位英雄的八一五戰士，這位我們身邊的麥賢得式的英雄。他以極大的毅力，戰勝了傷口的疼痛。他在神志十分模糊的情況下，他仍能記得我重大八一五，英雄的三〇一戰士的光榮任務——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隨時準備給來犯的一小撮壞傢伙以沉重的打擊。當他第一次睜開眼睛不久，他就能用唯一能活動的左手比出一個「三」，這是他對人們的一切問話和社會上一切現象的唯一反應，從這裡，可以看出這位無畏的戰士，在幾個月用生命和鮮血在保衛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戰鬥中，對我重大八一五的驕傲——英雄的三〇一部隊有着何等深厚的階級感情！

當他精神好時，常用唯一能動的左手給來看望他的戰友、同學、親人寫「毛主席萬歲」！「八一五，三〇一」，他性格無比堅韌剛強，一次西交大一同學寫給他的一封慰問信，他固執地用他自己的左手去拿出來看，而不許人幫忙。為了早日返回戰鬥崗位，他忍痛進行着頑強的鍛煉，他常常用唯一能動的左手去幫助癱瘓的右手活動，他在敵人面前是勝利者，在創傷面前也是勝利者。

……當我們去看他，喊「毛主席萬歲」這個口號時，他萬分激動地舉起創傷的手並翹起大拇指，當我們講到劉少奇、王光美時，他馬上比起小拇指。看這是何等高尚的感情！何等鮮明的愛憎啊！[1]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42期，1967年10月1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此文把董繼平稱為「我們身邊的麥賢得」，在當時是很自然的事。麥賢得是文革前夕1965年「八六海戰」中解放軍海軍六一一艇的輪機兵，在戰鬥中頭部被彈片擊中，失去知覺。甦醒後以驚人毅力頑強堅守在主機旁，事後被授予「戰鬥英雄」稱號，其事跡幾乎家喻戶曉，成為廣大青少年崇拜的偶像。從有關董繼平的這一則報道也可以看出武鬥人員的思想與文革前革命傳統教育之間的關係。

反到底派中有個著名的專業武鬥隊北碚猛虎團。這個組織的人員組成不如重大八一五的三〇一部隊那樣單純，它是由北碚區反到底派的工人、農民、財貿職工、學生及其他市民混合組成的。在猛虎團於1967年10月14日寫給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省革籌組和成都軍區的匯報材料中，稱：

猛虎團是代表全區人民的心願，是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能夠在北碚區得到徹底勝利而成立的，為了更深入地揭發批判本區的走資派，徹底挖掉李、任死黨在北碚的黑根子。我們同時還擔負了「文攻武衛」的任務，確保「四大」的正常開展。我們堅決反對武鬥，堅決制止武鬥。文攻武衛是我們的重要原則。[1]

當年反到底派小報上發表過《不准把猛虎團打成反革命》一文，文中說：

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激烈的大搏鬥中組織、成立起來的反到底北碚猛虎團，它集中了北碚地區大批最早起來造反，長期慘遭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多次被打成「反革命」的，經過一年多階級鬥爭急風暴雨鍛煉和考驗的革命造反派。它是一支以工人階級為核心，工農革命群眾為主體的敢於革命、敢

1 《反到底北碚猛虎團匯報材料》，軍工長安兵團宣傳組六二〇代印（油印件），1967年10月31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於勝利的革命隊伍，是北碚地區近百個革命造反組織中的骨幹力量。[1]

西師八三一在1967年10月28日《紅巖》報發表《謠言殺不了英雄的猛虎團》一文時，還巧妙地以醒目的字體配發了這樣一則毛主席語錄：

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為殺人放火，姦淫搶掠，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公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這樣地奇怪，就是這樣的一群，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群眾的擁護。[2]

在這裡，當年的造反派已經把自己比作昔日與執政的國民黨作鬥爭的共產黨了。與之相應，對立派顯然就被視為當年的「國民黨反動派」了。當時兩派都是這樣認識問題的，這也是武鬥得以打起來並且越打越大的思想基礎。

當時反到底派財貿井岡山的主要負責人甘廷榮回憶：

武鬥的時候，武鬥隊我們要求也是很嚴的，每個人要填表，發的槍要登記槍號。我不讓出身不好的人參加武鬥隊，怕今後有什麼事情他們會先遭整。我還勸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志不要當頭頭。因為這樣，有的人認為我像譚力夫一樣講出身，喊我「甘力夫」。

武鬥隊是在食堂吃飯，不拿錢、糧，算「供給制」。我們這些頭頭都很自覺，都是自己拿錢、糧吃飯。[3]

1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字412部隊紅旗造反團主編《風展紅旗》第17期，1967年11月4日出版。

2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1485頁。

3　何蜀記錄整理《甘廷榮談重慶文革》，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專業武鬥人員除了享受「供給制」待遇（吃飯、抽煙不自己掏錢，有的還發勞保服）外，一般不會有其他的「物質刺激」。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1967年8月28日凌晨，八一五派武鬥隊以優勢兵力向反到底派佔據的北碚歇馬場解放軍總字四二四部隊（通信兵技術學校）發起突然襲擊，死傷數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離。至此，八一五派佔領北碚全區，此役被八一五派稱為「八二八大捷」。9月3日，八一五派在北碚召開「八二八祝捷大會」，參戰有功的武鬥隊員扛着槍、捧着獲贈的獎品參加慶功遊行，獎品是什麼呢？是被稱作「紅寶書」的一套《毛澤東選集》。

當時也有被動員進城參加武鬥的農民會多記工分或發一點現金，但這是會被一般「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的專業武鬥人員所看不起的。

其實，那時參加武鬥或支持武鬥的人，並非都喜歡武鬥。有一則當時的日記可為佐證。這是重慶第三中學一個女中學生的日記，她是八一五派三中抗大兵團成員，該兵團有一位武鬥隊負責人艾淑全在1967年8月3日武鬥中身亡，這位女學生在8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

武鬥加劇了，什麼武器都用上了，自動槍！大炮！坦克，有些援越物資也使用上了。我是討厭和反對武鬥的。現在艾淑全烈士的死，使我更痛恨武鬥了。但已打起來了，不打，我們沙坪壩保不住。所以我又覺得可以在後方做一些工作。[1]

武鬥中，武鬥人員殺人、搶劫、強姦等事件時有所聞，有的甚至被傳得十分離奇、恐怖。不過，當時那些宣傳有不少是出於派性的炒作。事實上，正式的專業武鬥隊成員中出這類刑事案件的極少。特別是一些影響較大的群眾組織，對參加專業武鬥隊的成員要求是比較嚴格的，有的還特別規定只能是「出

1 根據徐若丹日記原件錄入，由徐若丹妹妹徐軍提供。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身好」、「思想好」的人，經過總部審查批准，才能參加，而且還要經常組織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之類文件和毛澤東的著作、語錄。工人組織中的專業武鬥隊人員抽煙是「供給制」，而一些學生組織中的專業武鬥隊甚至規定不准抽煙，視之為違紀行為。

一位親歷者在其紀實文稿中寫了這樣一件很典型的事例：

參加武鬥的，絕大多數是學生和青年工人，身體剛剛發育成熟（有的還未成熟），正處在性危險期，如果是現在，那局面肯定難以收拾。但是，文革前那種革命的禁慾主義的教育，卻使絕大多數人有很強的自制能力。特別是女生，把性當作是一種極端低級極端下流的東西，不少人根本就不懂。一天夜裡，一個班的武鬥人員被派到山上去警戒，兩個女生硬要跟着去。到了下半夜，年輕人都疲倦了，便在樹下的凹凼凼裡橫七豎八睡起來。兩個女生就睡在男生們中間。又是夏季，穿得又少，卻沒有誰想到，更沒誰做出任何非禮的動作來。天亮了，樹上鳥兒嘰嘰喳喳叫醒了沉睡的人，大家爬起來，也沒誰想到那一回事，沒有誰臉紅，很自然的。後來——那是幾年後了——一個曾睡在那女生身邊的男生（是某廠的青工）說：「當時好傻呀，都不曉得趁機摸一把！那女生的乳房好大！」這當然是下流話了，可也反證武鬥時那些武鬥人員還算清白。[1]

如果認為當年的派性文章或當年武鬥親歷者的回憶缺乏客觀性，都不足信的話，那麼，多年後第三者的回憶，應能反映出一些歷史的真實。

武鬥期間在重慶市革籌組協助軍人整理簡報的前市人委幹部張光明，有這樣一段生動有趣的回憶：

1967年8月底，即「反到底」攻過嘉陵江大橋，佔領了上清寺至兩路口一帶後，武鬥稍有平息，社會局面漸漸穩定。行人可以在街上通行，車輛可以上主

1　李衡之《重慶武鬥瑣記》，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幹道運送貨物了。糧店、肉店、副食品店已經開始供應定量物品，百貨商店、餐廳也慢慢營業了。「反到底」為了安定佔領區的民心，做了一些「便民」、「保民」的事情。儘管方式不那麼恰當，但從實際效果上講，的確對老百姓有些好處。例如，那時社會混亂，小偷橫行。武裝人員便在晚上10點到次晨7點實行宵禁。宵禁開始，派幾隊武裝上主幹道，從兩路口到嘉陵江南橋頭，朝天放一陣排槍。街上行人被驅散，再定時巡邏。小偷怕死，就不敢進這個區域作案了。訪得家有孤寡老人，武裝人員還要與商店聯手，為你把米、菜、煤送到家裡來，再把錢和票送還商店。肉店、米店、煤店門前有武裝人員站崗，不許插輪子。賣肉必須一視同仁，搭配合理。否則，武裝人員要管。走失了小孩，丟失了東西，武裝人員撿到了，會給你送回……

我家住在佔領區。我有好長時間沒有回家了，想回去看看。……回到家，家裡告訴我一件奇事：前兩天，武鬥人員給我家送還糧本。當時以為是來抓人的，滿院子都嚇了一跳。

糧本是每個家庭吃糧的戶口。你家幾口人，每個人該吃哪一個等級，全家的定量總數，每個月領取糧票的記錄，每一次買糧的記載，都在這個本本上。這可是一家人的命根子！可是，我家裡人去買糧時，不小心把糧本丟了，自己還不知道。前天中午，兩個揹槍的武鬥人員找到我們院子裡來，在樓層大喊：「這裡住的有不有個張光明，人在不在？」沒有人敢應聲。武鬥人員又喊：「張光明在不在，出來一下。」還是沒有人敢應聲。鄰居沒人敢吱聲，我的家屬更是不敢露面。

我們這一層樓，住着市委、市人委的六家人。熟人熟事的，平時比較友好。可文革開始後，六家人中，有幾家贊同「八一五」，有幾家贊同「反到底」。我和部隊在一起工作，一般認為軍隊支持「八一五」，因而大家把我看成「八一五」觀點。武裝人員高喊張光明時，持「反到底」觀點的以為是要抓我，暗自高興。在喊第三次時，便有人伸出頭來向我家門的方向嚕嘴。這在當時謂之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點水」。武裝人員便走到我家門前問：「你們家丟東西沒有？家裡有人沒有？這糧本是不是你們家的？」問了三聲，家裡聽說是丟了糧本，才戰戰兢兢出來，接過一看，果然是我家的，馬上點頭稱是。武裝人員見找到了失主，告誡說：「今後要把東西撿好，不要弄丟了。這糧本幸好是我們『反到底』撿到，親自給你們送回來。要是『八一五』撿到，一爪給你甩了，你們喝西北風去！」然後對着全層樓的人高喊：「你們大家都看到了。我們『反到底』愛護人民群眾。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我們堅決保護你們人民群眾的利益！」

說實在的，他們也確實能夠做到這一點。武鬥嚴重時，我們那一個單元的人跑光了。他們為了控制住制高點，曾經侵佔過我樓上的兩套房。主人不在，他們破門而入。把機槍架在當街的陽台上。武鬥撤出時，破壞的門主動修復，住戶的東西一件未丟。武鬥人員還給住戶寫了條子，放了錢，表示歉意。這顯然是學的紅軍和八路！[1]

這類「好人好事」，在當時兩派的武鬥隊中都有，並不稀奇。總之，對於文革中的武鬥隊，不應簡單化甚至妖魔化地視之為「土匪」或「軍閥」隊伍，他們什麼也不是，就是文革中的武鬥隊，一種「史無前例」的特殊形式的「革命群眾組織」。

武鬥中的「烈士」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烈士」應該是「為正義事業而犧牲的

1　張光明《騷亂的重慶——文革十年親歷記》，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人」。在文革武鬥中死去的人，當年都曾被認為是「烈士」——因為當時的官方宣傳稱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最偉大的事件。這個革命，使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個革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1] 為了這樣的「大革命」而獻身，自然是當之無愧的「烈士」了。翻開當時的紅衛兵、造反派自辦的小報，可以看到不少「烈士」遺像及「烈士」事跡介紹、「烈士」日記摘抄和悼念「烈士」的詩文，還有那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以血還血，以命抵命！

頭拋山河壯，血灑戰旗紅！

頭斷西南，血染四川，不打倒劉鄧心不甘！

活着幹，死了算，不打倒劉鄧非好漢！

斷頭流血何所懼，誓死保衛毛主席！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絕我兵團，自有後來人！

提着腦袋也要跟着毛主席幹革命！

……

後人讀這些文字，會感到可悲，甚至可笑，然而，在當年，能夠清醒地看待這一切的有幾人？

當時各群眾組織都要為自己一方死難的「烈士」召開隆重的追悼會，會上一般都要把那首毛主席詩詞歌曲《蝶戀花．答李淑一》當作「葬禮進行曲」，那高音喇叭中反覆播出的「我失驕楊君失柳……」的悲愴歌聲，會使參加追悼會的人們一時間恍然覺得死者是與國內戰爭年代被國民黨殺害的楊開慧和柳直荀（實際上柳直荀是被共產黨自己在內部「肅反」中殺害的）一樣會

1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1967年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永垂不朽」。因毛澤東這首詞中有楊、柳二烈士的英魂升天（「直上重霄九」）後「吳剛捧出桂花酒」一句，所以當時提到某人在武鬥中死了時，就有了一個形象的說法：「喝桂花酒去了。」

尤為可悲的是，獻身者義無反顧，視死如歸，有的家屬竟然也同樣認為自己的親人「死得其所」，「重於泰山」，要「繼承遺志」。

1967年7月29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及八一五派一些組織在重大「八一五廣場」舉行「烈士追悼會」，悼念在「七二五」攻打工業校時身亡的兩位大學生張全興和唐世軒。據報道：

張全興、唐世軒二烈士的父親，也在大會上發了言，他們激動地談到，自己的兒子是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死的，希望廣大八一五派的革命戰友，繼續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他們的兒子報仇，向李任死黨討還血債，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1]

兩個多月後，重大八一五又舉行了一次規模更大的追悼會，悼念武鬥以來陸續「犧牲」的該校13位大學生。重大八一五的《八一五戰報》為此發表了報道《踏着烈士的鮮血前進，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團舉行段亞偉等13位烈士追悼大會》：

（本報訊）10月9日上午8時半，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在我校風雨操場舉行段亞偉等13位烈士的追悼大會，沉痛悼念毛主席忠實的紅衛兵，八一五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烈士的父母也在會上發言，他們說，我失去了親密的戰友，心愛的兒子，內心是非常悲痛的；但是我又感到驕傲，因為培養子女的目的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鬥爭。我們的兒子是堅強的八一五戰士，是毛主席忠實的紅衛兵，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現了八一五

1　《死難烈士永垂不朽/重大八一五舉行烈士追悼大會》，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35期，1967年8月8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的鋼鐵誓言。[1]

1967年6月28日，反到底派重慶醫學院重醫兵團舉行「烈士」追悼會。在23日重醫附屬小學武鬥中身亡的重慶醫學院25歲大學生陳鏗的父親在會上作了《化悲痛為力量》的發言，他說：

我的兒子陳鏗犧牲了，為文化大革命獻出了他年青的生命，我是感到很悲痛的，但是，想起了陳鏗堅定的革命意志，我又感到自豪。[2]

重醫兵團在幾天後的7月4日舉行了又一次「烈士」追悼會，在7月1日武鬥中身亡的重慶醫學院畢業生于可的母親作了《擦乾眼淚，接過戰旗》的發言，這位母親在發言中忍住悲痛說：

同志們，從此我就失去心愛的兒子，黨和國家又失去一個接班人，我們又少了一份革命力量！我內心萬分悲痛。但是為了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為了國家永不變色，我擦乾眼淚，化悲痛為力量，與同志們一道沿着革命烈士的血跡，革命到底！我的兒子和他的戰友雖然英勇犧牲，但喚醒了山城更多的群眾覺悟，使他們認清了李任死黨及其同夥，認清了山城趙永夫的猙獰面目，都紛紛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3]

如果把這段話中的「李任死黨及其同夥」、「山城趙永夫」之類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語彙去掉，這位母親的發言，與過去那些烈士母親、英雄媽媽的講話又有什麼不同？

---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43期，1967年10月18日出版。

2 河校航鋒、重醫兵團主編《東方欲曉》「六二三」特刊，1967年6月30日出版。

3 河校航鋒、重醫兵團主編《東方欲曉》第12期，1967年7月12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1968年2月下旬，在西南師範學院掌權的八一五派春雷造反兵團安排「反動學術權威」吳宓等「牛鬼蛇神」教師為他們趕抄大字報。吳宓在2月26日日記中記載：

2：30—6：00中文系上班，到者五人趕寫大字報。緣三月四日為春雷造反兵團成立週年紀念，欲舉行慶祝，故春雷命寫之大字報特多。今日下午發出者，皆1967十二月二十四日《春雷．無產者專刊》（追悼春雷在「武鬥」中戰死之烈士專號）所登載之文章。

其中成組長分配與宓抄寫之一短篇，為悼念周虎溪烈士者，題曰《接過紅旗，勇敢前進》，係「周虎溪烈士愛人（其妻）廖少雲」所撰（載《專刊》第二版），約1300字……按《傳》：周虎溪烈士湖南湘鄉人，貧農出身。1964北京師大畢業。是年九月來到中文系任助教。1967五月隨春雷隊往梁平西師分院；七月十六日下午，在梁平兩派「武鬥」中（扶病退卻）戰死。[1]

2月28日日記中又記載：

（上午）宓僅寫一短篇，亦《春雷．無產者追悼專刊》所登載者，題曰《毛澤東思想是生命的靈魂》，內容為楊捍東女烈士1966十月五日之日記三條……楊為西師教育系1967級學生（女）。曾於1966十月之夜，在天安門前得見毛主席，遂改名為楊捍東。1967年七月紅巖山區龍車山之龍崗寺所駐之當地八一五來西師告急，求援，楊自請春雷派其帶隊前往，與八三一猛虎團對戰多日。曾躬自肩挑百數十斤，護糧隊上龍車山。

（下午）宓寫一短篇，完，亦《春雷．無產者追悼專刊》所登載者，題曰《沿着毛主席開闢的航道前進》，內容為曹邦友烈士日記摘抄……曹為西師教育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389—390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系1966級學生（男），1967年七月十一日在碚與西師八三一作戰，陣亡。[1]

2月27日，吳宓抄寫完周虎溪「烈士」之妻廖少雲的悼念文章後，忍不住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感慨：

按此文乃為妻者哀悼其戰死之丈夫而作；然篇中絕無私情之依戀，只有遵從毛主席思想及革命路線，為八一五派（春雷）在「武鬥」中勇敢作戰、壯烈殉身之志氣、精神。妻擬繼承其亡夫之遺志。母病危，急電去，夫亦不肯歸。又彼等結婚十餘年，為夫者只有檢查、糾正、提高其妻之政治學習、思想改造之事；此外種種，毫不關心。其與中國歷代哀祭之文何其大不同哉！[2]

當年重大八一五的戰報主筆周孜仁，多年後回憶了他的一位死於武鬥的同學李盛品：

我至今保存着他死前給女友的信件的副本。這封信是武鬥剛開始時寫的，來不及寄出他便死了。他到一個據他說「比較危險的」地區參加武鬥。那時使用的是自製手榴彈，因為毫無製造經驗，產品引爆時間普遍偏長：這在戰場上是很危險的。為了控制質量，他在試驗地讓大家散開，自個兒拉掉引信，然後將手榴彈握在手上測算投彈的最佳延遲時間。萬萬沒想到，他試驗的這一顆：引爆時間恰恰很短：他粉身碎骨了。在那封沒來得及發出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若有什麼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訴家裡人，如果我媽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會再活下去了。你若有空，希到我家去玩，以免除家裡人的懷疑。他們若問到我，你可編些話來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後語，要先想好。你得消息後，要說不難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391—392頁。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391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過那是假的，我只希你不要傷心過度就行了，不要影響身體健康，要想開些，我對得起黨和毛主席對我的培養，沒有辜負他老人家，我想，你只要想到這一點，可能心裡就會開朗些。」同學們感動於他的赤誠，在連天炮火中把他母親和女友從遙遠的山區接來了學校。當時我曾趕去看了，老母親撲在桌上痛哭不止，整整一個下午沒抬起過頭：我只能看見一部散亂的蒼蒼白髮，那麼耀眼，那麼懾人心魄！……

他給女友的遺書裡另有這麼一段：「我經常在想，如果沒有祖國的前途，一切所謂什麼個人的前途都是騙人的……階級敵人隨時都在夢想變天，我們怎能睡大覺？……現在的問題是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還是夭折的問題。毛主席早已下了決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現在是決戰時刻，是關鍵。我們一定要努力奮鬥，不怕犧牲。」他給他摯愛的女友的最後祝福是：「祝你放開眼界看未來，堅定不移向前進！」[1]

當年重慶市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成員張魯，二十多年後在回憶他的幾位死於1967年8月重慶大武鬥中的同學時，含淚寫道：

二十幾年來，有人說起這事，我腦海裡便湧起一組難以磨滅的形象記憶：

……一個青年學生用單薄的身體擋住二樓窗口擋住槍口，為他人留出一條活路……

……一個青年學生，聽不得女生的哭告，甩起手就走，去救槍口下的同學，結果卻沒有轉來……

倒回去二十年，他不就是陳然、邱少雲、黃繼光？

倒回去五十年，他不就是秋瑾、林覺民、譚嗣同？

倒回去千百年，他不就是田橫、荊軻、文天祥？

1　周孜仁《關於另一類受難者的思考》，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華夏文摘增刊276期．文革博物館通訊115期》，2001年12月10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殺身成仁，捨身救人，以身殉國，捨生取義……

本民族一脈相傳的精神基因，他們都如此忠實地繼承了，可他們卻只能是孫渝樓，只能是張光耀，只能是余志強，只能是歐家榮，只能是崔佩芬、唐明渝，只能是……

……

你們錯在哪裡？

你們生不逢時？死得不值？生錯了？死錯了？

你們才剛剛十六歲十八歲二十歲啊……[1]

周孜仁在《關於另一類受難者的思考》一文中，談到在武鬥中身亡的「烈士」時感慨道：

他們通過死亡所表現出來的信念、無私、勇氣和英雄主義，不正是從他們光榮的前輩：從董存瑞到雷鋒、從劉胡蘭到江竹筠那兒一脈相承的嗎？而所有這些，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們對他們多年教導的結果。……

他們有工人、平民、學生，有的甚至是尚未成年、或者剛剛成年的少男少女。他們沒有被尊敬過，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閱歷，而他們恰恰是想為國家和民族創造奇跡和功勳的人。他們正是懷揣着在壯麗革命背景下創造一段讓人羨慕的個人歷史，而愚蠢地、真誠地、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死亡。這一大批人，也應屬於文革的受難者。[2]

在漢語詞彙中，「犧牲」一詞可作不同的解釋，既可用來表示為正義的目的捨棄自己的生命，也可用來指稱為祭祀而宰殺的牲畜。那麼，這些在文革

1 張魯《紅衛兵武鬥懺悔錄》，載《紅巖春秋》雜誌1995年第一期。

2 周孜仁《關於另一類受難者的思考》，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華夏文摘增刊276期．文革博物館通訊115期》，2001年12月10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武鬥中身亡的人們，應該算何種意義上的「犧牲」呢？

武鬥中的虐俘與殺俘

毛澤東在1970年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的談話中說：「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話……第二條我很不高興的，就是捉了俘虜虐待。」[1]

其實，這兩樣他「很不贊成」、「很不高興」的東西，都是在他長期教育影響下才形成，並在他的「親自領導」下才氾濫成災的。

因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酷」，「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要「痛打落水狗」……長期接受這類教育和宣傳影響的造反派，在武鬥中就很容易把經常學習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拋到腦後，做出不少虐俘甚至殺俘的事情。在雙方的小報上，都可以看到攻擊對方關押俘虜處是「集中營」、「60年代的渣滓洞」、「60年代的白公館」等等的控訴。

重慶電視台編劇張魯在《紅衛兵武鬥懺悔錄》一文中回憶了他親見的一次虐俘活動。這些俘虜並不是武鬥中抓到的對立派人員，而是當時一夥「社會上的」（不在任何群眾組織派別中的）打架鬥毆者。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的紅衛兵武鬥隊以重慶市中心區的治安警察自居，得到群眾舉報後持槍跑去把那夥正在鬥毆的人抓到了學校，然後：

也不審也不問，就說，你們不是喜歡打麼？就打嘛。於是命那兩撥人就在

1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176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大操場扯開架勢打。哪還敢打？就說，不打？老子好久沒打了，今天倒要看下子你們是咋樣一個打法的，也算過個癮。那幫人還是不敢打。就又說，好嘛，不打群架，那就單練。就將兩撥人一邊喊出一個來，發了刀刀棒棒，單練。還是不敢。就喊其一趴下，令另一舉棒打去。這一位不敢打重了，看起沒勁，學生中就有一人悠悠從觀戰者一群中走出，伸出兩指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從此人手中要過棒棒，拉開過去衙門打板子的架勢照趴着那位一頓痛打，打畢，把棒棒交回站着的人手上，伸出兩指推推鼻樑上的眼鏡，悠悠回到觀戰者一群，活像體育課被老師叫出隊列投了一回籃又回到隊列。就問那人，這下學會沒有？那人連連應聲，會了會了。舉起棒棒要打。但有人說，打學會了，該學捱了。於是就換了趴着的那位起來，命這位趴下，趴着的那位自然將這頓痛打的怨氣全發洩在這位身上，棒棒舞得比眼鏡更圓。於是這兩撥人打了又捱捱了又打，直把個重慶市第二十九中學大操場打得來辟辟啪啪媽啊娘的響聲連天。這還不算，又有人想出點餘興來，叫這兩撥人「大聯合」合二為一列成方陣表演當時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流行歌舞《車水忙》。直到此時我才覺得這夥五大三粗的漢子真正可憐，他們五大三粗五音不全身帶棒傷還要學女學生扭腰擺臀載歌載舞：「車水忙，車水忙，腳踏水車喜洋洋，水過清渠嘩啦啦響……」[1]

跳《車水忙》不知從什麼時候流傳開來，成為當年雙方虐俘中的一個「保留節目」，反到底派武鬥人員也同樣逼迫八一五派的俘虜跳《車水忙》，不跳的，或者說跳不來的，就要用棍子打腳，逼得其非跳不可。當年流亡成都的反到底派人員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們抓到的八一五派俘虜中有一個是跛腳殘疾人，在被要求跳《車水忙》時，「自報節目」說跛腳不好跳，唱一個歌給你們聽要不要得？獲准後，那跛腳俘虜便臨時根據文革前的流行歌曲《亞

1 張魯《紅衛兵武鬥懺悔錄》，《紅巖春秋》雜誌1995年第一期。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非拉人民要解放》編了個討好的歌曲《反到底人民要解放》唱起來：

反到底人民要解放，

革命烈火越燒越旺，

燒得那個偽革聯心驚膽戰。

從軍工井岡山到西師八三一，

從造反軍到財貿九二一……

他把反到底派的知名組織都編進了歌裡，於是得到讚賞，免遭「觸及皮肉」。

當時在重慶大學圖書館監督勞動的「摘帽右派」賈唯英，回憶了她親見的一次重大八一五虐俘情況：

8月某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派攻打北碚後，抓回一批紡織廠女工，約20人左右。這些女工由一批頭戴籐帽、手持木棒的女武鬥士押着送往七大樓。這些女俘虜被手帕蒙着雙眼，繩子拴着手，一個連一個，牽成一線，由最前面的女武鬥士拖着走。這些俘虜由於看不見，加上道路不熟，又是爬坡上坎，走得踉踉蹌蹌。誰走慢了，誰跌倒了，劈頭就是一棒。有的跌倒了，爬不起來了，就被前面的人拖着走。有一個女工有孕，跌倒了就再也爬不起來了……我們站在圖書館台階上觀看的人，莫不感到心酸、氣憤，但又無可奈何！[1]

當年重大八一五的戰報主筆周孜仁，在回憶錄中寫到了他在重大校內見到的兩次虐俘事件，兩次的主事者都是重大八一五負責校內治安的專業武鬥隊三〇二部隊成員（被同學們戲稱為「鄉丁」、「門檻猴」）：

一次是在兩派武鬥最為激烈、仇恨也最為激烈的時期，「門檻猴」在校內捉奸細，輕而易舉抓來了一位女老師。該老師是校文工團的話劇演員，不知怎麼

1　賈唯英《武鬥中的重慶大學校園》，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參加了砸派……有人揭發，說就是她給出的信號，致使我校某目標遭到了砸派炮擊，損失極為慘重。總之，就為這個，原來非常尊敬她的「鄉丁」們斷然將她抓了來，綑在一張櫈子上，四五個壯漢圍着，用煙頭燒她的手臂，還用手搖電話機對她實施電刑。弄得她一忽兒痛苦地大喊大叫，一忽兒嚶嚶低聲痛哭。我正好從門口路過，我覺得那場面很像革命電影《烈火中永生》中英雄江姐受刑。不同的是，出現在我面前的真實的施刑者和被刑者，都是我的熟人。這一次，我無法在天使和魔鬼之間明確選擇自己的角色，我只能一走了之。

還有一次，我到文工團某隊找某個很要好的同學。他也是「鄉丁」。他正忙着打一個俘虜。俘虜是從河運校捉來的。河運校是砸派的「武鬥之花」……這下可好了，「鄉丁」們總算有機會好好表現一下自己的階級覺悟了。我這位好友現在就正在發洩自己的革命仇恨。倒在地上的俘虜像箍桶一樣，全身上下被他打上了好幾道箍。這樣，「鄉丁」打起來就很方便了。他把金屬棒舉得高高，然後劈柴一樣猛砸而下，又舉起來，又砸。每砸一下，「俘虜」就慘叫一聲，疼得非常自然地、像木頭一般滾來滾去。「鄉丁」已經打得很累了，索性把衣服脫得光光……[1]

虐俘中除去一般的用刑外，還有一種最刺激俘虜心理的「假槍斃」。有的俘虜是被押到「烈士墓」前或剛為「烈士」挖好的墓穴旁邊去假槍斃。當年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青年教師楊向東，因是西師八三一的骨幹成員（曾在1967年5月代表西師八三一出席過中央解決四川和重慶問題會議，是砸派一方的主要發言人），在1967年7月被八一五派俘虜後，在關押中就曾遭遇假槍斃。他多年後回憶了自己那次被蒙上眼睛拉出去假槍斃並且險些被弄假成真的兇險經歷：

1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188—189頁，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不知什麼時候腳步聲響了，汽車馬達發動聲傳來，我又被推上了卡車，難友們……已在車上，我的兩隻手很快被左右兩側的難友緊緊握住。汽車開到了西農某大樓外的平壩上停下，有人命令我們下車。我們下了車，有人為我們解下蒙布。此刻，我們同時看到了眼前的難友，一共五個……我們五個難友的後面站着五個舉着手槍的劊子手。那邊十幾米外大樓前有一大群武裝人員在圍觀。我正想喊幾句口號，只聽見槍栓嘩嘩地響了，但是就在這時，突然傳來一聲聲嘶力竭的喊聲：

「不要開槍！」我掉頭一看是押送我們的一個小頭目，我很奇怪，只見他右手高舉手槍，左手揮着一張紙，另外的四人也舉着手槍。但不是對準我們，而是對着那邊幾十個武裝人員，「不能開槍！捍紅總部有令：他們幾個是特殊人物，我們帶他們來這裡是另有任務。如果你們當中誰敢開槍，我們就向你們開槍了！」

原來那邊的武鬥分子以為今天是槍斃俘虜，他們想趁機打活靶，於是不少人拉動了槍栓。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發生了這個戲劇性變化。我們忽然明白：今天把我們押赴刑場是搞假槍斃，迫使我們投降的！

接着是將我們押到一稻田看幾具屍體……只見那個小頭目與其他幾個槍手耳語一陣，然後說道：「今天，算你們走運。要不是這裡人多混亂，總部命令你們跪在五個烈士屍體旁嚐嚐死前恐懼的滋味，看來只好算了，要不然那些人開槍打死了你們，我們還交不了差，不過，你們回去後要徹底投降才行，聽到了嗎？」[1]

1967年大武鬥高潮中的8月10日（即「八八海戰」兩天之後），重慶一中八一五的一批學生乘一輛卡車沿嘉陵江邊公路進城，在從李子壩到牛角沱的

1　楊向東《多雪的春天——被困於集中營的65天》，2005年7月3日，發表於http://img00.bokee.net/content/10029743/content0001/10029743/。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一處彎道（麵粉廠附近）遭遇伏擊，被當場打死幾人。被俘虜的人中，有一中八一五的勤務組成員王臨平和另一位高一同學黃北極，他倆在被抓到反到底派的據點體育館關押幾天後也遭到了假槍斃。據說是反到底派人員聽說王臨平的父親（一家大型國防企業的黨委書記）是支持反到底派的，所以決定不殺他，但要嚇他一下；而黃北極則是在關押地認到了反到底派人員中有一個他的初中同學，那人為他說了話。於是，他們二人被押赴刑場後，身邊的人被槍斃了，他倆卻像小說《紅巖》中的華子良那樣活了下來。但是，假槍斃卻給他倆的人生烙下了深深的印痕：黃北極腳部仍被子彈（或許是跳彈）擊中，受傷後傷口一度潰爛發臭，在同學中留下了一個難忘的記憶；王臨平則因受了強烈的刺激，從此一蹶不振，生活對於他永遠失去了應有的快樂和光彩……

至於殺俘，在重慶大武鬥中也是兩派都有過的犯罪行為。其中較有影響的，有這樣幾次：

1967年8月2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武鬥，死傷多人。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鬥隊在攻打該廠醫院和水塔一線時縱隊長謝宗正等三人身亡，重傷致殘一人。八一五派佔領全廠後，三〇一武鬥隊出於報復，將該廠被懷疑為「砸匪」的無辜群眾一人從家中抓出殺害。八一五派還將先後被殺害的無辜群眾數人拖往石灰窯焚屍滅跡，途中發現有槍殺後未死者則補槍致死。

8月13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團召開「烈士追悼會」時，將不久前武鬥中俘虜的北碚紅巖公社公安員、北碚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負責人、八一五派武鬥指揮唐天倫槍斃「祭靈」。

8月17日，重大八一五武鬥隊將所謂「猛虎團匪徒」二人（嘉陵煤礦工人）抓到學校，次日強迫其為八一五「烈士」裹屍，並鼓動群眾將二人打成重傷，隨後又從醫院抬出毒打致死。

8月18日，反到底派工總司負責人鄧長春在武鬥艦艇「反到底一號」上為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王家大山武鬥中身亡的「艦隊」副司令李魯沂（嘉陵機器廠武鬥隊負責人）舉行追悼會，槍斃八一五派俘虜二人（其中一人未死），並將死者拋屍江中，為李「祭靈」。

8月25日，反到底派工總司負責人鄧長春在「黃山警備區司令部」批准槍斃八一五派俘虜一人。

……

後來曾任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北碚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西南農學院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西南農學院土化系女學生、反到底派西農八二六戰鬥團後勤負責人王蘭英，就曾被八一五派抓到後槍斃，中彈後僥倖未死，被農民發現救活後逃到成都向省革籌告狀。

重慶在武鬥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見到一個統計數字。不過，對於重慶武鬥中「殺俘」殺死了多少人，卻有一個當時官方統計的具體數字。據《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記載：1971年「6月5日　省人保組工作組在《重慶市武鬥殺人案件情況的調查匯報》中記載，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共發生22起較大的武鬥殺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虜』、『探子』等名義殺死1737人（其中五類分子14人），作案兇手878人（其中拘捕239人）。」[1]

僅僅「殺俘」就殺死了1737人！真是駭人聽聞。這個數字具體是怎麼統計出來的，是否準確，不得而知。

那些對殺俘罪行負有責任的武鬥指揮者，後來大多受到了法律制裁。但是，他們為什麼會變得那樣殘忍、瘋狂？他們都是在文革前17年「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傳統教育、階級鬥爭教育等等「毛澤東思想」教育中成長起來的

1　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161頁，1999年12月31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熱血青年，有的是共青團員（如反到底派的鄧長春，如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鬥隊的一些大學生），有的還是中共黨員、復員軍人（如北碚猛虎團團長邱開全），他們怎麼會在「最革命」的年代、「最革命」的口號下幹出那樣的事？這不是值得人們深刻思索和反省的嗎？

武鬥中的「第三條道路」

當文化大革命演變成「武化大革命」之後，造反派群眾組織在文革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定位。一些原來不大知名的組織在武鬥中因敢打敢拚而名聲大振，另一些原來頗有名氣的組織在武鬥中被打垮或遭受重創而名存實亡，有的則在迷惘中沉寂下去。值得注意的是，還有的走上了「第三條道路」或「中間路線」。

重慶工人造反軍司令部，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期本是工人造反軍幾大山頭中最大的一個山頭，後來因為他們比較注意「政策和策略」，影響逐漸遜色於工人造反軍總部。在兩大派大規模武鬥中，以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李方成為代表的一批人，力圖使自己置身於武鬥之外。為宣傳其反對武鬥的觀點，造反軍司令部主辦了《戰惡風》報（主筆呂朝生，天原化工廠工人），在該報第二期（1967年9月6日出版）上，就發表了該司令部於武鬥炮火正熾的8月27日呼籲兩大派迅速停止武鬥，組織力量下鄉搶收、搶種的緊急呼籲和要求其下屬組織下鄉支援農業「雙搶」的特急命令，並公開表明了堅持文鬥不用武鬥，不怕來自左、右兩邊的攻擊，不怕被說成是「右」了、「修」了，反對「資產階級宗派主義的唯觀點論」等見解。在一篇小品文《關於烈士的爭論》中，他們藉一個參與爭論的青年之口，對武鬥中身亡的人算不算「烈士」發表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了這樣的議論：

所謂烈士，是那些在國內、外戰場上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為了黨和無產階級的事業被國內、外階級敵人殺害了的同志。像現在這樣打「內戰」死了算什麼烈士？如果八一五派的戰士算烈士，那麼反到底派就是打死「烈士」的階級敵人，是反革命；相反亦然。……黨中央制定出的「紅五條」指出，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應該團結起來共同對敵。所以，兩派彼此都不是階級敵人，而是階級兄弟；他們互相武鬥死了，是無所謂烈士不烈士的，只能說他們是上了階級敵人「挑動群眾鬥群眾、坐山觀虎鬥」的當而不自知冤枉死去的人；如果要叫他們什麼「士」的話，只能叫「上當士」、「受騙士」、「冤士」。

能夠在當時那樣幾乎是「全民發瘋」的狂熱氣氛下發表這樣的言論，是很不容易的。即使在造反軍司令部內部，也有一些人不能接受這種觀點，以司令部主要「筆桿子」潘桂林為代表的一批人員，就脫離了司令部，而長期與造反軍一支隊在一起（潘桂林因此還在「八二二」寬銀幕電影院事件後被誣為造反軍一支隊的「黑高參」和「策劃寬銀幕事件的黑後台」，飽受牢獄之災）。

在武鬥中堅持走「第三條道路」的重慶工人造反軍司令部，在1968年夏四川省、重慶市革委會成立後，最早認識到群眾組織使命的終結，率先成立了善後工作組，着手解散組織，遣返人員。

重慶文藝界兩大派中的一些人員，在對武鬥和相互攻擊打派仗都感到厭倦之後，也想走一條「中間路線」。

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藝界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次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即作為中央文件向全國轉發了《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強調了不能用「50天」（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包庇「17年」和「30年代」（執行過「文藝黑線」）的問題。重慶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文藝界兩大派中的一些人在江青這個講話的啟發下，組織了一個「衝黑派」，公開宣稱自己既不是八一五派，也不是反到底派，而是專門批判、衝擊「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衝黑派」。一份印發於1968年1月19日、署名「重慶藝術館《中流擊水》記者」的油印傳單，介紹了他們的一些情況：

形式：一、分別從文藝界兩派中「殺」出來，成立獨立自主的新組織，退出原來的戰鬥隊（如話劇團《追窮寇》）；二、分別從兩派中站出來，參加新組織的活動，不退出原來的戰鬥隊（如歌舞劇團《無產者》）；三、從某一派中「殺」出來（如藝術館《中流擊水》）或站出來（如歌舞劇團《鬥批文藝黑線聯絡組》、川一團八一五《一一·一二》）。

這支新文藝隊伍的成員中，有「文藝司」的常委，部分文藝單位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勤務員和部分八一五、反到底的戰士……

一

當有人指責他們走「第三條道路」，是「第三種勢力」時，他們理直氣壯地辯稱：第三國際、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都是「第三」，「第三」沒有什麼不好。他們印發傳單，寫大字報，在鬧市區設立了大批判專欄，力圖引導更多的人來「掌握鬥爭大方向」，但是他們沒有建立起組織，對所謂「文藝黑線」的批判也引不起廣大群眾的興趣，響應者寥寥，只活動了不長的時間。

何況，他們所抓的「大方向」，即批判所謂「資產階級文藝黑線」，也並無多少「正確」可言，甚至有可能「大方向」抓得越好，對歷史犯下的罪過反而會越嚴重。這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他們不可能超越的局限。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武鬥中的報紙、廣播

武鬥時期，「文鬥」也從未停止或中斷。造反派的「文鬥」手段，主要是報紙、廣播、傳單和大字報。傳單，是中國共產黨在地下工作時期就使用過的；大字報，則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出現的，被毛澤東譽為「新式武器」；而由群眾組織自辦小報和自辦廣播，則是十足的文革特色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只有文革時期而且是文革前期（1966年底至1968年底）才允許這樣的情況出現。

重慶的造反派群眾組織自辦小報是從1966年底開始的。到1967年「二、三月鎮反」期間跌入低谷。到了5月「紅五條」下達前後，即武鬥初起之時，重慶各群眾組織創辦小報又出現了新的高潮。這一階段的小報，已經不再局限於由某個群眾組織主辦，而出現了不少由幾個群眾組織合辦甚至不以群眾組織名義而只以代表某派觀點的某「編輯部」名義主辦的情況，如：

由反到底派解放軍後字二四二部隊紅色造反者總團、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九一縱隊、國家科委情報所重慶分所紅色革命造反團、重慶文藝界延安兵團、重鋼工人九八戰鬥團、四川美術學院紅色尖兵團尖刀分團、首都紅代會赴渝戰鬥兵團等七個組織合辦的《山城紅旗》報（1967年4月30日創刊，後改為反到底工總司主辦）；

反到底派重慶河運學校航鋒戰鬥團、重慶醫學院重醫兵團合辦的《東方欲曉》報；

反到底派小人物編輯部主辦的《小人物》報；

反到底派紅巖紅旗編輯部主辦的《紅巖紅旗》報；

反到底派山城紅日編輯部主辦的《山城紅日》報；

反到底派重慶市革命職工造反團總部、東方紅一一・一六戰鬥兵團、重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慶市中區稅務局紅色警衛隊合辦的《紅滿天》報（1967年11月4日創刊）；

反到底派三十六中毛澤東主義兵團、工總司交通總部省船井岡山合辦的《紅旗漫捲》報（1967年11月28日創刊）；

八一五派四川外語學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縱隊、西南農學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縱隊合辦的《星火燎原》報；

八一五派紅衛兵重慶警備區機械校六二五、交院工程兵、二師八二九、九中八一五合辦的《江南烽火》報；

八一五派重慶楊家坪地區支革聯合指揮部主辦的《風雷激戰報》；

八一五派橫掃編輯部主辦的《橫掃》報；

重慶八一五四〇四部隊橫眉編輯部主辦的《橫眉》報；

重慶八一五六五六八部隊冷對編輯部主辦的《冷對》報……

到了大規模武鬥時期，「文鬥」也並未停止，辦小報又有了新的特點。除去一般的小報外，各派還經常出版一些對某次武鬥事件進行專題報道和「血淚控訴」的專刊、增刊，此外還有針對某一特殊問題而出版的專刊，如八一五派重大八一五羅廣斌問題專案調查組主辦的《打倒叛徒羅廣斌專刊》（1967年7月6日創刊）。

在重慶大武鬥時期，因受武鬥影響，生產停滯，交通癱瘓，紙張供應緊張，重慶市革籌組的「機關報」《新重慶報》被迫從1967年7月2日起改為每日出半張（兩版），並從8月5日起減少發行數量，只在本市地區供應部分零售報，訂戶一律暫停發送（直至9月底才重新開始收訂）。

在這樣的形勢下，群眾組織的小報也不得不停辦或削減數量，於是，就出現了一些由幾家小報合辦的「聯合版」，如：

1968年2月7日出版的《山城戰報》（八一五派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主辦）、《八一五戰報》（重大八一五主辦）、《八一戰報》（八一兵團主辦）、《山城紅衛兵》（紅衛兵重慶警備區主辦）、《星火燎原》（四川外語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學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縱隊、西南農學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縱隊主辦）、《機關戰報》（重慶市委機關革命造反總部主辦）的聯合版；

1968年8月出版的反到底派《文攻報》（《文攻報》編輯部主辦）、《機關反到底》（機關司令部主辦）、《山城紅旗》（《山城紅旗》編輯部主辦）的聯合版……

當時重慶群眾組織的小報，影響遠遠超出本市範圍，而且「上達天聽」。如前文所述，在1968年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和五十軍、五十四軍領導人時的講話中，特地談到了四川、重慶的小報，周恩來談到重慶情況時說：

「主席看的比我們多，是主席看小報，看了給我們講的。主席許多小報都看了。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塗，還有什麼《嘉陵江上煙雲滾滾》，主席都看了。」

江青講話中談到四川紅成、八一五派的小報大量攻擊省革籌成員劉結挺、張西挺時也說：

「你們四川出了那麼多的大報紙，革籌小組是中央批准的，而且是經過了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你們就讓人家那樣搞。劉、張和我沒親，攀不上。那麼大的報，你們不管，主席連小報都看。三個簡玉霞，是主席在小報上看的。」

「四川大報很多，人家佔領了輿論陣地……」[1]

毛澤東提到的那篇《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是八一五派《山城戰報》第38期、《八一五戰報》第47期聯合版（1967年12月1日出版）發表的編輯部文章，執筆人為重慶大學電機系六六級學生周孜仁，八一五戰鬥團的「筆

1　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中央首長接見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和五十軍、五十四軍領導時的講話》，1968年3月19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政工組、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部隊政治部翻印，1966年3月20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桿子」。

當時重慶反到底派的小報中，也有一篇影響很大、被五十四軍斥為「大毒草」、被八一五派稱為「反革命武裝暴亂宣言書」的文章，是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望江東方紅公社和重慶井岡山紅衛兵總部合辦的《井岡山》報第四期（1967年7月13日出版）發表的長篇專論《人民戰爭救山城》，執筆人為四川外語學院青年教師林亞光——反到底派井岡山紅衛兵的「筆桿子」。

重慶兩大派群眾組織在全面內戰期間還充分利用了廣播進行「文攻」。影響最大的是設於市中心解放碑周圍的幾個廣播站，如「紅五條」下達前後設於民族路餐廳的首都紅代會赴渝戰鬥兵團廣播站、先後設於交電公司大樓和人民商店（原友誼商店）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廣播站、設於工農兵市場（原群林市場）的八一五派痛打落水狗廣播站、設於紅旗糖果商店（原大眾糖果商店）的八一五派紅旗廣播站等。

其中，尤以反到底派的「完蛋就完蛋」廣播站影響最大。為此，在1967年全面內戰高潮中的8月11日至13日，八一五派攻打「完蛋就完蛋」廣播站，致交電大樓在戰火中燒燬，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

此後，「完蛋就完蛋」廣播站經過幾番輾轉，又改設於解放碑另一側的人民商店（原友誼商店）。1967年12月15日，因有八一五派群眾舉報「完蛋廣播站的人在大陽溝（菜市場）持槍搶白菜」，重慶駐軍派部隊包圍了設於人民商店樓上的財貿井岡山總部及「完蛋就完蛋」廣播站，要求入內搜查槍支。反到底派則認為這是駐軍「支一派壓一派」的表現，提出條件，要求部隊若執意搜查，在搜查不到槍支時必須向全市人民作檢查，否則就拒絕部隊搜查。部隊不願作此承諾。雙方形成對峙。部隊包圍至次年1月底（春節前夕）才撤走。「完蛋就完蛋」廣播站每天在商店樓上窗口掛出大幅標語「非法武裝包圍第××天」（日期逐日更換），牆上還掛滿各地支持反到底派的群眾組織送來的聲援標語、布幅、大字報，引來大批群眾圍觀，甚至有群眾給被圍困的反到底派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人員送茶送飯送雞湯，成為重慶城內武鬥期間一大奇特「文鬥」景觀。

當時遍設於各地的大小廣播站及宣傳車，對市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干擾。西南師範學院吳宓教授的日記中就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如1967年5月6日：「……夜1：30醒，大雨。聞廣播召集八三一全體隊員應戰，其後又連續廣播，約3：30宓始復寐。」[1] 1967年6月6日：「夜1時醒一次，晨5：30起，皆聞八三一號召『戰鬥』之廣播不斷。」[2] 1967年7月14日：「碚市之『保派』與校內之『革命造反派』……雙方用廣播對辯，互責詆，徹夜不休。」[3] 1967年7月16日：「昨夜仍有炮聲；兩軍以廣播互相責詆終宵……」[4] 1968年6月11日：「自晚7時起，春雷即廣播進軍、戰鬥曲，直至中宵11：30始止息（明晨聞系春雷往圍攻八三一學生所住之宿舍）。」[5]

「全面內戰」嚴重毒化了社會風氣，群眾組織的報紙和廣播，隨着武鬥的升級，都出現了庸俗化、流氓化的傾向。報紙上和廣播中不斷出現以造謠誣蔑來醜化對方的宣傳，有的甚至墮落成了「黃色新聞」、「色情文學」（如直露地描寫某一派的「女戰士」如何遭到另一派或本派的「匪徒」強姦，甚至從「女戰士」的第一人稱角度進行渲染、描繪）。廣播也從最初義正辭嚴的照着稿子朗讀變成後來隨意發揮、油腔滑調的挖苦調侃、謾罵攻擊……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22頁。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47頁。

3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83頁。

4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86頁。

5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474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當時雙方都在小報、廣播中隨意編造對自己有利或醜化對方的內容。在1967年大規模武鬥暫時停息之後，八一五派有一篇文筆生動、流傳甚廣、被大量翻印轉抄的文章《中央調查組到來之後》，其中提到反到底派一個負責人黃廉時，作了這樣的描寫：「滿臉粉刺、一身闊少打扮、尖瘦得像隻猴的黃廉」，在此文的另一版本中，這句話的後半句變成了「粗壯得像頭熊的黃廉」。從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描寫可以看出，作者對所抨擊的對象到底是什麼樣子並不清楚，就隨意發揮想像進行編造了。這個有趣的例子，可以反映出當時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文風之一斑。

武鬥中的文藝

參加武鬥的多是年輕人，而在年輕人的精神生活中，是少不了文學與藝術的。但是，經過文革前的「文藝整風」，再經過文革初期「破四舊」的掃蕩，過去的大量文藝作品都已被打成了「封、資、修」的「毒草」，能夠公之於眾的，只有體現時代「主旋律」的「紅色頌歌」。受此影響，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們也寫了些（一般也只會寫）這類作品。

在重慶大武鬥期間，紅衛兵、造反派的小報、傳單上有時也會出現一兩首這樣的詩歌，但為數極少。

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八一五戰報》於1967年8月8日出版的第35期，發表了該報主編周孜仁為八一五造反週年紀念而以「周熾」化名寫的詩《好呵，八一五！》，詩中寫道：

正當革命的暴風雨

在山城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猛烈地迴旋，
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
兩條路線
迎接着
最後的決戰……
好呵，八一五——
經過一年血與火洗禮的
第二個八一五
豪邁地
向我們走來！
我為你叫好！
我
大聲地
為你吶喊！——
不是用鮮花和彩綢，
而是用鐵和血，
用火與劍！
……

反到底派當時也有一首頗有影響的詩歌。1967年10月28日出版的《紅巖》報發表了作者署名「星火」（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化名）的長詩《航鋒頌——寫在〈航鋒〉誕生一週年的節日裡》。重慶河運學校（今重慶交通學校）航鋒戰鬥團在大規模武鬥初期拚殺鋼釬時頗為有名，鋼釬戰中八一五派的第一個「烈士」就死於航鋒武鬥人員之手，因而航鋒被八一五派譏稱為「武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鬥之花」、「航瘋」，成為八一五派重點打擊的目標。在1967年8月「全面內戰」中，8月24日，重大八一五三〇一野戰隊燒燬河運學校實習工廠和庫房等建築；8月26日，重大八一五三〇一野戰隊又燒燬河運學校東、西學生宿舍和西教學樓等，至此，該校全部建築物15000餘平方米及室內設備全部被毀。這所中專學校那斷垣殘壁的黑色廢墟在連接市中區與沙坪壩區的主幹道（二路電車必經之路）旁邊屹立了很長時間。這首《航鋒頌》，對河運學校的這個反到底派學生組織進行了熱情的歌頌：

奔騰呼嘯的
松濤
衝破山城的
迷霧
在呼喊着一個
英雄的名字
航——鋒！
那洶湧激蕩的
兩江洪流
用雙臂搖撼着
山城
發出千鈞雷霆的巨響
航——鋒！
啊，航鋒！
你是那紅巖青松之上
穿雲翱翔沖九霄的
雄鷹！
……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我站在

英雄的鮮血

幾度浸染的沙場上

用滿腔激情和滿懷思念

熱切地

呼喚着您呀

我們親愛的戰友

航——鋒！

……

很明顯，這類造反派詩歌都深受文革前流行的「主旋律」詩歌，特別是賀敬之的《放聲歌唱》、《雷鋒之歌》等名篇的影響。

武鬥中另一種較為流行的文學形式，則是「毛體詩詞」。文革中，毛澤東詩詞得到空前狂熱的宣傳炒作，為其詩詞譜寫的歌曲幾乎每天廣播，不絕於耳，許多詩句家喻戶曉深入人心，被大量引用到批判文章、報刊社論及大字報中。受此影響，造反派也經常會模仿寫些似舊非舊、不講平仄音韻的「舊體詩詞」，實際上只能稱為「毛體詩詞」。

在1966年「一二·四」大規模武鬥事件之後，因傳說有造反派被保守派的工人糾察隊打死了，雖然還沒有找到「烈士」的屍體，但造反派小報上還是發表了一些悼念「烈士」的詩文。如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辦的《山城紅衛兵》報上就發表了呂進的《詩詞二首》，其中一首《悼「一二·四」殉難戰友》寫道：

噩耗哀傳山城中，

悲痛切齒眾心同。

黑幫途窮猶困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烈士臨危有孤忠。
從來革命不畏死，
前仆後繼氣若虹。
更看照妖血如鏡，
長纓萬千縛蒼龍。[1]

1967年6月重慶兩大派大規模武鬥開始後，不斷傳來有「烈士殉難」的消息。砸派（反到底派）的《山城紅旗》報第11期上發表了署名「二四二」的《蝶戀花·悼死難烈士》：

黑手高懸霸主鞭，
抽向人間血肉橫飛濺。
趙氏殺人黑風旋，
歌樂山下皆是怨。

百萬工農齊聲喚，
浴血奮戰風展紅旗亂。
六月天兵捉戰犯，
忠魂笑對長空讚。[2]

詞中的「趙氏」即「山城趙永夫」，趙永夫是原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此時已因「篡奪軍權」和開槍鎮壓造反派紅衛兵而被中央下令逮捕，成為「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代名詞。各地造反派都紛紛大揪「趙永夫」式的人物。重慶的砸派（反到底派）筆下的「山城趙永夫」，實際上就是指的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辦《山城紅衛兵》報第七期，1966年12月23日出版。
2 山城紅旗編輯部主辦《山城紅旗》第11期，1967年7月4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五十四軍領導人。

重大八一五的《八一五戰報》上也發表有類似的詩詞，如該報在西師「六五」事件後出版的第26期上，發表了作者署名「凌波・代莉」，悼念在西師事件中死難的李國成「烈士」的《七律》：

耿耿丹心照九天，
英雄血灑西師園。
熱血濺處山花紅，
國成浩氣留人間。
戰友騎馬馳騁去，
革命小將戰猶酣。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1]

這樣的詩詞，不僅從立意到文句都模仿毛澤東詩詞，甚至還把毛澤東詩詞中的一些句子直接套用過來，可謂十足的「毛體」。

提起文革十年的文藝，一般人往往會想到「八億人看八個戲」，似乎文藝舞台上只有八個樣板戲在演出。其實這只是一個概略的、誇張的說法，並不準確。在文革頭幾年，八個樣板戲並未廣泛普及，各地文藝舞台上還不是經常能看到，特別是在「全面內戰」時期，各地都處於群雄並起的半無政府狀態，文藝舞台一時也出現了由群眾組織自發編演的節目「異彩紛呈」的局面。只不過，這種「異彩」，並非藝術上的「百花齊放」，而是統一在歌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歌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爭相表現自己對毛澤東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忠心，並按照「無產階級司令部」定下的調子批判、控訴

1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26期，1966年6月16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劉少奇及其「反動路線」等方面。因此，這表面的「異彩」，實際上只是「一彩」。

在重慶第一次大規模武鬥「一二·四」事件之後，因傳說有造反派被「工糾」打死了，重慶市歌舞團演員李天鑫曾為「死難烈士」寫了一首流傳甚廣的抒情歌曲《親愛的戰友你在哪裡》。到了1967年大武鬥期間，李天鑫又寫了一首歌頌反到底派武鬥據點的歌曲《黃山戰歌》。黃山位於重慶市南岸區，與市中區隔長江相望，海拔572米，山上大樹參天，林濤似海，與汪山、涂山、蔣山、老君山、文峰山等連成一片，是重慶老城區「南陲屏障」的中部。站在山頭舉目遠眺，重慶老城盡收眼底。黃山上原有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的官邸，20世紀50年代初改建為幹部療養院，文革大武鬥時被反到底派佔據作為武鬥據點，架起了三七高射炮，建立了所謂「黃山警備區司令部」。《黃山戰歌》歌詞大意為：

都愛黃山好風光，
我愛黃山是戰場。
山下長江炮聲響，
山上松林紅旗揚。
站在山頂放眼望，
五湖四海胸中裝。
毛澤東光輝思想來武裝，
紅色江山萬年長，萬年長！

歌中唱的「山下長江炮聲響」，即指當時反到底派以改裝艦艇組成的「艦隊」溯江而上，與八一五派在長江沿岸的幾處武鬥據點展開槍炮對射一事。從這歌中可知，當時參加武鬥的許多造反派人員，都認為自己是以「毛澤東光輝思想來武裝」的革命戰士，自己所參加的武鬥是為了「紅色江山萬年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長」。這不由得讓人想起那位癡迷於騎士小說而到處去「行俠仗義」，甚至與他認為是魔鬼的風車展開搏鬥的堂・吉訶德。

由於受到文革前《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歌》和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熏陶、影響，造反派組織自己編演「史詩」型大歌舞一時成為風氣。當年重慶八一五派就編演了歌頌八一五派戰鬥歷程的《八一五風暴》。

1967年8月15日出版的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八一五戰報》第36期，發表了報道《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八一五風暴〉在戰火中排演成功》：

在一陣壯麗雄渾的音樂聲中，帷幕徐徐拉開了，碧波萬頃的大海上，一輪紅日冉冉升起……朗誦者高亢的聲音響起來了：

日從韶山出

日出東方紅

東方紅日照世界

五湖四海紅彤彤……

由重慶工農兵文藝聯合指揮部、七醫大、四一二部隊、四二一部隊、重鋼十八冶、建設、重大、革教、六中、重慶市話劇團、重慶市歌舞團等單位的八一五革命派聯合編排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八一五風暴》，經過同志們一個多月艱苦努力，終於在砸派一小撮階級敵人瘋狂挑起的戰火之中，勝利排演成功，並在最近開始公演。

這部史詩由「序曲」、「山城的火炬」、「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決不丟」、「一月革命在山城」和「山城在前進」五場組成。通過許多生動的場面和精湛的表演藝術形象，再現了山城八一五革命派一年來與李井泉、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歌頌了山城八一五革命派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無限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無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現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在山城的偉大勝利。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當時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的梁興初，就曾在1967年底在重慶視察期間，於11月5日在重慶市人民大禮堂觀看了八一五派演出的《八一五風暴》。11月11日，梁興初又在文化宮禮堂觀看了八一五派演出的《紅衛兵戰歌》。梁興初因為與五十四軍領導人的親密關係，感情上傾向八一五派，以他觀看演出的行動來表明了對八一五派的支持。

在重慶大武鬥期間，造反派文藝宣傳隊的這類演出，成為武鬥戰火中給人們帶來些許藝術感受的「戰地黃花」。只是由於其派性宣傳的局限，演出中那些歌舞節目大多難以在民眾中流傳。

而由於派性，這類演出有時還會引發新的武鬥。發生於1967年10月27日的「一〇·二七」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當時，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的負責人應邀到位於歌樂山上林園的解放軍通信兵工程學院（對外代號為總字四一二部隊），對該學院反到底派紅旗造反團作「形勢報告」，隨同前去的反到底派財貿井岡山宣傳隊當晚舉行「擁軍愛民演出」。然而，在演出中，當宣傳隊演到表現反到底派在「二、三月鎮反」中遭到革聯會鎮壓如何英勇不屈時，在台下觀看演出的八一五派便以這是「攻擊解放軍」為由，扔石塊干擾、破壞演出，並進而為抓獲被該學院勤務連接到駐地保護起來的反到底派負責人而衝擊勤務連駐地，勤務連執行「九五」命令開槍攔阻，造成數十人死亡。引發這場慘劇的導火索，竟是帶有派性宣傳內容的文藝演出節目。這是後人很難理解的。

武鬥時期，美術創作也沒有完全停止。毛澤東要求文藝「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漫畫在這方面（特別是在「打擊敵人」方面）顯然能夠發揮很便捷的作用，因而在美術領域佔據了最重要的位置。這個時期的漫畫從題材上看主要有兩大類——

一類是批判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李井泉、彭德懷、任白戈等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的漫畫（通常以組畫、連環畫形式出現），以表明自己「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牢牢掌握了「鬥爭的大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方向」：

1968年1月，正值兩次大規模武鬥的間隙中，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團總部和文藝界的魯迅戰鬥團聯合主辦的畫刊《紅魯戰矛》第一期出版，以一、四版兩個整版篇幅發表了一幅漫畫《群丑圖》（二、三版發表的是一組批判齊白石、李可染、李苦禪、鄧拓、邵宇等人「黑詩畫」的圖、文，總題為《把黑詩畫揪出示眾》）。這種漫畫《群丑圖》、《百丑圖》，是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興起的，當時全國各地到處都能看到，甚至一些小單位的黑板報上也會出現，被大量用來醜化、打擊「右派分子」。到了文革造反運動開始後，受長期階級鬥爭教育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也就如法炮製畫起了《群丑圖》、《百丑圖》，不過這次卻是用來醜化、打擊那些曾經狠批「右派分子」的黨政領導幹部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了。文革中最早的一幅《群丑圖》是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站（二司造反聯絡站）主辦的《東方紅》報第21號（1967年2月22日出版）上發表的，此圖中的「群丑」，以原中宣部長陸定一在隊伍前鳴鑼開道，隨後走着「三家村」及「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的頭頭腦腦們，還有騎自行車的王光美，用官轎抬着的劉少奇，用涼轎抬着、手拿橋牌的鄧小平，背上插着幾面威風旗的賀龍，手捧朝笏（上書「保」字以表明其「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身份）的陶鑄，以及殿後的蕭望東、王任重、錢信忠等。隊伍後面還看得見幾面緊跟着的小旗幟，上書「東糾」、「西糾」、「聯動」、「紅旗軍」、「榮復軍」（都是在1967年初被「無產階級司令部」明令定為「反動組織」的群眾組織）。

而重慶八一五派發表的這幅《群丑圖》，在北京紅衛兵那幅原作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主體部分保持了原樣（那時也不會講究什麼「侵犯著作權」問題），但在「群丑」隊伍的前後增加了兩批人，在前頭增加了一批代表「帝、修、反」的人物，如「蘇修頭目」赫魯曉夫、勃涅日列夫，美國總統約翰遜，南斯拉夫「老牌修正主義頭目」鐵托，印度尼西亞「反動頭目」蘇加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諾[1]、納蘇蒂安[2]，印度「反動頭目」甘地夫人，「緬甸的蔣介石」奈溫，以及一副殘兵敗將模樣的蔣介石。在「群丑」隊伍的後面，則增加了一些文藝界人士如齊白石、梅蘭芳、胡風、趙丹、丁玲等，自然也必不可少地增加了重慶的頭號「走資派」任白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還增加了一個代表「軍內一小撮」的趙永夫——儘管反到底派一直在嚷着要揪「山城趙永夫」，但既然趙永夫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決定打倒的人物，八一五派也就不得不與之劃清界限，將其歸入「群丑」之列。

另一類題材的漫畫則是派性攻訐，兩派競相用漫畫來諷刺、醜化對方（反到底派在諷刺、醜化八一五派的同時還要稍微含蓄地刺一刺他們心目中的「山城趙永夫」五十四軍領導人，如前面提到過的那幅《拉一派打一派》）。當時四川美術學院的紅色尖兵團是反到底派的重要成員，美院的伏虎戰鬥團則是八一五派成員，他們都創作了不少大幅彩色漫畫，張貼在市中心解放碑周圍的高樓牆上，引來許多市民圍觀。可惜因為條件限制，大多未能付諸印刷，這些極具時代特色的漫畫作品都很難保存下來。

1　蘇加諾：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領袖和第一任總統。執政後個人生活腐化。其領導下的印度尼西亞在20世紀60年代初先後與美國和蘇聯關係惡化，與中國關係異常親密，在一些國際事務中「左得可愛」（1963年底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舉辦了與奧運會相對抗的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1965年1月宣佈退出聯合國），在國內容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參與執政。1965年9月30日發生軍隊以「粉碎共產黨人政變」為由清洗和屠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及左翼人士的事變。1966年3月印度尼西亞政府被陸軍少將、戰略後備司令蘇哈托接管。蘇加諾繼續當了一年名義上的總統，於1967年3月被迫讓位給「代理總統」蘇哈托。在中國1967年夏掀起的「大批判」高潮中，中央批准在全國各地公開放映「供批判」而組織群眾觀看的兩部電影紀錄片——《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和《劉少奇訪問印度尼西亞》，其中，劉少奇在1963年攜夫人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與蘇加諾表現出來的親密友好關係成了批判劉少奇「向帝修反投降」的重要理由。因此這時已經無職無權的蘇加諾仍然要被當作反動派代表列入「群丑」。

2　納蘇蒂安：這是一個現在已經不為人知、在一般工具書上也查不到的人物，他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9月時任印度尼西亞國防與安全部組統籌部長。印度尼西亞軍隊從9月30日開始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及左翼人士進行清洗和屠殺時，他是主要的決策人物。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只有極少數刊登在小報上的漫畫得以保存下來。因反到底派在批判革聯會時總把革聯會稱作「癩格寶」（川語所稱的癩蛤蟆），因此在反到底派的漫畫中常以癩蛤蟆來作為革聯會的形象代言人。[1] 然而八一五派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將反到底派畫作癩蛤蟆，諷刺他們想摘掉以五十四軍領導人為主體的重慶市革籌組的牌子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2]。在互相攻擊中，兩派常常這樣以同樣題材同樣手法來諷刺對方：比如同樣以「幾家歡樂幾家愁」為題，反到底派畫的是革聯會把革命造反派關進鐵窗黑牢裡，而革聯會這個癩蛤蟆卻與準備結合的「走資派」辛易之在悠閒地下棋（棋桌、坐櫈均是代表權力的大印），等待結合的「走資派」魯大東、廖蘇華等在一旁觀看，另一邊拄着掃帚的任白戈則在喜孜孜地自語：「我也要結合。」[3] 八一五派的同題漫畫，則畫的是幾隻躲在陰暗角落的癩蛤蟆正在因無法篡奪權力而向隅而泣。[4]

當然，也有兩種題材兼備——既抓「大方向」又打「派仗」的漫畫，如八一五派的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八一八戰鬥團主辦的《八一八戰報》總39期《批判大毒草〈紅巖〉專輯》（1967年11月27日出版）發表的漫畫組畫《打倒劉少奇　保衛紅巖村》，就在批判劉少奇的同時，批判了小說《紅巖》及其作者——曾經支持砸派、已經自殺身亡的所謂「叛徒」羅廣斌。

除去漫畫外，版畫也是文革中較常用的一種美術形式。特別是因為當時

1　漫畫組畫《偽革聯十大好》，載山城紅旗編輯部主辦《山城紅旗》第一期，1967年4月30日出版；漫畫組畫《偽革聯的邏輯》，載山城紅旗編輯部主辦《山城紅旗》第五期，1967年5月27日出版。

2　漫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回敬反到底報）》，載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辦《八一五戰報》第27期，1967年6月18日出版。

3　漫畫《月兒彎彎照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載山城紅旗編輯部主辦《山城紅旗》第五期，1967年5月27日出版。

4　漫畫《幾家歡樂幾家愁（回敬美院尖刀）》，載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辦《八一五戰報》第27期，1967年6月18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美術家協會四川分會在重慶，而四川美協的畫家以版畫為主，文革前他們為暢銷小說《紅巖》所作的版畫插圖影響極大，成為許多美術愛好者的學習樣板。1967年8月8日（即「八八海戰」當天）出版的《八一五戰報》第35期上，配合《重大八一五舉行烈士追悼大會》的報道，發表了一幅版畫《踏着烈士的血跡前進》，畫面是：一個頭纏浸透血跡的繃帶的青年抱着一個剛剛去世（屍體還未僵硬）的「烈士」，另一神情嚴峻、年齡稍大的青年揮手指向前方，他身後一女青年舉着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的大旗，在他們身後看得見重慶的標誌性建築解放碑……這幅頗為典型的武鬥題材版畫由該報主筆周孜仁自行繪畫、刻製。他在文革前是重大美術隊成員，曾接受過美術家協會四川分會版畫家徐匡的輔導，徐匡在文革前就是小說《紅巖》的版畫插圖作者之一。這時徐匡已是反到底派成員。

此外，在武鬥炮火中，另一種特別的美術作品又在重慶拔地而起，這就是後來一度氾濫成災的巨型毛澤東塑像。這一美術樣式在重慶也有它特別的背景——設於重慶的四川美術學院文革前就在雕塑方面取得了具有全國影響的成就。

重慶市最早塑造巨型毛澤東塑像的工程，是在1967年大武鬥期間由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冒着敵人的炮火」率先進行的。據《八一五戰報》報道，塑像從1967年7月1日開始動工，「這座毛主席的巨型塑像和底座總高為12.26米，這個數字代表了主席的生日，象徵着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座巨像的底座每邊長8.15米，表示了我們八一五戰士永遠向着紅太陽毛主席的一片丹心。」[1]

當年的「八一五戰士」周孜仁在回憶錄中對此作了記敘：

該毛塑像設計高度為9.15米，是為紀念剛剛出道的「八一五戰士」上京告

1 《讓毛澤東思想的燦爛光輝永遠普照重大校園/毛主席巨型塑像在重大動工塑造》，載《八一五戰報》第31期，1967年7月20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狀，於1966年9月15日在天安門廣場觀見毛的「非常非常幸福」的日子；塑像加台高共12.26米——這個數字不言而喻，代表毛澤東降誕吉日。碑台四邊各寬8.15米、像後八根8.15米的旗桿，這兩個數字含意也不言而喻：象徵八派戰士緊緊圍繞老毛幹革命唄……

塑像肇建於6月底7月初，重慶大學專門禮聘四川美術學院教授、中國著名的毛塑像專家葉毓山先生親自來校操泥，下定決心要搞出藝術水準和幾何尺寸都大大超過全中國任何一個馬屁精的夢想。葉教授主塑，數十學生擔任小工，風雨無阻，日夜兼程，僅月餘，一尊碩大無朋的黃泥巨人果然便在第三教學大樓前的球場壩拔地而起。

……

重慶武鬥打得熱熱鬧鬧那段時間，被反到底趕出來的八一五戰友紛紛避難於此。他們每天在重大校園閒遊浪蕩，除了喜歡去防空洞參觀死屍，另外最愛的，就是到三教樓前的球場壩看身高12.26的黃泥巨人。

有如此眾多看客捧場，為泥巴塑像日夜站崗的大學生就尤其洋洋得意，他們頭戴鋼盔，身背三八大蓋，煞有介事地恭身而立，接受參觀者的驚歎和敬意，非常敬業地介紹八一五如何用毛澤東思想指揮戰鬥，用最短的時間創造了奇跡。還有，三伏炎夏，久旱不雨，毛澤東泥身乾得滿身皴裂，八一五戰士深怕泥巴領袖身有不適，每天還得提着水桶於腳手架爬上爬下，頂着烈日給千溝萬壑的主席泥身澆水保養。好在參觀人眾，哥兒們虛榮心很是滿足，有時還裝模作樣圍坐在塑像前面認真學習「老三篇」；大雨之中推砂運漿，還要故意對着照相機鏡頭做嘻嘻微笑狀，非常前衛。[1]

在1967年8月武鬥炮火最為熾烈的時候，重大這一「敬塑」（當時出於對

1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289—291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毛澤東的狂熱崇拜，凡涉及毛澤東的事物都得加上「敬」字）工程一度因為躲避武鬥炮火，也因為交通阻斷、鋼筋水泥運不來而停工。直到1967年12月26日，即毛澤東74歲誕辰之時，才得以最後完成。第二天，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召開，同時舉行了這一座毛澤東巨型塑像的落成儀式。1968年1月1日出版的《八一五戰報》特刊報道：

1967年12月27日，在揮動巨臂指引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澎湃前進的毛主席巨型塑像下，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沐浴着毛澤東思想的燦爛陽光，迎着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在隆隆的禮炮聲中，正式宣告成立了！

反到底派也在其控制的重慶醫學院裡「敬塑」了一座毛澤東塑像，時間略晚於重慶大學。請來主持設計這座塑像的是四川美術學院另一位著名雕塑家、反到底派的青年教師伍明萬。塑像尚未竣工，1968年春武鬥再起，反到底派重醫兵團被打出了學校，塑像被迫停工。直到武鬥平息，重醫兵團人員返校「復課鬧革命」後才得以完成。伍明萬因設計的這座塑像受到好評，後來又被支持反到底派的四川省革籌小組有關人員請到成都去，主持了「萬歲館」前邊那座巨型毛澤東塑像的設計。

武鬥時期的市容

重慶大武鬥，使昔日繁華美麗的山城變得千瘡百孔，到處是觸目驚心的「戰爭廢墟」。最著名的「戰爭廢墟」有：市中區解放碑一側的交電大樓廢墟、嘉陵江大橋南橋頭的二輕工業局大樓廢墟、市中區至沙坪壩區交通要道大坪正街石油路一側的重慶河運學校教學樓和學生宿舍樓廢墟、楊家坪建設機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床廠的職工宿舍「彎彎大樓」廢墟……這些廢墟都矗立在城市的繁華地帶，人來車往的大馬路一側，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又看到了文革前夕1965年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20週年時放映的蘇聯電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戰》中的城市樓房廢墟鏡頭。至於那些未被摧毀的樓房牆上的彈洞，就更常見了。嘉陵江大橋欄杆上的鋼筋，到處都可以看到被子彈穿過的痕跡，有的鋼筋在一側留下個半月形彈孔，有的鋼筋中間被穿出一個彈孔，彈孔兩邊的鋼筋鼓出呈O形……

重慶素以擁有燈山燈海的「山城夜景」著稱。因重慶老城區是兩江環繞的半島狀地形，舊時房屋多依山勢修建，高下相掩，錯落有致，入夜則萬家燈火，層見疊出，火樹銀花，倒映江中，與星月交輝。中外遊客見此無不流連忘返。然而，大武鬥卻使得這一美景遭到破壞。一位當年的中學生紅衛兵在多年後寫的紀實文稿中這樣描寫了當時的山城夜景：

1967年8月，如果你站在南山上看那全市的景象，你會有慘不忍睹之感的。好端端一個燈山燈海的夜山城，卻到處一片漆黑。夜空中，那炮彈在空中東劃一條紅線，西劃一條紅線，火紅的彈頭一個接一個飛來飛去，好幾處正在燃燒，火焰沖天。[1]

當年的重大「八一五戰士」周孜仁，在1967年8月12日的日記中也有一則類似的記載：

去年我們炮轟市委，今年的今天，砸派可是真的炮轟我們啦。真的炮轟。用打飛機的四聯機關炮或大炮。總之，昨天炮轟了我校一夜。……今天（早上）撿到100多個彈頭。今晚又炮轟……嘉陵江漆黑漆黑的，連一隻船都沒有。山城死亡啦！真的死亡啦！什麼也看不見，只有通紅通紅的炮彈在天空中轟轟地飛

1　李衡之《重慶武鬥瑣記》，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過，在山谷中引起一陣陣巨大的回響。[1]

當時在重慶大學圖書館監督勞動的「摘帽右派」賈唯英，回憶1967年8月武鬥高潮中的沙坪壩街頭景象時寫道：

8月中旬，從學校到沙坪壩街上，充滿了「戰爭」的恐怖氣氛。家家關門閉戶，人們扶老攜幼，各自找尋安全之地躲炮彈。人流過去之後，街上空蕩蕩的，只有武鬥人員在巡邏，用於武鬥的摩托車呼嘯而過。我感到好像又回到了日機轟炸的年代，又好像見到了抗日根據地日寇掃蕩前的景象……[2]

1967年大武鬥停息後，一位從忠縣來重慶探親的幹部在日記中記下了他的所見所聞，其中有兩則日記詳細記下了他見到的市容慘狀，一則是他在楊家坪中心地帶看到的市容：

8月30日 ……穿出馬路正是長江劇場門口，抬頭一看楊家坪街心花園已在眼前。路上各種電線、電桿打斷，電車線、電燈線、電話線、廣播線遍地都是。有的在電架上亂七八糟的吊起，就像被風吹壞的蜘蛛網。各種汽車有的朝天仰臥，有的身首不齊，有的燒成廢鐵，有的滿身鱗傷。房屋更是問題，從長江劇場對門起被燒燬的很多，據說是被坦克擊中的。楊家坪百貨商店、郵局、新華書店等大型建築都已夷為平地。舉目四顧昔日面貌已完全改觀。電汽車站候車棚只剩下一個糊殼殼。在電影院周圍行人稀疏，過往者莫不驚驚慌慌若有所懼。荷槍男女往來不絕。倖存的房屋幾乎每個窗戶都塞有棉絮架有機槍。總之一片戰地景象觸目傷心。

---

1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241頁。

2 賈唯英《武鬥中的重慶大學校園》，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另一則日記記下了他從上清寺（借宿的親戚家中）步行到紅港（朝天門）碼頭一路上看到的市容：

9月11日　下午同隔壁老六步行進城。去時走大溪溝返時走通遠門，還去紅港看了一下。臨江門城外一些房屋毀於炮火中，解放碑交電公司一片瓦礫，不少殘牆獨柱欲墜欲傾，昔日富麗建築而今已成廢牆。解放碑一帶商店幾無一家開門。行人不多，只是大字報貼得舉目皆是。一過小十字更是路斷人稀，至紅港那就更是行人寥寥陰森可怕。長江江面停着兩艘巨輪靜悄悄地無半絲煤煙。昔日人山人海往來行人擁擠不堪的朝天門，而今變成冷冷清清如深山古廟，令人大有今昔之感。……

1968年6月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武鬥仍持續了一段時間。當時，外地陸續將重慶逃出去的「難民」一批批送回重慶，最後一批「難民」是貴州省革命委員會送回來的。辦完接交手續後，重慶市革委會派人帶貴州客人參觀了名震全國的重慶大武鬥留下的一些痕跡。當時在市革委辦事組工作的張光明，多年後在回憶錄中對陪同貴州客人所見到的市容有這樣的記敘：

車到大坪，景況更不同了：所有的商店沒有一家開門營業。很多人家的玻璃窗戶都被冷槍打破。每個窗戶都貼上米字條。有的還用棉被掛在裡邊。再往楊家坪方向走，電車線被全部打壞，東一截西一截掉在地上。電線桿光禿禿立着，有些則東倒西歪擺在路邊。沿途兩邊的房屋，斷壁殘垣，彈痕纍纍。沒有垮下來的磚牆，彈洞猶如篩孔。大火燒過的廢墟處處都是。街上看不見一個行人，能夠見到的是街巷和花壇裡掩埋的屍體。個別屍體的腿、手、鞋還露在泥土外邊。

武鬥特別嚴重的建設機床廠，在彎彎大樓裡，可以看見窗口處趴着尚未處理的屍體，有的腦袋趴在窗口上，有的兩手伏在機槍架上。街道兩邊，花木被全部拔除，種花的泥土全部掘出，闢為戰壕。戰壕上面堆起一排排的沙袋。我們下車走走，踏着半乾半腐的血跡。到戰壕邊探看，壕溝裡的彈藥箱，一箱一箱的擺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着。有的打開了，有的還沒有打開過。一麻袋一麻袋的乾糧，一桶一桶的飲水，一堆一堆的垃圾，一灘一灘的血液，一堆一堆的大便……

我們到了楊家坪轉盤。偌大一個轉盤花壇，全都埋了死人。貴州同志數了數，90多個墳包。有的墳包還不是一個人，因為有三條腿露在外邊。從大坪到楊家坪，有五個公共汽車站，約有五公里吧。我們沿途看了大約兩個小時。所到之處，沒有見到過一個群眾。上千家店舖，沒有一家開門營業。方圓幾公里的老百姓，基本上都逃跑避難去了。[1]

武鬥時期的市民生活

文革以來，交通運輸和市場商品供應等日趨緊張，市民生活已經十分困難。到了武鬥時期，一切更是雪上加霜。僅據有關史志記載，當時重慶的市民生活就遇到了如下許多問題：

1967年6月，由於武鬥升級，重慶生產急劇下降，導致城鄉市場極度混亂，商品供應日趨緊張，全市糧食庫存供應量由28天下降為13天，不少地區煤炭、豬肉、蔬菜脫銷。[2]

據不完全統計，至1967年8月5日止，長江上客、貨輪被武鬥組織搶劫百貨356噸、食品504噸、生豬2378頭及醫藥、香煙、罐頭等若干，損失近百萬元，導致重慶至上海、武漢的客、貨輪運輸中斷近40天。[3]

1968年1月1日，因武鬥導致煤炭供應日趨緊張，重慶全市自即日起實行煤

1 張光明《騷亂的重慶——文革十年親歷記》。

2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09頁。

3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0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炭憑證定量、限量供應。[1]

1968年3月下旬，重慶市四周專縣武鬥激烈，通往重慶的水陸交通中斷，市場糧食、煤炭供應極度緊張，出現搶購現象。重慶警備區組建糧煤專鬥運輸隊，以軍車代民車突擊搶運。[2]

1968年5月，重慶市四周專縣武鬥激烈進行，通往重慶的水陸交通仍然斷阻，1月至5月各地計劃調往重慶市糧食2.395億公斤，實際只調入1.26億公斤。至月底，全市糧食庫存僅4000萬公斤，其中大米僅夠七天供應，有的糧店脫銷。駐渝部隊緊急成立調糧辦公室，以軍車突擊搶運糧食，保證供應。[3]

1968年6月27日，鑒於重慶市缺糧狀況日益嚴重，市革委、重慶警備區成立調糧辦公室，組織軍車、民車共367台，由解放軍護送，經70天突擊搶運，一定程度緩解糧食庫存告急的狀況。以後一段時間，調入重慶市的糧食完全靠解放軍護送。[4]

1968年上半年，重慶四大煤礦（天府、南桐、松藻、中梁山）因武鬥嚴重減產，產煤量比上年同期下降50%，從而導致全市用煤極度緊張。由於缺煤，全市冶金系統用煤的生產幾乎全停，火車無法啟動。近郊221個民用煤供應點，脫銷147個，其餘的也是時斷時續供應。[5]

史志上的這類記載還只是一些大的概念，對於老百姓來說，日常生活中還有更具體、更瑣細的艱難與苦惱。比如，武鬥炮火打斷了輸電線路或供水管道，市民就得忍受停水停電之苦。有時，許多市民不得不挑桶端盆下河取水，沿江碼頭石級上取水者絡繹不絕，似乎回到了自來水尚未普及的民國初期。

1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3頁。

2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3頁。

3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4頁。

4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5頁。

5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5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當年重慶市文聯的業務幹部楊世元，一度離開文聯的家到妻子任教的衛生學校去躲避武鬥。他回憶武鬥時期的生活時說：

當時反到底派的「工總司」駐體育館，是第一線，文聯在後面，安全些。有一回他們武鬥中搶了一船豬，抬了些到文聯來殺，也不是正規的屠宰，就是拿搞武鬥的鋼釬捅死了，砍成幾大塊，有的人吃得拉稀，就自稱是成了「狂飆派」。吃不完，還召開「軍民聯歡會」——所謂「軍」，不是解放軍，是指他們的武鬥兵，說要慰問「解放區」的群眾，把附近居民找來，每家分一塊豬肉，上邊還帶着多長的毛。有一回我父親就給我們提來一大塊豬腳，說是他們發的。

每回武鬥一停，我們就趕緊回家去拿換洗衣服，拿牛奶鍋兒，拿煤油爐子……有一回我愛人回去拿衣服，剛剛把大衣找出來，就響起一陣槍聲，她趕忙趴到地上。

那陣因為武鬥，交通中斷，影響煤炭供應，沒得燒的了，只要解放軍軍車運來了煤炭，我們就都去裝，繼樓、向曉他們都斯文，就把我推上車去，他們把籮筐遞上來，我就拚命刨……搶完煤炭，我就成了非洲人——全身黑，只剩兩個白眼仁在轉。

武鬥結束後，文聯院子裡丟下好多鋼釬、籐帽，家家都拿籐帽來蓋泡菜罈子，有的拿鋼釬插在地上圍起來做雞圈。這是當時的獨特景觀。[1]

1967年8月21日，反到底派江北指揮部調集以軍工井岡山長安兵團、江陵兵團為主體的武鬥大軍向江北城（江北區當時的中心區）推進，八一五派被迫撤離。江北城成為反到底派的「解放區」。當年居住在江北城的市民張瑞華，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了反到底派佔領江北城後有關購買定量菜油的事：

於是，江北城大街上便出現了這樣的標語：

1 楊世元回憶，何蜀整理《文革風暴中的重慶市文聯》，未刊稿。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歡迎廣大群眾來我區買油購物！」

當時因為武鬥，交通不暢，所以其他區菜油早已脫銷，而市油脂公司設在江北城的煉油廠儲存的菜油卻又運不出去。那時每人每月憑票供應只有半市斤菜油。就是這麼一點菜油也還因為「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而難以買到。

因此，地處大坪、楊家坪和市中區的群眾，紛紛手提油瓶，絡繹不絕，經嘉陵江大橋步行到觀音橋地區，憑票購買定量菜油；南岸和市中區下半城的居民，則從朝天門過河到江北城打油。對於遠郊如李家沱等地的居民來說，這也不是一件小事，因為當時沒有公共汽車，為了那一兩斤菜油，只能徒步行走幾十里路到江北區，沿途還要提心吊膽經過許多兩派武鬥組織所設的檢查關卡，還要時刻準備着謹防捱武鬥流彈和遭認識的對立派「點水」（告密）被抓的風險。[1]

當時物資的匱乏，市民生活的艱難，在西南師範學院吳宓教授的日記中也有記載。如1967年8月22日他與一位老師閒聊：

……述新聞甚多。茲惟記重慶市中心區及大坪、楊家坪一帶，大戰，用遠射之大炮，又隔江用機關槍側擊汽車及行人，交通斷絕，尤以市內各區水電破毀，以重價購用肩挑之江水，且瀕於絕糧、無蔬菜，居民甚苦。[2]

1968年2月22日：「成君述其家況之艱窘，尤因文化大革命中秩序破壞，長女在南江『上山下鄉』者，因其地騷亂，回家久居，工資未發，口糧為人取佔。（賀君一子亦同）。二子初中畢業二載，迄未分發工作，皆閒居在家，故成君錢糧俱缺，賴本組同人濟助，每日全家啜粥，雜以青菜，恆不能飽等情……」吳宓在這段話後面忍不住加了一句點評：「然稱頌毛主席，毫無怨

1　張瑞華《武鬥時期軼聞一則》，載《紅巖春秋》2000年第二期。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224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言。」

同一天的日記中還有另一則頗具黑色幽默意味的記載：「晚……凌君述近日劫殺案，其一：甲乙二人，夜闖入九醫院某醫之家，逼索（持刀）得紙煙一盒，因分贓不均（甲欲多取，乙主平分），竟至拔刀互鬥，兩人皆受重傷。目前物資之缺乏，人情之橫暴，於此可見矣。」[1]

吳宓日記中還記載了武鬥直接影響到教職工工資發放的情況——

1967年6月21日：「下午3時，八三一廣播令全校教職員工及家屬咸集於會議廳（宓以牛鬼蛇神及勞改隊員未赴）；事後聞八三一領袖講話，略謂戰鬥（為應敵）尚須進行。全校薪津不能發，望各自用現錢在食堂買食票，其工人中最窮困者，當由八三一津貼、資助，云云。」[2]

1967年7月21日：「晚7—8曹慕樊來還書、借書，述其所聞八三一某首領對教職員宣佈：……已往領取經費，不日即發薪云云。」[3]

1967年7月22日：「唐君述所聞……發薪事，尚在磋商折衝之。蓋六月份西師經費領到後，碚市春雷取其四成（40%）發給春雷教職工薪，僅以六成付八三一發給校內人薪（其所取已太多）；今七月份，則春雷強索六成，否則不撥給八三一云云。故猶爭執未定，云云。」[4]

1968年4月12日：「眾雜談，知西師四月份薪，發出無望（工人已得借

---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385、386頁。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61—162頁。

3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90頁。

4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91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領），因銀行需兩派代表同往簽字領取，而聯合未成，殊難辦此也。」[1]

1968年5月11日：「眾述新聞：（一）兩派談判破裂，領薪無望。……」[2]

當時因交通癱瘓，公交車輛大多停駛，市民出門一般只能步行，途中往往要經過武鬥哨卡的盤查，一般市民都會很緊張，把守哨卡的那些小青年，有的完全出於惡作劇，要向過路人提出一些故意刁難的問題，最常見的問題是問你是哪一派的，若回答是與他們對立的一派，那就糟了，輕則捱罵，重則捱打甚至被抓去關押審訊。有的市民弄不清問話者屬於哪一派，怕回答錯了倒霉，只好說自己是「逍遙派」，但這樣的回答照樣會遭到責罵甚至毆打，其理由還振振有詞：「毛主席號召關心國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文化革命都搞了這麼久了，你還是逍遙派？你對毛主席指示是什麼態度？老實交待，你是不是『黑五類』……」

一位從忠縣來重慶探親的幹部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和親戚從重鋼職工住宅區渝鋼村到楊家坪晚間散步時被哨卡盤查的經歷：

（1967年）7月6日　晚飯酒醉後偕八、十弟、小春去楊家坪。返來經西區公園（引者註：即位於西郊楊家坪的重慶動物園）附近，突然在樹林下站數人，手持三角長刀兇神惡煞的大呼什麼人往哪裡去！說着就把刀對準我們。頓時弄得我驚魂失魄。放行後約二百步，突又有二人手持長刀頭戴紅籐帽，忽從黑暗地帶站出來攔住我們問：你們是哪一派的？十弟答不是哪一派。又問參加的哪一派？十弟答沒有參加。問到哪去，十弟答回家，我們是重鋼的。我接連說我是忠縣來的。

這一下把我魂都駭掉了，看來很有被戳一刀的危險。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432頁。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446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我們都站住不敢動。另一持刀者又兇狠狠的說了一個「去」，我們才急忙走到對面一邊。這真開了大恩。也許是我們把路走錯了，進入了他們的防線。聽說他們是共校（共產主義勞動學校，今楊家坪中學）的學生。昨天鋼校來打共校傷亡十餘人還死一人，今天共校就嚴陣以待。

走到路上探照燈又把我們四人照住。十弟連喊我們分開走不要目標太大，以免他們誤會。駭人，我巴不得兩步就走回渝鋼村，一直是到了家心才平靜下來，但回憶當時情景不免心砰砰作跳。駭死人。

8月5日　有一姓陳女孩今日由城返渝鋼村，她是經過石坪橋來的。在路上曾經多次被盤查，每次都是槍口對準胸膛，情況十分駭人。[1]

有的市民還會被無端抓住毆打。吳宓1967年7月3日日記中記載：「凌君惠（數學系無課老教授，住本舍二樓）來言：昨自江北家中來校領薪，下午行至大明廠外，被駐守之春雷軍擒捉，指為『八三一之偵探』，用木棒擊其胸三下，血出（示宓傷痕）今猶痛……」[2]

更可怕的則是走在路上被無端打死。武鬥期間時常會有無辜市民走在路上被飛來槍彈擊中身亡。當年的初中學生席慶生，多年後就反覆向人們訴說過他母親的死：

1967年8月24日，母親帶着我兄弟倆從九龍坡區灘子口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的家裡出發，準備到李子林[3]投奔親戚，因為雙方武鬥越來越厲害。上午10點左右出發，抄小路走到毛線溝屠宰場對面，大約11點，這時突然槍響了，第一槍打我，因為我走在最前面，母親在中間，他（席慶川）在後面。我們身邊的子

1　陳懋智《重慶武鬥日記》。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71頁。

3　李子林：在大渡口區，重慶鋼鐵公司黨委及公司機關所在地。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彈亂飛，打得地上的土撲撲地揚起來。我有武鬥的經歷，趕緊喊臥倒，自己同時就臥倒在地，這時刻我就聽見母親「啊」地一聲倒下去了，我轉過來一看，母親正痛苦萬分地撐着胸部，我不顧一切地撲到她身邊，大聲地叫媽媽、媽媽，抱着她的頭，她手上的血汩汩地流下來，兩眼直直地盯着我，沒有說一句話。我馬上撕開身上的白汗衫，準備包紮，這時，對方又用高射機槍朝我們掃射，我馬上脫掉白汗衫朝對方狂舞，表明我們是和平居民。但槍聲未停，我又臥倒在地，弟弟躲在海椒地裡。槍聲一停，我又爬過去看母親，她完全斷氣了，子彈從左乳下射進，從右腰部射出。我兄弟倆當時都沒哭，絕望了，茫然了，極度恐懼之下不可能有眼淚。路邊的農民這時從門洞裡探出頭來，朝我們招手，我們跑進門，背後山坡上的機槍又猛烈地叫起來了。我們倆抵着土牆渾身癱軟在地，我們一直躺了幾個小時……[1]

當時還有一種令人髮指的「打活靶」，即把過路人當作靶子練槍法，過槍癮。建設機床廠工人何心貴就是這樣無辜喪命的。他的兒子多年後回憶：

父親是建設廠工人，黨員，他沒參加武鬥，而是替車間工人領薪水，那是四十五車間關餉的日子，8月1號。半路被三十五中一名17歲學生練槍法，當靶子打死。那不是在戰場上。[2]

即使不出門，市民也會因「派性」衝突而「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落」。

吳宓1967年5月31日日記中記載：「8—11：30學習；聆諸君談昨夜半兩派復鬥爭（武鬥），其間春雷（1）毆傷教務處女職員和鍾華（彝族），當時呼

1　余劉文、韓平藻《青春墓地埋葬重慶文革武鬥》，載《南方週末》2001年4月19日。

2　陳曉文《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171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救無援者。（2）搗毀張清津教授之家，舊民主村，毆傷張夫婦及其二女，以其家近春雷總部，而張長女隸八三一，謂是『敵人』之奸細也。——以上受傷者均已送九醫院云。」[1]

1968年5月22日日記中又記載：「眾述說校內新聞：（一）昨（21日）上午八三一整隊在北碚市區大遊行，亦以慶祝毛主席接見在京學習代表二萬餘人為名，實則對春雷示威。春雷遂組織汽車隊往衝擊之。雙方在街中戰鬥，未用槍炮，僅用棍棒互毆，傷者極眾……（二）陳相武上午在市中觀戰，春雷疑為助八三一作戰，於是昨下午派附中『無產者』一群直至成君所住之宿舍內陳相武家捕捉陳相武，指為『國民黨特務』。陳逃逸，不獲，遂指其妻為『資產階級老婆』而加以凌辱，並毀其家中器物。彼等去後，妻與女在院中泣訴久之。」[2]

至於武鬥炮火傷及無辜的事就更常見了。

吳宓1967年9月2日日記記載，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職工中一位「牛鬼蛇神」成文輝：「兩月來，以厚被遮窗，日夜潛伏屋內，由校外進攻西師者之炮彈，不斷由其宅院中及屋頂上穿過（射入大校門內），幸未破屋傷人。」[3]

在重慶大武鬥時期，還出現了一種新「景觀」：「打財扒」。

所謂「財扒」，是指那些趁武鬥中社會秩序混亂之機，趁火打劫、搶劫民財的刑事犯罪分子，市民為了自保，按照戰爭年代流傳下來的民間傳統，自發組織起來，形成街道居民自保自救的一種超越派性的統一行動。一旦發現有事，不管哪派的居民都會自覺行動起來，「同仇敵愾」，高聲吶喊，敲打鍋碗

---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141頁。

2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456頁。

3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234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瓢盆，對「財扒」形成一種威懾力量。

在吳宓教授的日記中，對此即有記載，如——

1968年1月9日：「晚，唐季華來告：日昨『財扒團』多人已來碚，目的在搶劫西師與九醫院。昨九醫院宿舍一部分已被劫，職員白晝在院外亦被攔劫。明日為西師發薪之期，必將來此。聞若輩入人家，專務搜取（1）錢財人民幣（2）糧票（3）手錶。故勸宓宜作準備云云。」

1968年1月10日：「歸途，遇孫荃，語以夜間有寇盜入室，則大擊臉盆以報警，聞者應即赴救，以此為約，如其他宿舍之辦法云。」[1]

有時，因市民過度緊張，也會產生誤會，鬧出笑話。如有某青年到某街巷中找朋友玩，叫門無人應聲，便趴到窗口去往裡張望，引起對面鄰居懷疑，頓時「打財扒」之聲大作，滿街吶喊與敲打鍋盆聲齊鳴，那青年趕緊四下張望聲明：「我是來找朋友的！」

除了笑話，也有悲劇。在武鬥初起時的1967年5月下旬，重大八一五的武鬥隊就曾因為「打財扒」，而將幾個進入重大學生宿舍偷竊被抓住的小學生「供」出的「指使者」——兩個據稱有過小偷行為的年輕人，抓到校內，毒打審訊，折磨致死，釀成慘劇。當時曾引起極大爭端，重大八一五武鬥人員認為是「為民除害」，而砸派（反到底派）則認定是他們鎮壓反革聯會的群眾，雙方還就此發傳單、寫大字報，鬧得沸沸揚揚。死者家屬還將此案告到了中央，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文革聯合接待站批示給四川省和重慶市革籌小組，要求嚴肅處理。

甚至還有「財扒」反誣被搶劫者為「財扒」的事。吳宓1968年5月13日日記中記載：「西師工人家屬某婦，以勤能著稱。昨攜人民幣40餘元，以手帕包之，入碚市，以購食物及衣料。行至菜場，忽有男子某甲，驟奪其帕包（搶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348、350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劫），反誣該婦為『財扒』，劫取去彼之財物。旁有四婦人聞聲趨助，共擒捉該婦至公安局；局中人亦信之，遂痛毆該婦，且拘留焉。……後其夫聞悉，赴局陳述，該婦卒得釋回。而某甲早已乘機逸去，該婦之錢財未由追還矣！」[1]

不過，當年的傳單、小報，基本上都被狂熱、空洞的「大樹特樹」、「大批判」和派性攻訐的文字佔據了版面。涉及民眾社會生活問題的內容極少。1967年8月重大八一五在《八一五戰報》上發表的《把牛鬼蛇神揪出來示眾——當前重慶社會上牛鬼蛇神活動簡況》一文中，留下了這樣一點難得的記載，可見一斑：

一些流氓盜竊分子裹脅部分染有流氓習氣的青少年和流入城市的農民，組成流氓、財扒集團，經常幾十、甚至上百人的聚集在一起，在公共場所、繁華地區，特別是發生武鬥的地方，有組織地公開活動。6月21日，解放碑發生武鬥，有大批流氓、財扒趁機衝進東方紅電影院，打爛了銀幕，搶劫了放映機、鏡頭和4000多元現金（全部損失約十萬元）。群眾當場就抓住二、三十個財扒。[2]

1967年重慶大武鬥期間，一位從四川忠縣到重慶探親的幹部陳懋智，因受阻於武鬥造成的交通斷絕，一時無法回家，不得不分別借宿於大渡口區重鋼公司渝鋼村和市中區上清寺兩處親戚家中，他幾乎是逐日記載了一部《重慶武鬥日記（1967年6月18日—10月27日）》，他對這一大武鬥時期的重慶市民生活狀況，作了許多生動具體的記載，成為極有價值的歷史資料，現節選若干片斷如下：

---

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八冊448頁。

2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編《八一五戰報》第33期，1967年8月1日出版。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7月3日　渝鋼村[1]已停水二天。中午十弟揮汗去馬王場擔水，桶大約有120斤。擔得滿頭大汗，兩擔水擔了三個小時。

7月21日　渝鋼村附近兩個派的廣播又大肆叫吼，又呈恐怖狀態。晚飯後有兩個汽油彈，不知是誰投於渝鋼村，距我住處僅隔兩棟房屋。當時群眾一哄而至，我亦去現場看了一下，只見一堆白灰和一張紅布。投擲人逃跑無蹤。10點左右一派廣播說：渝鋼村家屬請注意，今晚某方準備大批人馬要來進行武鬥，務必密切注意。弄得大家惶惶不安。

7月28日　下午忽傾盆大雨。據說中午楊家坪曾放機槍，有賣涼水老人昨天死於彈下。這兩天到處都有謠傳，膽小的我更是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7月29日　昨晚入睡較早，在12點後房側馬路忽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從聲音中估計約有二、三百人，不知去向何方。樓上還有人起身去看的。我卻嚇得不得了。又過半小時左右楊家坪一帶傳來清晰可聞的輕重機槍聲，中間間隔很少，直到近天明始息。不知又是什麼緣故……

整天不見公共客車往來，當然又發生了事故。天一黑就開始害怕，這樣熱的氣候不免緊關窗戶。但祝今夜能平安度過。

7月31日　昨夜又有炮彈聲且極近，群眾都未出去看了。中午去郵電局發電報，據郵局稱電報電話均不通……

8月1日　昨夜10時以後即到處槍聲四起迄至早上未停。據傳西區公園路上有一老太婆和七小[2]附近一老人中彈身死，另有受傷者。當炮火熾烈時，居民仍不少觀望者。我睡在床上只聽到吱吱的聲音不時掠空而過。晚上楊家坪起火。我看了一下就回家了。

8月2日　菜市上有一老者挑着兩大綑行李，圍着一大堆人。他是從楊家坪來的，他說昨夜失火處係楊家坪河南飯店（隔壁）收購廢品處，共燃三間，是照明

1　渝鋼村：重慶鋼鐵公司的一處職工住宅區。

2　七小：重慶鋼鐵公司第七子弟小學。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彈引火。因炮火熾烈無救火者。起火處樓上的人都用繩吊下來的。又說有一坦克開來，周圍機槍圍攻，後開至一高處，天明才開走。

開槍事件越來越激烈。以往只是晚上開槍，今天卻是白天開槍了。無知的孩子們一會一齊擁上山頭，一會狂奔亂跑，我看實在駭人……中午楊家坪公路上開來三輛坦克，人們又擁至山凸爭看，我也去看了。果然幾輛坦克橫臥路中清晰可見。

8月5日　8點沿公路去大渡口火車站，買到去重慶的車票（3角）。一會有持刀槍的青年來到車站尋找「敵人」，結果被帶走六、七個。在賣票以前車站仍公佈不賣票，有無重慶車還是一個問題。10點左右成都車開來了，大家一擁而上。殊開至九龍坡，正遇對面開來一車，機頭被亂槍擊中，水箱打穿不能續開。被迫停於九龍坡。這一來我們的列車司機就不敢開車。一會萬盛方面又開來一列車。三列車均停於九龍坡。約半小時車站公佈，前面槍聲急密車不能開，乘客下車自行設法入城！初大家都觀望不下。後無可奈何絕大多數下車走路。我亦下車開走。殊知未行半公里，前面槍聲如下雨一般響個不停。幾千行人蜂擁後退我亦後退，在車站聽候解決。不少人打電話去警司請解決問題。直到4點多車才續開重慶，人們無不提心吊膽聽其自然，結果冒險開到重慶。

在火車上就聽人說兩路口至上清寺都架有機槍，更把我駭得不知如何是好。到站不少人即將離站，開往成都的乘客問前面打槍的情形。我又渴又餓不敢稍停，匆匆忙忙向上清寺走去，一上兩路口果然路斷人稀，邊走邊問偶有三五行人也是驚驚慌慌。一到李二哥家，正見他們將衣服行李包裝成綑準備進防空洞。他們見我來都驚問我來作甚。傍晚我亦隨他們進防空洞，抗戰後已20餘年不嚐此滋味了。據說今天廣播公佈居民如不進防空洞，則安全不負責任。

8月6日　昨夜提心吊膽的過了一晚，主要是怕燒房子。今晨起床廣播即大肆宣傳雙方已於今晨0時40分達成停止武鬥協議，大字報旋亦滿街通貼，因此人心大安。上清寺街心花園頓時熙熙攘攘行人驟增，大家歡天喜地慶祝武鬥停止。上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清寺轉角前晚為炮火轟擊的大洞洞和二輛汽車（一司機當場擊斃）也停放路旁。馬路上遍地皆是玻磚渣滓，目睹者大談經過。上午仍有炮聲。協定規定從今天12點起生效，當然只有待下午，不過人們思想上是安定了。搬走的居民有的又陸續搬回來了。街上的人越來越多了，但交通仍未恢復，長途客運站仍堆滿旅客。有的路費用完，有的找不着旅館。郵電局今天依然關門未營業。解放軍仍武裝運糧入市。

8月7日　早上街上行人不少。公共車僅開臨江門一路在行駛，長途客車仍未開……下午忽傳來槍聲。據說是兩路口電影院當門。中午我才在那裡耍，真危險。又嘉陵大橋一路過行人姓羅約40餘歲，突被一群青年拳擊身死。當抬至口腔醫院急救亦無效。傍晚又有幾輛滿載武裝架着機槍的卡車風馳過市。居民惶駭，入夜路上行人寥寥。

8月8日　天未明密集槍聲不斷傳來，估計是在兩路口一帶。早飯後出街看大字報，正走至口腔醫院門口，忽見後面人聲嘈雜，紛紛從人行道湧退。我急忙回頭一看確見有十餘青年手持短槍對準前方洶洶而行。我當時不及躲避亂竄一民房中，正有一女人睡得正鼾，不得已又出來擠入一糖果店，該店不准進入乃緊逼而進。這時忽聞持槍者連發數響，心更駭。一會有人來說是抓的昨天在大橋故意打死二人的壞人，但炮是從空中發放。我見這些青年走遠遂疾步而回，真是駭人。約半小時又出現同樣情況。據說這幾個人弄去是難以活出來的。

正午太陽正烈，街上行人一擁而至街口，特別是孩子更是叫喊不已。我出門一看，正好一部全新的裝甲車和一輛重型坦克車從牛角沱方向駛來。我還是第一次逼近看，不過今天看是有些駭人的，裝甲車和坦克車都子彈上膛，殺氣騰騰。下午4時又沿路開回。這說明今後武鬥更會升級。下午5時遠處傳來大炮和機槍聲，後有人說是重慶飯店樓上在打朝天門的輪船。晚上還稍平靜，僅體育館方向打了幾槍。有位張醫生從小十字回來，他說昨晚到今晨小十字一帶、臨江門一帶開槍很久，街上行人被打死的還露屍街口無人收屍。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8月9日　我決定於今日返大渡口……到火車站買票的人山人海，我的衣服包包幾乎擠掉。上車後11點開，行至銅元局附近，忽聞槍聲又起，車上人倚地而坐。有一從上海來的乘客說：從上海到重慶只有這裡才像這樣。另一乘客又說：剛才靠近火車站的菜園壩江邊被亂槍打死一人傷一人皆女的，因聞槍聲亂跑而中彈。想起我前天在菜園壩河邊問船多嚇人。

8月13日　下午遙見市內濃煙如柱，據說是朝天門附近失火。竟日仍斷續聽到炮聲，尤以傍晚楊家坪一帶為急，我在山坡乘涼只有退避回寓。

8月15日　今晨1時到天亮槍聲未絕，且愈打愈猛，槍聲又很近。樓上還有人去山坡觀望。今天亦斷續有槍聲。將近天黑我在渝鋼村口乘涼。途中忽有青年數人持槍往渝鋼村方向走去。群眾嘩然。尤以小孩竄擠看熱鬧。我生怕槍有失誤，當逃往榮休隊暫避。駭得我雙腳發抖。

8月17日　早飯後去郵局交信，據答要20日後才設法送進城。匯款不收，電話電報不收。

有人說今天李家沱開槍打登陸艇，彈如雨下。過對河的老百姓駭得很兇。適火車通過這裡，為要求停火拉汽笛約十分鐘。講話人是從彈子石進城沒過到河，沿河上行直到馬桑溪才過了河的。又一人說城裡前天失火是燒的交電公司。他距那裡只幾十公尺遠。他說城裡到處都在打，主要是大炮打得兇。渝鋼村商店和附近商店暫時沒有鹽巴、佐料、菜油等物。居民不少去鄰近鄉鎮購買，有的甚至走到白市驛。

8月22日　5點過幾分正在煮夜飯，忽然對面朝着我們的房屋連發子彈十餘發，炮彈就爆發在附近，我的腳都站不穩，駭得抖起來。這樣下去如何得了……

又在發（放）槍了，心子都要落，一身都發抖，我的處境真夠扎實，身邊又無錢無票，欲走不能。火車已停駛三四天。聽說城裡還鬆活點，但怎麼去呢？原可唯一通行的火車路，前兩天有兩個車頭被打翻倒在九龍坡附近隧道裡無法通行了。大渡口車站以往候車人擠成一團，而今也是冷冷清清沒有一個人了。……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近晚渝鋼村空氣異常緊張，四面八方的槍炮聲呼呼吱吱不斷飛過，有時房屋都像要坍塌。三部坦克和幾部裝甲車已開赴楊家坪公路上，增援卡車載着戰士飛速馳往楊家坪。炮彈着地之處不是一片濃煙就是火光一閃。楊家坪已為股股黑煙所遮住，明顯起火處有四起，越燃越旺，直到深夜未熄。天剛黑槍聲越密、越響、越近，「可可可」就像在身邊掠過。大炮的射擊簡直像鞭炮一樣厲害。一顆炮彈落在渝鋼村坡下，居民們開始慌了，拖兒帶女揹挑行李從遠處逃難者絡繹不絕。約半小時炮聲簡直連次數都不能辨別了。許多住戶的電燈仍然大開着，有武裝巡邏隊來強制關燈，很快全村燈火盡滅。樓上住戶都把東西往樓下搬，大人娃兒都在樓下過道處打地鋪。無知的孩子們一聽連串炮聲、照明彈、坦克等卻連聲叫好，拍手高歌，一點不知厲害。其實這兩天為流彈所傷的人是人所共睹的，為什麼還不害怕呢？

8月23日　昨夜軍管會門口數以千計的「難民」守住不走，要求保護生命安全。絕大部分是由楊家坪遷出的。即使炮火最激烈仍有難民往外逃命，其狀十分淒慘。渝鋼村居民今天搬走的也多，同我們一棟的人幾乎都十家九空。樓下六戶全走者二戶，老弱者走四戶。有的把娃兒放在籮筐裡，有的扶着行動困難的老人。有的甚至還帶着炊事用具。我想萬分無法罈子還有十來斤米，我帶走就可以維持十天左右，可能就能解決問題。

……4點多鐘，楊家坪又傳來炮聲，同昨天差不多厲害。八輛坦克十輛裝甲車和多輛卡車都從公路上開過。有一汽車開在前面約300公尺處就未繼續行駛，大家料定為槍傷。楊家坪又中彈幾處起火，濃煙如柱升達太空。入夜火勢更明，起火有三處。今天風特別大，故火勢較熊。

我今天亦冒險去凸處觀看。只見機槍穿來穿去如星星過渡一般，密如春節放煙花，只不過顏色是綠色。

8月24日　早飯後去郵局交信，只見大門上貼了四個大字「停止營業」。李子林公路上仍有端槍巡邏的卡車和小隊，令人有些害怕。從楊家坪一帶逃來（在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軍管會門前）的男女老少，揹、挑着行李的依然絡繹不絕。據說昨晚火勢太猛不走不行，今天走的已是走得較晚的了。有的走在中途丟失了小孩哭哭啼啼，要想回頭去找又怕流彈傷人。（據說昨天有一對逃出者為回頭去再搶點東西出來，結果兩人被亂槍擊中橫臥西區公園門口無人收屍。）每過一堆人，不少（人）關心的去問長問短，有的還幫助端茶送水。年老的拄着枴杖一步一歇一說一哭。我看到這些情景不禁含淚欲滴。

8月28日　據說距此不遠的公路上有一男一女被槍打死橫臥路心，由於連日暴曬面部已炕糊。善心人今天用繩將死者雙腳綑着拉往路邊用泥土堆上。此人究竟張王李姓無人得知。有的猜想似為夫婦。

9月14日　李二哥家今午吃肉。從武鬥到現在有近兩月未吃肉，今天每人供半斤計二斤半。

10月1日　國慶節居民每人供肉半斤……

10月4日　12點半去寬銀幕電影院看《紅太陽照亮了芭蕾舞台》。其涵天亮就去站輪子，但還幾乎沒買到。……5點左右街上有十輛汽車載着昨晚被八一五派打死的吳雲龍屍體及送葬者沿着兩路口入市中區，這樣的遊行我還是第一次。

有個六七十歲的老婆婆白天黑夜都在街上要她的女兒，昨晚深夜幾乎喊到天亮。她喃喃自語地說：你抓去幾天了嘛，還不放出來，快放呀……她的女兒是個幹部，前一向被另一派抓去迄今未回。也是一幕慘劇。[1]

1　陳懋智《重慶武鬥日記（1967年6月18日—10月27日）》，未刊稿。其中大部分內容已經由其家屬提供以《重慶武鬥見聞日記》為題連載於網絡刊物《記憶》2008年第三、四、五、六、七期。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毛澤東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就在老百姓眼前不斷看到文革武鬥引起的「慘劇」的同時，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毛澤東卻「高瞻遠矚」、「獨具慧眼」地看到了另外的形勢。

1967年10月7日，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要求各地組織學習貫徹。毛澤東在這「重要指示」中，不但隻字未對各地發生的大規模武鬥表態，甚至竟稱其視察期間（正是各地爆發大規模武鬥的7、8、9三個月）「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形勢大好，不是小好」，這就是毛澤東對全國各地大規模武鬥即「全面內戰」時期的一個基本評價。

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對武鬥的延續顯然只會起到鼓勵作用。儘管重慶兩派在學習、貫徹毛澤東指示和「九五」命令中上繳了一些武器，作出了一些聯合的姿態，武鬥的規模略微縮小，武鬥熱點轉移到周邊區、縣，但卻並未真正停止，因而在不久之後的1968年4月至8月間再次惡性爆發。

「形勢大好，不是小好」，這也是毛澤東對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估計。

在「全面內戰」的1967年7、8、9三個月，由於武鬥，重慶市大批職工外逃，工廠停產，全市工農業生產急劇下降，三個月工業總產值僅完成2.4億元，相當於3月份的75%。8月，省革籌調查組調查重慶武鬥損失情況，調查表明，重慶165個大中企業因武鬥停產或半停產的達157個，其中完全停產的達109個，因停產減少產值3億餘元，廠房和大量物資遭破壞，直接損失達1億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元。主要公路被切斷，交通基本癱瘓。[1]

重慶地區的「全面內戰」，對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群眾的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全市工農業總產值為25.65億元，較1966年的31.96億元下降19%。[2] 由於武鬥，煤炭生產下降，交通運輸癱瘓，煤炭供應緊張——從1968年元旦起，全市被迫實行煤炭憑證定量、限量供應。[3]

當然，毛澤東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也許根本就沒有算這些「經濟賬」，而是算的「政治賬」。那麼，政治上果真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嗎？

歷史已經作出了回答。

---

1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版411頁。

2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重慶出版社2001年10月版101頁。

3 《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13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尾　聲

無言的墓群

1969年1月，坐落於重慶市沙坪壩區沙坪公園內，群眾自建的武鬥死難者墓群，結束了最後一批墓塋的修建。

據對這個墓群進行了長期專門研究的陳曉文（重慶出版社編輯）統計，從1967年夏以來，此地先後建起了113座墓塋（據另一位墓群研究者、退休中學教師曾鍾繼陳曉文之後的調查，墓塋數量已經超出這個數字，有130餘座）。其中，除去個別沒有立碑或碑文已經風化湮滅的以外，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仍有碑文資料可考的92座墓中，安葬了345人，加上那不可考的墓中的死者，估計整個墓群共埋葬有約400名死難者。[1]

這些死難者多為重慶大武鬥的直接參加者，少數為無辜遇難者。在有年齡資料可考的196人中，最多者是20歲以下，佔69人，其次是21—30歲，佔66人。年齡最小者14歲，最大者60歲。[2]

在有職業身份資料可考的299位死者中，最多的是工人，佔176人，其次是學生，佔104人（其中又以普通中學學生最多，佔82人）。[3]

1　陳曉文《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載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166頁。

2　陳曉文《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載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166頁。

3　陳曉文《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載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166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在這片墓群中，埋葬死者最多的合葬墓塋，主要是工廠企業的，如生產槍支的大型國防企業建設機床廠八一兵團的墓塋埋葬有31位死者，生產坦克、裝甲車的大型國防企業空氣壓縮機廠八一兵團的墓塋埋葬有37位死者，生產國防鋼材的一〇二鋼廠（後更名特殊鋼廠）二三〇七革命工人造反團的墓塋埋葬有15位死者，生產炮彈的大型國防企業江陵機器廠八一兵團的墓塋埋葬有10位死者，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的墓塋埋葬有16位死者，二七戰鬥團總指揮部金屬兵團的墓塋埋葬有8位死者……[1] 因此，將這片以產業工人及其他行業職工造反派死者為主體的墓群稱為「紅衛兵墓園」，顯然是不準確的。因紅衛兵特指學生中的群眾組織，而且，「紅衛兵」又是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它既指文革初期以高幹子女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主要在北京），又可指各地黨政領導仿效北京模式聞風而動組織起來的官辦紅衛兵，還指各地向黨政領導造反、奪權，後來有代表進入各級革命委員會的造反派紅衛兵，甚至還指群眾組織解散之後，在各中學一度取代原共青團組織的紅衛兵（在小學則由紅小兵取代了少先隊）。所以，我一直主張將這個地方稱為「文革武鬥死難者墓群」，簡稱「文革墓群」。

因重慶大武鬥時期沙坪壩區為八一五派控制區，此地安葬的死難者多為八一五派成員或其親屬，因此在這片墓群的許多墓碑上都塑有象徵「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的火炬——火炬的手柄由「815」三個數字組成。這個圖案是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八一五戰報》主筆周孜仁在辦報時設計的，因其簡潔明快，便於繪製，後來就成為八一五派通用的象徵圖案。

這片墓群中的墓碑的樣式，有的是模仿古代墓碑，有的則是模仿人民英雄紀念碑。從墓碑上那些文字，可以明顯看出當年的造反派與文革前革命傳

1 陳曉文收集整理的《重慶紅衛兵墓園一覽表》，2005年5月4日在凱迪社區網站貼出，華夏知青論壇等網站轉貼。2006年2月6日被封。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統教育的思想淵源。不少墓碑上除了刻有文革口號（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可捱打，可捱鬥，誓死不低革命頭」）之外，一般都刻有毛澤東為死於抗日戰爭或國、共兩黨內戰中的革命烈士的題詞，以及毛澤東詩詞中的名句，如「死難烈士萬歲」、「死難烈士永垂不朽」、「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之類，套用的毛澤東題詞，一般都是模仿的毛氏手跡。

墓群中，重慶市第二十九中學的那座墓碑顯得十分突出，這座多人合葬墓建成於大規模武鬥暫時告一段落後的1967年10月，其碑文很有時代特色，全文如下：

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吐春華。

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我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余志強、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織的八月天，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

死難的戰友們，一想起你們，我們就渾身是膽，力量無窮，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

親愛的戰友們，今天，我們已經用戰鬥迎來了歡笑的紅雲。

披肝瀝膽何所求，喜看環宇火樣紅。

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這大旗啊，我們高高舉；你們殷紅的鮮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這火炬啊，我們緊緊握！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絕不丟，你們鏗鏘的誓言啊，已匯成千軍萬馬、萬馬千軍驚天動地的呼吼。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松翠柏，巍然屹立紅巖嶺上，歌樂山巔。

揮淚繼承烈士志，誓將遺願化宏圖。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死難烈士永垂不朽！

八一五革命派死難烈士永垂不朽！

重慶革命造反戰校（原二十九中）

毛澤東主義戰鬥團

1967年10月

這座墓中埋葬着的重慶市第二十九中學八位學生，均死於1967年武鬥戰火最熾烈的8月間，「八三」、「八四」、「八二二」三次武鬥中。他們分別是——

張光耀，二十九中高三學生，該校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勤務員，1967年8月3日，因兩派在二十九中校內武鬥，石油學校的八一五派有人中彈受傷躺在操場上，無人敢前去營救。石油校的幾個女生跑到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團部求救。張光耀聽了她們的哭求，轉身就走，用他同學的話說，「活像到大操場去撿個籃球轉來一樣」，[1] 走去就被對方射殺；

歐家榮、余志強、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這六位學生，是1967年8月4日幫財貿八一五總部搬家時，在財貿俱樂部門口遭遇反到底派武鬥隊突襲被槍殺的，當時幾個女生嘴裡還在吮吸冰糕。女生中14歲的楊武惠，就是這片墓群全部死難者中年齡最小的兩人之一；

孫渝樓，二十九中高一學生，時任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駐南岸區革聯會代表，1967年8月22日在反到底派攻打南岸上新街八一五派據點時，為掩護其他人撤退，隻身斷後，中彈身亡。

---

1 張魯《紅衛兵武鬥懺悔錄》，載《紅巖春秋》1995年第一期。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另一座單人墓，其墓碑上的文字是：

江丕嘉同志簡歷

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江丕嘉同志（男），1949年9月5日生於重慶小龍坎，1966年10月加入中學生紅衛兵，1967年3月加入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8月21日晨6點50分為保衛中央赴渝調查組的安全英勇獻身，年僅20歲。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勇敢戰鬥，在鬥爭的最前列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江丕嘉同志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於泰山。

這篇墓文中，「為保衛中央赴渝調查組的安全英勇獻身」一語有些聳人聽聞，其實這只是寫碑文時的誇張、溢美之詞。據知情者回憶，江丕嘉是重慶第四十一中學（今巴蜀中學）高三學生，其父在重慶大學任教。1967年8月21日晨，江丕嘉正奉命駐守在重慶市市中區的制高點枇杷山公園上。晨6時許，江北區的反到底派向這邊開炮，其時，江丕嘉正背倚一棵樹睡覺，不幸被流彈擊中身亡。而同倚此樹的另一同學卻毫髮無傷。因江丕嘉出身名門，長得又十分英俊（私下有「美男子」之稱），因此在他的追悼會上，班上的女同學們哭得最傷心。[1]

中央調查組一行是在1967年8月21日下午6時抵達重慶的（從成都飛渝）。這時離江丕嘉身亡已經有約12個小時了。何況，中央調查組到重慶後一直住在鵝嶺下邊的五十四軍軍部，哪裡需要你幾個中學生跑到枇杷山公園上邊去「保衛」？其實，無論是「保衛中央調查組」還是「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死難者都不過是文革祭壇上毫無意義的犧牲。

墓群中，有一座重慶第三中學高中學生艾淑全的墓，艾淑全是當時三中

1　《讀者來信》，載《龍門陣》2006年第七期。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抗大兵團勤務組成員和武鬥隊負責人。墓碑上的文字是：

艾淑全烈士，男，河北天津人，工人家庭出身，優秀共青團員，重慶三中抗大兵團優秀戰士，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於1967年8月3日英勇犧牲，享年21歲。

艾淑全的一位女同學徐若丹（1968年7月16日為紀念毛澤東暢游長江而帶頭下嘉陵江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在日記中記下了艾淑全死後她的心情和他們在沙坪公園墓地埋葬艾淑全的情景：

1967年8月3日　下午睡覺起來，剛到紅專樓門口就聽見說艾淑全死了。我根本沒往那兒想，還以為是別人騙我的。一會兒後，「打漁船」回來了，抬下了艾淑全的屍體，一個個悲憤已極，向天連鳴數槍以致哀。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天晚上還好好地和我們談天，談論當前形勢……

烈士遺體抬到會議室，人們都悲憤地低着頭，站在旁邊為他默哀。有的低低地哭泣，有輕輕的歎息聲……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天在呼嘯，地在動搖。大自然和戰士的心靈正唱着一支悲壯的樂曲。我們冒着細雨在街上分頭刷大標語：向李任死黨討還血債！

艾淑全烈士遺體躺在會議室桌上，他已換上了軍裝，手裡拿着語錄，還戴上了主席像章、胸章和袖章。他眼睜着，嘴微張着，像在說：我不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不把李任死黨鬥垮鬥臭，就是死不瞑目。

1967年8月4日　昨晚一兩點才睡。今早聽說烈士家長來了，忙起身到兵團，才走攏，一陣悲憤的哭聲傳來，那是艾淑全烈士的媽媽、妹妹、爸爸、弟弟在哭。聽到這淒悲的哭聲，誰不動心流淚呀。艾淑全是我兵團負責人之一，又是革聯會的專政委員會的常委，平常和同學玩得來，臉上總掛一絲笑容，同學都知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道他工作踏實，認真積極負責。死了他，誰都覺得可惜。聽說還要等他哥哥來才埋，這是最後一面哪！

1967年8月6日　艾淑全烈士的哥哥來了，他是天津大學的學生。他見了艾淑全烈士的遺體後，默哀了好久，摸了他，把自己的紀念章、袖章給他戴上了。這時，他爸爸再也忍不住，痛哭起來。他哥哥為了不讓老人傷心，只背着老人流淚。看着這場面，誰不陪着掉淚呀！化悲痛為力量，一定得向李任死黨討還這筆血債！

1967年8月7日　昨天開了追悼會，烈士全家講了話。烈士生前好友介紹了他生平。他很早就造反了，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被打成反革命、暴徒、牛鬼蛇神，受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高壓，那時他沒屈服，為革命，四處奔波，他曾說過：「為了黨，我願獻出一切。」現在他實現了他的諾言……

今天，我們都懷着沉痛的心，埋葬了烈士。烈士埋在沙坪公園，烈士墓裡，我們向他發誓，要繼承他的遺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接着，每人捧了一把泥沙，埋葬了烈士……

一個英雄倒下去，萬桿紅旗沖天起。英雄的死更多的喚起了受蒙蔽的群眾，烈士的血不會白流，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願將青春獻給黨。[1]

當年可歌可泣，如今可悲可歎。這片墓群中的每一座墓裡，都埋有許多這樣的故事。

這是全國至今保存完好、頗具規模的唯一的武鬥死難者墓群。

當年在重慶的許多學校、工廠，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園或花圃（如

1　根據徐若丹日記原件錄入；由徐若丹妹妹徐軍提供。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市體育館、朝天門碼頭、上清寺轉盤、楊家坪轉盤、嘉陵江大橋頭等地），都曾修建有武鬥「烈士墓」，但是後來都被平毀了。

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在當年的大規模武鬥中共死亡24人，24個風華正茂、熱情單純的大學生！1967年大規模武鬥結束後，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在校園內的松林坡上為他們修了一座規模不小的「烈士陵園」，墓前立了紀念碑，紀念碑上刻了仿毛澤東手書的「死難烈士萬歲」。陵園進口處還豎了很大一面詩屏，上刻毛澤東悼念亡妻楊開慧和故友柳直荀的浪漫詩句：「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當年許多八一五派的同學畢業離校時都會來到這「烈士陵園」憑弔並合影留念，表達對死難同學的緬懷之情，並相許今後要經常回到這裡來祭奠不幸早夭的同學。然而，文革結束後不久，這座陵園就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號下被平毀了。

那些年輕的「烈士」或曰「冤士」，曾經滿懷豪情地「為毛主席而戰」，最終卻死無葬身之地。

值得慶幸的是，沙坪公園內的這一處「烈士」墓群沒有被毀。儘管多年來不時會有它將被拆毀的消息引起輿論的關注，但是它畢竟遠離鬧市，所處地段實在偏僻，在一波又一波的城市開發熱潮中也很難讓人看到開發價值，再加上墓群數量大（上百座），安葬死者多（數百人），涉及家屬親友更多（其中既有事業成功人士也有下崗困難人群），因此開發商一般都不會去打這塊地方的主意，免得給自己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就在這片墓群的最後一批墓塋建成40年之後，在2009年底，重慶市政府批准將此地列為文物保護單位。雖然用了個不甚準確的「紅衛兵墓園」的名稱，但總算是將它正式作為歷史文物保護起來了。巴金老人呼籲多年而未能建立的「文革博物館」，總算有了一個正式的實體性的「分館」。

如今。這片墓群中的不少墓碑已經風化剝蝕，碑文字跡已經難以辨認。作為文物加以保護和搶救已經刻不容緩。但不知人們是否注意到，需要搶救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的，還有對那段歷史的記憶……

2006年9月5日第一稿完成

2007年9月25日第二稿修訂完成

2008年6月21日第三稿修訂完成

2009年8月11日第四稿修訂完成

2010年春節期間第五稿修訂完成

於重慶風江閣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後　記

本書的寫作，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

要寫好重慶武鬥，一要有資料，二要有對親歷者的採訪。而對於我來說，這兩方面都很欠缺。儘管重慶是我的家鄉，自出生後我就一直生活在重慶，但恰恰在重慶文革大武鬥期間我卻基本上在外地，對家鄉發生的各種重大事件多係間接瞭解而少有親歷實感。家裡搜集的一些小報曾由我父親（他喜歡做事有條理）精心裝訂成冊，已經頗為可觀，但是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期間，街道居民委員會三令五申，嚴厲告誡各家各戶交出文革「派性宣傳品」，否則今後查到就要嚴辦云云，我的外婆成天提心吊膽，再三叮囑我們不要再保存那些堆在床下可能惹禍的資料了。那時百姓家裡居住面積狹小，根本無地方可以收藏，加上我父親又是「摘帽右派」，文革中又被批鬥、遊街，那時正在工作單位上監督勞動，經不起任何新的打擊，因此我只好忍痛把那一冊冊小報拆開，選取極少幾份內容最重要的留下，其餘的全部陸續在燒火煮飯時化成了灰燼。

文革結束以後，我又重新開始搜集資料，總算陸續又積累了一些。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的寫作興趣已經從文學轉向了歷史，這時想的雖然還是要寫文化大革命，但已經不再是想寫虛構的小說而是想寫真實的歷史，不是想歌頌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而是想反思那場史無前例的大動亂了。1994年，我開始學用電腦，學習打字時打下的第一行字就是「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我把錄入重慶文革大事記當作打字練習，開始了新的寫作。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寫作有關重慶大武鬥的歷史，還得益於許多當年當事人和知情者的支持幫助。其中，特別需要提到的是當年重慶反到底派的「一號勤務員」、年長我十歲的李木森。在我幫他整理回憶錄前後，我們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雖然對文革和對毛澤東的認識與評價不完全一致，但我們相互能坦誠相待。通過他，我陸續結識了當年重慶兩大派群眾組織的一些風雲人物，並同其中一些人建立起了友誼。他們給我講述了許多親身經歷，提供了許多鮮活的細節，使我對那場震驚世人的大武鬥有了更為真切的瞭解和感受。

此外，同樣對重慶大武鬥進行了關注和研究的一些重慶朋友，如文革小報收藏家張瑞華先生，最早提議寫作重慶武鬥紀實作品卻壯志未酬英年早逝的于琦先生，最早寫作並出版了有關重慶文革的長篇回憶錄的周孜仁先生，最早研究重慶沙坪公園武鬥死難者墓群的陳曉文先生，曾親歷重慶武鬥並對一些武鬥事件展開了認真調查研究的韓平藻先生，曾親歷重慶武鬥並較早寫出了有關紀實作品的李正權先生，對重慶武鬥墓群及其相關背景進行了大量追蹤採訪的曾鍾先生，因母親在武鬥中無辜遇難而長期成為沙坪公園文革墓群義務宣講員的席慶生先生，遠在異國他鄉卻繼續關注研究重慶武鬥的人類學學者張躍宏先生等，都以他們搜集的資料和他們不同角度的著述及研究成果、親歷見聞給我的寫作無償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和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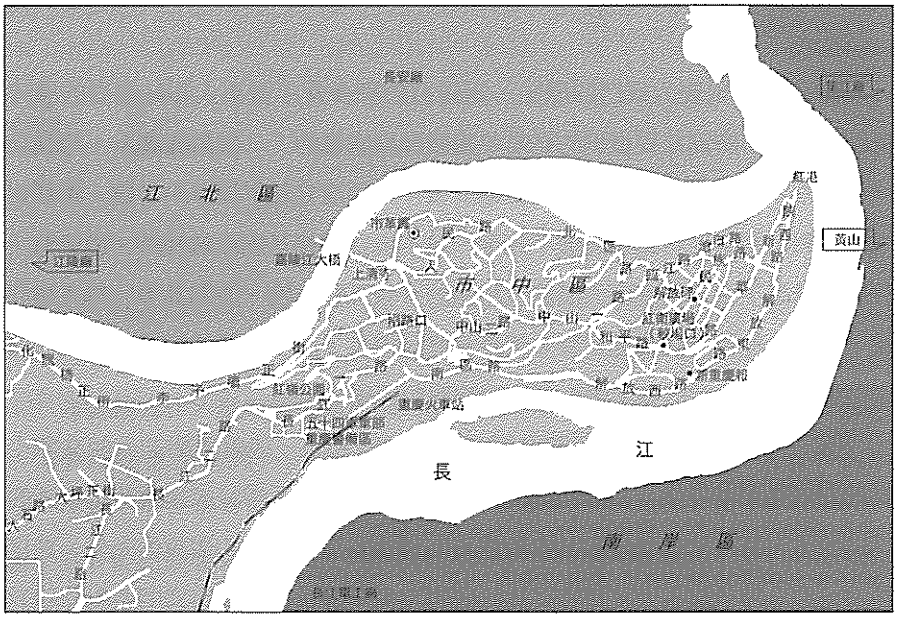
當然，由於官方收藏的歷史檔案仍不解密（重慶檔案館的文革時期檔案要有中共市委常委的批示才能有限地查閱），對文革武鬥中的一些重要情況（比如武鬥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仍然難於查清。這只有等待來日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有些人經常用來教訓東鄰的話，然而對自己的一些「前事」卻似乎希望人們能盡快遺忘。但願此書能為拒絕遺忘的人們提供一點有用的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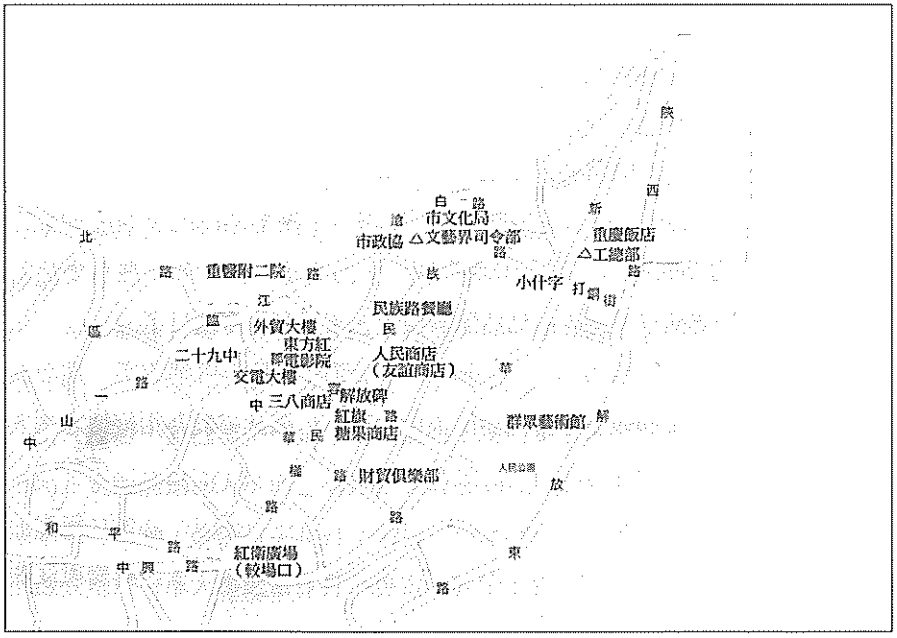
2010年春節

於重慶風江閣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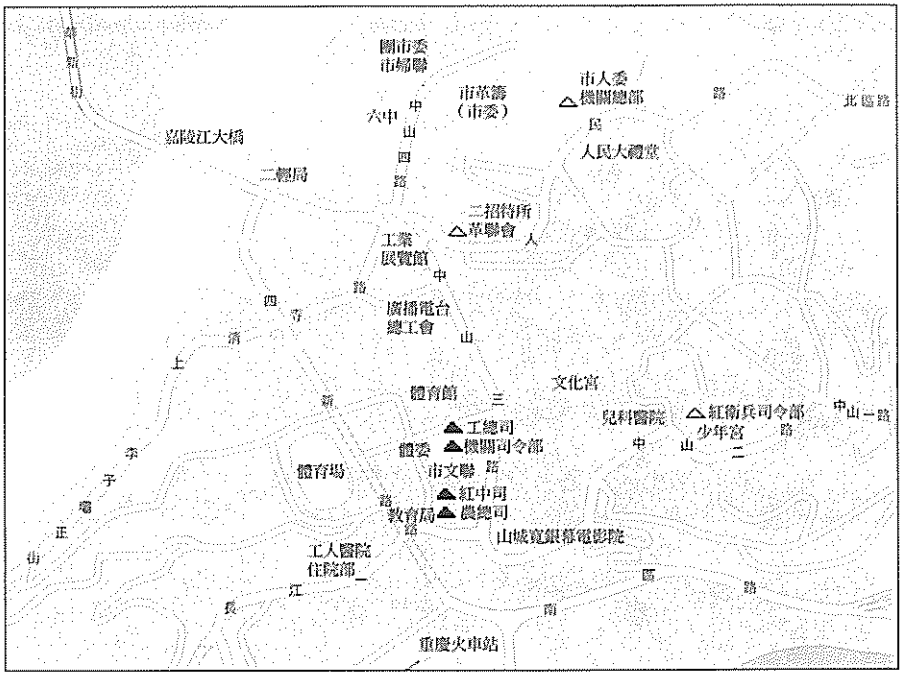


重慶武門時期地形圖（苗佳製作）



重慶武門時期地形圖（解放碑地區）（苗佳製作）

天涯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重慶武門時期地形圖（兩路口上清寺地區）（苗佳製作）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

重慶市沙坪壩區沙坪公園內，有130餘座墓塋，裏面安葬着約400名文革時期重慶大武鬥的死難者，其中年齡最小者14歲，最大者60歲。

在研究文革的中外著作中，本書是第一部研究武鬥的專著，它以客觀、冷靜的態度和詳盡的史料，敘述了以派性武鬥為主要內容的重慶文革歷程，並對造成武鬥的思想源頭做了深入的思考。

HK$ 128.00

ISBN 978-962-04-2995-8
9 789620 429958

聯合出版集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當代中國研究所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g.info